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共和国之战 (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共和国之战

第十二章 由盟友变仇敌，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两军恶战珍宝岛。毛泽东智破核讹诈。

第一节 毛泽东首晤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中国

1954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决定让赫鲁晓夫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除了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以外，代表团其他成员有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谢列平、《真理报》主编和乌兹别克人民代表纳斯利金诺娃。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说来，是十分熟悉的。

有那么一阵子，他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那时候，他代表老大哥。那时候，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

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反面人物了。

他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是个坏人。他的名字和修正主义、一切反动派连在了一起。由于他有一个光光的脑袋，人们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赫秃子”。

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更使他的名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可磨灭。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红卫兵把刘少奇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几经变化，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被赫鲁晓夫稳取在手。

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正式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主要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还有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

9月29日苏方代表团来到北京。中国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团。他们也因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有机会同中国同志进行讨论而感到高兴。

在苏方代表团同中国领导的会谈中，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为了保持苏联人自己的防卫态势，他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作出贡献，因此，苏联人作了一些安排，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他们同意给中国派遣军事专家，运来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以加强中国军队的实力，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总之，赫鲁晓夫认为，只要苏联的物质条件允许，他们就尽可能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因为，中苏必须一致努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虽然已被打败，但仍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一个比日本大得多的威胁则来自美国，它已经在紧靠中国的南朝鲜发动了战争。

苏军撤出旅顺港

中苏双方为努力使彼此关系建立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了签定旅顺港协议的正式会谈。

在这件事情上，双方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旅顺港是中国领土，苏联只有在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在那里保持军队，这是绝对正确的。为了改建旅顺港的防御工事，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这个军港并在那儿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驻军，苏联人已经花了很大力气，他们在大连也有驻军（1945年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协定，规定苏联对大连享有自由港权益。斯大林曾同意最迟于1952年撤出驻旅顺港和大连的苏军，但后来这个撤军期限由于中国方面的“请求”而推迟了，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方感到东北面临着美国的威胁。）

代表团说他们想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军队，除了刚刚安装的十分昂贵的海岸炮群以外，把他们在那儿的一切设施全部移交给中国。毛泽东回答说，他认为苏联在这个时候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是不合适的。他怕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一行动向中国进攻。

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我们怀疑美国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当然，我们不能向你们担保，因为美国刚刚结束它在朝鲜的侵略战争，而且现在还在推行侵略政策。不过，如果我们的部队从旅顺港撤走的话，这些部队还会驻扎在离那里不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以，假如你们遭到进攻，我们可以前来救援。”

又经过一番协商，毛泽东同意了，说：“如果你们认为现在撤走合适，我们就不阻拦了。”

双方就一项有关撤走苏军的新协定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旅顺港和大连于1955年即赫鲁晓夫首次访问北京的7个月后重新由中国管理）

据赫鲁晓夫回忆，后来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问代表团：“你们看把你们的大炮留在旅顺港怎么样？”

赫鲁晓夫认为，假如中国愿意为这些大炮付钱，苏联倒是愿意助人为乐的，可是周恩来要求苏联免费交给他们。

赫鲁晓夫说：“周恩来同志，请体谅我们的难处。我们还没有从可怕的毁灭性战争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一团糟，人民很穷。我们乐于以低价把这些大炮卖给你们，但我们确实无力无偿地送给你们。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想吧，不要再坚持你们的条件了。”这件事就谈到这个地步，中国没有再提起过它。

苏方拒绝修建铁路

代表团取消了两国间的联合机构（指新疆的联合公司）以及有关的各项协定。苏联放弃了对东北中苏铁路的权益。赫鲁晓夫记不得这条铁路是怎样移交的，是无偿的，还是廉价卖回的，反正中国接过了这条铁路的管理权。赫鲁晓夫相信他们这么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想制造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你就不应该在他们的领土上保留自己的设施。

赫鲁晓夫还记得，中国当时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们说，通过乌兰巴托连结苏联和中国的那条铁路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赫鲁晓夫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条铁路对苏联非常有用，而对中国却没有好处。从前，苏联必须通过远东运输货物，有了乌兰巴托这条铁路后，路程大为缩短，莫斯科和北京直接连结起来了。中方说，他们想要的是另一条铁路，它在阿拉木图附近跨过两国边界，然后穿过中国矿藏丰富的地区。

苏方代表团说，如果中国修建这条铁路位于他们境内的那一段的话，他们愿意承建苏联境内的那一段。这一段路程较短，条件也好。此外，苏联工人在训练和设备方面比中国工人强，因此完成这一段根本不费什么事。然而，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修建他们那一段是件很棘手的事。以中国当时的筑路实力，很难完成这样的工程。于是，周恩来就来找代表团。赫鲁晓夫认为，中国总是派周恩来向代表团提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来因为他是总理，二来因为他是个外交老手。

周恩来说：“我们请你们承建我国境内的某些路段，你看怎么样？”赫鲁晓夫觉得，中国想让费用也由苏方出。

这就把整个事情都改变了。对于这样一个建议代表团毫无思想准备。他们不知道这要花多少钱，但是苏方能肯定这是一笔相当昂贵的人情。赫鲁晓夫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承建这段路要架很多桥，凿很多洞——这一切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拒绝朋友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落到了赫鲁晓夫的身上。他对周恩来说：“非常遗憾，周恩来同志，我们实在不能承建你们国内的那一段铁路。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太多了，实在承担不起这个任务。”

这件事也就这样作罢了。但是，后来赫鲁晓夫认为，由于苏方拒绝中国的要求这一决定，就像在双方关系的天平上又加上了一块石头，使天平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友好的一侧倾斜。

苏方建议中国派出百万劳工

苏方也向中国提出一个建议。他们说要帮助中国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那时，苏联的部长们认为苏联的西伯利亚缺少劳动力（当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劳动力并未得到有效利用，他们应该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吸引一部分工人去开发西伯利亚的宝藏）。苏方建议中国派 100 多万名工人到西伯利亚去帮助苏联开发那里的巨大森林资源。

毛泽东对他们建议的答复很有特色——也顶示着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行动缓慢地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几步，然后，盯着赫鲁晓夫很长一段时间，低下眼皮，开始用一种文静的、不受拘束的声音说话：“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少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很侮辱人的。现在你也这么看，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了。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可真是知道该怎么来羞辱他们。

显然，毛泽东想使赫鲁晓夫对于所提的问题感到遗憾。赫鲁晓夫听他这样说话心里很不愉快，尤其是竟将他与资本家相提并论。赫鲁晓夫觉得自己毕竟没有绕着圈子说话。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他衷心认为符合中国人利益的建议，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人的吃饭的问题。

根据赫鲁晓夫同代表团同志商量的结果，由赫鲁晓夫代表苏联代表团进行这些谈话。所以，在下一次会谈中他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当然不想给你们制造困难，我们当然不坚持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建议会损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就当作我们没有提过，务请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用自己的工人也行。”

代表团游玩中国沿海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毛泽东利用一次共进晚餐的机会，对赫鲁晓夫说：“你第一次到中国来，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去走。特别是到我们的南方，那里是另一种情景。”

赫鲁晓夫非常高兴，他说：你们这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哪里都想去，但这次只能到沿海的南方北方走走。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拿起了一块腊肉，正往口里填，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到哪里都可以，就像在你自己的家里一样。我这个人喜欢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去活动，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也不给作什么特殊安排，随你的便。”

赫鲁晓夫胃口大开，不少腊肉和火腿进了他的肚子。

赫鲁晓夫这次来华，先在北京的街头看了古城的风采，又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黄埔江边漫步；然后他又在杭州西湖品尝了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到广州吃了属于中国另一菜系的粤菜。

途经长江时，他也领略了中国第一条大江“江涛拍岸”的情景；到旅顺时也看到了与黑海不同的中国内海。

赫鲁晓夫出尔反尔

代表团又回到了北京。这时，中国的代表们又扯起了西伯利亚使用中国劳动力的事情。苏方的同志回答说，毛泽东反对这个想法。后来，这些中国同志带回一个正式口信，大意是说，毛现在愿意接受苏方原来的建议，愿意帮他们的忙。

赫鲁晓夫这时突然又为自己提出了这个主意而感到遗憾，可是因为是他首先提出来的，现在既然中国方面同意了，他就不大好声明取消了。要不然，他还得向中国人解释为什么改变了想法，而这样一来又会产生“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的后果。

所以，苏方只好勉强同意签订一个协定，让第一批（约 20 万名）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去做工。在这批工人工作期满时，他们有意避而不提新协定的谈判问题。

当中方准备尽力满足苏方的要求时，赫鲁晓夫却认为中国人自己开始逼苏方吸收更多的工人到西伯利亚去，尽管毛泽东说过他讨厌人们把中国当作廉价劳动力来源。

中方代表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多派一些人去呢？不要不好意思嘛，我们是很乐意帮你们忙的。”

在后来同毛泽东的一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道了歉，说他们过去对进口劳动力的需要估计过头了。他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做工的合同期满后不再继续延长。这样，才把这些工人打发了回去。

原来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是在打什么主意，认为中国想兵不血刃就占有西伯利亚。中国想渗入并接管西伯利亚的经济，想确保在西伯利亚定居的中国人多过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简言之，中国要把西伯利亚变成中国人的而不是俄国

人的，好个出尔反尔。

中苏核分歧

在中苏举行的双边会谈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不少直接对话，据有些当事人的回忆，他们的对话也颇有意思。

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对我们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

毛泽东说：“十根指头被切去了一两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如以前了，大大削弱了，甚至减去了一半的力量。总之，形势是好了，对我们是有利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自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有二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了。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于人民力量、和平力量强大，从此战争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

他们的看法自然有些差异。

赫鲁晓夫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的回答很有点艺术性，他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双方的专家天天都在接触和交谈。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事情能办通。”

说到此处，毛泽东又停顿了一下，说：“我们对太阳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这太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翻译把这话全部翻译出来后，他呆了好一会儿才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

看看毛泽东不以为然的神色，他又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毛泽东同志，你不知道哇，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后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不说话，中国方面其他人也不说话。

赫鲁晓夫又说：“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电全部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但你们如果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听说，中国人民在解放以后，生活上有了保障，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我经常想，你们这么多人口，如果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伸手向国家要，我看很难应付得了。然而不管怎样，这的确是国家应该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摆在首要位置加以妥善解决，那日子是过不好的，甚至是过不下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很好么！

听毛泽东这样说，赫鲁晓夫很高兴，他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举得很高很高，说：“好！好！”

总之，这次中苏高级会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应该说，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次访华，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的。

第二节 毛泽东二晤赫鲁晓夫

毛泽东要求搬出沙皇寝宫

这是建国后迎来的第八个金秋。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11 月 2 日，上午 8 时许，毛泽东登上“图 104”客机。

一位塔斯社记者虽然顽强，此时也只能望“机”兴叹了。他曾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可惜，落空了。外国记者，除了当年的斯诺和斯特朗，很少再有谁有与毛泽东谈话的荣幸。

“图 104”客机轰鸣着滑上跑道，送行的中国党政领导人在旭日的光辉中向滑动的飞机频频招手，为领袖送行。

毛泽东此次访苏，同行的还有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对宋庆龄非常尊敬和关心，到她的客舱中问候：“怎么样，还适应吧？”

“感觉还好。”宋庆龄微笑点头。

“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后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

“主席，您事情多，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

莫斯科时间下午 3 点左右，“图 104”飞机经过 8 小时的飞行，来到莫斯科上空。这天莫斯科天气晴朗，从舷窗向下观望：灰黄的田野，蔚蓝色的莫斯科河，色彩斑驳的树林，被公路和林木分割成各种几何图形的城市建筑，宛如一幅油画尽收眼底。

“图 104”徐徐降落在伏努克机场，经滑行道停在候机楼前。当舷梯与飞机舱门对接好时，卫士长已经替毛泽东整理好大衣和礼帽，毛泽东向舱门走去，翻译李越然跟卫士长李银桥两人如同毛泽东所言的哼哈二将紧随其后。

舷梯下是红地毯铺就的一条路。毛泽东的身影在舱门一出现，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热烈鼓掌的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满面笑容地向舷梯走来。

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也来了，立在赫鲁晓夫身边。毛泽东缓步下梯，剩最后三级阶梯时，抬起头望着赫鲁晓夫浑圆而结实的面孔，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们在舷梯下拥抱，亲颊，互致问候。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毛泽东和胡志明主席拥抱在一起，尤为亲切。

“身体好吧？”胡志明讲中国话。

“很好。你怎么样？”

“比上次见面还要好些。”

“上次是在家里，这次是在莫斯科。”毛泽东说的“家里”是指中南海的勤政殿，夏天胡志明曾在勤政殿与毛泽东长谈。天气闷热，毛泽东请胡志明赤裸了上身，并说：“这是在家里么，尽管随便就象走亲戚一样。”

毛泽东顺序同到机场来迎接的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一一握手，赫

鲁晓夫跟随一旁做介绍。之后，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过来引导，请毛泽东检阅仪仗队。

毛泽东走到三军仪仗队前。他立住脚，将头上的礼帽摘下来交李越然拿着，面对仪仗队的陆海空士兵，用激昂高亢的湖南腔，大声问候：“同志们好！”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威虎势，发出震耳三声欢呼。

仪式完毕，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车。

这种车很宽大，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坐后排，前排和后排之间可以拉出一排略为低矮的活动椅，李越然和李银桥“哼哈二将”坐在其上。前排是司机，司机旁边坐了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副局长查哈洛夫少将。他被指派为毛泽东访苏期间的卫士长。

李越然侧着身体，将手搭扶在椅子靠背上，为世界最大的两个共产党的领袖翻译对话。

“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吗？”毛泽东问。

赫鲁晓夫搬动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袖。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毛泽东对这两位来自西欧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领袖很感兴趣：“他们住在哪里？”

“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说到这里，有意补充介绍，“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驻地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

毛泽东对这种特殊友好表示似乎并不在意，身体倚靠沙发，头侧扭着望着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是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对他们像对我一样……”

“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

毛泽东点头：“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毛泽东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不无庄严地解释道：“是啊，我们收到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照惯例办的。您这样的尊贵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

“谢谢你们的热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都没用了。”毛泽东微笑着吮一吮下唇。他高兴或者生气都有可能做出这个动作。

道路两旁的楼房建筑渐渐增多。毛泽东朝窗外望去，赫鲁晓夫介绍了住宅建筑的情况。

毛泽东始终注视着窗外，良久，他点点头说：“看清了，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人们穿着也都不错。”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查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舍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和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特别留意了一下毛泽东的寝室里的木板床和改造过的蹲式马桶。

“我们该告辞了吧？克利姆，”赫鲁晓夫扯扯同毛泽东谈笑风生的伏罗希洛夫的衣襟，“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休息了。”

苏联领导人纷纷起立，握手道别。赫鲁晓夫不无殷勤地向毛泽东介绍：“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表示我们对您的一番心意。”

可是，毛泽东到为他准备的房间里没呆多久，便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直朝李越然住的房间走来。

李越然和保健医生李志绥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见毛泽东进来，忙起立。

毛泽东摆了下手，没说话，在屋内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是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毛泽东点点头，仍然一言不发，回身走出去，慢步上了楼。

李越然和李志绥正在犯嘀咕，不知怎么回事，李银桥来了，拽着李越然说：“你来一下，主席找你。”

李越然忙跟随李银桥上楼走到毛泽东寝室。只见他老人家独自一个，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李越然在距离他3米远的地方站立，听候指示。

毛泽东招招手，李越然走到他身边。他用很轻的声音吩咐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住，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

李越然一怔，头立刻摇起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你看，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不行，主观主义。”

“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

“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做个手势。

李越然走出屋，没去找苏联同志说，先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

毛泽东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与赫鲁晓夫多次交谈

莫斯科会议是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简称。会前重要的准备工作是起草宣言。《宣言》由中苏双方讨论起草。中方首席代表是邓小平，苏方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不同场合（包括会议休息室、宴会席间，乃至汽车上等）有过多次交谈，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

赫鲁晓夫本人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与毛泽东交谈，基本内容：一是关于如何对待铁托。抵达莫斯科后不久，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毛泽东。赫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请帖，他可能不来。”又说：“他不来是他自己失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

毛泽东微微一笑，又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

“来，是卡德尔。”赫鲁晓夫介绍说，“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那好啊。”毛泽东兴致高涨：“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赫鲁晓夫表示赞成。

二是关于会议文件（指宣言草案）。赫说：“苏中是两个大党，大家都在看着我们，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兄弟党都在等着。”

毛泽东着重讲了我党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

当天夜间，毛泽东把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他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的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他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李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

志和你们谈，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然写完，他就在这个信封上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

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会谈，并正式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提纲。

三是关于现代战争和物质生活。在拜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的时候，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观点：“我们对现代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赫不表态。布尔加宁很欣赏，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分析。”

谈到物质生活时，毛泽东说：“人身上的热量是很有限的，不能昼夜都吃，也不能同时穿 10 件皮大衣，享受也有自然的限度……”

双方都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享受也不是无止境的。

四是关于苏联专家。在会议休息时，赫鲁晓夫说：“我们专家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做，是不是可以回来？”

毛泽东表示：“事情是有得做的，不过不一定要那么多。我们的同志应该学会自己走路……”

赫鲁晓夫对米高扬说：“你听见了没有，毛泽东同志同意专家回来。”

米表示：“想想再说。”

五是关于核武器。毛泽东出于后发制人的观点，在会见场合问赫鲁晓夫：“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赫说：“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毛泽东问。

“能知道。”接着，赫鲁晓夫又说：“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

“这种说法不对，”毛泽东不同意这一观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

六是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在宴会席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忠告说：“你这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在兄弟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着急不行……”

赫没有完全听进去，他说：“你不了解，有些人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使人生气。”

七是关于以苏联为首。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说：“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毛泽东说：“我们没有资格……”

接触其它共产党领袖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接触了其它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方面听取意见，并阐明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到郊外别墅看望了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

多列士身材匀称，不是金发，是像亚洲人一样的黑头发，鼻梁高，脸膛红红的，可是他自己说身体不好。据说，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议会中的合法斗争问题。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也搞过合法斗争。但是搞合法斗争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不合法的斗争，至少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一旦有条件，就要轰轰烈烈干一场。你

只在资产阶级的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斗争，怎么可能夺取政权？”

多列士持有自己的观点，他摇着头说：“不能搞冒险，流血

总不是好事情……”

“这要看为什么而流血，巴黎公社不是有极大的牺牲吗？”多列士没再多说什么。

毛泽东邀请陶里亚蒂来到他下榻的克里姆林宫，交谈中他仔细地了解了意大利的社会情况和意共的斗争。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额头已经看得出明显的深纹，大背头，眼镜后两只眼睛特别亮，但又总是漾出一种哲学家的思索的神情。

陶里亚蒂行止稳重，对毛泽东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走路、入座、谈话都坚持礼让毛泽东在先。陶里亚蒂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欧和意大利的情况。强调西方与东方社会情况不同。

毛泽东赞赏这种讲求实际的态度，也承认“我对西欧党的情况不太熟悉。”

陶里亚蒂点头说：“中国党要加强与西欧党互通情况。中国党是大党，应该多了解西欧各党的具体情况。”说着，便简略介绍了一下西欧的政治经济特点及西欧各党的概况。

陶里亚蒂说：“在资产阶级统治还比较稳固的意大利，在社会各种矛盾还没有尖锐化，在人民群众也没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的迫切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共产党必须善于和执政党很好合作。条件不具备，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会脱离实际。”

毛泽东想了想，说：“坚持实事求是，这样对。我们过去和国民党也合作过，搞统一战线。”

“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但是斗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陶里亚蒂慢条斯理他说，“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工人阶级，让社会各阶层了解我们的党是为各阶层人民谋利益的。意大利政治是多元化的，政党很多，我们是一个大党，在政府里也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们要发动劳动人民起来，共同争取利益。”

毛泽东只是认真听，并没有对这些观点做评论，但是对陶里亚蒂本人有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以后的事实发展表明，毛泽东认为陶里亚蒂的思想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思想。而且毛泽东也指出来，苏共“20大”路线在国际共运中大有市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提出了两个新理论——通过取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

义和平过渡”以及不仅有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合作。毛泽东反对这两条新理论，陶里亚蒂显然是支持这两个论点。那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呢？

这一天，毛泽东又驱车来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拜访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出迎到院外，他细高个子，背稍驼，已经脱顶，鼻梁不高，但是鼻头却倔强地翘起，面带一种深沉的微笑，寒暄着将毛泽东让入客厅。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兄弟关系。”哥穆尔卡像老朋友一样，坐下后便用抱怨的语气向毛泽东发牢骚。在波苏关系问题上，哥穆尔卡是感谢中国共产党的公正态度的。“我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么。”

毛泽东当然明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难言之苦，他们国土上有苏联驻军。然而，还要顾大局，讲团结。讲团结就不能搞小动作跟着发牢骚。

“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毛泽东将手划一道线，在战争年代他常用这个手势表明形势，“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

哥穆尔卡抿嘴耸肩，表示没办法。

“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

“嗯。”哥穆尔卡鼻子里哼一声，勉强喃喃，“这个道理还可以讲得通。”

“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哥穆尔卡对涉及苏共“20大”路线的问题似乎不愿多谈。稍停片刻，他很直率他说：“毛主席，你是有很高威望的无产阶级领袖，但是你讲的‘纸老虎’这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

毛泽东也很坦率：“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

哥穆尔卡听着翻译有些发怔。

毛泽东侃侃而论：“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的，是纸老虎，但是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又是纸老虎，又不是纸老虎，这话怎么讲……”

“这就是辩证法，一个是从战略上讲，一个是从战术上讲……”毛泽东反复讲解，哥穆尔卡没再说什么。不过，在场的人能观察他对事物的理解好像是跟原来有所不同了。

这番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引得毛泽东思考很久。他说：“看来辩证法不讲不行。”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同志请来一道用餐。

毛泽东风趣地与郭沫若等人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季越然问：“李越然同志，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

李越然听到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

“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毛泽东停下筷子，谈得兴致勃发，“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说：“晋书地理志载 5600 万。”

“现在还统计不全，总有一些不入户之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姑且算作 5600 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建安七子中王粲所作《七哀诗》，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多少人？比比么，三国混战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一声，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后来，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及其它党的领袖们又讲了以上观点。

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口述，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

苏斯洛夫为此来看望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说：“毛主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不添进去好像也可以……”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摆：“说大家都熟悉，不见得。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必然也就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你信不信？”

《宣言》本来就是中苏协商，你一段，我一段。苏斯洛夫同意将辩证法的论述写入会议文件。

妥协不是单方面的，毛泽东也决定做出妥协。

毛泽东点“家珍”

当赫鲁晓夫再次陪毛泽东共进午餐时，毛泽东递出一个信息：“文件可以照顾你们‘20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赫鲁晓夫顿时精神起来。他在高兴的时候，喜欢“滔滔不绝”，“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指挥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到一次次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不接茬，有意岔开话题：“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

“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赫鲁晓夫仍然想着那话题：“斯大林对西南前线的指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我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停止包围哈尔科夫地区的作战行动，但是斯大林蛮横地拒绝我的正确意见，下令继续进行哈尔科夫包围战。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上将，请求他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讲明形势。你要知道，斯大林是不看地图的，他是用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地球仪上的哈尔科夫地区只有针尖大！可是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对此问题我不能向斯大林再说什么了。’他害怕斯大林的粗暴，歇斯底里，还有总参谋部那位可怜的元帅，胆小如鼠，一见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光会颤抖。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但我还是勇敢地在另一个地方向斯大林打电话……”

赫鲁晓夫眉飞色舞讲述他自己如何“正确”，“勇敢”，向斯大林一再提出正确建议。但斯大林不接电话，他就站在马林科夫身边，马林科夫接电话他就不接，自己的正确意见遭到无理拒绝云云。

这期间，毛泽东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领的赫鲁晓夫，在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名不见经传，现在自吹他比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还高明，而且是在指挥过千万次大小战役的毛泽东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用餐巾擦擦嘴，终于幽默他讲一句：“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西南战线还没打完呢。”

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扳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一下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赫鲁晓夫点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注：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他与邓小平打过交道。）

毛泽东继续扳动第三个指头：“第三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

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头说：“咱们都是 60 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原则性不够强，但他也是个好人。”讲到这里，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扳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但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像对我一样来对待他们，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着右手说。

席间还谈及莫洛托夫。毛泽东以我党“八大”保留王明为例，问赫：“你们能不能把莫洛托夫选进中委，以示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赫说：“不能，这个人没有用，只能妨碍我们的事业。”

莫斯科风云人物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终于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开幕了。

毛泽东每临大事思想高度集中。出发前，他中山装制服领扣没扣，李越然帮他扣时，他好像根本没有受到触动。坐电梯下楼，请他上电梯，他便机械地走上电梯，立在角落一声不响。电梯停了，什么时候请他下电梯，他什么时候迈步，完全是机械的。他在考虑即席发言。而他的发言，对会议来说是举足轻重的。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向乔治大厅走去时，情绪很热烈。因为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 40 周年的活动中，毛泽东在列宁山向集会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盛赞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盛赞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革命所做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用美好的语言祝贺了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即席无稿发言，赞扬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他说：“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各国代表听到毛泽东的生动语言，气氛活跃。

会议中，毛泽东有几次即席讲话，留给人们深刻印象。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做个手势，望着会场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

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掌声。赫鲁晓夫也显出喜悦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目光掠过会场，落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身上，微笑道：“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他朝卡德尔努努下额，“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

卡德尔当时显出很受感动的表情。

“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些？算一下吧。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多少钢？苏联有多少钢？”毛泽东说出两个数字，而后讲道：“但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了颗卫星上天。这个意义很大，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接着，毛泽东对着赫鲁晓夫说：“你们再加把劲，能不能用 10 年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

赫说：“我们努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你们用 10 年时间超过美国，我们 15 年超过英国。”

会场响起了掌声和喧哗声。毛泽东在分析了力量对比之后，用那高亢的声音说出了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著名论断。

“要警惕出战争狂人，他们有可能到处乱扔原子弹和氢弹……”毛泽东郑重声明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在战争中充当侵略者。他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考虑了一旦发生战争所可能出现的局面。他介绍说：“我和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内又会有 17 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建设，我们希望和平，

可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横下一条心，奉陪到底，打了再建设。如果你每天怕战争而战争最后来了，那么你怎么办？……”

全场聚精会神地听着毛泽东的即席演讲。

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于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召开；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又于16

日至19日召开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

11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林娜大厅为各国党的代表团举行隆重的送别宴会，气氛非常热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主宾席正中并坐。

毛泽东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们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毛泽东略一停顿，用诗词比喻了共产党人的团结，他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宴会厅响起热烈掌声。赫鲁晓夫举起酒杯，一边喝彩，一边在毛泽东的酒杯上碰出清脆的一声响。

第三节 毛泽东三晤赫鲁晓夫

“联合舰队”的争论

时光到了 1958 年 7 月 29 日；中办翻译组长阎明复从居仁堂给李越然打来一个电话。

“李兄，有要紧事情。你赶紧过来。”

“什么事？”李问。

“有重要工作。你赶紧过来，杨主任找你。”

李越然赶到居仁堂，阎明复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苏联方面通过驻华大使尤金请见毛主席，表达了苏联领导的一个意思：希望在中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个长波电台以便与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我们搞个联合舰队。尤金第一次来谈，毛泽东便严肃地问他：“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有些恼火，严厉他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回去便向莫斯科紧急发电报告，返回来再次请见毛泽东，还是说要搞一个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第七舰队。毛泽东听后很生气。追问苏方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尤金依然回答不清。毛泽东说：“不行，这事必须弄清楚。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就这样，尤金给赫鲁晓夫拍了电报，赫鲁晓夫决定马上来华。

阎明复告诉李越然说：“尤金两次来，都没有讲清楚，主席很火。赫鲁晓夫马上就要到，杨主任让你参加翻译工作，所以找你来。”

他们一道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杨尚昆把毛泽东和尤金的谈话过程又介绍一遍。

听了情况介绍，李越然思想上也有了准备：看来将有一场大争论！

隔一天，7 月 31 日，赫鲁晓夫便来了。李越然随毛泽东乘车到南苑机场。参加迎接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候机室等待时，气氛比较严肃，不像过去那么轻松愉快，大家很少说话，毛泽东也不像过去喜欢和尤金谈论哲学，这次没有多少话谈。

赫鲁晓夫乘坐的“图 104”客机缓缓落下，我方党政领导人迎出去。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泽东只是同赫鲁晓夫握手致意，互相寒暄着走进会客室。

在会客室稍坐一下。没有谈正题，毛泽东一般地谈及中国国内情况，他说：“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

刘少奇接过来说：“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露出一种异样的笑容，说：“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好办，可以给我们。”

没多谈，宾主便乘车从南苑直驶入中南海。

毛泽东陪赫鲁晓夫走进颐年堂。邓小平和杨尚昆陪同参加。刘少奇和周恩来迎接过赫鲁晓夫便回去了，没有参加会谈。

走进颐年堂，毛泽东随便问候：“一路上还好吧？”

赫鲁晓夫点头：“还好。你健康吧？”

“自我感觉良好。”毛泽东已经请赫鲁晓夫坐下，自己也坐下来。说：“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意思，但说不清究竟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说他可能没有听明白苏联领导的意思。然后说明自己的想法。大致谈的是，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等等。

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十几分钟，加上翻译，就讲了有半个多钟点。毛泽东神色肃穆，不停地吸烟，望着赫鲁晓夫默默地听。赫鲁晓夫显然对毛泽东的想法不了解，对毛泽东将会出现的反应估计不足。他还在泛泛作解释，越讲情绪越高，有些得意。

突然，毛泽东抬手做个断然而简截的打住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继续讲下去……”他强做笑脸，有些不自然。“尤金告诉了我，您很火。尤金不行，他没讲清楚。我们只是想法，想跟你们商量……”

毛泽东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绕山绕水，便语锋犀利地直戳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联合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支支吾吾，憋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解释：“所谓联合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联合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拍了一下桌子，愤然立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李越然见此情景，在译语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情感，使赫鲁晓夫充分感到问题的严肃性。

赫鲁晓夫脸孔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始终处于答辩地位。但他仍然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下不乏自信的嘲意：“你们都拿去算了！”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外长费德林是位著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他用俄语从旁提醒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可真动火了！”

赫鲁晓夫自然明白毛泽东已是“维佳里夫谢里约斯”，但他还能沉住气，耸耸他那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的双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眨两下，锋芒稍纵即逝，摊开了两只胖而小的手，带着鼻音嘟囔着：“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里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

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毛泽东重新坐下，他至今还没有附和过一句赫鲁晓夫。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还注意选择一些有共同点的问题谈话。这次不然，抓住要害不放：“你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提高一些话音：“我们只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误解。”说着，赫鲁晓夫愠怒地连连摇头：“这就不好商量不好办了。”

毛泽东心里是有数的。8个月前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曾劝说哥穆尔卡：“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

是啊，“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那时，中国海军创建不到10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难怪毛泽东敏感，难怪毛泽东愤怒。苏联在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驻有军队，建有基地，那另当别论，中国管不了东欧，但是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土地上立足，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立场。

赫鲁晓夫曾多次责怪尤金不会办事，现在这样收场他大约也感到不好下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拂开：“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的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微露愤懑。他不高兴或愤怒时，眼睛便眯细成一条线，目光像被聚光之后那么凝成犀利的一束。

毛泽东反而坦然了，甚至轻悠悠地吸起了香烟。大概他的目的达到了：弄清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并且抓住时机把态度明确告诉他们，叫他们永远忘不了。他斩钉截铁他说：“不能！”

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眯眼，表情恢复了平和。毕竟是位大国领导人。他的意志也是足够坚强，忽然一笑：“为了合情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

“不要！”毛泽东吮吮下唇，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斯理的声音说：“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赫鲁晓夫无声地望着毛泽东，望的时间不短，那种表情是说：我没法理解你，也没法跟你谈话。

毛泽东却像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继续讲道：“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二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话讲到这一步，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眯细的眼睛睁开了，缓解一

下气氛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似乎就此结束他也不好下台，便又将眉毛耸了耸，用不无遗憾的口气说：“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大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 and 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用柔和的声音将援助和主权问题区分开，礼貌而不失坚定地重复一句：“是另一个问题。”

在颐年堂的会谈是一下车就开始，可见毛泽东的重视，他对中国的主权问题毕生都是格外珍重。

这次会谈结束后，一位领导同志曾对李越然说：“小李，主席还问我呢，问你是不是怕赫鲁晓夫？”

李越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位领导同志说：“主席问，我指赫鲁晓夫他为什么不指？”

李越然解释说：“我不是怕他。我跟少奇、恩来、彭真几位首长出国多次，对赫鲁晓夫还是知道一些的。他脾气是很暴躁的，都那样指，干起来不好。”

游泳池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毛泽东在游泳池等候赫鲁晓夫，准备第二次会谈。

李越然先到了，见毛泽东已经换了游泳裤，穿了一件浴衣正在做准备活动。

李越然趁机走过去，小声问：“主席，听说你问我是不是怕赫鲁晓夫？”

毛泽东停止活动，望着李越然：“嗯，你怕不怕呀？”

“我不是怕他，我是了解他。”李越然向毛泽东解释了赫鲁晓夫脾气暴，也是容易发火的。李越然说：“主席，您指他鼻子问题还不算大，我要是再指他，问题就可能闹大了。当时您已经很激烈，我作为一名翻译再激烈就不妥当了。干起来对双方都不好。”

“嗯，”毛泽东的神情半是思索，半是赞同：“你考虑的有道理，说的也有道理。”

受到鼓励，李越然更能畅所欲言了，便说：“当时我也站起来了，在主权问题上是不能含糊的。不过，关键不在指不指他，把意思准确地翻译出来，词锋够尖锐就行了。”

毛泽东点点头，目光朝身体两侧扫来扫去他说：“你讲的对，赫鲁晓夫这个人，该碰碰他就碰碰他，也不是什么都去碰他。”

这是室外游泳池，阳光照射在清澈透底的池水中，浅水一侧泛出青白的光辉，深水一侧蓝幽幽给人以清凉的舒适感。白磁砖亮得耀眼，池边摆了藤椅。藤桌上有茶水和香烟，藤椅摆放的格式是准备会谈的样子。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来了，他们显然也是来参加会谈的，阵容比昨天大。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都很能抽烟。周恩来除偶尔拿支烟摆摆样子，基本不抽。毛泽东是很随便的，穿一件浴衣，光脚踩着拖鞋，另外三位领导人都是穿着整齐，立在池水边，抽烟聊天。

毛泽东讲话多些，给人们印象深的几句话是：“我们都要学点唯物论、辩证法，这里可有学问哩！客观事物复杂着呢，一切都处于运动中，一切都在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从1957年始，毛泽东格外强调辩证法，特别是与苏联人打交道时，总是加以特别强调。1957年李越然随他访问莫斯科时，一上飞机他就谈起了辩证法。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苏联方面安排的参观列宁格勒，看芭蕾舞、话剧、歌剧以及游览等活动都拒绝了，他只提出见见苏联的哲学界名流们，与他们交谈辩论，津津有味，和他们一道讨论辩证法以及如何把哲学变成普通人手上的武器。会议期间，曾根据毛泽东的口述、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

后来这段论述写进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中。

毛泽东坚持讲辩证法就是坚持要革命，世界上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对辩证法不感兴趣，就是追求平静安逸，不愿改变现状，不愿打破旧的平衡，就是不想继续革命继续前进。毛泽东对他的战友们讲过有关辩证法的话。

赫鲁晓夫到了。双方握手寒暄几句，赫鲁晓夫也知道毛泽东是习惯夜里工作，他问毛泽东睡眠如何？主席说：“心里有事，睡不着……”随之，“便在藤椅上坐下来，开始第二次会谈。

关于建长波电台和搞共同舰队的问题已经在昨天被毛泽东否定，今天便不再提这个事，转而谈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双方分歧不是很大，可以谈出许多共同点，因而气氛比昨天融洽些。

不过，还是有争论。

从国际形势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又谈到中国的“大跃进”。

赫鲁晓夫摇头说：“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的情况。”

从大跃进谈到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

赫鲁晓夫仍然摇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儿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

赫鲁晓夫不吸烟，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都是不停地吸烟，主要就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别人基本不插话。赫鲁晓夫借谈中国国内形势之机，将话锋一转，转到国际关系上，说：“对亚洲，对东南亚，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比较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多考虑考虑欧洲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考虑亚洲的事情。”

毛泽东几乎没有一件事随声附和赫鲁晓夫，他做个手势说：“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你们比我们熟悉一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毛泽东讲这段话，仍是坚持尊重别国主权，提醒赫鲁晓夫不要搞什么划分势力范围的事。

会谈结束，毛泽东请赫鲁晓夫游泳。

赫鲁晓夫换了游泳裤权下水。他游泳水平不行，在浅水那边下池子，说不上是什么泳姿，就是手脚乱刨的那种姿态，“刨”了几下就沉不住气了，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爬上池子，要了一个救生圈，套上以后才重新下水。

毛泽东游泳在国内外都是闻名的。他从深水区下水，下到水里便从容地游几下蛙泳，然后将身体一侧，用侧泳向浅水区游去。

这时，赫鲁晓夫悄悄地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将手一划，两腿一蹬夹，肩头冲起一片水花，速度很快，像颗巨大的鱼雷一样飞速前进，手刚动了几下，身体已过游泳池中线。

赫鲁晓夫大约是出于自尊心，想故意不去看毛泽东，但又忍不住要打量这位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他将头刚转开，很快又转回来。转回来时，毛泽东已经游到他身边。

“我早就知道你游泳是能手。”赫鲁晓夫伏在救生圈上喃喃，毛泽东微笑作答，没有说话，已经又折向深水区游去。转折时，他的侧泳已经换了仰泳，游到了池中间。

这时，赫鲁晓夫忽然睁大了眼，嘴唇也稍稍张开着僵住了。难怪赫鲁晓夫目瞪口呆：

毛泽东竟躺在了水面上！

工夫不大，更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竟在水中成70度角竖立了身子，近乎立正的样子，有人可以躺在水中，但还没见过谁能像毛泽东这样不动地“立”于水中！

赫鲁晓夫怔了片刻，终于叹服地晃了晃头，又点了点头。

毛泽东游过一段时间，心满意足地靠近赫鲁晓夫聊天。现在已不是双方坐下来会谈的官场气氛，换了个人交往的比较轻松自由的气氛。

“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毛泽东望一眼赫鲁晓夫，语意深沉他说：“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这段活时面无表情，他是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赫鲁晓夫7月31日到北京访问，8月3日回莫斯科。来的时候是秘密的，走的那天发表了会谈公报，是公开离开北京的。

毛泽东虽然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但是没有同车。

送行时没有搞什么仪式，毛泽东也没有同赫鲁晓夫拥抱。这次会谈，对以后的中苏关系的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

第四节 毛泽东四晤赫鲁晓夫

颐年堂两军对峙

人们都说 1958 年是中国和苏联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1958 年以前，赫鲁晓夫自己也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58 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出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磨擦”。

这又要涉及到赫鲁晓夫的第三次来华。

那个金色的秋天里，中国的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赫鲁晓夫要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是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参加了和美国首脑的戴维营会谈。

在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前二天，苏斯洛夫已先到，陈云去机场迎接。在汽车上，苏斯洛夫说：“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的。”

1959 年 9 月 29 日，赫鲁晓夫一行到达北京。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大会堂国宴上发表讲话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

国宴后，双方便到颐年堂举行会谈。

这次参加会谈的人比较多。中方有政治局常委们及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介绍他访美的情况，他晶亮的眼睛带着发现新大陆的神情和语气，说：“这次我到美国去亲眼看了，他们真富，确实富。”

毛泽东对他的谈话很不以为然，无表情从容他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问题的。”

……

赫鲁晓夫强辞夺理

赫鲁晓夫在这次访华期间，口气已经不一样了，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还提出了一些要求。

他首先提出的是放了两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

这两名美国人，是当时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时抓获的。

这叫人想到赫鲁晓夫是否和美国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来为美国人说情的。

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他一点都不含糊他说：“这是不能商量的。”

一句话把赫鲁晓夫堵在了门外。

“这两个人是执行侵入我领空进行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陈毅插话，赫鲁晓夫把目光转向陈毅。陈毅接着说：“至于俘虏的其他5名飞行员，我们早已放给他们了。”赫鲁晓夫还用了很多的口舌，说中印边界问题。他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了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声音本来就是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做了个不值得的表情，“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得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8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怒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竟说什么：“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接过话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 1957 年 1 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

周恩来反驳他，指出当时是他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准则。

“没有！”赫鲁晓夫企图赖帐。

当时作为翻译的李越然在场，他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悄悄报告说：“丰席，当时他的话都是我翻译的，我可以作证吗？”

“可以。”毛泽东点点头。

李越然站起来用俄语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是说过的，当时的翻译就是我。”他将当时的场景，参加人，及每人讲话的内容说了一遍。

赫鲁晓夫喃喃道：“记不清了，记不清……”突然话又转了，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吾吾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

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了，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对我无礼貌……”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是不公平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像这样的会谈实在是不多见的。

苏联决定撤回专家

晚上天安门有庆祝活动，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第二天国庆检阅，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道：“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赫鲁晓夫离京时，毛泽东到机场送行。在贵宾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从上面布置下去的，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应该支持。我们认真地研究过你们集体农庄的章程和制度，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同，要通过实践取得经验，总结经验……”

赫鲁晓夫再次表示：“这一切都是中国式的，我们搞不清，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之后赫鲁晓夫决定撤走所有的苏联专家，撕毁了所有的合同……

紧接着就是 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

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这次会议上散发一封苏共中央 6 月 21 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不能不激怒中国共产党。

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 26 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又和赫鲁晓夫作了许多次的交锋。

第五节中苏大论战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曾爆发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如今，这场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如果我们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可以感到当时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56—45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中共的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外交部八年》中（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四辑），曾写及当年的陈伯达的文章造成的错误影响：

1958年5月我奉召被调回国内（引者注：当时伍修权担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一到家就先在外交部把我批了一顿，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作检讨。我听了对我的批判，又重新看了我从南斯拉夫发回来的几个电报，自己也觉得同国内的调子相距太远了，我的报告肯定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南共纲领中有着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一面。而国内的论调却把南共纲领说成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

我对这些说法起初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时，仍然讲了一些南斯拉夫真实情况。但是我个人看法改变不了上面定的调子，当时康生和陈伯达对这事就特别起劲，他们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大骂“以南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康生、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九十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九十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

注。

从 1962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3 年 3 月 8 日,中共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

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起草。

国宾馆灯光彻夜

钓鱼台，这座北京西城三里河附近的国宾馆，因“文革”中那里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而闻名全国。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另外两名“秀才”只是挂名，并未参加多少具体工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

这个“秀才班子”的助手有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

此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为“秀才班子”提供许多资料，但不算是“秀才班子”成员。

对于如此重要的“秀才班子”，陈伯达当然要插上一手。但是，那里已被康生所控制。陈伯达参与了一部分工作，而领导权毕竟落在康生手中。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出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

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曼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幸亏他在毛泽东身边多年，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

另外，毛泽东嘱，送金日成、胡志明征求意见。

此文在1963年6月14日发表，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亦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二十五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除了正面阐述了中共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 1963 年 7 月 14 日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1963 年 7 月 20 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九评”是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写的。陈伯达有时参加审稿，不像写《二十五条》那样亲自主稿——因为康生在主持“九评”写作，他就不便插手了。

“九评”的篇目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 9 月 6 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 9 月 13 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 9 月 26 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 10 月 22 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 11 月 19 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 12 月 12 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 年 2 月 4 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 年 3 月 31 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 年 7 月 14 日)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 1964 年 10 月 14 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 年 11 月 21 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至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康生、陈伯达这两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他们也是这场论战的最大受惠者，从此以后深得毛泽东的信任，青

云直上。

陈伯达在 1960 初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六节 邓小平勇斗“老大哥”

“这个人利害，不好打交道”

“您看见了那边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聪明，前途无量。”1957年11月，第二次访苏的毛泽东在苏共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向赫鲁晓夫这样介绍了邓小平。

矮壮的赫鲁晓夫和比他更矮的邓小平已经握过两次手了。第一次是1954年9月，赫鲁晓夫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他没有太注意这位矮小的四川人，因为他只是很多副总理中的一位，中苏友协名誉理事之一，凡是有关对外的事务，他都表现克制，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出头露面。第二次会面是匆匆进行的，那是1956年岁首，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党代会。然而，赫鲁晓夫要真正认识这位火爆的四川人还要一段时间。

1958年和1959年以“老子党”自居的赫鲁晓夫又两次访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不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1950年夏季，苏共领导终于把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方面。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同时撤销中苏合办的《友好报》俄文版等

等。

接着，苏共中央提出利用6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中央不赞成，认为涉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个建议获得苏共中央赞同，并决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就这次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地点等问题交换意见。

中共中央派彭真率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代表团成员有康生、伍修权、许建国，工作人员有张香山和熊复。

会议开始前，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向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拉开了围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

彭真采取维护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立场。对赫鲁晓夫的种种攻击，一一驳斥，并正告赫鲁晓夫，他的指责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休想不予回击。

布加勒斯特会议开了一个坏头，给中苏关系带来了严重损害。在中苏协商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时，彭真严肃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背着我们散发通知书，从而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攻击，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准则，这个历史责任你已经推卸不掉。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这么大的事马上决定不了，我还要请示中央。但有一条可以肯定，要开就要有充分准备，就要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才行。”

彭真归国后，向中央汇报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以后，中苏两党多次信件往来，并征求兄弟党意见，最后同意先由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 26 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乘苏联“图 104”专机，先飞伊尔库茨克，受到波斯别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安德罗波夫（苏共联络部部长，在勃列日涅夫之后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谢尔巴阔夫（苏共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迎接，在他们陪同下一起到达莫斯科机场。

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是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有一次，翻译李越然等人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他们联系，变脸变色他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呢。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

看到苏联警卫人员紧张的样子，李越然不由得想起 1957 年毛泽东谈到邓小平时，对赫鲁晓夫讲的那段话：“希望你们把他像我一样来对待。”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是高规格的热情接待，但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不像过去先要礼节性的客气一番。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达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地点仍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参加了。

赫鲁晓夫同邓小平坐在一起，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不妙感觉。

果然，席间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脸大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严肃他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就在两个多月前的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 1960 年 7 月 28 日到 9 月 1 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他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 250 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种做法且不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

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宴会上，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不甘示弱。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邓小平环视一下四周，接着说：

“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它兄弟党。”邓小平紧追不舍。

“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赫鲁晓夫狡辩道。

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

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这个弱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他就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面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遇到这种水平的对手，当然没有必要再与他多纠缠。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他失控后的乱放炮往往带来极大的被动，便纷纷起来打圆场，互相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

赫鲁晓夫自己也借助碰杯，转了话题。

鉴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了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这一次，中共代表团就其“通知”中的指责做了答复，许多兄弟党看到中共代表团的“答复”，才感叹说：“我们原来没想到，中苏两党的矛盾已经这么大了啊！”

实际上，在苏共中央宴请26国党的代表团时，这种矛盾已公开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面前。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我们说，他们有一些极左的观点。”赫鲁晓夫以主人身份举杯敬酒时，又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讲到这里，两道犀利的目光从眼缝中射向康生：“这些个东西都出自你的手笔。”

邓小平仍以从容自若的神情将话截过来：“关于对国际共运的看法，是当前各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赫鲁晓夫情绪又开始激烈了，“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反调。”

“我们是唱反调。”康生冷冷他说，“没有中国参加签字，你们签字的任何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首’我们不当！”赫鲁晓夫激愤他说。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邓小平心平气和地提醒。在整个会议期间，每次宴会都是他与赫鲁晓夫坐主位，其它 26 国党的代表在宴会上一般不插话，神情各异地在那里旁观。

“哼，有的党口头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是在拆苏联的台。他们在和平过渡，东西方缓和问题，在裁军和苏美首脑会晤问题上与我们唱反调。”赫鲁晓夫似乎总想避免和邓小平交锋（他曾私下说“这个人厉害，不好打交道”），把目光投向康生：“你搞的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康生始终是一副冷板的面孔、冷板的声音：“又来了。你给我扣一顶帽子：左倾教条主义。我也送给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这些话，在场的代表们都直接听到了。

赫鲁晓夫只好憋一口气，终止这不愉快的争论，端着酒杯继续完成他的祝酒：“算了吧，还是让我们互祝健康吧，干杯！”

宴会上争论如此激烈，会议上的气氛可想而知。那是相当紧张的，对于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也逐段逐句研讨与争论，并且常常伴以指责性发言。

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即中共中央 1960 年 9 月 10 日答复苏联 6 月 21 日给我方通知的答复全文。其中包括：

- (1)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方搞突然袭击，接着撕毁两国签订的苏联援华协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 (2) 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把两党意识形态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
- (3) 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苏方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推行亚洲地理政治战略方针。
- (4) 苏方美化美国帝国主义，宣传戴维营精神，对我施加政治压力。
- (5) 赫鲁晓夫在 1959 年 9 月竟然向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提出请求，把中国说成是对苏最大的问题，请阿登纳帮助对付中国。

发言的其它 7 点是有关苏波关系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关于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工会理事会上争论的问题。

争论中双方的观点交锋，会议记录都有详细记载。翻译李越然讲了两个印象比较深的小例子，就可看出会议是在怎样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

这次会议，苏方是以其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为首。他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瘦高个子，喜欢戴一顶圆型列宁帽，说话比赫鲁晓夫稳重多了，很注意逻辑性。他嗓音略有沙哑，即使是指责对方也能表现出沉稳。

“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无法工作。”苏斯洛夫用左手拇指触触眼镜框下沿，瞥一眼邓小平，继续盯住自己的两只手，不紧不慢他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给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态度已使得我们无法工作。撤走苏联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会议发言都是按顺序，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中国代表团一般都是后发言，当苏斯洛夫举出这个例子后，邓小平指示李越然等人去核实。

李越然离开现场赶紧给国内打长途，核实情况，尔后向邓小平悄悄做了

详细汇报。

轮到邓小平发言了，他两臂放在桌面上，左手中的香烟还在悠然地冒着白烟，他的目光在各国代表的身上缓缓扫过。

“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了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8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邓小平停顿一下，嘴角漾出一丝浅笑，同时将目光缓缓掠过表情各异的各国党的代表们，最后，目光停在苏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

苏斯洛夫不抬头，只把眉毛做遗憾状地耸了耸，两手互搓着有些不自在。

“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份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

苏斯洛夫赦颜喃喃：“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

“那么，到底为了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我国各重要经济部门。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邓小平眼里像打闪一样射出锐利的光波，“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邓小平的话是深刻的。赫鲁晓夫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损害留下的伤痕印在几代人的心灵上。记得1960年8月，周恩来在为将要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回顾了中苏友谊的发展历史后，动情他说：“全体苏联专家与中国同事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全部撤走，虽然我们一再表示挽留，但是无效。今天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惜别，我的感情已经不允许我讲下去了……”当时许多苏联专家难以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李越然又讲了第二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这次会议对文件的起草确实是逐段逐句，甚至是逐词逐字地进行讨论的。

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文件原稿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在俄文中有“勒住缰绳”的意思。胡乔木说：“这个词要推敲，不是马受惊了以后再勒缓绳，而是在它未惊之前就加以制止。”

为这一个词，中方同苏方争论半天，强调对于战争的预防，而不是等战争打起来再设法“勒住惊马缰绳”。

主持会议的苏共宣传部部长波诺马廖夫都争得出汗了。他敞开爽襟，扯着衣襟一角边扇凉边说：“中国的翻译对俄文研究到这个地步，啊，这么抠字啊。我们都不得不翻字典了。”

在这样紧张激烈的交锋中，邓小平始终是泰然自若。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代表团在大使馆里吃饭，常常是笑语不断，轻松活泼。

有一天，在激烈争论之后，回到使馆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这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扬一扬下颊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什么，兔子吃鸡？兔——子？”张毅以为听错了。

“对，兔子吃鸡。”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还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忍着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掌故？”

“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30年代。”邓小平含着笑望望大家，大家都

睁大眼等下文。

“你们谁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

“是在延安吗？”有人问。

“不是在延安养兔子，是在延安做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他这个无锡话可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

饭厅里早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刻好起来。

会议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都是用俄语发言，并且是看着苏方眼色行事，在发言中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中国共产党。其中就有伊拉克共产党的代表。他俄语讲得不太好，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共产党，那种腔调是别有一番风采的。

到了吃饭时，邓小平知道李越然善于摹仿别人讲话，过去就曾叫他摹仿过薄一波的讲话，于是他又提议：“小李，你给大家出个洋相，学学巴格达什讲话么。”

于是，李越然摹仿巴格达什的腔调和表情即席表演，引得哄堂大笑。

会议桌前论“辣椒”

在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国一星期后，也就是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再次飞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并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苏联派来两架“图104”专机接载中国代表团。周恩来与朱德到机场送行。李越然跟随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等同志乘一架飞机，代表团成员彭真等乘另一架飞机。

专机由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照例先经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机场做短暂休息时，当地州委书记来迎接中国代表团。这是位年轻人，过去中国代表团路经这里差不多也是这位青年同志出面照料。他很好讲话，有时过多，大家也就不在意听了。

专机由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苏斯洛夫、科兹洛夫、葛罗米柯等苏联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刘少奇第一个走出机门，接着是邓小平。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仪仗队和红地毯，双方远不像1957年那么热烈了。刘少奇只是礼貌地同赫鲁晓夫握手，没有拥抱。

“欢迎你到莫斯科来。”赫鲁晓夫礼节性地表示，“在你到达之前，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刘少奇同志来了，我相信会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更大的成果。”

刘少奇微笑点头：“我们是带着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我相信经过我们双方以及各兄弟党的领导共同努力，可以把这次会议开好。”

中苏领导人互相握手见面后，便驱车前往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赫鲁晓夫陪同刘少奇同乘一辆“吉斯”车。

车上，赫鲁晓夫和刘少奇做了一番礼仪性寒暄后，便出现片刻沉默。赫鲁晓夫表示说：“这次开会，凡是取决于我们的事，我们都做了，现在就看中国同志的了。”刘少奇很有分量地回答说：“不是看我们，我们是带着真诚的团结的愿望来的。希望苏共能带个团结的好头。”接着刘少奇默默地向窗外望去。

赫鲁晓夫下意识地随刘少奇的目光朝外望，似乎被什么触动了一下，也许是那些新崛起的住宅楼吧？他终于打破了沉默。

“上次毛泽东同志来，我向他介绍过。这几年我们盖了许多新居，你看到的这些楼房都是新的职工住宅楼。我们的城市发展正由以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为主的中心区，发展为多中心区，特别是在郊区建设了大量民用住宅，以满足人民需要。总的来说，我们的形势很好，只有农业收成不太好，我们这里主要是天气的原因。”

苏联本是粮食出口国，赫鲁晓夫执政后有些急功近利，农业政策失调，不得不以黄金储备去购买粮食，使苏联从粮食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这一点中方代表团一进苏联就有体会。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暂停休息时，也常常听到粮食欠收的情况介绍。

不过，中国当时的困难要更大些，这与大跃进是有直接关系的。赫鲁晓夫把苏联的农业困难归咎于天气不好，说完他还意味深长地瞄了一眼刘少奇。

刘少奇不像赫鲁晓夫把责任往“天灾”上推，他只简单他说了一句：“我

们也是严重欠收，困难不少，我们正调整政策，解决这些困难。”说完，话又归正题。

赫鲁晓夫说：“关于这次各国共产党会议，虽然经过了起草委员会的协商讨论，仍然遗留了一些问题。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中国同志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

刘少奇在车上仍穿着毛皮领大衣，戴一顶呢子制服帽，坐得很直，不动声色他说：“小平同志讲过了我们的意见。”他瞥一眼赫鲁晓夫，语气诚恳地继续说：“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同志还是从大局出发，尽量协商，取得一致，不要出现大的争论，使得会议不好进行。”

赫鲁晓夫也穿着大衣，戴一顶灰白羊羔皮的上土耳其帽，习惯性地转动几下腕子上的手表，又重复说：“取决于我们的事我们都做了，现在就要看中国同志的了。”

刘少奇声音始终温和，但立场很坚定：“我们是坚持团结的，这个立场早已讲过，也是这样做的，对尚存在的几个原则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坚持。”

赫鲁晓夫扬眉耸肩，不再作声。

双方已经初步探明了对方的立场和态度。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驻苏大使刘晓向刘少奇汇报情况。

刘晓在汇报中说：“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后期，赫鲁晓夫把本已达成协议的某些东西也给推翻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刘少奇说：“也可以利用机会亮亮我们的底。”

接着，刘少奇微笑着说：“赫鲁晓夫如果想开好会议，就要有诚意。他们是不是这样，我们还要看实际。”

“如果会议中有人要搞分裂，那决不答应。我们来是为了把会开好。”刘少奇显得自信而坚定。

中国代表团一到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便在苏共中央大厦的会客厅里同邓小平举行了会晤。

他们寒暄之后，在会议桌两边面对面坐下。双方就会议通报了一些情况和想法后，苏斯洛夫说：“我们准备了一份材料，全面阐述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会谈和探讨，”说完又补充一句：“不过里面也加上了一点辣椒。”

“哦？那我倒要尝尝是什么滋味？”双方都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这次会晤时间很短。

苏斯洛夫没有当场将文件给邓小平，是后来派人送来的，打开一看，好家伙，长达120页，厚厚一叠，洋洋6万余字。文件果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攻击。而且，他们还将文件散发给了各国共产党（这个文件是对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通知书答复的答复。）

会议在开始阶段气氛紧张，争论很激烈。中国代表团主要是邓小平发言，刘少奇只是偶尔在关键处插几句话。但是，会下刘少奇一直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刘少奇坚持以诚待人。他再次向刘晓大使说：“你去找赫鲁晓夫，你告诉他，81国党的会议开成功了，也就是中苏关系改善的一个转折，因为有了共同基础。”

“这要看机会，还是顺乎自然地向他们透露好。”刘晓建议道。

刘少奇点点头：“要相机行事。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同赫鲁晓夫谈谈中苏关系问题。”

于是，刘晓加紧进行活动，很快便择机向米高扬、科兹洛夫透露了这个意思，他们很快报告了赫鲁晓夫。

但得到的反响是强硬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双方分歧尖锐，刘少奇与赫鲁晓夫会面时，用劝说的口气说：“你们不要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中共，不要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后果不好。”

赫鲁晓夫坚持说：“我们只是讲明情况，讲明自己的观点。”

“我们一再讲明了，我党代表团对 81 国会议的方针，就是以互让互谅的协商精神达成协议，使 81 国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从一下飞机我就对你讲过，我们是抱着团结的愿望到这里来的。”

赫鲁晓夫仍然用怀疑的目光去看刘少奇：“并不是没有人攻击苏联共产党啊。”

确实，会议中有些左派共产党代表提的意见不乏尖锐，矛头有些是直接指向苏联共产党的。赫鲁晓夫可能误解这是“受中共指使”，误解为中共的策略。

刘少奇仍然诚恳待人：“现在会议上有些过左的思想，也有一些过右的思想。我们对于左派的合理意见是支持的，对于某些过左思想我们有我们的见解，我们要对他们做工作。但他们是处于一个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所以对他们的意见中苏双方都应予以谅解。会议中所出现的较右的思想，也不利于团结，这也是因为他们的斗争条件和传统思想所形成的，对他们也应谅解，多做工作，特别是苏联方面要对他们多做工作，因为他们和苏共有历史关系。”

对于刘少奇的诚恳劝说，赫鲁晓夫开始是听不进去的。除了疑心之外，他还坚持一种“策略”：你想得到一百，开价就得二百，而且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赫鲁晓夫始终对 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不满意，认为对苏共“20 大”的意义肯定不够。

他坚持要在 81 国会议的文件中写上：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赞成苏共“20 大”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分析，苏共“20 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原则问题上，中共代表团的 attitude 是，寸步不让。刘少奇说：“1957 年《莫斯科宣言》，我们已经照顾了你们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让步，只能照抄《莫斯科宣言》。你们不能强迫各兄弟党都接受你们一家的观点。各国情况不同，那么别的党的会议通过了什么决议，是不是也可以像你们这样提要求，让国际共运承认是总路线呢？”

赫鲁晓夫甚至说什么，“我们没有你们也可以，没有中国也可以生活。当年我们不愿为首，你们非要我们为首不可。我们为首了，你们又朝我们痰盂里啐唾沫。”等等。

本来，除了双方正式会晤外，中国代表团还让刘晓大使向苏共领导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哪些问题可以让步，哪些问题不能让步。为了团结，顾全大局，是会互让互谅的。应该说，中国代表团坚持团结的真诚愿望苏方是清楚的。但他们还是搞高压政策，在会上攻击中共，也攻击当年的阿尔巴尼亚。但中国代表团并不孤立，会上会下，有不少兄弟党代表团对苏共那套表

示不满。会议越开越紧张。苏方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以及其它赞同中共观点的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指责和攻击。

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请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共产党代表到中国大使馆来，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态度。

刘少奇庄严宣布：“苏联坚持把他的观点强加于我们，我们不能同意。特别是苏联在会前散发文件全面攻击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无法签字。”

日本共产党代表焦虑他说：“不签字就没有团结，就是分裂了。”

刘少奇表示：“苏共不放弃他们的要求，我们难以签字，但是，签字表示团结，不签字我们也要团结。”

当时，印度共产党代表高士与中共观点接近。他也不无忧虑他说：“中共的态度我们理解，但我们还是希望不要破裂，不签字就破裂了。”

越南劳动党一直在中苏之间进行紧张而积极的斡旋。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知道了中共的严正立场和坚定态度后，由胡志明找赫鲁晓夫谈话，据赫鲁晓夫自己回忆，胡志明是这样说的：“赫鲁晓夫同志，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你不能让我们的运动出现分裂，你必须使中国人同我们一起在宣言上签字。只有一致签署，这文件才会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赫鲁晓夫虽然没答应胡志明，但他至少可以看出对中共是压不了、压不倒的。

在关键时刻，刘少奇在列宁山别墅接待了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等。

刘少奇保持着一贯的诚恳态度，这一次又增添了几分严肃性，不紧不慢他说：“宣言里不许谴责或影射任何兄弟党，比如你们又指责什么派别活动。你们不要带这个头。”刘少奇略一停顿，加重语气说，“刚一下飞机，我就明确地表示了我们的来意，热情地讲了我的坚持友谊和团结的愿望。我劝你们不要把事情做绝了！你们要不听我们劝告，一定坚持做绝，破坏了这次会议，是要担历史责任的，要受到历史的谴责。再说一遍：不要把事做绝了！”

米高扬望望刘少奇，又望望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咳一声说：“我们重视刘少奇同志这个讲话，但不是谴责谁，只是讲一此事实。”

“你们不是讲事实，而是攻击，还没有开会，你们就抢着发那么厚的材料，6万多字，攻击我们。”

米高扬强笑道：“我们还是愿意维护苏中两党的团结友谊的。”

刘少奇平静他说：“兄弟党之间应该真诚相待。”

刘少奇这种坚持原则正大光明的态度，对于最终达成协议有重要意义。

81 国会议不是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中方希望越南的停火线定在 17 度线，但提出的分界线还要向南移到 15 度线，这是为了讨价还价。赫鲁晓夫曾回忆说：“17 度线是我们的最高要求”。甚至于“我们并未指望得到这样的东西”，当以 17 度线为界达成协定之后，他“但白他说，我们是又惊又喜地喘了一

口气”。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对 17 度线协定也“非常满意”。只有美国的杜勒斯先生不高兴。

81 国会议是世界各兄弟党的会议，不能像对付帝国主义那样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兄弟党之间，特别是中苏两大党，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做了必要的相互妥协。

苏联共产党终于采取了协商和妥协的态度。经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苏共领导同意取消对所谓“派别活动”的谴责，接受了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关于兄弟党的关系应一律平等正确观点。中苏双方互有妥协，对苏共“20 大”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同意照抄 1957 年《莫斯科宣言》的文字。于是，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终于通过了共同签署的文件《莫斯科声明》。

会议成功后，苏共中央再次提出邀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分访问苏联。经中共中央同意，刘少奇留在了莫斯科，由邓小平率代表团返回北京。

受到不寻常的礼遇

1963年初，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转交苏共中央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提出两党不要再公开争论，建议两党举行会谈。

中共早已提出过停止论战的建议，未被苏方接受。但出于团结的愿望，中共还是同意会谈。

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团员有杨尚昆、伍修权、廖承志、刘宁一、康生及新任驻苏大使潘自力。

苏联共产党派出以苏斯洛夫为首，由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格里申、伊里切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组成的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准备赴苏期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作为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

赫鲁晓夫对这篇文章大为恼火，拒绝文章中的全部 25 条建议，指责中共 25 条建议是对苏共的诽谤和攻击。

7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出发和到达莫斯科那天，不知是碰巧？还是有意为之？中国空军的飞机竟然不得不在机场等候数小时，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

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天，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指责中共继续加强公开论战。于是在机场上，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回驳了前一天苏共的指责。

中苏两党会谈便在这样一种不平静、互相激烈地批评指责声中开始了。

必要的礼节还是不曾少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下榻于列宁山别墅，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

宴会的隆重丰盛同气氛的紧张激烈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使当事者至今记忆犹新。翻译李越然日后回忆：

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郑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20大’、‘21大’、‘22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接受我们的观点。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些急切，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明确指出：“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语言。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时机表明态度。”他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

赫鲁晓夫将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接着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中苏两党会谈，就这样从宴会上便开始了正面交锋。欢迎的宴会上尚且如此，正式会议便可想而知。会谈是在双方不断发表声明、政府照会和报刊文章的争论中进行的。虽然没有大吵，但都是态度强硬，以宣读发言稿为主，都是各读各的稿子，各表各的观点。那情景可称之为“文明的争论”。在一次争论中，双方终于离开了讲稿。这是在苏共中央的小会议室里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苏方发言人主要是苏斯洛夫，有时科兹洛夫也发言。中方发言人主要是邓小平，有时是彭真或康生。这次会谈由苏斯洛夫先发言，核心是说帝国主义已经变得比较现实主义，比较明智。共产党通过争取议会多数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邓小平发言时，指出苏联美化帝国主义，丧失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这时，科兹洛夫开始即席发言，他将两肘支撑桌面，两手互相摩擦着说：“国际会议上，你们中国代表团总是持特殊立场。比如你们的廖承志、刘宁一，在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上总是唱另一个调子，有自己的特殊路线！”

邓小平仍然是不紧不慢他说：“想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别的国家，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别人跟着你的指挥棒转，这是行不通的。”

科兹洛夫从鼻子里哼一声道：“哼，我们苏共总是在抓国际上的大事，你们中共总是在那里抓苍蝇！”

邓小平并未理睬对方的用语，而是强调原则：“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是改变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要不要支持？各兄弟党之间要不要坚持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原则？还有和平过渡问题，斯大林问题，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原则问题？”

“对于斯大林的种种罪行我们必须加以谴责！”苏斯洛夫提高了声音，这显然是苏共新领导在政治斗争中最为敏感的问题。

“斯大林有错误，有些甚至是严重错误，可以批判，但为什么要一棒子打死？”邓小平犀利的目光在苏斯洛夫脸孔上扫过，“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呢？为什么拿不出勇气对他做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呢？”

“他专横跋扈，是个暴君，对苏联人民犯下了粗暴的罪行！”

“当苏联人民高呼他的名字，前赴后继同希特勒法西斯展开殊死搏斗的时候，当苏联人民紧紧团结在以他为首的苏共中央周围，保卫和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们呼喊的难道只是一个暴君？”邓小平嘴角掠过一丝讥讽的浅笑，迅即又严肃地盯紧苏斯洛夫，“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这样丑化他呢？”邓小平目光变得严厉：“你们为什么听见他的名字就害怕，难道他的魂把你们迷住了？”

苏斯洛夫的目光在邓小平脸孔上稍触即离，始终不敢正视。苏斯洛夫及时改变了话题。

就在会议期间，苏方与英、美两国草签了针对中国的部分禁上核试验协议。

条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限制中国拥有核武器，由苏、美、英3国垄断核武器。

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这个针对中国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议，使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又增添上一层阴影，双方的分歧与争论更趋激烈。这次会谈约进行了两个星期，会议期间未给中国代表团安排任何参观和

娱乐活动。

会议休息时间，邓小平和彭真常在一起散步。有一次他们在散步时，议论赫鲁晓夫故作姿态地建议停止论战。

彭真说：“他们把我们骂够了，不外乎就是来这招儿，要求停止论战，堵我们的嘴，不让人民知道事实真相和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笑道：“可以呀，他们要承认他们原来骂的都是错的，然后再停止。”

会议期间，苏方在最高苏维埃小宴会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过两次小宴会。宴会目的不外乎缓和一下气氛，却始终未能如愿。

“我们应该停止论战。”苏斯洛夫确实担心中国共产党发表重头文章，他大概有了什么预感。

“可以停止。”邓小平面带笑容，笑得轻松，讲得坚定，“我们可以停止论战。但你们要承认你们对我们的攻击是错误的，否则你停止论战的提议就是不真诚的。”

“如果你们有诚意，就应当无条件地立刻停止！”赫鲁晓夫推脱责任。

“你不要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邓小平保持着他那惯有的沉稳声音，“我们一贯要求停止，一贯主张不应公开论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就一直在劝你们，几年了，你们始终不听。现在你们骂够了，不许我们答复，我们不能接受。”

赫鲁晓夫容易反复无常。当他和美国关系缓和，诸如在美苏戴维营会谈等活动中有所得时，便攻击中国，有时简直是肆无忌惮。当他和美国关系紧张时，比如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与美国较量以失败退却告终时，就无可奈何地被迫表示中苏友好，希望忘掉过去。

然而，邓小平是国内外闻名的政治家，他有“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具有领袖人物的深远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战略洞察力。

当赫鲁晓夫控制不住情绪，缺乏一种大国领袖人物所必须具备的清醒冷静的头脑、缺乏深思熟虑，因而讲出一些草率的话、做出草率的行动时，邓小平不止一次当面提醒他：“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并不止一次地讲过：“最终你要负历史责任的。”

7月20日，邓小平率中国党的代表团结束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党会谈，返回北京。

出于安全的原因，中国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当飞机在西郊机场刚刚停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迎向舷梯，欢迎伟大的“反修主义者”归来。据说邓小平以前从未受过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

这次会谈没取得任何进展，更谈不上什么一致意见。达成的唯一一项协议是：谈判暂告一段落，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

一个半月后，中国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一评”到“九评”。说起来也巧，随着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声，赫鲁晓夫在国内外的一系列困境中倒台了。

据说，赫鲁晓夫开始还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希望能再次出现1957年苏共中央6月会议那种转变。但是众叛亲离，在10月13日夜间会议休息时，终于被米高扬说服，“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公布于世界各报刊上的“辞

职申请书”。苏联新闻界称赫鲁晓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要求被解除职务。

赫鲁晓夫解职后，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苏共新领导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中国和其他6国党拒不参加。此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1966年3月，苏共召开23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中断。

回顾这场论战的历史，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

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他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

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

至于过去争论的另一个方面，邓小平说：

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第七节 “小老弟”和平期求落空

赫鲁晓夫下台为这次访问提供了机会

赫鲁晓夫隆重庆祝他 70 寿辰后不久，即前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苏联度假胜地——克里米亚的索契过起假期生活，但风云骤变，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突然派专机将他接回莫斯科，并解除了他的一切党政职务，迅即成为国际瞩目事件。

1964 年 10 月 16 日凌晨，为赶在这项消息公布前通知中共中央，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他说，1964 年 10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0 月 1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说来有趣，正是 10 月 16 日塔斯社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这一天，新华社公布了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有人却说，我们选在这天进行核爆炸是有意的，这当然纯属瞎猜。

苏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新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将奉行的政策和他会有什么差别，人们难免猜测纷坛。对赫鲁晓夫下台大体有三种说法：一是由于他内外政策失败，引起党内不满；二是由于他主观片面，简单粗暴；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对苏联新领导也有三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据友人说，根据他们几个月前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人的接触，赫鲁晓夫对自己的政策表现“把握不定”，“想寻找出路”。苏斯洛夫等人对现行路线表现坚定不移，可能由于怕赫鲁晓夫动摇而将他撤职。当时，要了解事件真相，唯有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

赫鲁晓夫对华态度为何先好后坏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面临许多困难，地位尚不稳固，需要中共的支持。那时，他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比较尊重，对中苏关系也较重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斯大林未到车站迎送。赫鲁晓夫上台后第二年即来我国访问，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对中国革命评价甚高，批评斯大林对我国有大国主义错误，说中共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础。遇到不同意见，也能友好协商。他按早先决定，撤退了驻旅顺的苏军，并将该海军根据地交还中国；废除了原先遗留下来的不符合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提供了新的贷款，增加了援建项目，扩大了原有援建项目的规模和双方科技合作，等等。中共中央本来就十分重视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赫鲁晓夫以平等友好态度待我，自然更愿与之友好相处。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和我党中央虽然对赫鲁晓夫的错误深感痛心和耿耿，并在内部对他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但也充分估计其积极方面，希望他能纠正错误，加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增强中苏团结，反对共同敌人，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他和苏联给予了真心实意的、力所能及的支持。

1957年毛泽东再次访问苏联，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毛泽东、邓小平同苏共领导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同各国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终于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能以平等协商的方法，取得克服分歧、增强团结的成果，对于双方的原则分歧采取内部协商求得一致，暂时不能取得一致的则注意等待或作必要妥协的做法，深为满意，十分乐观地把苏联卫星上天和这次会议的成果作为标志，用“东风压倒西风”来形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赫鲁晓夫一旦站稳脚根，立即转过头来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我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归两国所有，由两国共同使用；同年7月，继而提出中苏两国军队直接协商制定专门计划以适应苏联国防部的需要；同月又提出苏联在远东没有不冻港，要和我国建立共同舰队，使用中国港口。毛泽东始终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功大于过，但对他的沙文主义做法深为不满。只是为了顾全大局，长期隐忍不言。毛泽东原以为赫鲁晓夫会改变斯大林以往的错误，然而赫鲁晓夫却接二连三地提出上述“建议”，图谋控制中国，这使他大为震怒。毛泽东严厉指出，怎么那一套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他的话说如实报告赫鲁晓夫，不要替他粉饰，赫鲁晓夫听了越不高兴，他越高兴。对毛泽东这样强烈表示的严正立场，赫鲁晓夫表面敷衍，实则已

下定决心，我行我素。

赫鲁晓夫还积极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并企图将我国也纳入这条轨道。1958年8月23日，我炮轰金门，旨在惩罚蒋军对我骚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苏联对我甚为

不满，担心引起中美冲突，妨碍他们搞苏美合作。于是，立即派葛罗米柯访华，并带来核试验影片，请毛泽东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想吓唬我们。我党为照顾团结，派陈毅同志出面，明确告诉他，中美双方都未准备打仗，万一打起来，我们也不拖苏联下水。这样，他们才放下心来，作了支持我的表态。

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不帮我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华参加我国庆。10月2日中苏举行高级会谈，赫鲁晓夫替艾森豪威尔说项，要我释放在押在美国特务，并说当年列宁曾

在西伯利亚建立远东共和国，暗示我也可让那个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蒋介石暂时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理所当然的遭我拒绝。事后，毛泽东说，他们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不得不反。受美压迫的朋友需要我支持，我不得不支持。

但是，赫鲁晓夫并未就此止步，1962年8月23日，苏联通知我国，美向苏建议签订《防止核扩散协定》，苏已给予肯定的

回答。这是苏联背着中国同美达成的协议，合谋束缚我手脚，由他们垄断核武器，合作主宰世界。我当然不能同意。苏联说，他可给我核保护。如果我接受他的核保护，只能听其摆布，否则就会在我头上挥舞核武器。1963年7月25日，正当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时，苏联又一次背着我国，同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阻止我进行核试验。

赫鲁晓夫对我胆敢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十分恼火，便采取一个又一个措施，对我施加压力，妄图逼我就范。政治压力无济于事，便转而施加经济压力和军事压力。苏联一党不行，便召开国际会议，对我进行围攻。一次不行，再开一次。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正是赫鲁晓夫这种无休止的蛮横行径，把中苏关系推到了破裂的边缘，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弄到名存实亡的地步。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理应为改善中苏关系带来转机。

抓住时机决定周总理访苏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

10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毛泽东主席指示，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嘱余立即拟稿报批。毛泽东还说，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这份贺电当天即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周恩来对余湛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团结对敌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周恩来雷厉风行，日以继夜地接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倡议通知他们，强调中方的目的是去寻求团结，请他们报告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考虑到苏联已主动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和外交关系，周恩来特别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我们主动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分析了不论这一行动的结果如何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有益无害。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对周总理的谈话和解释都表现很高兴。他们的党和政府对中国的倡议也都迅速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苏联也很快给中国和其他兄弟国家发出了邀请。这表明中国的倡议是深得人心的。

中央决定，我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任副团长，参加代表团的还有有关各方面的负责人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漆、余湛等。

中央还决定，在北京扩大庆祝十月革命节47周年活动的规模。11月5日，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了节日贺电。11月6日，首都各界举行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协副主席刘宁一在大会发表了讲话。11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招待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11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不是逢五逢十的时候，这样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也是破格的。

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

1964年11月5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当晚下榻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国高级代表团住过的一座不大的建筑，有个不大的花园。晚饭后，大家在园中散步，但见庭园依旧，只是换了主人，不免有些感慨。有人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并将诗中的“刘郎”改作“周郎”，奉赠周总理。回国后和毛泽东谈及此事，有人认为称周总理为“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还是“周郎”好。

周总理到达别墅后，无心和大家一起散步，稍事休息，立即开始夜以继日的紧张活动。对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进行礼节性拜访，接受他们的回访，参加节日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同苏联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接触，进行非正式交谈和正式会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团结对敌的愿望。每晚10点左右，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聚集在列宁山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交流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研究次日的活动，向中央报告请示。每到深夜12时，周恩来便请健康欠佳的贺龙副总理先去休息，自己则领导大家继续忙到次日凌晨三四点。7时许，他复起床，开始又一天的紧张活动。

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是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这个不平常的时刻来访的，但可以看出，他们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大都很谨慎。除因某种任务需要同我们接触者能同我们较自然的交谈外，许多苏联老朋友看到中国代表团后，往往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用不同方式悄悄地表达欢迎之意，有的激动得热泪滚滚。有的新朋友则就近同代表团攀谈，表达对昔日中苏友好的怀念。但苏联保安人员却公然阻止这种接触，迫使他们只好默默离开。中国代表团感到这不是好兆头。

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后碰到的第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当周总理同苏联领导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此时，迎面走来了马利诺夫斯基。他见到周总理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正言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他却像发了疯似地，在周总理走后仍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这时周总理和译员已经走远，未能听见。另一位翻译王刚华虽听见但已来不及找到周总理报告此事。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总理已走开，又跑到贺龙副总理那里继续挑衅，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后，认真地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认为决非偶然事件，是对我们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次日上午，苏联新领导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总理。稍事寒暄后，周总理便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总理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指出马利诺

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应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总理指出，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 8 号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他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总理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那当然！”

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号召推翻毛泽东的领导，这不仅对尚未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也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周总理早就把我方同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意向通知了苏方。如果苏联新领导真有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就应乘此良机，同中方坦诚相见，表明自己团结对敌的意愿，主动说明中方最关心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但事实却不然，从 11 月 5 日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至 11 月 9 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前，不论周总理如何多方向苏联新领导探询，他们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第一次会谈开始，周总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着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提出某些问题，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骤。其实，苏方很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从 1963 年起，苏联公开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几千篇，煽动和胁迫其他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材料更不可胜计。到这次高级会晤为止，我答复苏方攻击我们的材料为数不多。现在勃列日涅夫又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但他自己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公开论战，对苏共中央对我们进行那么多的攻击，对我党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一概避不作答，那么，对他提出的这个议题如何讨论？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执意不谈，周总理料到再就此提问也无用，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但周总理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同他们讨论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向他们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寻找苏联新领导究竟和赫鲁晓夫有多少差别，希望了解在我党同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周总理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周总理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周总理说，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 1964 年 7 月 30 日信中通知召开的 12 月 15 日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

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勃列日涅夫说，开会是他们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周总理说，8月30日我党给你们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勃列日涅夫企图把我们党对他们的复信说成是命令，周总理立即据理反驳说，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周总理还指出，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党参加呢？周总理还告诉他们，迄今为止，已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但是，不论周总理怎么劝他们不要把兄弟党的会议同赫鲁晓夫7月30日下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执意不改。我方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他们采取的是决不妥协的态度，也不讲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发言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坚持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他们所说的团结是要我们牺牲主权，屈从苏联领导指挥棒的团结。这是无法接受的。

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米高扬企图为自己辩解，说他讲的是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又强调是集体领导，党的决议和纲领都是集体作出的，没有什么赫鲁晓夫的一套。那么，他们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何区别，又说不出来。

周总理这一着很灵，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这个具体问题上终于揭开了苏联新领导守口如瓶的瓶盖，露出他们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的发言终于堵死了此次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大门。

这次会谈后，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仔细研究了几天来与苏联新领导以及其他兄弟接触和会谈的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周总理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作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需要的。

代表团还讨论了可否同苏联发表个中苏联合反帝的声明，结论是不能这样做。因为苏联新领导在联合反帝问题上无任何实际行动，对我党亦无丝毫妥协的表示，发表这类声明，只会给他们以招摇撞骗的资本，而不能达到真正联合反帝的目的。弄不好，还会被他们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成为他们棋盘上的棋子。

在11月11日的会谈中，周总理对他们的意见作了如下答复：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

这就是我方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还是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 12 月 15 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 1960 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方身上，遭到了周总理的坚决驳斥。周总理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 7 月 30 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11 月 12 日，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按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果真如周总理所料，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为了把球踢到中国一边，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也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总理表示将报告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11 月 13 日，我代表团乘专机离莫斯科回国。柯西金去机场送行途中在汽车上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总理问他区别何在？他一直闪烁其词，避不直言。

周总理访苏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坚决而机智地执行了中央的出访方针，虽然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找到中苏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但这次访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磨灭。第一，了解到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阐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和各兄弟国家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第二，为维护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中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和中苏两党、两国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同苏联新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第三，捍卫了我党、我国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周总理这次访苏，为党和人民立下了新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更衷心的爱戴和尊敬。11 月 14 日，当周总理的座机徐徐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健步走下飞机的时候，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随同毛主席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并和首都民兵照了像，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第八节 乌苏里江的枪声

“克格勃”分子的渗透阴谋

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春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已开始融化，白杨树鹅黄色的嫩芽挂满枝头，草地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翠绿。

天刚蒙蒙亮，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一大早这是上哪去？”他问司机。

“这是祖龙泰耶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泰耶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

岳科长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犁去？”

“怎么，不行吗？”

“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祖龙泰耶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岳科长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

祖龙泰耶夫，俄罗斯族人，中等个，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鬈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泰耶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

1949年8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祖龙泰耶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祖龙泰耶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下。祖龙泰耶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

“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

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

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泰耶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

“嗨……嗨……嗨……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国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

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白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

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

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

“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嘛！”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

祖龙泰耶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

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

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加之一大批“克格勃”分子，又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秘密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千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内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

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

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

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白，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砸！”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烧……”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

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特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

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

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

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

“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

这时伊犁军分区警卫连战士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

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

与此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

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

在区党委大院内，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撤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

警卫连长在路中央划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

没有人理会他的话，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喊道：“冲，冲……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

人群前呼后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士们一齐朝天鸣枪……

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有的是被挤倒的，有的是自己卧倒的……

“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的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着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篷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

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他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中国北京，中南海丰泽园。

四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但丰泽园里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草，洁净的通道两边松柏树郁郁葱葱，因毛泽东在开始住进丰泽园的时候不准许在他的住处摆放鲜花，工作人员就只好种树种菜。

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慢慢地吸着一支烟，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线装本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另一边则摆着毛泽东手书的《西厢记》的一段，大笔开篇，神采射人的几个大字：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对面的沙发上并排坐着刘思齐和杨茂之，他们二月刚刚结婚，杨茂之从苏联留学回来，在空军学院当教员。

“思齐、茂之，看到你们结婚，我就放心了，思齐的身体不好，茂之你要多照顾她。”

“是，是，”忠厚老实的杨茂之连连点头。

“爸，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老是熬夜。”

“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我是顺其自然。”

“爸，人家医生说的都是有科学道理的！”思齐一下子认真起来。

“他那个道理，就不发展了！”毛泽东笑了起来。

这时卫士小田走了进来：“主席，总理来了。”

“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主席，我这一来又打扰你们了，”他又笑着说：“思齐，茂之你们结婚了，工作和学习要好好安排一下。”

刘思齐和杨茂之站起来，“爸，我们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小田，你送送他们。”

周恩来又叮嘱了一句：“有时间，你们可要多来看看！”

两人点点头，随卫士小田走出门去。

周恩来打开一份电报：“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这个事件，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一些人也要去，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

“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0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愿意走，可以欢送嘛！”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恩来说着拿出了另一份报告。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

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向中苏边境驶去。

一晃 30 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

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 1992 年 1 月 2 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一个漫长而饥饿的冬天来了，于是 30 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

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

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 30 年前那个夜晚。

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如同大梦初醒。

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 年河东，30 年河西。

正如 30 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苏军的挑衅不断升级

1969年1月以来，苏联边防部队对中国领土珍宝岛的入侵和挑衅再次升级，他们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由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拳打脚踢发展到了棍棒相向，中国边防部队在几次执行巡逻任务中，都遭到了苏联边防军的拦截和殴打，致使巡逻中途中断，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忍让，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这一天在上岛巡逻之前，奉命带侦察分队支援珍宝岛的陆军133师侦察科长马宪则和合江军分区曹建华副参谋长专门把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侦察连副连长陈绍光、排长武永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

马科长说：“最近这一段，苏联边防军动用了棍棒，一连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持说理斗争，我们要坚决执行。但是孙站长和李翻译要重点保护，无论如何不能被敌人打着。”

陈绍光说：“还是我们在前面，叫孙站长和武排长、李翻译跟在后面，有情况也好往下撤。”

“不行，我们也要到前面去。”孙玉国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是这里的老人了，情况熟，出力还在后头呢，真让那些王八犊子给打坏了，我向上面也交待不了。”马科长不同意。

曹副参谋长说：“行了，行了，都别争了，按孙站长说的办，他熟悉情况，也可以当机立断进行处理，陈副连长可以在后面接应他们。”

马科长无奈地笑道：“看来你们还是自家人向着自家人，那好吧。”

孙玉国一马当先，带着巡逻队出发了。中国边防军的巡逻队刚刚登上珍宝岛，对面苏联边防军的观察哨便发出了信号，孙玉国他们刚走到岛的西面，只见对面开过来两辆军车。

伊万上尉第一个从车上跳了下来，瘸着一条腿，一拐一拐地边跑边叫喊着什么，一共从车上跳下来三十多名苏联士兵，紧跟在伊万的身后。

“他们在喊什么？”孙玉国问小李。

翻译小李侧着耳朵听了听说：“他们在叫喊，快，快点，不准他们过来。”

“我们偏要过去，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过去，跟我来！”孙玉国一摆手，战士们迎着苏联边防军走了过去。

伊万上尉看见中国巡逻队走过来了，恶狠狠地叫了起来：“站住，你们再朝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

“听拉拉蛄叫就别种高粱了，咱们过去看他们想干什么。”战士们边说边朝前走。

伊万又叫了一声，这一声像下了一个什么口令，苏联士兵一下子散开了，每人手中都握着碗口粗的大棒，一个个虎视眈眈地摆开了架势。

孙玉国第一个走上前去，严厉地说：“你们已经侵入了中国的领土，必须马上离开。”

小李刚把这句话翻译过去，伊万便粗野地骂了起来，不管中国边防部队讲什么道理，伊万的回答就是叫骂。

许多和伊万上尉打过交道的中国边防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说，还没有见过这么粗鲁、这么不讲道理、又狠毒、又野蛮的人，仅在他的指挥下打伤中国边防部队的干部战士就有四五十人之多。

中国边防部队不再说话，用沉默来回答对方的叫骂。

孙玉国已经有了一种预感，看来今天苏联边防部队是故意要把事态扩

大，便提醒大家说：“要做好准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准先开第一枪，要严守巡逻纪律。”

他的话音未落，伊万喊叫了一声，苏联士兵举着棒子冲了过来，对中国边防军人又推又打，当场打倒了两名战士，中国边防部队冒着生命危险赤手去夺苏联士兵手中的大棒。这些苏联士兵也是专门挑出来的，一个个人高马大，加上他们几个人围打一个中国士兵，很快便占了上风。

“把他们赶出去，统统赶出去，一个也不留！不走的就用棍子打，打死了喂野兽。”伊万狂叫着，在他的声嘶力竭的鼓励下，苏联士兵像发了疯一样，棍子像雨点一般落在中国边防战士的身上，一下子又打伤了七八个。

中国巡逻队架着被打伤的战士往下撤，心黑手毒的伊万带着人紧追不放。在后面接应的陈绍光他们一看，嘴都气歪了，这帮子侦察兵，个个身手不凡，早就憋着一肚子气，一看自己的战友被打伤了，掰断了几棵小树当棍子，冲上去要为战友报仇。

马科长在后面大喊了一声：“把棍子放下，都回来，边防纪律对谁也不客气！”

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中国边防部队再一次进行了克制和忍让。

伊万上尉一看中国军队没有还手，得意地狞笑着说：“他们要敢还手，就打死他们，看他们敢不敢再来！”

说完摆了摆手，带着一群打手，得意洋洋地走了。

肖全夫副司令员强调不开第一枪

1969年3月1日，珍宝岛的气温到了零下30度左右，冰雪覆盖了乌苏里江，一眼望去，冰面上一片洁白，岛上的小树林、变成了白色的珊瑚枝，在风中摇来摆去，飘飘欲仙。雪地上清晰可见一串串孢子的蹄印，如同绽开的朵朵梅花。

侦察科长马宪则刚刚接到上级的电话，要加强珍宝岛地区的巡逻。从2月6日至25日，苏联边防部队连续五次围攻和毒打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中国边防部队暂时停止了巡逻。为此苏联报刊大肆宣扬，说中国退出了达曼斯基岛，这证明达曼斯基岛是苏联的领土，而且公开扬言如果中国边防部队再敢上珍宝岛巡逻，就使用火力解决的办法。

根据上级的指示，边防部队召开会议，研究巡逻问题。

战士们一听要上岛巡逻，人人争着打头阵。

孙玉国说：“这次我们要上岛巡逻，敌人可能要耍更大的花招，也可能恼羞成怒向我们开枪，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是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只要敌人敢先打第一枪，咱们就不能放他们回去。”陈绍光越说越激动，边说，边用手拍着枪托，引得大家都乐了。

“我看我们绝对不可以麻痹大意，伊万上尉好几次发话要火力解决，这一回有可能按他说的去做，而且这个伊万，手段很毒的，什么法子都会想出来。”马科长一再提醒大家。

“听说这个伊万，还上过什么军事学院，懂得不少战术，平时也是吹吹呼呼的。”魏连长在一边又插了一句。

“伊万那小子，别看平时横二八三的，把他手下的兵，一个个熊得溜溜的，可不一定真行，这小子瞪着俩大眼珠子，咋一看挺唬人的，其实好多事都没整明白。”全江军分区作战参谋金泰龙在一边和113师侦察连魏连长聊起了伊万。

曹副参谋长捅了他一下：“胡扯什么呢，这儿正开会研究正事，你们又搬出个苏联瘸子来。”

大伙一听都乐了，会场上一下子活跃起来。

金泰龙摸了一下后脑勺，不好意思了：“咋整的，马掌挂到了膝盖上，跑了题（蹄）了！”

马科长听到他俩的话，思付了一会说：“正题，正题，真该好好研究一下伊万，还有那个杨辛中校，咱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曹副参谋长是老边防了，这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过去咱们和苏联边防军官会晤的时候，苏联军官老是吹嘘，他们战术如何如何，打仗如何厉害，咱们也不吱声，就在一边听，他们是有一套办法。不过我觉得他们的搞法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太教条，处处都按照条令来，当然部队不听指挥不行，我看了他们一些作战条令，连排以下的军官就不准要求增援部队，更不能擅自行动，违者处罚很严的。”

“他们训练是很严，但是太教条了，队形怎么摆，进攻怎么走，差一点也不行，都是死的，我就不相信战场上，就和他们那个条令上一样，当小兵的更谈不上什么灵活机动了。”金参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孙玉国说：“他们就是靠坦克和装甲车，没了那玩艺，他们就得往回跑。”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真要出了情况，打起来不能蛮干，要敢打，又要善打。”马科长心里明白，步兵和坦克打，主要是战术要对头。

班长周登国说：“珍宝岛地方大小，两家都在明处，可他们在坦克、装甲车里面，我们在外面，打起来，和他们硬拼，我们要吃亏的。”

这时马科长转身问魏连长：“你们侦察连在这一段雪地潜伏，练得怎么样了？”

“耐寒训练是没有问题了，只是雪地里难以机动，一旦被敌人发现，可就罗嗦了，攻，攻不上去，撤，撤不下来，那些个“塔头”都埋在雪里、人一绊一个跟头，人跑起来还没有爬得快。”

“王副连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冻伤的？”

陆军 77 师 217 团 1 连副连长王庆容，带领一个排，配合 133 师侦察连行动，这一个排的战士，个个都像小老虎，王副连长说：“冻伤的没有，就是大伙吃了这么大的苦，怕仗打不上，罪白受了。”

“这个不用担心，平时训练多受点罪，打仗不会吃亏。”

看看议论得差不多了，马科长拿出了一张珍宝岛地图。“敌人要下黑手，肯定他们要三面包围，我看很可能是东、南、北三面，西面是咱们这边，他们不一定敢过来。我们可以派两支巡逻队上去，也好有个照应，千万不能叫敌人给包了‘饺子’，看着不行，就朝下撤。”

曹副参谋长说：“后面要有人接应，要是没有人接应根本就撤不下来，西边又没有工事，没有可隐蔽的，他们要是追着屁股打过来，我们损失可就大了。”

马科长点了点头说：“咱们是不是这样，由孙玉国、周登国各带一支巡逻队上岛，潜伏好，我和曹副参谋长也提前上岛，靠上去指挥，大家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这个巡逻方案，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马科长立刻用电话向上级汇报了巡逻方案，肖全夫副司令员在电话里，又一次强调说，无论如何不准先开第一枪，这是纪律。

马科长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后，又说：“大家马上回去准备吧，侦察连抓紧时候睡上一觉，夜里开始行动，巡逻分队也要作好准备，明天还和往常一样，上岛巡逻。”

会议一散，各分队便分头去准备了。

勇士的鲜血染红了雪疆

半夜时分，侦察分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无声无息地向珍宝岛开进。空旷的原始森林里寂寞无声，月光透过挺拔的树梢泻到林间，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团团晃动的亮影，密林中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从远处传来一阵阵低沉的狗叫声……

陈绍光在前面带路，这一带的地形，侦察兵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走得很快，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只听到卡卡的踏雪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马科长和曹副参谋长走在队伍的后面，通讯员小马跑过来报告：“尖刀班已经作好登岛准备。”

“先停一下，再检查一下武器装备。”马科长命令道。

侦察分队在岛边停了下来，这次执行任务，每个侦察兵除了武器之外，还带了一小包饼干，一两散装的老白干，一包止咳药片。

“把止咳药吃了，喝一小口白酒，暖和一下，准备上岛。”通讯员把指挥组的命令传了下去。

尽管气温是零下30度，但大家心里都热呼呼的，不少同志没有喝酒，只是吃了止咳药片。

一切准备好了，侦察分队悄悄进入了珍宝岛的西端。

侦察兵进入了潜伏地点之后，挖了雪坑，上面挡上白褥单，每人又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

大约到了3月2日早上六点多钟，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一直开到了靠近中国珍宝岛的南端，吱地一声停住了。

马科长小声地说道：“不要动，无论出什么情况，都不准暴露目标。”

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其中一个像是杨辛中校，几个人站在车边上没有动，朝着珍宝岛指手划脚说了起来，边说好像还边商量着什么，过了一会几个人又争论起来，声音越来越

高。

马科长向曹副参谋长递了一个眼色，两人心里都一阵阵紧张起来。

这时正在争论的两名苏联军官，突然朝珍宝岛走了过来，走得很急，一边走，一边用手比划着。

“妈的，今天要坏菜了，搞不好全完了。”马科长心里一个劲地打鼓。

两个苏联军官越走越近，侦察兵们都往指挥组这边张望，也有些沉不住气了，马科长轻轻地摆手示意要沉着，千万不能乱动。

远处一名苏联军官扯着嗓子喊了一声，这两名军官应了一声，停住了脚步，又说了几句话，便转身往回走去，回到岛边，上了小车，小车一加油门，开走了。

这时马科长才感觉到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们今天想搞什么名堂？”曹副参谋长问马科长。

“我看他们也是有一定的准备，是想长期霸占咱们珍宝岛吧，不管怎么说，要有充分的准备。”

曹副参谋长点了点头，不吭声了。

这时金参谋看了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正说着，只见孙玉国和周登国带着巡逻队上岛了。孙玉国带着第一小组走在前面，排长武永高和周登国带第二小组走在后面。

对面传来了一阵轰鸣声，从苏联境内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开出来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指挥车。车速很快，向珍宝岛急驶而来。卡车上苏军士兵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他们抢先赶到了珍宝岛的东侧，挡住了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的去路。

苏联士兵从车上跳下来 70 人，手里全都平端着枪，没有一个拿大棒子的，而且一下车就摆开了战斗队形。

孙玉国一看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敌人今天有准备，来势汹汹，很可能要挑起事端，要作好自卫还击的准备。”

这时一股苏联边防军绕到中国边防部队的左侧，另一小队也在快速向右侧运动，他们的意图很明显，想从三面包围中国边防部队。

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孙玉国一边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出警告，一边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向岛西撤去。

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忍让后退，苏联边防部队却紧追不舍，约有二十多人，持枪紧逼过来，这时中国边防部队已经退到了岛边，再也无路可退了。

孙玉国看到苏联边防部队的士兵，一齐端起了冲锋枪，他知道敌人可能要开枪了，便挥手高喊一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是发出的准备还击的暗号。

中国边防部队刚刚散开，苏联边防部队首先开枪了，哒……哒……一排子弹飞了过来，随着枪声，中国边防部队 6 名战士倒下了……

孙玉国临危不惧，再次向苏联边防部队，提出严重警告。

苏联边防部队不顾中国边防部队的警告，又一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击。

马科长一看如果再不还击，孙玉国带的小队，怕是一个人也回不来了，便果断地发出了还击的命令，参谋金泰龙用手枪朝天鸣枪发出了还击的信号。

立刻，侦察分队和巡逻分队同时开火了，两边的枪声响成一团。正在这时，只听岛的另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第二小组巡逻的方向，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

“那边也打起来了，没准又是他们先开的枪。”马科长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要是他们先开枪，咱们的人就吃大亏了。”曹副参谋长憋着一口气。

马宪则横下了一条心，咬了咬牙说：“先别管那边了，这边无论如何不能再吃亏了。”

“对，眼前的敌人，让他们有来无回。”

“给他包饺子，一个也甭想回去。”金泰龙话音未落，副连长王连容带头冲了上去，几个战士紧跟在他后面，他冲过一片小树林时，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吼叫着向他们扫射过来，王庆容又向前冲了几步，只觉眼前一黑，跌倒了，他用力一挺身子，又站了起来，冲了两步又跌倒了，他趴在地上，吃力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人在珍宝岛在，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时，冰面上传来了隆隆的响声，一辆苏军装甲车，发疯一般从岛的东面驶了过来，哒哒……装甲车上的机枪发出一阵阵吼叫，几分钟之后便驶上了中国一侧北面的江汉，装甲车边开边打，一直驶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身后。

“火箭筒，快打火箭筒！”马科长喊了起来。

因为，当时侦察连没有装备火箭筒，火箭筒手是从步兵分队调来的，看

着装甲车上来了，举起火箭筒就打，一连打了两发也没有击中，主要是提前量掌握不准，装甲车开得又很快，不是打到了前面，就是落到了后面……

马科长趴到火箭筒手身边，这时苏军的装甲车又冲过来了，火箭筒手跟着装甲车瞄来瞄去，一扣扳机，火箭弹飞了出去，火箭筒后面喷出的火，把马科长的棉裤烧了个大窟窿……

尽管几发火箭弹都没有击中苏军装甲车，但是装甲车里的苏军，看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火箭筒手冲了上来，而且越来越近，便胆战心惊起来，掉头朝回跑去。

一看苏军装甲车吓跑了，中国边防部队抓住战机马上反击。

陈绍光很快带着尖刀班冲到了敌人的后面，他们趴在一道土坎下，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一股被打散了的苏联士兵退了下来，一个个低着头只顾一个劲地往回跑，冷不防撞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枪口上了。陈绍光一声令下，一排子弹飞了过去，苏联士兵倒了好几个，活着的趴在地上再也不敢动了。这时从陈绍光的身后传来一阵机枪的吼叫声，一排子弹从他的头顶飞了过去，他回头一看，在几百米远的树林后面，有几只苏军闪光的钢盔在动，一团团火舌就是从那儿喷出来的，看来敌人是想把我们包在中间，他一挥手，带着几个战士向敌人冲去，敌人的子弹嗖嗖地飞了过来……如疾雨一般。

“副连长，你身上冒烟了！”战士小李叫了起来。陈绍光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打了两个洞，烧得黑乎乎的，他用雪一搓，朝头上一戴，又向前冲去。离敌人只有一百多米远了，敌人的两挺机枪交叉火力，封锁了前进的道路，陈绍光冲到一棵大树后面，刚要射击，忽然身子一歪跌倒了，他低头一看，胸部和左臂都负了伤，鲜血直流，战士小李冲了上来要给他包扎，他推开小李，一只手端起冲锋枪向敌人的机枪打出了一梭子子弹，敌人的机枪不响了。

小李兴奋地叫了起来：“副连长，敌人的机枪哑了吧！”他没有听到副连长的回答，回头一看，副连长躺在雪地上，他的腰部又受了重伤，他吃力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不要管我，消灭敌人要紧，小李把陈绍光扶到一棵小树下面，让他半躺在树干旁，为他包扎起来，战士们都围了过来，陈绍光吃力地解开身上的子弹袋，对他身边的战士小李说：“拿去，打……打敌人……”在他说话的时候，血顺着伤口渗了出来，染红了他身下的雪地。

当入侵的苏联边防部队突然开枪的时候，于庆阳身边的几名战友，在枪声中倒下了。于庆阳被激怒了，他端起冲锋枪朝敌人冲了过去，苏联入侵者乱作一团，几名士兵跟在一名军官的后面回逃窜，于庆阳紧追两步，跳出一道土坎的后面，猛扣扳机，打出一串点射，5个敌人在枪声中倒下了。于庆阳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又向前面爬了几步，他看到小树林的后面，有一挺机枪正在向这边射击，子弹打得树枝哗哗作响，战士们被机枪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过了一会，敌人的机枪停了，于庆阳抬头一看，敌人的机枪手正在更换弹夹，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纵身跃起，哒哒……一梭子子弹打了出去，敌人的机枪手身子一歪，栽倒在雪地上，那一挺机枪在那儿不响了。于庆阳两眼紧盯着那挺机枪，应该把它缴获过来，它是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的罪证，于庆阳朝机枪冲了过去。就在这时，从他的侧面飞来一串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一头扑倒在雪地上。

“于庆阳，于庆阳……”卫生员边喊边跑了过来，他把于庆阳拉到一边，查看他的伤口，发现子弹从右边太阳穴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脑浆和血水不断地向外淌，于庆阳已经昏迷过去。

卫生员立刻把他抱在怀里，拿出绷带为他包扎起来，于庆阳的嘴唇颤动了一下，卫生员知道他是想说什么，急忙将耳朵贴到他的嘴边，他听到于庆阳微弱而刚强的声音：“我……还……要……”

卫生员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脉搏，几乎已经没有跳动的感觉了，他伸手拿过于庆阳的冲锋枪，只见上面沾满了英雄的鲜血。

哒哒……哒哒……前面不远的小树林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于庆阳被这枪声震醒了，他用力睁开了眼睛，推开卫生员的手，一把抓起冲锋枪，“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如一尊巍然屹立的铁塔，周围的战士都惊呆了，只见他用右手，“刷”一下撕掉了头上的绷带，端起冲锋枪向敌人冲去：一步、二步、三步……他向前一连冲了六步，手中的冲锋枪吼叫着，子弹朝敌人飞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倒下去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排长于洪东看到于庆阳牺牲了，高喊了一声：“为于庆阳同志报仇，冲啊！”全排同志跟着他冲了上去，他发现丛林中有两个敌人仓惶奔逃，便叫班长孙宝山去堵住敌人的退路，自己带三个战士追了过去，突然，丛林中射来一排子弹，于洪东发现有个敌人趴在雪地里，向这边射击，他一枪就报销了那个敌人，战士小周在一边着急地说：“排长，你看那两个敌人要溜掉了。”

于洪东不慌不忙：“我就不信，这两家伙比豹子跑得还快。”说着举枪，叭叭两枪，远处那两个敌人应声倒下。

马科长来到陈绍光身边看了一下他的伤势，对曹副参谋长说：

“老曹，我看打得差不多了，王副连长牺牲了，陈绍光的伤也不轻，咱们向上冲一下，就往下撤吧？”

“好，就这么办。”曹副参谋长同意了马科长的意见。

中国边防部队发起了冲击，苏联边防部队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猛烈冲锋，开始向后撤退，一直退回到主航道的江面上，尔后登上装甲车开始向苏联境内后撤。

马宪则命令金泰龙：“发信号，往下撤，动作要快！”

金泰龙发出了撤出战斗的信号，战士们纷纷跑了过来，班长石荣庭缴获了一架照相机，孙宝山和战士周锡金各自缴获了苏军5支冲锋枪。

排长武永高和班长周登国，带领的第二小组也撤了下来，除周登国腰部受伤外，再没有多大的损失，大家一下子把他们围了起来，争着询问第二小组的情况。

当时，苏联边防军伊万上尉，堵住了他们巡逻的去路，排长武永高迎上前去，大声抗议道：“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已经越境了，必须立刻退回去！”

伊万上尉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盯着武永高看了半天，二话没说，抬手就打了武排长一拳，尔后摆出一副要掏枪的架势，武排长这时候注意到，苏联边防军都没有拿棒子，而是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他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把入侵升级？今天的情况不比往常。

为了防止冲突扩大，中国边防部队采取了克制态度，主动避开伊万一伙。伊万一看中国边防巡逻队走开，便一挥手带着他手下的人追了过来。中国边防部队快走，伊万一伙就紧追，中国边防部队慢走，他们就又推又打。这时已进入中国江面二百多米了。中国边防部队不再退让，双方在冰面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突然，从珍宝岛的中间传来了一阵枪声，哒哒……哒……这枪声清脆震

耳，接着便是一阵短暂的平静。双方一下子全愣住了，谁也搞不清楚，那边是哪一方先开的枪。这时空中传来了中国边防部队第一巡逻小组的喊声，声音断断续续听不大清楚，但是声调激昂严厉，周登国明白了，这是中国边防部队在抗议苏联边防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

也就是在这时候，伊万上尉歪着头，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几圈，脸上露出一丝狞笑，眼睛在中国边防部队身上扫来扫去，手却偷偷地去掏枪……这一切都被周登国看到了，他立刻端起了冲锋枪。伊万的手枪掏出来了，他正要扣动扳机，只听“哗”地一声，周登国把子弹推上了膛，哒哒哒……他抢在伊万上尉之前开火了。当场把伊万打倒了，其它的苏军士兵愣住了，有往回跑的，有原地卧倒的。这时，中国边防部队一齐开火了，一举歼灭了伊万带领的7人小组。

中国边防部队沿着珍宝岛边上的树林往下撤，不远处不时地传来苏联边防部队发射的枪炮声。前面几个战士，用树枝搭成担架抬着陈绍光，陈绍光一直昏迷不醒，后面的十几个战士背着烈士的遗体。积雪很深，一步一个雪坑，走到急造公路的边上，大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马宪则下达了原地休息的命令。战士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望着牺牲的战友，胜利的喜悦骤然消失了。每个人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有的人一边低着头啃饼干，一边吃着雪。

等了一会，县反修办的担架队还没有上来，马科长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了，再延误一会伤员就没救了，这时，有人喊道：“军医来了，军医来了！”

大家如同见了救星，一下子围了上来，军医来到陈绍光跟前，检查他的伤势。

“还看什么，还不赶快抢救。”周围的人都叫了起来。

军医在喊叫声中也懵了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快打强心针，打强心针……”众人又叫喊道。

军医急急忙忙地找出了强心针，一看已经冻得梆梆硬，如同冰棍一般，军医急出了一头汗，拿着针管团团转，大伙急得直跺脚。

“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人要是死了，你们要负责！”

陈绍光在大家的叫喊声中，微微睁开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意思是告诉大家，我不行了，不要责怪军医。

有人哇地一声哭了，紧接着是一阵哭声……

马科长火了：“哭，哭能把人哭活，都哭！”但是，他自己的泪水也流了下来。于是哭声变成一片抽泣声……

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周围不时有炮弹的爆炸声。这是苏联边防军向中国境内炮击，这预示着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

1969年3月2日，由苏联边防部队挑起的这场边境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边防部队已进入实战状态。

中国军队巧在雪雷

前线指挥所内，作战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军区副司令肖全夫，陆军第46军133师师长刘继昌，陆军第23军77师师长黄浩，133师侦察科长马宪则、133师师炮团团长胥善海、沈阳军区工程兵军务科副科长孙征民，军师两级的一些作战参谋也参加了会议。

肖全夫在总结了3月2日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坦诚地说：“根据情报，对面苏军在最近几天内又得到新的加强，坦克达到70辆，火炮380门，装甲车及自行火炮150辆，地面部队猛增至一万多人，已有迹象表明，苏军为了实现其扩张政策，挽回失败的面子，肯定会对我军江岸阵地发起进攻，同时重霸我国领土珍宝岛，军委首长指示我们：既要准备苏军小打，也要准备他们大打，既要准备他们打边界线，也要准备他们大举入侵，在我国领土上打全面战争，有了充分准备，就能立足于不败之地。毛主席最近指示说：‘美帝是纸老虎，苏修也是纸老虎。’上次作战，我们就捅了它一下嘛，实践证明，苏军也并非不可战胜。当然，战术上，我们要格外重视它，总的看，还是敌强我弱，苏军的装备、火力、单兵技术都超过我们。这一仗怎么打，希望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九大召开在即，我们要用胜利的捷报，向九大献礼。”

肖全夫话音一落，人们便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刘继昌师长说：“我认为，苏军此次作战，当然不排除其全面进攻的可能性，但从当前部队的配置来看，洗刷3月2日作战失败的耻辱的可能性更大些。战斗伊始，敌人一定会对我守岛或巡逻部队进行突然袭击，利用坦克和装甲车的冲击力实行穿插、分割、包围，然后吃掉我边防巡逻部队。因此，我认为：炮兵部队要集中使用，形成拳头，在主要方向上重创敌人。步兵作战部队应该继续加强工事，利用作战地区塔头较多的自然条件，构成较严密的交叉射击火力网，并且注意形成一定的纵深。预备队应该多保留一些，这样做一是作战区域狭窄，部队太密集容易增大伤亡，二是可根据战况发展及时加强薄弱方向

黄浩师长说：“我同意刚才刘师长的意见。再补充几点，一是根据苏军作战历来以坦克导引步兵冲击的作法，应制定出更有效地打击坦克的办法。从上一仗的经验教训中也可以看到，苏军T—62坦克有比较好的战斗技术性能，前钢板护甲近20厘米厚，我们的85、75反坦克炮对它都没有太大的威胁，用重型火炮实施拦阻射击的作法亦难以奏效，可否发掘发扬一下军事民主，集中研究打坦克的问题，如何利用现有装备，将集束手榴弹、反坦克炮、40火箭筒、榴弹炮等远近不同的火力配套成龙，结合地形地貌，形成打敌坦克的有效套路。二是根据以往敌坦克的冲击运动路线，预先设置一些雷区，使敌坦克一侵入我国领土，就陷入处处挨打、寸步难行的境地……”

肖全夫认真听着，不时地点头，在记录本上写着什么。

又有几位参谋人员分析了苏军的常用战术及我军火力配置的方案后，会议便静场了。

肖全夫指着马宪则点将道：“马科长，你们已经在江边上泡了两冬了，为防止部队冻伤，控制大量战斗减员，你介绍介绍经验吧！”

肖司令几句话，使大家的情绪又活跃起来，几个师的领导正为战士冻伤太多犯愁，一听这话，赶紧把合上的本子又都翻开。

马宪则不好意思地说：“我和师侦察分队的同志在这儿呆了两个冬天不假，战士也基本没有冻伤，但说经验确实没啥，我们编了段顺口溜，供大家参考吧！”

有人着急他说：“老马，别卖关子了，有话快说吧！”

马宪则应道：“好，顺口溜编的不好，大家别笑啊！是这么编的，叫‘耳戴套，脸戴帽，裤带扎棉袄，手往怀里抄，夜里值勤别偷懒，困了喝酒别睡觉。’”

有人说：“老马呀！你这是啥经验？乱七八糟的。”

马宪则说：“别急，先听我唠叨两句，这耳戴套，是说耳朵最容易冻伤，这疙瘩经常零下三十多度，野外执勤，没耳套不成。第一年冬天，我们一个战士没戴耳套，结果耳朵冻得透了亮，都脆了，不小心摔了一跤，耳朵就摔下来了，这可不是吓唬你们。”

大伙一听这活，都愣怔了，耳朵真有冻掉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了耳朵，再剃个光头，成了干瓢葫芦，该有多难看。

马宪则接着往下说：“这脸戴帽，是指夜间执勤的同志如果有条件，最好脸上再横戴一顶栽绒帽，护住鼻子和脸。防止鼻子和脸部冻伤。上次战斗我们在珍宝岛上夜间潜伏了九个多小时，没那么多帽子戴，我们便提前每个人用栽绒做了个护脸。要不然啊，下了战场怕不掉鼻子也成花脸了。”

与会的人暗暗咋舌，北疆的冷确实出乎人们的想象。

“这后两句是说，如果腰带够长，最好把棉袄掖到棉裤里扎起来，这样走起路来不进风，趴下去不进雪。战士的手是最重要的，要抠扳机射击，拉弦扔手榴弹，一旦手冻僵了，仗可就没法打了，所以执勤时手要常往怀里揣。晚上值勤站岗是最要命的，千万不能偷懒、蹲着不动，要不停地来回遛达。不妨一个战士弄个小瓶，装点酒，冻得不行的时候，喝一点暖暖身子。”

有人问：“喝醉了咋办？”

大伙“哄”地笑起来。

马宪则认真地说：“所以要严格控制定量嘛！”

马宪则一说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嚷起来，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有两位竟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起来。

肖全夫拍拍桌子，站起来说：“别吵啦，马科长只是介绍了他们的一些作法，各部队可以回去研究一下，究竟怎么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可是有一条，哪个部队再有战士冻伤，我拿在座的各位是问。”

大家一听这话，顿时噤了声。

肖全夫接着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会上，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前线指挥部会根据这些意见，使战斗方案更完善，待最后决定后，经中央军委批准，立即下达。另外，由孙征民科长，老马，加工兵连的干部，组成一个布雷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一个方案，尽快实施。”

江边上，孙征民、马宪则和工兵连范连长愁眉不展地围坐在一起。正为在江面上布雷的事伤脑筋。在别的地方布雷好办，无非土冻得硬点，多下点死力就是了。可在这平展展的江面上，无遮无掩，即使是等到夜间摸黑作业，稍有响动，肯定会被对面苏军的哨所发现。雷区一旦暴露，也就失去了作用。如果不在冰面上刨坑，直接布雷，这反坦克雷一个有小箩大，埋到雪里，短时间内能挡挡眼，待江面上的积雪被寒风一吹，岂不全得露馅吗？

正在这苦思冥想的当儿，通讯员王玉民拎着饭兜送饭来了，午饭是包子，

小王是紧跑来的，包子还冒着热气。

马宪则招呼说：“来，先垫垫肚子。”

三个人一人抓着一个，慢慢地啃嚼着，鼓囊囊的饭兜总不见瘪下去。

马宪则突然不动了，盯着饭兜怔怔地出神。

孙征民捅了他一把：“怎么了，你？”

马宪则突然兴奋地说：“哎，我有个想法，你们看成不。咱们把反坦克雷，一个套上一个这样的白布兜，埋在雪里，即使江面上风大，把雪吹跑了，敌人远远看见这玩意儿，只会当成是雪疙瘩，绝不会怀疑是反坦克雷。”

孙征民狠狠锤了马宪则一拳，兴奋地说：“成，我看成，这法子太巧了，想不到你老马还真有一手。”

三个人把包子塞到嘴里，大口狂嚼起来，一袋包子顷刻便风卷残云般被扫荡得干干净净。

3月14日晚9时，按照预定计划，三个雷场同时开始布雷，江岸通道上的两个雷场在孙征民率领下工兵连负责埋设。397团侦察排由排长于洪东率领，在岛西江叉上埋设反坦克地雷。江叉上的雷场既是与敌坦克作战的第一道防线，又可以卡住主要通道，使岛上的驻军免遭苏军的分割和包围。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侦察排战士将需在江面上埋设的二十多颗反坦克雷，分别装进预先缝制好的白毛巾兜里，扳开压簧，利用岛上树丛、塔头的掩护，将伪装雷按照江叉上的自然地貌，拉开间隔，不留痕迹地在冰面上埋设起来。他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片雷区，开战时发挥了极大威力，在全世界面前，戳穿了苏修指责中国侵略、挑衅的谎言。一辆被炸毁的苏T—62坦克，成了苏修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妄图吞并我国领土珍宝岛的钢铁罪证。

雷场设置完成后，为了加强警戒，防备敌人潜入破坏，亦为掩护我边防分队次日正常巡逻，前指遂命令于洪东率侦察四班留岛执行警戒任务。

一个个矫健的身影掠过江叉，悄悄跃上了珍宝岛。

“不对，应该十人，怎么多了一个。”

于洪东挨个细察，才发现师政策部干事杜永春也跟上来了。

“杜干事，您怎么也来了！”于洪东紧拉着杜干事的手，倍感亲切地说：

“咦？打仗嘛，我怎么不该来。”

“可，这太危险了。您还是回去吧！”于洪东恳求着说。

“是不是嫌我累赘啊！好了，权当你多个兵，快分配任务吧！”

于洪东心里像烧了一团火，热乎乎的，世界上任何友谊，都没有在战争中同赴生死的交情来得深厚、纯洁。他把全班分成三个组，由班长石荣庭一组，杜干事带一组，自己带一组，相隔50米，在岛西侧无名高地潜伏下来。于排长又寻找了一个视野开阔，便于隐蔽的山包，将机枪手杨念全和贾玉明安置好。

今夜正逢朔日，没有月亮，天上只有几颗冻得打抖的星星。四野除了皑皑白雪，便是黑黝黝的丛林，凄厉的寒风一阵阵卷过江面，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野兽的悲嚎。

尽管这一夜同往常的宁静没有什么不同，每个人的心头却都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大战的导火索已经点燃，明天，将是个石破天惊的日子。

苏军猛攻珍宝岛

3月15日凌晨3时，于洪东感觉对岸有异样的响动，马上用抛石子的暗号，发出了提高警惕，注意观察的警报。

片刻之后，借着雪地的微光，看到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从车上跳下三十多个士兵，手端冲锋枪，猫着腰，悄悄向珍宝岛逼近。

怎么回事？莫非是昨晚的埋雷行动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准备来破坏雷场？还是我们在岛上暴露了目标，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呢？刹时间，于洪东觉得浑身燥热，脑门上冒出了汗珠。他马上打开身边的报话机，用预定的暗语向前指报告。

和衣而卧的肖全夫睡梦中被值班参谋叫醒，听到敌情变化时，他顿时紧张地思索起来。

敌人的意图是什么呢？

值班参谋又跑来报告：“敌人距岛只有30米了，于排长请示是否开火，消灭他们？”

3月2日一战，苏军的损失更惨重些，他们肯定急于报复，这批小股敌人，夜半上岛，想干什么呢？如果说发现了我们的潜伏部队，他们完全可以用岸上火力解决，没必要半夜来偷袭呀，如是为了破坏雷场，他们选择的时机，行进的路线，似乎都不能解释。这是外交斗争，稍有差池，将会铸成巨大的国际影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告诉他们，注意监视，敌人不放第一枪，我们决不开火。”

不一会儿，值班参谋又来报告，苏军小分队在岛岸中部登陆后，在东北部丛林中隐藏起来。

肖全夫抚着额头，猛然醒悟过来了，这是敌人悄悄楔进来的一颗钉子，他们企图在天亮我巡逻队上岛时，两面夹击，一口把我巡逻队吃掉。

“天算不如人算。”我军先走的这步棋，居然和苏军的顶了板。

“通知于洪东，让他们在岛上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值班参谋在保密手册上迅速地记录着。

“另，通知边防站，天亮后，巡逻按原定时间推后一小时，巡逻路线由原来的由北往南，改为由南往北，如发现情况，迅速登岛与我潜伏部队汇合。”

值班参谋走后，肖全夫觉得倦意全无。一场大战已是计时可数了。他抬腕看了下手表，3点53分，离开亮还有四个小时，他觉得肚子有些饿，便翻出几块饼干，倒了一杯开水，一边慢慢吞咽，一边细细思考着作战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战斗一打响，首轮炮火要把岛上潜伏的苏军干掉。

两个师炮群要严密封锁江岸，使苏军的坦克群无法冲过江面。

岛上的力量还要加强，应该立即把23军的火箭筒排调上去，用猛烈火力打击苏军的装甲运兵车。

还应该……

肖全夫坐不住了，起身披上大衣，叫上警卫员，对值班参谋说：“我去77师指挥所。”说完，对警卫员招了招手，踏着没脚踝的积雪，消失在迷茫的雪夜里。

在小小珍宝岛这个弹丸之地上，隐藏着怒齿相向的两只猛虎，只不过一

只瞪圆了眼睛，另一只还懵然不觉罢了。

东天透出了微微的曙光，银龙般的乌苏里江已经现出了它那硕长粗大的身影。中国士兵在岛上已经潜伏了7个小时了。此刻，于洪东觉得双脚已经麻木了，完全失去了知觉。整个身躯好似变成一块僵死的冻土，只有神智还在欢快地跳跃。身边的机枪手杨念全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好似嗓子眼里卡住一索冰块。

“千万不能暴露目标。”于洪东用预定的暗语通过报话机向各小组发出了警告。

相隔仅百十米的苏军小分队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对面的眼皮底下，居然也潜伏着一只与他们人数相仿的中国部队，而且已经潜伏了近8个小时，比他们的潜伏时间多了近一倍。他们的潜伏时间，是根据苏联科学家进行的人体耐寒试验提供的各种数据而确定的。可现在，他们已经耐受不住了，有的在雪地上翻来滚去，有的蹭了起来，拼命跺着脚板。痛苦的呻吟声，严厉的呵责声，压抑的抽泣声，混成一团。即使这样，仍有3名苏联士兵被冻死在这片榆树林里。战后，此事引起了苏军高级将领的高度重视。为了解决防冻问题，国防部曾召开过专门会议，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扎哈罗夫元帅，曾带领各大军区的元帅、大将们，在莫斯科近郊的野外露宿一天，以寻找防冻伤的对策。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军队靠着单薄的棉衣，在同一个岛屿上潜伏，时间超过苏军的一倍，且无一伤亡时，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是人种的不同？

是防护措施的优劣？

是精神的作用？

苏联的科学家为此困惑过，笔者也感到困惑。因为无法进行对比试验，也许三者都有，也许都不是，永远是一个谜。

8时正，我巡逻分队开始巡逻。孙玉国带领巡逻队12人，按照临时改变的路线，从南侧登岛，路过我军的设伏阵地，由南向北巡逻。

走到岛中部，快要进入苏军设伏的火力区了，孙玉国命令巡逻分队停了下来。

狡猾的苏军想等巡逻队全部进入火力区后再开火。没想到中国军队不走了，尽管他们离“死区”只有一步之遥。

孙玉国早知道对面林子里埋伏着敌人，自己已在枪口的瞄准之下。但他似乎也摸透了敌人的心态，故意与敌人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待看到江岸上的敌人开始行动了，这才神色自若地命令巡逻分队回头折向西南。

煮熟的鸭子要飞了，苏军潜伏部队在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部队即将离去时，无奈打响了第一枪。

这又是罪恶的一枪，是苏修侵略者悍然发动武装挑衅的铁证。

孙玉国带领着巡逻队迅速在预定位置隐蔽起来。

列昂诺夫上校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到这一切，顿时怒火冲顶。

“命令，第一梯队按照第二方案，对岛上敌军发起冲击，务必全歼。”

8点零5分，苏军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二十余人，沿着冰冻的江面，向着孙玉国率领的巡逻队的隐蔽位置冲了过来。

这股冲击部队沿正前方突击时，恰恰把侧翼暴露给于洪东率领的潜伏队。

“准备战斗！”于洪东断然下达了命令。

中国士兵一个个从树枝下，雪堆里露出头来，75反坦克炮，40火箭筒，机枪冲锋枪……红肿僵直的手指扣住了扳机，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敌人。

“50米，40米，35米……”

于洪东默默估算着距离，猛然一声大喝：“打！”

顿时，珍宝岛上枪炮齐鸣，宽阔的江面上浓烟滚滚，各种早压满怒火的轻重武器，一齐拼命地吼叫起来，密如飞蝗的枪弹，带着死亡的呼啸，在苏军的头顶，脚下爆炸开来。

苏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江面上又无可依托的抵抗阵地，惊慌中只能躲在装甲车后拼命地射击。

苏军潜伏部队一看情形不妙，这才大梦初醒，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居然也埋伏着一支中国军队。此刻，他们只好显出面目，用火力的支援江面上已遭重创的友军。

此刻，中国江岸上的两个炮群开始发言了。密集的炮火，将苏军的潜伏阵地炸成一个浓烟包裹的火球，江面上的装甲车也被火炮击中，炸得人仰马翻。丛林里的苏军实在呆不住了，像群受惊的兔子，逃命似的窜向江面。

双方激战一小时余，苏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败，江面上遗留下苏军十几具士兵的尸体，一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冒着浓烈的黑烟。

于洪东望着遁逃的敌人，被浓烟熏黑的脸上露出了爽快的笑。他掏出怀里的小酒瓶，拔开塞子，美美地灌进一大口。

报话机里，传来肖司令的声音：“于洪东，你们打得好，敌人第二次进攻马上就会开始，要做最坏的准备，有什么困难，马上报告。”

杜永春爬过来说：“子弹、手榴弹不多了，火箭筒也太少。”

于洪东嘶哑的嗓音：“肖司令，我们弹药消耗太快，急需补充，另外，战士们在雪地里趴了十多个小时了，能不能送点热汤喝喝，暖暖肚子。”

肖全夫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从昨晚6点登岛到现在，他们已经在冰雪中风冻了16个小时了。没有饭，没有水，而且，战斗需要他们继续呆下去。呆多久？谁也不知道。

这是些顶天立地的英雄啊！他们以血肉之躯抗击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风雪严寒。以凛然的正气与强敌进行着殊死的搏杀，而他们的要求，仅是一口能暖胃的热汤。

将军的喉头哽咽了。

苏军上校饮弹身亡

第一次进攻受挫，列昂诺夫并没有因此而气急败坏，岛上有中国的潜伏部队，这是他未预料到的，只要弄清了敌情，下面的仗并不难打。

他重新进行了部署，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导引冲击，牵制中国军队的火力，由杨辛中校率一个坦克中队4辆坦克，从岛南端侧后的江叉上穿插过去，切断江岸同岛上的联系，将岛上的中国军队包围全歼。

3月15日9时46分，苏军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了。

苏军的炮火准备异常猛烈，把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炸得体无完肤，爆炸的气浪将如岩石般坚硬的冻土和树根枯枝掀起一丈多高，然后又像降冰雹般“噼哩啪啦”地猛砸下来。

于洪东向全排命令道：“各小组注意，要节省弹药，轻机枪打短点射，冲锋枪打单发，40火箭筒要瞄准装甲车的有效部位，把敌人放近打、看准打。”

敌人逼近了，孙玉国、周登国率领的巡逻组先敌开火，将坦克后尾随的步兵打得全趴倒在江面上。

于洪东指挥着两架40火箭筒和两挺机枪也开了火，子弹打在苏军“乌龟壳”的钢板护甲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后面有一辆装甲车被40火箭筒命中，冒起了黑烟。

由于岛岸太高，苏军坦克无法登岛作战，导引的步兵被我军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进退不得，所以苏军坦克便不再前进，停在江面上，像一座座钢铁堡垒，不断用坦克上的滑膛炮向岛上轰击。

突然，于洪东身旁的贾玉明喊道：“排长，敌人坦克从后面冲过来了。”

于洪东回头一看，果然，4辆苏军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绕过了岛南端，从我国内河的岛西江叉上包抄过来。

于洪东心里一阵暗喜，来得好，反坦克雷场该发挥威力了。随即命令战士周锡金说：“用40火箭筒，敲它两炮，把他们引过来。”

周锡金熟练地装上射弹，瞄准第一辆坦克的侧甲板，击发了扳机。

“轰！”地一声，火箭弹准确地命中了坦克的腰部，虽没有钻透，却震得坦克一颤。

坦克里面的5名乘员，由杨辛中校率领着正无所顾忌地往前突击，被这一炮也是震得七荤八素。他们狂怒地喊：“包围他们，一个也不准跑掉。”

坦克终于冲进雷场了，于洪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些反坦克雷究竟有多大威力，事先没有演练过，他心里根本没有底，实践证明，我们的反坦克武器，没有一样能致苏军这种新型坦克于死命。如果反坦克雷再不管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岛东面，苏军乘着岛上火力一时减弱，又冲上来了，我军伤亡非常惨重。

4班长石荣庭带着一个战斗小组，灵活地滚动变换着阵地，用军帽吸引敌人的火力，发现目标后再准确射击，战果甚丰，打得苏军躲在坦克身后，不敢轻易地暴露目标。

杜永春带领的小组也打得异常英勇，40火箭筒手负伤了，杜永春毅然接过武器，连发两弹将20米外的一辆装甲运兵车击毁。

于洪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江面上一个个大白馒头似的反坦克雷。

钢铁的履带轰隆隆地滚进着，进雷区了，碾上了，正在这时，江面上爆

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坦克履带被炸断了。刚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 30 多吨重的铁家伙，顿时死在那儿，一动不动了。

“快，火箭筒，给我打后面那辆装甲车，一定要击中。”

周锡中装弹瞄准，扳机一扣，“轰隆”一声，最后一辆装甲车失去了平衡，歪倒在江面上。

“好啊！”于洪东兴奋地喊，“这几辆乌龟壳给咱堵住了。大小家伙一齐上啊！”

好像到实弹射击场，岛上岸上的大小火炮、手榴弹，一齐向这 3 辆坦克冰雹般倾泻下来。敌坦克上的车灯、天线、履带护板被炸得四处横飞。

3 辆苏军坦克前后受阻，急得在江面上打转，最后终于将后面的装甲车碾碎，带着累累伤痕，从原路逃了回去。

被打瘫的第一辆坦克见同伙弃它自逃，慌了手脚，坦克里一名上尉站了出来，仓惶跳车，企图沿江岸逃跑，于洪东举手一枪，将上尉的脑袋打开了花，头上的毡绒帽子飞出一丈开外。

于洪东瞅准坦克射击的死角，疾步飞奔过去，跳上坦克车，拉开顶盖，将一颗手榴弹塞了进去。

“轰隆”一声，这辆已经瘫痪的坦克彻底哑了，成了一块死钢铁疙瘩。于洪东当然不知道坦克里面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有一位便是杨辛中校。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苏军第二次进攻又被打退了，战区的皑皑冰雪已被炮火熏染成黑灰色。连当天正午的太阳也变得迷蒙、惨淡。

下午 15 时 13 分，苏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密雨一样的炮弹，飞蝗般倾泻在中国的土地上。

15 分钟后，苏军坦克、装甲车 24 辆，导引一个连的步兵，在其火力掩护下，向珍宝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战斗进入残酷阶段。

火炮在怒吼；

铁甲在奔突；

机枪在猛喷；

手雷在飞舞。

两军将士在珍宝岛上进行了一场罕见的血肉拼杀。

77 师副营长冷鹏飞率领增援部队，穿过炮火封锁区，冲到岛上来了。岛上的火力得到了加强。

中国 75 反坦克炮手为了平炮射击，直接命敌，将两门反坦克炮推出了掩体，在不到 100 米的距离上对着苏军坦克一阵猛轰，将苏军的炮火压制下去。

杜永春发现了敌人的指挥官，喊道“瞄准西边那个穿黑皮袄的‘戈比蛋’，狠狠地打。”

四五支冲锋枪一阵扫射，苏军上尉再也爬不起来了。

苏军指挥所里，列昂诺夫看到进攻再次受挫，准备孤注一掷，让 70 余辆待命的坦克一齐杀过江去。

突然，一发炮弹准确地落在了指挥所的头顶，指挥所塌了。

列昂诺夫好不容易扒开压在身上的横木草苫，从土坑里爬了出来。

他拖着被砸伤的腿，还没有直起身子，一颗流弹飞了过来，不偏不倚地穿透了他的心脏。

他活动的身躯凝固了，惊悸的神情停滞在脸上，眼睛里的瞳孔在逐渐放大，放大，生命的光亮消失了，代之一片阴暗的死灰。

列昂诺夫上校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上。

他在生命终结的一刹那，仿佛看到了死神扇动的黑色的翅膀，看到了瘫痪在中国领土上的那辆坦克，它将成为苏联入侵中国无法抹掉的钢铁罪证。

遗憾的是，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并不知道苏军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被击毙。事隔一个多月之后，苏联《红星报》上才披露了列昂诺夫和杨辛阵亡的细节。

毛泽东强调“西北可能出问题”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

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例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微认真地多看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

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按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6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干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

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他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林彪的弦外之音，龙书金自然心领神会。

4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不对下传达。

进入6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

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戈壁滩上的 38 具中国官兵的尸体

1969 年 8 月 10 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8 月 11 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 月 12 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对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 月 13 日上午 8 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 37 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政委伫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战斗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

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

他细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地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 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300 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狂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杨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

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 10 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 6 辆，步兵 300 余人……”

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飞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他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 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庞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 4 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

等到中国陆军第 8 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 60 公里外的巴克图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 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大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官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主意。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否也暴露了军队内部分工不明，遇事推诿，相互扯皮，缺乏决断的弊端呢？

毛泽东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

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势，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桨才能将 8 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

中苏边境，苏军 55 个步兵师、12 个战役火箭师、10 个坦克师、4 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 100 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 500 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 10000 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

8 亿人民 8 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

哼！没有 400 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 320 万。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爆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他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 5000 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珀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

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7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索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朱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埠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很多启示。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

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

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他说。

“主席，四老师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毛泽东今天是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付，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师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神量警报后的5分钟。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4分钟、3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他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公元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8次、第9次核试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

奇怪的是，同前7次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相左，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播发，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

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日，毛泽东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

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毛泽东，真乃神人也。

第十三章 “北部湾事件”震惊世界，中国军队再举义师。七条公路横贯越土，北越上空火网密布。

第一节 援越抗法

陈赓受权指挥越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正处在严重困难的时刻。法国侵略军一方面加紧进攻越北解放区，另一方面勾结从中国败逃到越南的国民党军队，图谋把越南民主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政府于1950年1月18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月30日以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首先承认越南是对法国侵略者及其越南国内反动派极大的打击，开创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的纪元。为了纪念中越建交，越南政府决定：1月18日为越南外交胜利纪念日。

胡志明第一次秘密访问新中国是在1950年1月底。他代表越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当时，新中国成立才4个月，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中国党和政府仍然作出果断的决定。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从二野、三野和四野各选一个师（包括师、团、营三级）的全套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四野选调整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4月23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增调营以上13名干部，参加顾问组。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军队的军事、政治、后勤顾问或助理顾问。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和利少奇、朱德等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顾问团师以上顾问及部分团级顾问。给他们提了要求，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越南组织、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军队和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主要是协助组织指挥运动战，较大规模的正规战。当顾问是当参谋，给越南的领导当好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79名干部、250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

援越抗法的战役打得非常漂亮。首先是1950年底的边界战役。1950年4月起，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训练，中国军事顾问团即将入越，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以后的战役。越共中央6月决定发起边界战役的同时，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并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

中国派出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是陈赓。

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初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经了解情况，拟定出了作战方剑、这个方针得到了武元甲和越军前线指挥部的一致同意。随后，陈赓的部分随员同顾问团的师、团、营三级军

事、政治顾问，分别下到参战部队，协助战前准备和指挥作战。

战役发起前夕，胡志明前来看望陈赓和顾问团领导。胡志明对陈赓说：部队都交给你指挥了，但有一条，只许打胜，不许打败。

陈赓说：打胜仗主要靠越南军民，但我一定尽力协助指挥打好这一仗，不辜负胡主席期望。

经过7昼夜连续激战，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解放了高平，并乘胜攻占了七溪，那岑、同登、谅山、亭立、安州等地的法国侵略军纷纷撤退，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也被迫撤离。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法国在中越边境3500人的精锐部队，遭受在新中国受训和武装的越盟军队的强大进攻，法军大部分被消灭，在中国接壤的边境约250英里地区，法军已完全没有防卫力量。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边界战役结束，陈赓回国。后来的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展开的。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一举围歼1.6万余名法、伪军，宣告了法国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

漂亮的游击战

1954 年日内瓦协议签订，越南北方全部解放，美丽的河山回到了越南人民的怀抱，但北纬 17 度线以南的越南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没有统一。越南劳动党就越南国家统一斗争的路线问题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交换意见。苏联提出建议：“越南南北和平共处，进行经济竞赛，北方经济比南方优越，南方将被统一到北方。”中国共产党则介绍过去在敌占区的工作经验：“长期埋伏，联系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越南劳动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1956 年，胡志明提出举行民主大选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这一符合越南各阶层人民利益的主张遭到南越伪政权吴庭艳当局的拒绝。1959 年吴庭艳公布 59—10 号法令，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抗吴庭艳的人民格杀勿论。

越南劳动党根据形势，提出了在南方进行武装斗争自卫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国政府于 1962 年专门援助越南南方人民 9 万支（挺）步、机枪，用以发展游击战争。以后南方的游击战、运动战不断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日益扩大，中国的军事援助也日益增多。

越南政府也曾向苏联提出军事武器援助事宜，赫鲁晓夫给了 3000 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缴获的德国枪支。胡志明感到很不对味，愤愤他说：“把它拉到博物馆去！”

法国人被越南人民在奠边府打得一败涂地，被迫从北部撤军，在南方也岌岌可危。美国人看准了东南亚濒临太平洋，具有漫长海岸线和军事良港的越南这块肥肉，紧随法国人的屁股，插足越南。吴庭艳上台，人民群起反抗，游击战争扰乱了吴庭艳的梦想。吴庭艳无法对付日益发展的人民武装，肯尼迪政府乘机将第一批 1.6 万名“美国顾问”派到南越。可是美国军队一到南越，就被越南南方人民的“游击战争的奇怪现象迷惑住了”。

当时在南方工作的黎笋、阮志清、阮文灵等越南劳动党南方局领导人，积极抗击美帝侵略，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土地改革，他们的正确主张和军事上的谋略，为南方人民赢得解放起到了重大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黎笋之所以后来到中央接替长征任书记，主要是在南方工作中的功绩被劳动党中央和人民所重视。

到 1964 年秋季，美侵越军队增到 2.3 万人，所谓的“军事顾问”已安排到吴庭艳军队的营一级。但无论是美军，还是南越伪军都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游击战无可奈何。

越南南方人民的游击队很快发展为整连、整营、整团的正规部队，从游击战逐步发展为运动战，狠狠地打击美伪军，使美驻越大使、侵越美军头目及其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坐卧不安。

美军密谋新的进攻计划

1964年6月下旬，檀香山。

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驻地的会议室俯视当年日本人曾袭击过的珍珠港，一切都显得非常清晰，美丽的港湾躺在太平洋上，安祥恬静。会议室里的气氛与风和日丽的珍珠港迥然不同，相当的阴郁、沉重，这里的人们正为南越的处境忐忑不安。他们想从困境中开辟蹊径，扭转每况愈下的局势。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务卿腊斯克、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美驻西贡大使洛奇、美太平洋总部司令费尔特海军上将和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

还有一位参与者，默默地坐在一角。

他叫泰勒。

泰勒在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曾任第8集团军司令，后担任美陆军参谋长。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从陆军退休。肯尼迪上台，这位退休者又被召回，充当了白宫军事顾问。他有他的军事见解，他向肯尼迪强调，美国陆军必须准备打小规模战争，反击共产党的“民族解放战争”战略，这给肯尼迪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约翰逊上台后，对他颇为赏识，任命泰勒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位一直在军中谋职并占有高位、曾制定和实施美军多次军事行动的泰勒，退休后被召到檀香山专门参加这个研究越南局势的会议，约翰逊不是没有其用意的。

7月初，泰勒被任命为美驻西贡大使。

威斯特摩兰自上月任司令后雄心勃勃，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另一方面他又忧虑重重，前任大使洛奇对他的一些军事主张并不那么热心，致使他对共产党的镇压和进攻的步骤不得不放慢。泰勒上任，他抱有极大的兴致。他了解泰勒，泰勒对他也早有好感。早在1944年，泰勒当空降师师长时，就曾通过他的副师长要威斯特摩兰到他的手下任职。威斯特摩兰早就想当一名伞兵，但未能如愿。可是他俩的交往却一直保持着。泰勒到达西贡，威斯特摩兰出面接驾，并很快驱车登门拜见。泰勒的上任，使他增强了镇压和屠杀越南劳动党扑灭革命火焰的信心和力量，他称：“由泰勒将军出任驻西贡大使，这是非常合适的。他给这个职务带来了丰富的军事经验，还带来了卓越的才华和巨大的机智。”

泰勒走马上任，就咄咄逼人他说：“我要对美国政府在南越的一切行动担负并行使职责……我希望人们清楚地了解，这种全面的职责包括在南越采取的全部军事行动，并视需要可行使军事方面的指挥和控制权……”

第二节 先遣部队急驰友谊关

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

位于中国雷州半岛、海南岛与越南之间的北部湾宽阔海域。片片渔帆点缀其间。

越南人民军海军正巡逻在海防线上。

突然，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闯入越南领海。越南海军向美军舰发出警告。

美舰置之不理，仍如入无人之境，昂着舰头，继续向越南海面行驶。

越南巡逻舰被迫采取行动。顿时，北部湾炮声轰鸣，水柱冲天。美舰见势不妙，仓皇逃窜。

这是1964年8月2日。

美国人开始做文章。声称美海军遭到越南海军的袭击。于是调兵遣将，从台湾海峡和香港调了大批舰艇，云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海附近。

8月4日夜，北部湾雾海漫漫，能见度很低，美国军舰又一次进入越南北方领海，炮口对准越方。

机会终于来了！美国人很高兴。两军交上了火。西半球，美

国政府立即声称：美国海军遭到越南海军袭击，两艘舰艇被打沉。约翰逊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表一系列讲话，发表声明，并

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借此，他从美国国会获得了在东南亚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权。

当晚，约翰逊就在电视上发表演说，他已命令美军轰炸越南北方，对那些对美军的敌对行动，“不但要以戒备、防御来对付，而且必须给予积极的回答，在我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正在作这种回答。现在正在对北越的这些敌对行动中使用的炮艇和某些辅助设备采取空中行动。”

8月5日，美国出动大批飞机疯狂轰炸、扫射越南北方。越南军民奋起还击，防空部队当即击落美机8架，击伤3架，俘虏一名美国飞行员。

是夜，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今天下午先后出动64架次飞机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鸿基、禄昭、福利、广溪等四个“鱼雷艇基地”和“油库”。

麦克纳马拉眼看增兵攻击越南的时机已到，即在招待会上宣布美国采取一系列加强太平洋地区兵力的步骤：

- 一、把第一舰队的攻击航空母舰特混群调到西太平洋；
- 二、把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调到南越；
- 三、把战斗轰炸机调到泰国；
- 四、从美国调遣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的中队到太平洋前进基地；
- 五、把反潜艇的特种部队调到南中国海；
- 六、使经过挑选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出动。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1964年8月6日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

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8月8日，北京近百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8月10日，北京举行10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总理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出席了集会。

1965年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标语牌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面，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吟吟地与大家握手。北京市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亲切交谈，同声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强盗行为，表达中越两国人民永远并肩战斗的坚强意志。毛泽东朝东望望，朝西瞧瞧，先后与黄北、阮

明芳及其他领导相见握手，显得那样的自信，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的笑容饱含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过去他挥手打败了由美国人支持和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人交锋，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你美国人再来，无非是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毛泽东笑得自如、自信。

胡志明秘密访华

列车咣当咣当地向北行驶。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

胡志明记得，1950年1月秘密访华，后于2月初与周恩来一同访苏。当时毛泽东也在苏联访问。胡志明向斯大林讲述了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斗争，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特别是武器弹药。苏联未予理睬。

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6千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6年，中国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还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5万支。1960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另外，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人民军组建六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信、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

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中国讲情谊，有求必应。

列车途经柳州，胡志明又想起1954年7月3日至5日在柳州渡过的日日夜夜，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期间。那时的柳州没有这么繁华，市民的衣装没有这么华丽，但人们仍是那样的真诚和善。那次他与周恩来在这里对日内瓦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率诚挚地交换了意见。越南那时处在十字路口：可能和，可能战；争取和，准备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事后，胡志明访问北京，又去苏联，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中国、苏联为一方，法国、英国、美国为一方。胡志明一直视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他十分珍惜阵营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提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时，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胡志明1969年去世，他最后看到的仍是中苏争吵，听到的是乌苏里江上的枪炮声。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胡志明，与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互相商洽，力争主动。会议于7月20日结束，以北纬17度线划分了越南南北方，两年后举行大选。胡志明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很满意，赫鲁晓夫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即向越南劳动党和政府致电祝贺。但会议期间不和周恩来握手的杜勒斯不满意。

1965年春天，长沙风和日丽。

毛泽东洗漱完毕，走出房间，舒展一下身体。他晚间工作到凌晨的习惯在战争年代养成，到了和平建设国家的岁月里，仍未改变。夜深人静，思维纵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他在这静静的深夜里思索决断的。

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要秘密来访，毛泽东将在这里会见他。

胡志明要谈些什么？胡志明会提出啥要求？毛泽东思忖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邻国，友好邻邦。胡志明是位真诚、坦率的朋友。早在中国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多年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革命、一道参加抗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与胡志明的私人感情很深。

上午 10 点半，两国主席握手拥抱，亲切会见。

毛泽东早已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但胡志明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情况，就从上衣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

胡志明从口袋里掏出的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 12 条公路的示意图……

周恩来、罗瑞卿调兵遣将

5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周恩来总理从车上下来，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这是米兰的郁馨。

平素，他喜爱花卉。在中南海办公间隙、国事访问中，他时常鉴赏评说。今天，他顾不上。他迈开矫健的步子向会见厅走去，浅灰色中长毛料裤的裤腿呼呼生风。

他走到会见厅时，一位大个子早在门口等候，这位大个子，就是毛泽东曾经多次夸奖过的“天塌下来不要紧，有大个子顶着”的罗瑞卿。

站在罗瑞卿身后迎候总理的是杨成武。

罗瑞卿迎上前去。

周恩来握住罗瑞卿的手。

这是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在这里接见将与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走进会见厅，全体人员都站了起来。

他用浑厚的淮安普通话招呼大家坐下。

中越两国交通代表团会谈是由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那张条子引起的。毛泽东爽朗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修建河内以北的公路。毛泽东让周恩来尽快落实这件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立即与罗瑞卿、杨成武商定，继续由军队承担这项工程。

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会同李天佑副总长等已经拿出了初步方案。他将代表团的准备工作情况简单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他和罗总长、李天佑副总长经过研究，拟派大批部队出国，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请中央、国务院决断。汇报后，杨成武请周恩来总理指示。

周恩来向大家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要交待的实质性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范文同总理曾经谈过，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寮走廊，扩修支援南方的公路。他们的部队要南下修路。所以要求我们帮助修北方的路。”

大家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作了记录。周恩来呷了一口清茶，继续说：“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一个公路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他稍微停顿，若有所思他说：“这些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不同，好修和不好修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能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以唇再逐步加固，总之，是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要用支前精神来办事。由总参谋部挂帅，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由罗总长和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抓总。”

“修路的施工力量，油工兵部队为主……支前公路、作战公路都要考虑到敌人轰炸破坏，要随服随修。……关于反击敌人轰炸的经验，我们交通部、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可以把我们抗美援朝的经验介绍一些给他们，还要不断总结新的经验，美国的轰炸技术会有进步，我们不能满足过去的经验。还要派一些专家去，帮助越南研究抢修技术。这是个大战斗，要抢时间作出点样子。

就由罗总长挂帅，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调用。”

他坐在沙发上，一手弯曲地置在灰色中山装前，一手指划着：“还有水路，对越方要求，应予以满足。敌人总不能都封锁住，不管是陆路、水路，损失都会有，但只要想办法，总是可以送东西过去的。总之，要改变认识，就是支前，一旦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一定会学到许多新东西，拿我们的勇敢和智慧学会反击敌人轰炸的新本事。”

坐在一旁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抢修抢建公路的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在具体现场勘察团还没去，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是 12 条路展开作业，派兵 10 万；另一种是先抢修抢建主要的 5~7 条公路，派兵 8 万，视以后进展情况酌定增减兵力。”

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围在地图前研究起来。最后决定：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后再定，我们倾向于后一方案，抓住重要的线路先突击抢修。

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这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的 80000 大军。

三路大军秘密入越

暮色笼罩大地。

中国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严密伪装的漫长车队和各种火炮。夜，静悄悄的，没有车灯，没有喧哗。路旁树梢上鼓噪的蝉声此起彼伏，打破这静谧庄重的气氛。漫长的车队在等待。偶尔有一、二辆摩托车从汽车、炮车边急驶而过，仿佛是茫茫夜色中滑过的流星，很快就消失了。

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盔形帽、身穿绿色帆布装、脚蹬用轮胎剪就的斜插两条胶带的“抗战鞋”的士兵，他们怀抱新式冲锋枪、高平两用机枪，一条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的小背包垫在屁股底下。

这是一支庞大的越南人民军摩托化队伍？

可所有的军人都没军衔。

车上渐渐骚动起来，有的用刚学会的几句英语说：“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随之是一阵轻轻的笑声。

大伙七嘴八舌地互相帮助纠正发音，他们用中国汉字注音，英文说不连贯，听起来很别扭，但是这批年轻军人那威严的神态，豪壮的语气，又令人肃然起敬。

友谊关城楼下，一位穿越南人民军服装的军人双手握拳，跑步前进，腰间扎着一根武装带，身侧的手枪套随着他的步履一颤一颤有节奏地敲在屁股上。他跑到几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将军前，立定，举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首长，我援越部队二支队第一梯队整装待命。请指示。”

这位军人姓王名辉，41岁，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注视着老将军，他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员兼工程建筑第53师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雄风犹存，组建援越部队二支队时被任命为支队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此时此刻，他精神抖擞，满腔激情。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军委对他的信任。马上要率领中国第一支援越部队出关，在这“报告”之时，心头的热血阵阵地上涌。

几位老将军还了庄重的军礼，向他走了过来。

一位老将军首先握住王辉的手。他看着王辉抖擞的姿容和待命的神情，轻轻的却又是一字一句他说：“王辉同志，我代表军委、三总部来欢送你们！你们去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援越抗美，希望你们为国争光！并预祝你们凯旋！”这位老将军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他说话时也显得很激动，字字句句落地有声。

刘志坚看了一眼身材魁伟的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陈士榘紧紧地握住王辉的手摇了摇说：“我老了，不能随你们一道分享这个光荣，我向你们保证，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只要你们为祖国争光，所需要的物资，我们一定送到。祝你们光荣而去，胜利而归！”

公路上汽车、炮车马达轰鸣，无数车灯撕开夜幕，照向前方。这支部队越过友谊关，跨进越南同登，按指定路线向各集结地开进。

时为公元1965年6月9日晚8时半。

出关时，与王辉同乘一台指挥车的是越南人民军东北军区黎副政委，他代表越南政府和军队先期到达南宁迎接中国援越部队。他俩用中国话亲切的交谈着。黎副政委主动地介绍美国飞机可能空袭的情况，一路上经过的主要

地点及当地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王辉也将我二支队先头部队的人员、装备配备一五一十的向黎副政委汇报，并请东北军区领导指导、帮助我们。他俩促膝交谈，亲如兄弟。

车队进入谅山。越南军民在夜里列队鼓掌欢迎中国援越部队。王辉和黎副政委下车走向人群。越南总参作战局长、越东北军区段政委激动地前来握手拥抱。欢迎的男女老幼向战士们送开水、香蕉和香菠萝。中国军队大部分是北方人，从未见过香菠萝，更不知如何吃法。车后档扳边堆了许许多多。战士们激动地用刚学的越语说：“谢谢！谢谢越南人民！”

姑娘们还是一股劲地往车上抛香菠萝。

年轻的战士此时此刻洒下了感动的泪花。

车队在越南狭窄的公路上行驶。突然，几道闪电劈开夜幕，随之闷雷在车顶上炸响，大地震颤。雨点噼里啪啦地敲在车篷、炮衣上，很快就紧锣密鼓。干部战士怀抱手中武器，一个挨一个地靠在车里，随着越野车的颠簸而摇晃。大家没有睡意。出国头一夜，不知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敌情，警惕性都很高。不准抽烟。严格控制灯光。只有黄黄的车灯在雨幕中扫描，寻视线路。

到了蒙阳，越南东北军区铁司令、毕副政委和广宁省的领导冒雨站在十字路口迎接中国军队。铁司令是王辉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故情笃厚。日后在越工作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互相尊重、信任，更加深了往日的情谊。一路上，王辉受到了数位老同学的欢迎。

夜沉沉，雨淋淋，灯闪闪，车隆隆。

长龙般的摩托化部队全速前进，他们在与美帝国主义妄图进攻北方的部队抢时间。

中国援越的先头部队二支队分三路向越南开进。中路从东兴进入越南芒街，汽车、炮车冒雨行驶，向菇苏岛进发。东路从北海港登舰向吉婆岛开进。大量的火炮、工程机械昂首屹立在甲板上。舰艇全副武装，随时准备迎击美国从空中、海上的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海运登陆艇也像离弦之箭，在茫茫夜色的隐护下，组成战斗序列，向越南北方的锦普、鸿基等港口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胡志明在长沙打太极拳

同一时刻，湖南长沙郊外，一座不被人注目的寓所里，灯光明亮，柔和的光线透过淡蓝色的窗纱，透过明洁的玻璃，撒在室外草地上。一位老人正在夜风中打太极拳。他衣着宽松，一抬一推，一招一势，缓慢稳健，如行云流水。他前额宽阔，眉宇和善，神情安祥，一缕长须飘在胸前，颇有长者风度。

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胡志明自 50 年代开始就睡眠不佳，周恩来、贺龙派中国太极高手到河内，给他传授太极拳，从此他坚持锻炼，睡眠好了许多。

可是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又常常忘记坚持打太极拳。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扶植傀儡政权的同时，蓄意制造“北部湾”事件，袭击越南沿海港口，轰炸北方和平的城市乡村，屠杀越南人民，令他痛心疾首，更无心于太极拳了。

他这次秘密来华，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又在董必武副主席的陪同下，于 5 月 21 日上黄山作短期休息疗养，落榻在环境清幽的观瀑楼。

他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中山装，还是着双“抗战鞋”，和董必武并肩行走在青山绿水间，他俩一边观赏一边交谈，山风徐徐，有种清新之感，不像刚才上山时车内那么发闷，山外青山天外天，天地这么开阔辽远，景色这么幽静迷人。

他俩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不来到瀑布前，飞流直下，疑是银河落九天。瀑布落涧，发出隆隆巨响，腾起滚滚白雾。

胡志明立在瀑布前，两眼凝视，开始他觉得颇为新奇，渐渐地，他耳边好像是另一种声响在回荡，仿佛是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城镇乡村，硝烟弥漫……

“董老，咱们走吧！”刚停留几分钟，胡志明神情有所焦虑地对董必武说。

回到住所，董必武特意在胡志明的房间里多坐一会，宽慰一番。

住在这幽清之处，胡志明感到寂寞。第二天，他向董必武提出，搬到老百姓中去。于是，就搬到人民群众较多、居住条件较差的温泉宾馆。

在黄山，他走进茶园，与茶农亲切交谈。走访黄山小学，听小朋友唱《越南小英雄》，一起照像留念。散步到温泉小卖部，在门口见到安徽省黄梅剧团的著名演员严凤英等人，他请大家进绿荫茶庄，品茶交谈，问长问短。他想听听严凤英的演唱。严凤英的《天仙配》誉满全国，她歌喉甜润，情感丰富，极富艺术的感染力。当她唱到“夫妻双双把家还”时，胡志明已热泪盈眶。

胡志明与董必武在黄山停留了 18 天。在这期间，应邀援越的中国部队一、二、三支队，两个高炮师和一个高炮加强团，正向中越边境集结。中共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组建下属四、五、六支队的援越抗美修筑公路指挥部；先遣勘察设计代表团将于 6 月入越。

在黄山的 18 天中，胡志明没心思打太极拳。

就在这一天，就在中国援越先头部队浩荡出关的这一天——1965 年 6 月 9 日，胡志明的太极拳又行云流水般地挥舞起来。

第三节 八万大军高奏凯歌

中国军队黑夜登岛

天漆黑。

几道闪电像几把锋利的剑从天际斜刺过来，“咔嚓——哗啦啦！”一棵大树被拦腰劈断，一团火球跳跃，突然震天动地的一声爆炸，整棵大树熊熊燃烧，树枝树干劈哩啪啦地在火光中像爆豆花般的脆响。

刹时，火光照得海面泛起红光，照得姑苏岛一片亮堂。

瓢泼大雨从天上浇下来。

中国援越部队二支队在深夜里冒着滂沱大雨向姑苏、杜拉、吉婆等岛屿开进。

大批登陆舰、登陆艇在大海中冒雨颠簸。海域茫茫，方向难辨，有的艇长索性拿着手电趴在艇头上导航。舰艇一会抛向浪尖，一会又跌入深谷，海水哗哗地扑向甲板，雨水哗哗地飘落而下。浑身湿透，衣服贴在肉上。海水、雨水、汗水灌入嘴中。这没什么，要扒好、要抓住，别摔入大海。

姑苏岛没登陆码头，登陆艇在几十米、几百米外搁浅，有的登陆舰装有数量较多的重型装备，在千米之外就不能前进。

团长刘志高，政委叶丛华急得头上直冒汗。

“老叶，部队下海，装备卸下海，拉！”

“天亮前必须上岛就位！”

“发信号！”

“发信号！”

顷刻，甲板上的部队下饺子般地跳入齐胸深的被涛中。有的用粗绳系高射炮，有的拴空压机、拌合机，甲板上、海水中的人员相互配合，准备将舰艇上所有的武器装备、工程机械拉上岛。

登岛的主要是工程部队。也是为了适应援越工作，我工程部队特意实行了一种特殊编制。一个团下属3个工兵营，1个机械营，1个高炮营，还有85加农炮连、82迫击炮连、警通连、运输连、加工修理连，各个营除编有4个连外，还配有高射机枪排、重机枪排、无后座力炮排、通信排。每团4000余人。这样的编制序列在我军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应越南沿海岛屿的作战要求，也是为了满足越南政府的请求。

部队要一边施工，一边守岛，对空、对海作战。

部队配备的是当时中国军队最新最好的轻武器：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高、平两用高射机枪，加之几种地炮、高炮。毫不夸张他说，中国军队在越沿海岛屿构成了一个力所能及的立体防御体系。

可眼下装备器材上不了岛，一切等于零。

时间就是生命！

刘志高、叶丛华清楚地记得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建立的功勋，在朝鲜战场上还与美国鬼子交过手，并在朝鲜西海岸构筑了防御工事。可今天情况非同一般，临行时，济南军区首长就交待：根据越方要求，军委命令你们一方面援助越南尽快构筑沿海岛屿防护工程，一方面守备沿海岛屿，以防美军登陆。守岛是相对不运动不转移的战斗，打起来不可能很快派别的部队直接支援，你们要准备打恶仗。

“妈的，没上岛，就打恶仗！”刘志高团长拎着手电，察看着部队在海水中拉火炮、工程机械。

叶丛华政委像落汤鸡一样。蚕豆大的雨点从眼贴的头发上、眼窝上、面颊上像断线的珠子般滚落。他与团长一道看着部队在海水中非常缓慢地推、拉火炮、机械。“老天爷先来了个下马威，”他眨着眼说，“老刘，上不了岛，火炮不就位，天一亮，雨一停，美国飞机就可能临头，美国军舰就可能露面，我们就措手不及啦！”

形势非常严峻。

刘志高脸绷得紧紧的，浓眉拧成一团疙瘩。忽然，他一纵身，跳入滚滚的大海中。

刘志高像位冲锋的战士一样。

离岛几十米、几百米的舰艇上的装备，指战员很快卸到海滩上，千米之外舰艇上的重型装备需用吊车吊上小船再拉上海滩。

一个连二百来号人排成四列，成人字型在海水中拖拉着空压机、拌合机、解放牌汽车。高炮分队一个连一趟也只能推拉一门高炮。

许多人脚掌被蚌蛎划出道道血口，在咸水中浸泡，痛得火辣辣的。

这些都顾不上了！

大批装备物资卸上岸，还要连夜疏散。部队又在大雨中转运，岛上没有汽车马路，仍然靠肩扛手推，山头灌木丛生，怪石嶙峋，部队一边清道，一边又是几十人、上百人的将一门门火炮拉上山头就位，又马不停蹄地构筑临时阵地。

大海喧嚣，浪涛翻滚，雷电交加，风雨呼啸。

上百部机械，几百门火炮，几百辆汽车和几十万吨物资靠人力扛、拉、推上岛。

一切在风浪中进行！

一切在雨夜里搏斗！

海岛上灌木茂密，杂草丛生。蚊子、小虫繁多。有种身上长着白斑纹的大黑蚊虫，白天还追着人叮，一咬就是一个大包，战士们称它“B—52 重型轰炸机”。岛上蚂蟥也不少。但最多的是毒蛇。地上有金环蛇、银环蛇、眼镜王蛇，树上有响尾蛇、竹叶青、叶上飞。中国军人每人手持一根藤子棍，边走边拨打草丛路面——打草惊蛇。一般的毒蛇闻有响动，嗖嗖逃窜，可眼镜王蛇不怕，它时常横在路面，高竖上半身，血红的信子从扁扁的嘴中吐出，伸伸缩缩地向你挑战，还呼呼地喷着毒气。它要与行人对峙，你若走近一步，它的下半身就会游动一段，上半身仍保持着挑战攻击的姿态。你只有横起藤子棍奋不顾身地扫荡，它才可能落荒逃跑，或败倒在你的棍尖下。有位当年的军人说，有天晚上，他到部队去送给养，走着走着，突然脚下有什么东西软乎乎的，蹲下身子在朦胧的月光下一看，好家伙！一条两米来长比手杖还粗的金环蛇。他说，真庆幸！金环蛇嘴中正凸凸地吞食大老鼠，还剩半截身子和长长的尾巴露在外面，要不然，它是决不会饶过我的。

英国人惊呼北越海岛高炮成林

部队刚安下帐篷，就投入紧张的施工，构筑指挥所，炮工事、机枪工事、屯兵坑道。为了作好长期对付敌人的准备，按越南的要求，大都构筑战备工事。施工用的水泥、钢材、木材全由汽车运输团和海运大队从中国口岸运送到各个岛上。来自全军的海运大队、海底电缆团、陆地架线团、汽车运输团和几个工兵团、炮兵分队及后来增加的高炮团配合默契。王辉说：“那时，我们二支队所属八个团级单位两万多将士，多兵种协同作战、施工，心齐得很啊！”

越东北几十个岛屿，大的十几平方公里，小的几百平方米，一人呼喊，音响覆盖全岛。

许多岛上缺少砂、石，有的岛没有淡水，得从陆地或其他岛上转运。生活用水、施工用水都得运送，这对海运大队是莫大的压力，他们为保证部队施工，不分昼夜，风雨无阻。

面对海洋的大都是炮工事。有的岛四周悬崖峭壁，部队就将绳系在干部战士腰际，悬挂在峭壁上，手把钢钎打锤。头上海鸥盘旋，脚下海浪滔滔，硬是在绝壁上打出能隐藏大炮和屯兵的坑道。

团长刘志高、政委叶丛华有时坐镇菇苏岛，有时到群岛上巡视检查，部队的情绪深深地感染着他们。他们也钻入坑道，和战士们一块打风钻、装炸药、搞爆破，常常是走出坑道，胶靴里能哗哗地倒出汗水。

岛屿石质复杂，加之连绵暴雨，坑道坍方严重而频繁。他们常常为施工进度受阻和干部战士的死伤绞尽脑汁。年仅 19 岁的测绘员李永祥就在坍方中牺牲了。大家在海边松林里安葬他。松涛哭泣，海浪呜咽，加修连连夜赶制棺材，营、连扎了两个花圈，团机关、越方联络组和几名岛上越南居民，连同各连派出的代表不足 40 人，在全营 5 名司号员的哀乐声中举行了战地追悼会。

这就是军人的葬礼。

大部队由集结到开进，从登岛到施工作业，连续几个月没休息一天，风餐露宿，阳光暴晒，干部战士个个脸上黑黝黝的，甚至连理发刮胡子的时间都难挤出来，20 岁左右的年轻人看上去像 30 多岁的模样。越南居民传说，毛主席派来都是不怕死的老兵，个个有实战经验，天下来飞贼，海上来“水鬼”，咱都不愁了。

炮兵部队除构筑坚固阵地外，还构筑二三套预备阵地。同时用树干作炮管，构筑了许多假阵地，所有的高炮与假炮都用树枝叶伪装。假作真时真也假。几十个岛屿上处处成为炮兵阵地，处处成为打击美机侵犯的战场。

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在越南直接参战的当天就从南宁附近开拔，9 日入越，先头部队很快登岛。短短几天后，越东北沿海、岛屿就构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不久，西贡电台广播：“中国共产党的志愿军开进越南北方，进驻东北群岛，接管了北越各岛屿和沿海的防御。中国军队都是老兵。岛上高炮成林……”

美军飞行员的请救书

二支队在岛屿上的工程部队施工进度神速。坑道作业，美国飞机也无可奈何。可是它并不死心，仍然不分昼夜地从第七舰队上起飞，轰炸扫射在多个岛屿上施工、守备的中国军队。

高炮分队、高机分队对美机的行动规律早就摸透了，他们不但打击轰炸各个岛屿的美机，还适时瞄准美机从海上起飞轰炸北越的必经之路，截击它们。一年多，击落美机 114 架、击伤 124 架。但在越南，击落美机以缴获美机残骸数为准，中国军队打落的飞机残骸，有的坠入大海，有的坠向大陆，有的被群众抢走，最后越方承认二支队击落 39 架。

美机攻击岛上中国军队，起初从东南方向起飞、升高、俯冲。它们被中国军队击落后，一般坠在岛上，或坠入内海，美军飞行员跳伞者则被活捉。

为了救护方便，美国飞机后来往往是从海上起飞，升高，转从西北方向向下俯冲，这样，被击中的飞机驾驶员跳伞，就落入大海，美军就火速组织直升飞机抢救。

有一次，两名美机飞行员降落在中国驻岛部队南边的大海上，中国登陆艇刚要启航，美国直升飞机已嗡嗡地飞临这片海域上空，从直升飞机舷窗上放下长长的软梯。

海面上的美军飞行员划动着自备的充气救生船，拼命的冲向云梯，抓住就往上攀登……

中国军队眼看美国飞行员被救走，操起海岸炮直射美国直升飞机。

登陆艇哗哗地犁开波滔，用高射机枪哒哒哒地扫射。

一架直升飞机被击中，坠入大海。另一架直升飞机吊着长长的云梯，云梯上飘着美军飞行员，嗡嗡地向南逃窜。

两名飞行员被俘。他们从怀里掏出早就用 13 种文字印好的请救书，其中中文写道：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请你帮助我找到粮食、住所和保护，请你同我到能够给我安全和想法让我回美国的人那里，美国的政府一定多多给钱，谢谢你们。”

中国军队在各岛屿上的防御工程基本完成后，将一部分部队撤至沿海，构筑海岸工程。

山中，有 27 座坟墓

128 团从杜拉岛撤到下龙湾海岸。

下龙湾又是军事要地，是海防、鸿基等重要城市、港口的海上门户。自北部湾事件后，不论白天黑夜，阴天晴天，美国飞机总时时飞到这里，不断轰炸和扫射各个重要目标。夜间，照明弹布满天空，从天黑到黎明，很少间断，一旦发现可疑目标，就可能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顿时就会火海一片。

下龙湾笼罩在不安和警惕的气氛中。

128 团 8 连驻扎在下龙湾畔的一片树林里，他们担负全团施工的采石任务。

采石工地离驻地有半小时的步行路程。工地南边不远处就是鸿基市、广宁省委、甫府的一幢幢瓦房宿舍，在阳光照射下，红红的一片，特别显眼。

美国飞机的盘旋、侦察，严重威胁着 8 连采石的安全。连长王玉秀与连队干部战士商量，寻找对策。他们对场地进行了伪装，山头上安排了高机排，时刻监视着蓝天。鸿基市郊布置着中国高炮部队，美机飞临上空，必遭火炮机枪的扫射。夜间作业，探照灯明晃晃的，敌机从高空很易发现，有时敌机临空，高炮、高机来不及发挥火力。工地几次遭受袭击，庆幸没有人员伤亡。

8 连根据敌机的活动规律和天气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施工班次，将打眼放炮安排在白天，运碎石尽量安排在夜间，组织得好，没有照明也可以干，阴雨天和有月亮的夜晚，集中力量突击。

一天，连长王玉秀和其他几位连队干部商量：“咱们搞个假工地，让美国佬炸炸？”

一拍即合。

连长和副连长唐宏义第二天就组织部分战士在不远处开辟了一个“像样”的新工地。

说来也巧，当天晚上美国飞机就临空侦察。8 连即刻关闭工地灯火，假工地却一片通明，假人假机械在紧张地作业。侦察机过后，轰炸机接踵而来，对着假工地一阵雨点般的轰炸。

8 连的干部战士在一旁风趣地点数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观赏着像礼花般的炸弹。

“炸得好！”

“再来一颗！”

“再来几颗！”

战士们手舞足蹈，挥动着拳头呼喊。

“美国佬真行！”

8 连就这样在美国飞机的眼皮底下采石作业两个多月不间断，大批石料源源供应其他连队的坑道和掘开式工事。1966 年 5 月 22 日，星期天。越南北方天气晴朗，碧空万里。下龙湾明丽的风光历历在目。

8 连驻地，鸟雀鸣啾，阳光透过树丛撒在帐篷上，点缀出斑斑驳驳的花环。上完夜班的 8 连干部战士在帐篷里呼呼入睡。野外热气蒸腾，树丛中凉爽宜人，经过一夜突击的 8 连干部战士睡得特别香。几位早起的战士静静地伏在床沿上写家信，在帐篷外树荫下清洗刚刚换下的浸满汗水的工作服。

突然，警报长鸣。尖厉的嘶叫声搅破了山野的寂静。这时，上午 11 时许。

8 连的同志从睡梦中惊起，提枪冲出帐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从海面上超低空袭来的 12 架美国飞机，逃过雷达的监视，突然出现在 8 连驻地上空，隆隆的飞机引擎声震得树梢哗哗作响，震得山野阵阵颤动。

副指导员第一个跑出连部帐篷，抬头一看，不好，敌机已开始轰炸！

话音未落，一颗重型炸弹在附近爆炸，副指导员应声倒在血泊中。

顷刻，750 磅以上的重型炸弹接二连三地落在 8 连的帐篷中间。

山摇地动，火光冲天，浓烟翻滚。

一棵棵大树拦腰劈断，一顶顶帐篷被气浪冲向天空，飘落在远处的树梢上。

一颗黑乎乎的重型炸弹恰恰落在炊事班的棚子里，“轰隆隆——”弹片呼啸着射向四面八方，热腾腾的馒头也像弹片般射向天空。

罪恶的炸弹夺去了炊事班的全体人员的生命，没留下一具完整的尸体。

副连长唐宏义紧跟副指导员冲出帐篷，边跑边喊：“快隐蔽！快隐蔽！”他刚跳到一棵大树旁，几块弹片像恶魔似地朝他袭来，一条大腿即刻被炸断，腹部几处穿孔，他倒在血泊中。

卫生员苏振福跑过来为他包扎，他喃喃地问：“同志们怎么样？……别管我，别管我了！”

卫生员看着朝夕相处的副连长被炸成这样，心如刀绞，但他来不及悲痛，来不及落泪，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抢救每一个伤员！”

后来救护车开到 8 连驻地，人们抬副连长唐宏义上车，他两手紧紧抓住树根：“让他们先上吧！让他们先——上——”这位共产党员，士兵的楷模，我军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就这样溘然长逝了。

8 连的指战员在敌机轰炸中临危不惧，连长王玉秀很快组织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对空射击。这时高炮声，机枪声和敌人的轰炸声交织在一起，天地一片混沌。

两架敌机中弹起火，冒着浓烟，坠向远处山林。

敌机被击退了。王玉秀马上组织清理现场，抢救伤员。万没料到，狡猾的三架敌机再度突然俯冲 8 连驻地。爆炸声惊天动地。

8 连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连长王玉秀腿受重伤。

在场的 2 排长曹振库赶紧冲过来。扶起他：“连长！连长！”

“我不能动了，你赶快去组织抢救，快去疏散伤员！”

已经负伤的 2 排长马上挑起了指挥全连的担子。

通讯员王邦兴跟随连队干部刚冲出帐篷。就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刹时，天翻地覆，泥土石块哗啦啦地从天而降，全身被埋在土里。当他拱出身子时，树在摇，人在跑，烟在冒，可是刚才隆隆作响、天翻地覆的世界嘎然间无声无息。他晃晃脑袋，摸摸耳朵，鲜红的血沾染了手指。他明白了。

他环视四周，副指导员倒在地上，鲜血直冒，已经牺牲。他又去扒土，从土堆里扒出了三名战友。

他突然想起，我不能蹲在这里，我有我的使命。敌机轰炸联络的电话线肯定中断，我应尽快将情况报告上级。征得连长同意，向 20 余里外的营部直奔而去。

两耳鲜血还在流，剧烈的疼痛没有令他止步。他一口气跑到营部，汗水淋漓，气喘吁吁。

营里领导和正在营部开会的8连指导员听到了8连方向有飞机沉闷的轰炸声和枪炮声，但电话中断，音讯全无，正在焦急忧虑之际，通讯员小王匆匆赶到。

指导员没说一句话，拔腿就跑。

营里干部留一人值班，其他几位紧随其后向8连驻地赶去。

卫生员苏振福带着伤在树林中窜来窜去，救护战友。自己腿上、臂上已被弹片切开，皮肉翻卷，血糊糊的。有位战友跑过来。看到卫生员的腿，鲜血直往下淌，马上取出急救包。苏振福皱皱眉头，说：“急救包不够用，我不要紧！”断然拒绝了。他一连包扎了7名战友，最后倒下了。

这位1960年入伍的老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心中唯有战友，而没有自己，他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将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11班刘天喜等5名战士，不顾美机第二次轰炸，硬是用手扒了两个多小时。一位战友被泥石挤压得气息奄奄。刘天喜等5名战士的手指全磨破了，鲜血淋漓。终于将埋在防空壕中的这名战友扒了出来。

美机第一次临空轰炸后，广宁省、鸿基市两所医院闻讯后，很快组织医务人员赶来救护。越南人民军官兵也立即派出人员赶到8连驻地。正在越南军民协助8连紧急救护之际，美机的第二次轰炸突然袭来，重型炸弹又在8连驻地爆炸。

与8连12班长郝遵义跳入同一防空壕的越南人民军一位中校，在敌机再次俯冲下来时，一把抱住郝遵义，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郝遵义一看是人民军掩护自己，迅速翻转身，扑在人民军中校身上。

就在这一瞬间，一颗重型炸弹在附近爆响，泥土碎石劈头盖脑地砸在郝遵义身上。

敌机过后，郝遵义和人民军中校起身，面面相视，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语言不通，双方无法进一步表达各自的感情，眼含热泪的中校抓着郝遵义的臂膀，用庄严的目光表达烈火般燃烧的激情，郝遵义紧紧地握着中校的手，激动的泪花洒在焦热的土地上。

烈火熊熊燃烧，硝烟弥漫，整个山野充溢着浓烈的炸药味、糊焦味、血腥味。

赶来救护的越南军民在美机第二次轰炸中，有的负了伤。救护车一到，8连的同志立即组织将越南受伤人员抬上车。一位受重伤的越南人民军少校看到车上的全是越南军民，而中国受重伤的军人还在树林中，呻吟着叫来越南医务人员：“你快把我抬下去，快！让中国同志上！”

中国军人上前劝阻，指挥司机开车上路。可是这位少校执意不肯：“你们快把我抬下去，否则我起来。”他正欲起来，“啊唷”一声又歪倒下去，铁青的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他仍挥挥右手，示意人们赶快抬他。

越南医务人员攀不过他，只好将他抬下来。

接着，他们又将中国重伤员抬扶上车。在生命的临界点上，越南人民军少校的一举一动使在场的中国军人无不为之感动。

至今，这位少校的形象仍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官兵的心中。

救护车将受伤的中国军人送进了广宁医院。广宁医院的医生如临战场，立即组织抢救。好几位昏迷军人在越南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护下苏醒过来。

8连战士梁成义的病房，处在紧张的气氛中，主任、医生、护士围在小梁身边，小梁一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小梁的呼吸渐渐微弱，过重的伤势即将夺走他年轻的生命。这时，一位娟秀的白衣天使顾不上小梁满身的泥灰，满脸的泥土血浆，扑上去口对口的进行人工呼吸。呼吸了一阵又一阵。她秀美的脸上沾满了泥工血浆，洁净的帽沿和额前的秀发上也沾满了灰土。年轻战士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可是这位白衣天使还在大口大口的呼吸，她多么渴望自己能救活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军人呵！

病房里的空气像凝固一般的沉重、悲伤。她含着深情的泪花，慢慢地从梁成义的身上起来，肃穆站立在这位年轻的中国军人面前，徐徐抬起右臂，轻轻摘下白帽，双眸透过蒙蒙的泪雾，默默地注视着，注视着……

当晚，中国援越部队二支队指挥部的领导、128团团长、政委和当地越南政府商定，将这些为越南人民抗美救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中国死难烈士安葬在附近的摆在。

那些刚刚还在共同作战、施工、生活的战友，就这样突然地离去了！永远地离去了！

8连的官兵泣不成声。

团长韩德仁、政委刘玉昆和支队的领导一起默默地伫立在墓前，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俩为自己团队有这么英勇不屈、顽强奋战的干部战士感到骄傲，祖国的优秀儿女，在援越抗美的疆场上英勇作战，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为越南人民立下

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他们感到无比的悲愤和痛惜，祖国将4000多名儿女交给我们，从祖国的东北拉到了华南，拉到了越南。现在呢？他们其中的一些就这样安眠在越南的国土上。

越南地方党政军机关送来了一个又一个祭奠的花圈，越南当地群众，少先队员送来一个又一个五彩的花圈和花环，人们伫立在27座坟茔前，寄托了深沉的哀思，献上人民对壮烈牺牲的中国军人的崇高敬意。

太阳西下，血一般的夕阳染红了摆在山山岭岭，染红了下龙湾的宽阔海面。韩德仁、刘玉昆此时此刻想的很多很多，想的很远很远。可是，他们想的最迫切的是赶紧安排受伤人员回祖国治疗，赶紧安排明天8连的采石工作，全团的工程急待着更多的石料供应。怎样化悲痛为力量？怎样在全团掀起学英雄、看行动的比学赶帮超热潮？这一步步的工作都得跟上去，都要一环扣一环的抓紧落实。

暮色苍茫。他俩沿着27座坟茔，缓缓地转了三圈，擦干最后一滴眼泪，转身走下山去。

周恩来交诗再次派兵

1965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秘书报告：“总理，陈士榘他们来啦！”

周恩来热情地握住陈士榘的手。

“这是罗洪标。”陈士榘介绍说。

周恩来：“我认识。”将手伸了过去。

陈士榘：“军委已决定，派罗洪标到援越部队工作。”

“这很好！”周恩来很高兴。

刚坐定，周恩来就说：“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了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事，这是毛主席在湖南长沙会见胡志明主席时商定的。毛主席说，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

周恩来的语气稍为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面的事，就是我们如何来落实了。军委决定，修筑路的任务由工程兵负责组织执行。如果只修筑主要的几条道路，估计也要8万人。这是我国援越部队出境最多的一次，时间紧、任务重，你们要抓紧准备。美帝国主义妄图从朝鲜、越南、台湾这三方面包围封锁我们，抗美援朝这一仗，打破了它的预谋。现在它又从越南这方面来了，派出大量的部队援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援越也就是打破美帝的包围，保卫我们的祖国。毛主席指示，我入越部队一定要全心全意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服务，他们打得很艰苦、很坚决。我们援助的意义很重大。这个任务要完成好，为祖国争光。”

陈士榘、罗洪标一边记着周总理的指示，一边体味着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的份量。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次派兵援助越南，要我们充分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物资装备的准备工作。物资器材、机械工具都要我们自带，所以，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我已请总参负责抓总，布置这项工作。”

“你们看怎么样？”周恩来问。

由工程兵组建的我援越部队二支队已经向越南开进，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估计这几万工程部队不够，还要派遣后续部队跟上，但他想不到来得这么快，他感到时间很紧迫，就向周恩来提出：“出国部队的事，我们同总参商量，可以由广州、沈阳、昆明等军区组建几个支队，很快可以开赴集结地域。但我们钻探勘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缺乏，能否请交通部支援？”

“可以！”周恩来肯定的说，“我告诉交通部，可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抽调，要多少你直接找交通部商量。”

周恩来炯炯的目光望着陈士榘、罗洪标说：“还有着装，跟二支队一样，穿越南人民军服装，由广州、昆明两军区后勤部门解决。这两军区在后方组织分部、兵站、医院、接收站，担负起全部援越部队的后勤保障。”又强调说：“部队进入越南后，一定要尊重越南政府和人民，关系要相处好。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陈士榘说：“总理指示很明确，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具体问题，我们找总参解决。”

周恩来：“那好。工程技术和勘察设计由交通部负责。陈士榘同志，你以后参加国务院援越领导小组工作。”

陈士榘：“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请总理转告毛主席，请他放心。”

谈完话，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陈士榘、罗洪标上车了，他还在招手。

周恩来在找陈士榘、罗洪标谈话前，已与罗瑞卿谈过，对援越修建公路作了布置。

1965年6月20日，由李天佑副总参谋长主持，在北京三座门召开援越修路工程会议。总政、总后、工程兵、铁道兵，沈阳、广州、昆明军区的领导、总参有关部的领导和国务院交通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主要是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宣读了中越两国政府签署的《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和议定书》，商议援越修路工程的具体事宜，并报军委审批。根据越方要求总参议定主要援建1、3、7、8、10、11、12等7条主要公路干线。

随后，交通部董宁、工程兵崔萍、廖习仗等三人率领的代表团赴河内协商，并对7条路线进行现场勘察，以便进行工程设计、兵力部署和工程材料、经费预算的筹措等。该团由交通部30余名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工程兵2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施工部队师团干部10余人，还有总参、总政、总后的几名机关干部等共70余人组成，于6月25日从北京出发，直抵河内。

8月10日至20日，各勘察组先后到了河内，大家马不停蹄的整理汇总勘察资料，共同研究，提出了各条公路线的走向、路基土方、桥梁、涵洞的工程量和兵力部署的初步方案。并将勘察情况与越方交通部商定后，向总参谋部、国务院交通部汇报。

随即，中央军委命令，从工程兵和各大军区抽调400余名干部战士到广西柳州集中，组建精干的修路工程指挥部和直属队。罗洪标为指挥部副主任，修路工程指挥部主任暂缺，工程任务由罗洪标抓总负责，代理主任工作。在3年的时间里，罗洪标一直主持这个工作。

修路工程指挥部下属3个支队、1个测量设计总队。

3号路是我国广西凭祥和靖西县通往越南高平、太原、河内的主要干线，地形比较隐蔽，原有道路标准低，运载能力差，改建后，可大大提高运输能力，是我国援越运输的主要公路干线。7号路属新建，由我国云南河口通往老街、班菲、朗达，与通往河内的公路网连接。建成后是我国从河口方向通往河内的主要公路干线。8号路属新建，是我国云南文山地区通往越南孟康、班菲与7号路连接。10号路上的沙巴以西为新建，沙巴以东为改建，是沿中越边界的一条横向迂回路，东起老街，经沙巴跨黄连山到封土，东与7号路相连、西与11、12号路相连。

四支队担负1号、3号路修建任务。

五支队担负7号、11号路修建任务。

六支队担负8号、10号、12号路修建任务。

云南省民工大队配属五支队、六支队，主要在我国边境与越南公路接壤路段施工。

各支队配有高炮分队，并根据敌情，随时可请求增配高炮部队。

8万大军遵照军委命令，于10月、11月先后从各个口岸秘密越过国界线，向越南开进。

崔萍前后两个月在越南率队勘察。天热，蚊虫多，他首先感到的是对气候很不习惯。人很快瘦了下来，还得了病。回北京总结汇报工作后就住进了医院。11月初，他又匆忙地赶到班菲。

菲。

中国援越部队修路工程指挥部就设在班菲。

46岁的崔萍正值年富力强，他曾率师在北京修筑重大的地下工程，如今又来到越南抗美救国的前线修路。每有重大的工程任务时，领导总想到他，他觉得这是一种荣誉，同时也使他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到班菲指挥部不久，他就想到各条线路上去看看，部队进入指定地点后，展开施工作业的情况怎样？他觉得修路指挥部司令部几位领导只有自己来自工程部队，懂工程建设，应该到施工现场去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年后，崔萍晋升参谋长，他仍像以前一样，从东部1号路的夏眉山顶到西部越老边境的莱州河畔，处处留下他奔波的脚印。他对高平的城镇乡村、对高平的山山水水、对高平的人民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那是1954年5月的一天，年仅35岁的师级指挥员崔萍，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40余名专家组成的工兵训练团，冒着霏霏的阴雨，赶到高平。他奉命帮助年轻的越南人民军组建训练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

这时，经过几次重大战役，越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奠边府法国殖民军孤立无援，卡斯特莱准将指挥的1.6万多兵力在奠边府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妄图歼灭越军主力，挽回败局。就在这时，中国军事顾问团深入到越军各师、团、协助指挥作战。

日内瓦会议正在召开。只有在战场上更多的歼灭法军，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主动。

为此，越南党中央，人民军总部决定扩大武装，在邻近中国边境的高平迅速组建工兵团、舟桥团和炮兵部队。由中国炮兵一师参谋长张挺率领的炮兵训练团也同时赶到高平。

高平的青山绿水间活跃着中国健儿们。来自华北平原、八路军出身的崔萍，在越南组织训练工兵、舟桥兵正好如鱼得水，他在中国吉林工程兵训练基地任职时就练就了一套严密组织，严格要求的训练方法。他常与越军总部工兵主任范璜商量，订计划，组织训练课目。一整套训练管理、政治思想工作、部队编制体系等都是按中国军队的模式组织实施的。

中越两国军人朝夕相处，在4个多月的共同学习、训练、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训练的最后课目是组织一场演习。11年过去了，对这场演习，崔萍记忆犹新。那一天，高平格外热闹，许多群众搁下手中的活儿奔来观看，人民军和高平省的许多领导也亲临现场观看演练。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在天际划了两条漂亮的弧线。接着，从树丛荫蔽处隆隆地驶出一支工程机械部队，在高低不平的山丘上，开辟出一条平坦的通道。这条通道一直伸向滔滔的江水旁。舟桥部队像一支支离弦之箭，向江心冲刺。瞬间，座座门桥在江河上连接。汹涌的江河被镇服了。天堑变通途。一队队卡车，拉着一门门火炮，排着长龙般的队伍从舟桥上隆隆驶过……

崔萍完成了训练后，就调到河内我国军事顾问团工作。这时抗法战争已取得重大胜利，日内瓦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顾问团主要是帮助越军壮大队伍，加强正规化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如今是修路工程指挥部参谋长的崔萍又一次来到高平，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觉得高平既熟悉又陌生。如果说抗法斗争时期的高平还是个弱小的少年的话，那么如今的高平已经是一个有为青年了。青山环抱着美丽的城市，一江清水从高平城下缓缓流过，仿佛向远方而来的中国军人诉说衷肠。

他疾步登高远眺，高平的景象尽收眼底，他觉得高平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到处充满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美军的入侵，由于战争，高平的一群群新建筑的手脚架空无一人，人们还来不及干完活，就上前线了。街面冷落，车马稀少，商店货架上有限的货物依稀排列着，偶尔光顾的人们仅问问价格，就悄然而去。高平人民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都用于支援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他们为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正勒紧腰带过日子。一辆辆满载物资的中国车辆，也正不分昼夜地经过高平的3号公路，向南行驶。

四支队有3个团的兵力部署在3号公路上，这一线的公路改建工程已经全面展开。锤声叮当，马达隆隆，部队冒着风雨作业。蒙蒙的雨雾像巨大的帷幕悬在天边，白茫茫的。

一列中国运送援越物资的车队被大雨阻在高平附近的山路上。前面几辆车轮在泥浆中呼呼的打转，排气管咣咣地爆出青烟，卡车在泥泞的路面上颤抖一阵，又熄火了。修路部队只好帮助推车。推了一程又一程，不一会儿又陷入前面的路段。

在风雨中，崔萍察看了这路面，他眼见长长的车队停在马路中，雨水敲打在卡车的帆布盖上，似乎敲打在他的心头。道路不修好，物资运不上去，越南南方人民的战斗依然艰难，中国是大后方就成了一句空话。

想到这里，崔萍立即回到指挥部，与四支队的领导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和施工计划，决定先抢修一段路基，铺设一段路面，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拿下高平这一线的改建工程，再逐步向南推进。

3号路全长236公里，从1965年11月15日开工，一直干到1967年4月15日竣工。

中国军队援助新建、改建的7条公路，根据越方要求，大都与中国境内公路相连接。其他则是越南部队机动和输送物资的重要横贯线。

1967年春，第一期工程的3号、7号、8号、10号公路先期竣工，并移交越方。修路工程指挥部又命令各支队向第二期工程的1号、11号、12号公路沿线集中。

此时，表仪至坂质的1号公路已完成过半，但夏眉山一带的工程仍很艰巨。那里地势复杂，病疫成灾，曾被当年的法国人宣布为修路“禁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罗洪标又一次想起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他像组织决战一伴，组织五、六两个支队在11号、12号路上攻坚。8万大军已基本完成修路任务，最后的攻坚决不能麻痹，他又想起毛泽东的活：“骄兵必败”。

施工专业队采取一条龙作业法，大大提高了工效。到1968年6月底，11号、12号公路相继竣工。中国部队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部筑路任务。经中越双方验收后，1968年6月30日举行公路移交仪式，罗洪标和越南交通部部长潘仲慧分别代表中越双方在移交书上签字。

胡志明亲切接见中国代表团

1968年7月初，越南交通部邀请中国修路工程部队组织代表团到河内参观访问。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各支队部、团、测设总队各派两位代表，还有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廖习仗共56人，由罗洪标任代表团团长，于7月5日抵达河内，受到河内人民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参观了原被美机轰炸破坏，后由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和越南军民共同修复的龙边大铁桥。又访问了越南北方最大港口城市海防，游览了海上公园，欣赏了下龙湾的奇妙景致，访问了广南省，参观了由我七支队构筑的海防工事，参观了通向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小道的入口处……

7月15日。总理府通知：胡志明主席要接见全体代表。大家忘却了连续10天的参观的疲劳，情绪顿时兴奋起来。

下午，潘仲慧部长来到代表团住处，接代表团前往主席府。潘部长与罗洪标是这几年经常相处的老朋友。潘是越南南方人，与罗洪标同岁，两人亲如兄弟，无话不谈。潘仲慧曾私下对罗洪标说：“我们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发展到今天，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批给我们每个连队一台‘熊猫’收音机，还批给每个战士一顶蚊帐。每天有240辆汽车负责运送中国援助我们的物资。毛主席为我们想的真周到。你们修路大军整整战斗了3年，为越南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这么快要走了，我们真舍不得呢！”

下午3时许，代表团到达主席府。范文同总理在门口迎候。范文同总理领大家在会议厅坐下。他身着灰色短袖衬衣，站着，笑容可掬地对全体代表们说：“我很高兴地欢迎你们的到来！告诉大家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要接见、看望你们。”

范文同总理的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这时，胡志明主席从会议厅后门健步走来，向大家招手致意。代表们站起，再次热烈鼓掌。绝大多数代表是头一次见到胡主席，他们眼中含着激动的泪花。胡主席几次招手示意让大家坐下，可是这热烈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分钟，掌声在会议厅中回荡。

范文同总理将罗洪标介绍给胡主席。胡主席握着罗洪标的手：“欢迎你们！”

罗洪标把廖习仗、各支队的领导一一介绍给胡主席，胡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说：“欢迎、欢迎！”

大家的目光都聚向胡主席。他穿着一件黑色绸缎的短袖衬衣，坐在主席台的中间，和善亲切的眼神凝视着全体代表，一缕银须挂在胸前。他身边坐着范文同总理，另一边坐着罗洪标。罗洪标的边上坐着潘仲慧部长，廖习仗坐在范文同总理身边。同坐的还有中国驻越武官张秀山。

掌声落下，胡主席用流利的中国话亲切他说：“同志们好！大家辛苦了！”热烈的掌声又在会议厅里激荡。

胡志明主席微笑着摆了摆右手说：“你们援助我们修的这些公路，是我和毛主席在湖南长沙见面时商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是毛主席无私的对越援助。你们在越南3年修路很辛苦，还有不少同志流血牺牲了。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最及时的，最大量的，最真诚的，最宝贵的，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代表团中情绪激昂。他们中有几位在昔日的朝鲜战场上见过金日成主席，其余的因为从没聆听过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讲话，所以感到很新鲜。他们感到亲切，他们感到这3年的浴血奋战值得。他们感到这次河内之访很有意义。这些感觉和感受都汇集在小小的手掌里，变成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胡志明的话语渐渐低沉下来，他向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向在越南国土上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而英勇牺牲的同志们表示了哀悼。向英勇负伤的同志表示了亲切的问候。这时，会议厅里静静的，牺牲的战友的英勇形象仿佛在代表团成员面前浮现，他们眼中噙着泪花，大家为牺牲的战友们感到惋惜和悲痛。胡志明深切他说：“请你们放心，中国军队牺牲的同志的遗体安葬在越南国土上，我们会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墓地的！”转而他又以安慰的口吻说：“革命战争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实证明，中越两国的关系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固的。我说过，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越南人民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我给你们这支部队一个荣誉：你们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军队。”

这时罗洪标激动不已，站起来领着大家呼口号。然后代表8万中国援越部队讲了话，他说：“我们就要离开英雄的越南国土了。但只要越南人民需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会立即回来，把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听到这里，胡志明主席带头鼓起掌来。

第四节 粉碎边境袭扰和侦察

美军无端挑衅

1964年，美国全面扩大侵越战争。中国政府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侵越美军不甘心于现状，为查明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兵力动态，不断派飞机对中国进行袭扰和侦察。

1964年8月5日晚和6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先后两次召开由空军、海军、各兵种和北京军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作战会议，分析研究中南半岛形势，确定空、海军和广州、昆明军区立即进入战略状态，并加强广西、云南、海南岛地区的防空力量。

这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实际上都是围绕援越抗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连夜召集空军机关领导干部开会，传达总部作战会议的精神，研究提出了提高防空作战能力，打击入侵美机的意见。海军领导人和海军机关也同时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这些意见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迅速得以落实，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防空作战力量和指挥得到全面加强。8月初，空军将驻广东兴宁的空军第7军的指挥机关调往广西南宁，统一负责南宁地区的防空作战指挥。在广西、云南地区的前沿机场，增设了师、团两级指挥所，配备了精干的作战指挥班子，并向中南和西南地区增调了2个歼击航空兵师另1个夜航大队和1个高炮师。与此同时，在上述地区增修和扩建了一定数量的机场，增设了一些雷达站，加强了雷达、通信等各项保障，弥补了低空盲区，扩大了情报保障范围。

尽管中国军队加强了防空作战的准备，但仍然执行中央军委规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采取克制态度，对入侵美机一般不予攻击，尽可能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1965年4月8日，美国海军舰载F—4B型战斗机2架，侵入中国海南岛榆林港上空挑衅。4月9日上午8时多，又有两批8架F—4B型战斗机侵入海南岛上空。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遂命令海军航空兵8师起飞4架歼5型飞机，监视第二批入侵的美机。中国飞行员发现美机后，几次处于有利位置，但均未进行攻击，然而美机却摆开了格斗的架势。1架美机突然向中国飞行员李大云进行攻击，发射2枚麻雀—III型空对空导弹。李大云眼疾手快，迅即驾机急转弯规避，导弹从他侧方飞过。美机的无端挑衅，激起了指战员们的义愤。师指挥所向飞行员发出命令：“坚决回击！”。于是3号机魏守信和4号机李大云，迅速向两架美机靠近，准备歼灭入侵者。美国飞行员见势不妙，慌乱地向中国飞机发射了4枚导弹后，仓皇逃遁。

美军战斗机连续入侵中国领空，并向中国飞机发射导弹，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于4月9日，将情况

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美机的疯狂挑衅，

已直接威胁我机安全，建议对侵入中国大陆包括海南岛等地上空的美军战斗机，予以坚决的打击。周恩来明确指示：原来的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撤销。美机入侵中国大陆和海南岛上空，要坚决打击。毛泽东也指出：“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从此，人民解放军对待入侵美机的政策，便由原来的一般不予攻击，

转变为坚决打击。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对入侵美机应坚决打击的作战原则，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驻云南、广西，雷州半岛、海南岛的空军航空兵、地空导弹部队、高炮部队和海军航空兵，都制订了作战方案，组织了以反击美机入侵为战术背景的训练和演习，加强了战备值班和空域巡逻。他们昼夜严密监视空中情况，悉心钻研现代空战战术，积极捕捉战机，打了不少胜仗。

空军在中越边境“打擦边”

1965年8月20日10时47分，美国F—104C型战斗机1架向海南岛靠近，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所判断美机可能入侵中国领空，即令海军航空兵4师10团大队长高翔率领歼6型双机起飞，进行警戒。美机在海南岛西部领海线附近上空飞行，时入时出。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所针对这种情况，将拦截机置于有利空域，监视美机动态。11时9分，美机从海南岛西部侵入中国领空，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员果断下令拦截。领航员引导高翔双机接近美机，以1300公里的时速切入目标前置点。高翔为了更有把握地歼灭入侵美机，尽量缩短与美机的距离，直至离美机290余米时才开始射击，一直打到距离39米，把这架美机打得凌空爆炸。由于距离大近，高翔的飞机被美机爆炸的碎片击伤多处，一台发动机也停了车。他依靠另一台发动机工作，坚持驾机返航着陆。被击落的美机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跳伞被俘后，心有余悸他说：“在这样近的距离开炮，太可怕了。这是一次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的战斗。”

10月5日上午，侵略越南的美军出动32批120余架次战斗轰炸机，袭击靠近中越边境的高平、芒街地区。为防备美机入窜，空军驻广西的航空兵9师副中队长张运宝奉命率领4架歼6型飞机，迎着蒙蒙细雨，穿过云层，直奔龙州、宁明一带巡逻警戒，监视当面美机的动态。12时许，广西地区的许多地面防空雷达遭受严重干扰，飞机信号湮没在迷雾般的杂波中。有经验的操纵人员及时采取了反干扰措施后，发现一架美国RA—3D型侦察机从隘店两次侵入中国境内，又两次退出。指挥员判断美机还可能入侵，即命令在空中巡逻的张运宝等4名飞行员，投掉副油箱准备战斗。美机果真再次飞向中国境内，并以云层作隐蔽，紧贴着云顶飞行。张运宝率领的编队在地面领航员的精确引导下，及时发现了入侵的美国侦察飞机，在超音速条件下采取鱼贯进入的战术，向目标发起了连续突击。4名飞行员从距离美机900米一直打到300米，先后都击中了目标，使美机冒烟坠落。张运宝等4名飞行员在超音速情况下编队作战，始终协调一致，充分发挥了整体的威力，因而赢得了这次空战的胜利。

空军部队的指战员们，把在中越边境地区打击入侵美机的侦察挑衅活动，称为“打擦边”。这是一种特殊的空战，情况突然，战机短暂，稍纵即逝。拦截飞机既要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迅速准确地抓住战机，又要严格遵守作战政策，将入侵美机歼灭在国境线内，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空战中无论哪个环节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整个战斗的失利，乃至被对方所击落或酿成涉外事件。担任防空作战任务的歼击航空兵指战员，刻苦学习，大胆实践，潜心研究，逐步认识和掌握了进行这种特殊空战的规律。他们采取空域隐蔽待战、直线出击和大速度、大角度截击方法，做到引导接敌快、发现快、攻击快、脱离快和进入截击准、瞄准射击准，使入侵美机遭到沉重打击。在歼击机不便于作战的地域，则部署高炮部队，采取空、炮协同的方式，实施对空作战，使入侵美机无隙可乘。

1967年，美军对越南北方实施全面轰炸，美国战斗机、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的次数也显著增多。从4月24日至5月1日，美机入侵广西地区达11次之多。中国空军驻防广西地区的歼击航空兵和高炮部队，在8天中三战三捷，击落入侵的美国军用飞机5架。其中在4月24日所进行的战斗，是击落

美国鬼怪式飞机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当天 16 时 41 分至 17 时 13 分，美国海军舰载机 40 余架，在干扰机的配合下，空袭越南克夫至谅山的铁路线。为防备美国军用飞机乘机突然窜入中国领空袭扰，中国空军航空兵 26 师指挥所，命令该师 78 团 4 架歼 5 型飞机，飞至宁明东南空域巡逻监视。17 时 5 分，地面防空雷达发现两架美国 F—4B（鬼怪式）战斗机，突然向中国边境飞行。地面领航员根据双方飞机所处的态势，迅速测算出截击诸元，提出了截击方案。师长车香友判断这批美机很可能入侵中国领空，当即决定予以截击。于是领航员立即引导在空中巡逻的歼 5 型飞机，内侧跟踪，监视美机。美国 F—4B 型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其最大飞行时速为音速的两倍多，机上装有先进的火控系统和电子设备，可携带空对空导弹，能对目标实施尾后、侧方和对头攻击。而歼 5 型飞机却是一种比较老旧的亚音速飞机，既没有机载雷达和自动火控系统，也不能携带空对空导弹。从飞机性能看，要用这种飞机拦截“鬼怪式”飞机，困难很大。但是，中国空军作战部队指战员们对此早就作了充分的研究。他们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地面指挥引导的优势。发挥飞行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扬长避短，敢打敢拼，是可以取胜的。17 时 9 分 40 秒，美机逼近中国边境。中国空军领航员立即奉命指挥拦截机投掉副油箱，准备切向美机的前置点。担任这次作战引导的主要领航员，是空军一级技术能手，平时训练有素，基本功过硬。在双方相对速度很大，转弯截击只要延误几秒钟，就可能导致整个战斗失利的情况下，他们准确迅速地引导拦截机形成了有利态势。17 时 9 分 55 秒，美国 F—4B 型飞机从广西南部边境的板兴侵入中国领空，驻防这一地区的空军高炮 10 师 30 团采取集火近射的战术，一齐向美机猛烈射击，当即击落 1 架。另 1 架见势不妙，慌忙逃跑，刚飞出高炮火力区，即被早已跟踪监视的 4 架歼 5 型飞机截住。美机竭力摆脱，它时而进行小角度蛇行机动，时而急剧上升，时而下降。但是在中国 4 架飞机上下左右的夹击下，始终未能摆脱挨打的局面。一号机飞行员宋义民连续开炮 3 次，将它击中。这架美国 F—4B 型飞机中弹数发，拖着浓烟，坠落于北部湾海域。这是一次空炮密切协同，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速决战，两架美国 F—4B 型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仅 3 分 20 秒钟，就被全部击落。这次战斗的胜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称赞。1967 年 7 月 31 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领航员，赞扬他们打得好。

人民解放军在打击入侵美机中，越战越强。8 月 21 日，空军航空兵 18 师又在广西地区击落入侵的美国 A—6A 型攻击机 2 架。当日下午，桂南地区阴云密布，局部地区还有浓积云。13 时许，美国海军两架 A—6A 型舰载攻击机又从广西隘店侵入中国领空。空军第 7 军指挥所命令航空兵 18 师康振生等，驾驶歼 6 型飞机 4 架起飞拦截。他们进入战区后穿云破雾，及时发现了入侵美机。二号机韩瑞阶在云隙中盯住 1 架美机，跟踪至相距 600 米，连续开炮 3 次，将它击落。三号机陈丰霞也紧紧咬住了另 1 架美机。他在第一次进入未及攻击而冲到前方后，立即作了一个斜斤斗特技动作，再次咬住目标。美国飞行员驾机急速

下滑，企图利用十万大山的险峻地形，以钻山沟的方式，从低空逃逸。位于桂南地区的十万大山，海拔 1100 余米，峰峦起伏，峡谷急流较多。康振生等飞行员曾在这一带进行过数十次训练

和巡逻，地形比较熟悉。他们紧追美机不放，从高度 5000 米追

到高度 800 米，在两个高大山峰之间的峡谷中，与美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陈丰霞忍受 8.2 个载荷因素，连续开炮，从距离 1000 米打到 700 米，终于将另一架美机击落。两架 A—6A 型美机坠入广西南部地区。

自 1964 年 8 月至 1968 年 11 月，美国作战飞机在中越边境地区入侵我领空 155 批， 383 架次，被我军打下“擦边”12 架，击伤 4 架，有力地支援了越南军民的抗美斗争，同时也保卫了祖国的领空。

第五节 中国炮兵捷报频传

高炮部队宋化桥告捷

高炮 609 团团长程玉山，“嗖”地跳出掩蔽部，像离弦之箭，奔向阵地制高点。

满天的美国飞机穿梭往来，炸弹隆隆地在原野上炸响。越南人民军高射机枪连先期开火了。

程玉山观察着，头上伪装的枝叶在强烈的阳光燎灼下，已经蜷缩萎蔫。他屹立在高地上，一派军人的英武之气。他看到美机投弹七零八落无目标，心想：“你再狡猾、也逃不出咱的眼睛。”

他判断着美机的主攻方向。

紧跟他上来的作战参谋不免有些紧张：“团长，下命令吧！”他昂头仍在观察着敌机的行动。

“别急！”他头也没转。

“轰隆隆！”突然一颗炸弹在四、五连阵地间爆炸，冲起一团浓浓的烈焰。

又一位作战参谋冲出掩蔽部，跑到团长跟前：“报告，团长，二营请求开火！”

他面对作战参谋说：“告诉部队，沉住气，敌人就这么两下，它炸它的，我打我的！”

“是！”

转眼，空中一批美机俯冲下来，接着第二批敌机也呼啸着俯冲下来。程玉山判明敌机主攻方向是西南角的宋化桥，当机立断：“传达命令，调转火力，瞄准第三批第一架，全营集火！”

“轰！”“轰！”“轰！”

一阵集火射击，美机即刻空中开花，粉碎的机身从半空中噼哩啪啦地坠落下来。

609 团首战告捷。

这是 1965 年 9 月 20 日。

在总结会上，有人问：“程团长，前两批你不打，如果没后续飞机，失去战机，上级追查，你咋办？”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打则已，一打即中，我宁肯挨批评受处分，也决不打乱仗，消耗兵力！”

1965 年 8 月，609 团所在的高炮 63 支队奉命入越，配属 63 支队的空军高炮 23 团也同时出境作战，担负克夫至友谊关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

高炮 61 支队，1965 年 7 月 20 日接到援越作战命令，8 月 1 日至 8 日全部到老街、安沛地区，担任老街至仙建的铁路线防空作战任务。

63 支队出国后，8 月 23 日所属 628 团在克夫首遇美国飞机轰炸。支队分析轰炸可能升级，可能要步步向中国边境靠近。当即命令程玉山所在团二营向河友线宋化桥开进。程玉山率部当晚从凉山出发，一夜没合眼，赶到宋化附近构筑阵地。第二天，顶着太阳和指挥所的人研究作战方案。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高炮部队坚决做到不打则已，一打就力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一定要以胜利的战斗，表达中国人民支援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英雄气概，体现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程玉山又发动群众，四次修改作战方案。

9月的越南，天气炎热，中午气温常常高达摄氏40度，而敌机中午活动又很频繁。为了指挥作战，他中午从不休息，总是汗流浹背地蹲在阵地指挥所。

山下有条清清的溪泉，每天晚上，组织战斗部队分批下山洗澡。

“团长，你怎么不下去洗洗？”

“不打下飞机，我就不下山！”程玉山说。他另有一分担心，是万一下山时敌机临空，贻误战机，怎么交待？直至9月20日，美机在空中爆炸，晚上他才一溜小跑冲下山，扑通一下跳进惬意的清泉中。

10月5日，美机又一次袭击宋化桥。第一批F—4飞机从西南方向低空临近，程玉山及时抓住时机全营集火射击，将它们击落。这时，美机F—105四架又狡猾地从东北方向转入攻击。程玉山又立即命令部队转移火力，集中打第一架、第三架，又击落一架。

整个战斗集火射击8次，6次取得战果，击落美机5架，击伤1架，活捉一名美军飞行员，宋化铁路桥安然无恙。

支队召开作战会议，推广了他们集火射击的经验，程玉山却说：“不行，打得还不理想，还有几个地方要改进！”

这样的将士敌人最害怕！

这样的将士没有不打胜仗的！

程玉山，河北魏县人，1921年出生在农民家庭，1941年投奔八路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身经百战，沉着勇敢。可是，这位英勇机智的团长在10月7日宋化战斗中不幸献出了生命。

程玉山所在团受命在谅山至北宁沿线机动作战，数月内先后转移13次，行程31000多公里，作战9次，取得了击落美机17架、击伤4架、俘一美飞行员的辉煌战果。

在半年的对空作战中，63支队共击落敌机54架，击伤22架（包括空军高炮23团击落23架、击伤8架）。61支队半年中先后对77批222架次美机作战49次，击落击伤美机各30架。628团6连在1965年12月1日的温江战斗中，全连沉着操作，一直压缩到2200米才对敌开火，一个点射，28发炮弹，就击落美机一架。

美军连续轰炸西北线重镇

1966年2月18日。中国援越高炮部队67支队接替了61支队，担负起安沛——老街的防空作战、掩护交通的任务。所属625团部署在寨湖——铺合地区，626团于保河——老街地区，607团、619团部署在安沛地区。

安沛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西北重镇，省政府所在地，是滇越铁路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

1965年1月，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在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5月，承建这机场的中国援越部队三支队先遣人员抵达安沛，主力部队由中国空军组成，随后进入越南，11月22日开始大规模的作业施工。

新建机场位于安沛市西北4公里处，濒临红河，群山环抱，场地原有50多条山沟，地势起伏坎坷。三支队到达时，安沛这座省城已被美机炸得到处瓦砾，弹坑遍地。他们面临的定是一场浴血奋战。支队领导提出“血染红河畔，铺出通天道”的战斗口号，激励部队一边修建机场，一边与美机作战，在敌机的扰乱下抢时间、争速度。

推土机、卷扬机、装载机、平路机，一排排、一列列地隆隆作业，机场工地一派繁忙紧张的施工景象。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顶着连绵阴雨，冒着烈日酷暑，很快削平了59座山包，一片开阔的机场雏形展现在群山脚下，红河之滨。

在安沛建设空军机场，对美国侵略者是个巨大的威胁。美军在轰炸安沛市的同时，对机场工地也进行了不停的扫射和轰炸。

67支队将安沛的619团部署在市区以北至鹅冠桥的地段上。607团和625团一营共同担负掩护安沛车站和机场工地的防空作战任务。

据越南报刊公布，自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以来，对安沛多次进行轰炸。从1964年8月5日至1966年4月30日，在安沛上空已击落美机34架。

5月6日，美国空军又出动各类飞机11批50架，对安沛进行了空前的袭击。67支队驻安沛高炮部队当即迎头痛击，击落3架，击伤1架，活捉美国空军联队参谋长罗伯逊·诺曼尔中校。

这一天，支队长王恩谦在指挥所里踱来踱去，他好像有一种预感，5月将有恶战，67支队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他蓦地想起83年前的5月。1883年的5月，有个名叫刘永福的中国人率领黑旗军在河内城西二里一座小桥附近的关帝庙前，与法国侵略军展开过一场激战，大刀长矛对着法国人的洋枪洋炮。黑旗军出动了3000人马，分为三路向法军发起攻击。那一天，从早晨9点直拼杀到下午1点，黑旗军杀死法军2000多人，砍下了1000多个法国人的头颅，法国侵略军司令李威利也丧了命。那座小桥称纸桥，这场激战日后被称为纸桥战役。这一仗，法国人损失惨重，好久喘不过气来。黑旗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总要付出代价。当时的越王为了酬谢刘永福，封他为三宣提督、一等义良男。越南人为了表彰黑旗军的英雄业绩，在纸桥还立碑纪念。83年过去了。

想着，想着他来到两个团的高炮阵地，对战斗部署又作了调整，使619团的兵力、火炮配备更加集中。又指示部队加修工事，严密伪装，检修火炮、器材，随时处于准备战斗状态。

王恩谦预感的鏖战果真出现了。这是67支队入越以来最大的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5月6日后，侵越美军常有侦察机飞临安沛外围进行电子侦察，或突然进入防区低空侦察。5月30日，连续数天阴雨刚放晴，保河、寨湖就遭美机攻击。与此同时，美机对安沛防区进行最后一次侦察。

5月31日，白云停在半空，喷火的太阳悬在头顶，烤得大地到处蒸腾、烫人。坚守在阵地上的高炮部队指战员像置身于偌大的蒸笼中，吸进鼻孔的空气都是火辣辣的。

下午3时13分，侦察分队报告安沛西南方向110公里处，发现一批6架美机向安沛一侧飞来。

王恩谦觉得自己预感中的这天到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和支队指挥部的其他几位领导扼要交换想法，立即发出命令：“各级指挥所进入一等！”

5分钟内，各团和支队直属分队全部进入一等战备状态。

就在部队紧急行动之时，前方观察哨报告，“RB—66、F—4C 六架，向安沛临近！”

王恩谦判断是敌指挥、警戒机。命令部队继续监视，注意后续目标。

3时24分，西南方向相继捕捉到另一批4架F—105美国轰炸机的行踪。

王恩谦急切地感到一场战斗即要打响，美机很快就要进入我部防区。他立即指示部队：“注意敌机俯冲！”并果断命令：“各团（营）瞄准第一架，集火射击！”

不到两分钟，敌机临近了高炮阵地，一阵猛烈的炮击，头一架敌机就翻滚着一头栽在阵地前的山脚下，轰隆一声爆炸了。后继几批敌机疯狂地向我阵地扑过来，数不清的炸弹在阵地上炸响，顿时安沛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

轰隆一声，一颗翼尾炸弹在五连阵地上爆炸，班长黄永龙腹部中弹，鲜红的血汩汩地流淌。这时黄永龙看到排长也倒下了，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冲到排长身边，拿起指挥旗，指挥全排继续战斗。一位副班长见他脸色苍白，伤势很重，扶他下去包扎，他说：“别管我，只要我们勇敢，就没有敌人的威风。狠狠打！”他从第一批敌机投弹负伤，一直坚持到第18批敌机投弹，他的气管被罪恶的弹片炸破，壮烈牺牲在炮位上。

黄永龙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战斗了80多分钟。

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和机枪的扫射，像雨点般地落在619团4连高炮阵地上。山坡上的树枝在浓烈的火焰中燃烧，炮位四周的草丛，树木燃起熊熊的火焰，烤得整个阵地通红。四连二班副班长陈永林胸外受轻伤，整个胸腔受到强烈冲击波的暴震。他感到胸中憋闷，伴随着疼痛。作为一名炮兵战士，他知道，定是肺泡、血管破裂。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战斗。正当他又冲向炮位之际，敌人的第二次攻击又接踵而来，他腹部中弹，他仍支撑着身子。这时火炮出了故障，他咬着牙排除了故障。他见到一炮位没弹了，又到20米外往返搬炮弹。后在救护中，人们才发现他胸部有五处被子母弹击穿。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他在安沛土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四连连长桑家贵头部负伤，腿被炸断，光荣牺牲。指导员彭祖循弹片贯穿腰部，有助关节炸伤。

四连二班炮位内外中弹两枚，全班7人只剩负伤的3人。最后只剩右手负伤的三炮手李昭才。他一人仍坚持战斗。他沉着地把速度、航路定好，压上弹，手打高低机，左脚蹬地转方向，右脚踏发火机，向敌机射去一连串的炮弹。

真是炸不烂，摧不垮的钢铁战士！

时至下午 4 时 7 分，已经击退敌机 9 批 22 架的轮番进攻。

战斗打到 4 时 32 分，美机还在疯狂攻击。许多连队阵地上弹药紧张，炮管、枪管超过发射极限。40℃的烈日高温下连续作战，许多人中暑倒下，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各营、连炊事班、司机班全都跑步奔向阵地，擦拭、搬运炮弹，有的冲上炮位，顶替伤亡的战士操炮射击。

附近的越南人民也纷纷前来搬运炮弹。

枪管打红了！

炮管打红了！

619 团二营高机连连续更换了 49 支枪管，607 团五连几门高炮更换了 2 次炮管。红亮的炮管烫得人们手掌滋滋的冒青烟，“换！”硬是一根根卸下来。他们顾不上喘口气，扛起新炮管又刷刷地装上去。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胜利！

弹药越来越紧张。619 团在击溃敌人第 15 批的轰击后不得不规定：每炮一次只准打三发！打到第 18 批敌机时，又提出：一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

战斗越来越激烈，中国炮兵越战越勇，美机损失越来越大。

4 时 47 分后，狡猾的美机又利用阳光、云块连续三批猛烈地偷袭我阵地，妄图攻我措手不及。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高炮部队早已料到这一手。部队又是连续地回击。虽然回击的炮弹不像对付前十几批那样猛烈稠密，然而命中率却很高，一架架美机栽在阵地前。

英勇的中国高炮部队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安沛，保卫了越南神圣的国土。战后，高炮 67 支队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安沛人民对中国军队无不敬佩，每当遇到中国军人，总要热情地伸出大拇指，无比激动他说：“感恩懂基中国（感谢中国同志）！”“感恩懂基中国！”

英机轰炸太原损失惨重

美机对修路部队的轰炸逐步升级。1965 年底，美机重点袭击连接我国的两条铁路和公路的桥梁。修路部队开进后，敌机重点袭击永绥渡口、桥梁和郎馆桥，企图切断江河至宣光的交通要道，阻止我大部队开进和大量援越物资的运送。

1966 年 3 月，美国和谈阴谋破产，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加强了对几条路线上的施工部队的侦察和攻击。一次，美机对 3 号路正在抢修的 302 团一个连队突然袭击造成 30 余人伤亡。对 12 号路上的 315 团的一个连队空袭，伤亡 40 余人。3 号路、6 号路、12 号路奠边府至西庄段，也成为美机轰炸的重点。

针对这种情况，崔萍组织部队认真贯彻“疏散、隐蔽、伪装”的防护原则。在便于生活，便于施工的前提下，驻地、车辆、器材适当分散。插上树枝、披上草网。做到驻地上面不露房盖，路上行人不见墙壁，做饭“不冒烟”，点灯“不见亮”，晒物“不见物”。在驻地、工地、依据地形地貌，构筑防空工事。有的工事防护强度很大，即使敌人火箭命中，工事内的人员、器材也不会受损。

配属修路部队防空作战的大都是独立高炮营。高炮主力部队重点部署在西、北两条铁路线上。

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说：“点多线长，兵力有限，这是护交作战的特点，援越作战与抗美援朝都一样。对于高射炮兵来说，反轰炸也好，反侦察也好，通常总是存在着任务与兵力之间的矛盾。护交作战，一种办法是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兵力；另一种办法是固守重点，不及其余，这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的主张是：集中主要兵力重点掩护和部分兵力机动作战相结合。”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首批入越的 61 支队在西线，以安沛为重点。63 支队在北线，以克夫、宋化、同摸为重点。

重点掩护的目标通常是全线的枢纽和要害，也就是敌人攻击、破坏的重点。但在北线，美国曾抛开两头炸中间，不炸大桥炸小桥，原来不是重点的宋化桥就成为重点。63 支队作了新的兵力部署，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克夫至太原的新建铁路竣工后，美机轰炸重点又移到刘金、太原等地。1967 年 3 月 10 日、11 日，美机对太原钢铁基地的轰炸，是它轰炸规模的又一升级。

太原是越南太北省省会，坐落在求江右岸，位于河内正北方，距河内 70 余公里。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抗法战争时期，被夷为平地，一派荒凉。60 年代初，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下，这里开始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64 年，第一号高炉系统正式投入生产，越南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生产出了钢铁。太原附近有丰富的铁、煤和石灰石等矿产资源。河内至太原，克夫至太原的铁路迂回贯通，3 号公路又从太原经过直达河内，为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高炮 62 支队率 4 个团又 5 个独立营于 1966 年底入越，担负保卫越南这座最大的重工业城市的防空作战任务。

1967 年 1 月 15 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62 支队大显身手，于 1 月 29 日，2 月 3 日、4 日的初战中击落敌机 5 架，击伤 3 架。

10 日下午轰炸太原钢铁基地失利，想不到地面火网如此猛烈稠密。很明

显，这是中国高炮部队所为。但美方始终没敢公开宣称中国军队入越。西贡政权不断叫嚷中国军队入越，无非是希望美国再增兵，再添装备，以此抗衡北方共产党的联合力量。美国有美国的用意；我不宣布中国参战，但美空中力量专找中国军队轰炸，炸穿蓝工作服的中国铁道部队，炸构筑沿海工事和红河三角洲防御工事的中国工程部队，炸北部湾和在越南近海航运援越物资的中国船只，炸护航的中国海军部队，炸修筑连接越北和中国公路的中国工程部队，炸掩护交通的中国高炮部队。美国也担心世界舆论和外交上的麻烦。这类麻烦，有时像陷井，落入就不能自拔。聪明的中国人，也考虑到这点，所有出国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空军、海军，统称“中国后勤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编制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本书中提到的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当时就称为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这也是一种计谋和策略，像美国人对中国出兵越南从不吭气一样。

威斯特摩兰对于 10 日的中国高炮部队的火力感到惊讶，他想不到损失这么惨重。他不想就此罢休。于是打电话召集一班参谋人员，重新拟定一个作战方案。

10 日晚，62 支队支队长袁守范、政委张克里和几位其他支队领导蹲在指挥所隐蔽部里，在暗淡灯光下，研究对付美机的策略。他们分析判断：美机破坏太原钢铁厂的企图未成，定要再度大规模袭击。

袁守范即令在刘舍车站的高炮 605 团二营，调到敌机主要俯冲航线上的钢厂东南地区；在二和机场的 620 团一营，调到发电厂以西地区。加强这两处的火力。

部队连夜动员，着眼于打大仗、打恶仗，迎击敌机再度轰炸。

11 日下午，天气晴朗，一层薄薄的云彩铺散在蓝天上，太原这座重工业城市虽然承受了敌机昨日的轰炸，但工人们照样上班作业。钢铁厂的工人正在清理炸弹炸毁的几个房屋的瓦砾。两座高炉依然冒着青烟。炼钢工人们以火热的激情加倍努力生产着。

中国高炮部队严阵以待，一排排炮口直指蓝天。集中的高炮群已组成了严密的火网，尤其是钢铁厂上空，美机一旦闯入，定叫它有来无回。

下午 3 点 40 分，前哨雷达观察站报告，美机多批向我防区临近。刚过 2 分钟，就有一批 4 架敌机到太原高炮部队火网边缘环飞。支队长袁守范判断这是敌人的佯攻机群，要求部队跟踪监视。这 4 架飞机环飞一圈后，分为两组，爬高后草草俯冲攻击了附近的苏军导弹阵地后逃窜。

所有的雷达天线在转动，荧光屏上闪着绿色的敌机亮点。一个个准确的数字，连续报向支队指挥部。

突然，荧光屏上亮点消失，就像电视中不见图象一样，只有沙沙和噪音。几乎在同一时刻，全支队雷达失灵，远方情报戛然中断。

雷达失灵，等于失去了高炮部队的眼睛。袁守范立即断明狡猾的敌人施放了大量的反雷达干扰。在这关键时刻，他果断命令：启用观察哨跟踪目标。

就在雷达失灵的几分钟内，6 批敌机向 62 支队高炮阵地和钢铁基地轮番俯冲攻击。高炮部队猛烈开火后，敌机向高炮阵地发射了导弹。顿时，太原大地上，炸弹的爆炸声和空中敌机的爆炸声交织成一片，浓烟翻滚，火光四起，全城迷漫在硝烟之中。

敌机一次次地向钢厂俯冲，猛烈密集的火网中，一架架美机拖着乌黑的

浓烟，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

时隔几分钟，又有4批美军轰炸机接踵而至。炸弹象雨点般落在我高炮阵地上。有的连队一个班的掩体里，就落下两颗钢珠弹。一批批战士倒下了，当他们苏醒过来，又爬上炮位操作炮盘，向美机发射出复仇的火焰。有位战士负伤80多处，醒来又冲上炮位，使尽全力，独自发射出两发炮弹后牺牲在炮位上。

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全支队击落敌机10架，击伤2架，生俘飞行员7名。

3月10日、11日，美军出动了33批107架飞机轰炸太原钢铁基地。中国高炮62支队，在两天的战斗中，共击落敌机18架，击伤5架，俘飞行员10名。太原钢铁基地主要设施安然无恙。

自1965年8月1日至1968年3月，前后分5批入越轮战的中国高炮部队，连同配属援越工程支队的高炮部队，共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及部分独立营、高机连和勤务分队，总计15万余人。

1968年3月31日，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5月31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全部回国。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和各工程支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军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第六节 修建铁路机场

杨成武与吕正操商计铁道兵援越

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杨成武副总长找铁道部部长兼军委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谈话。他们分析，国内铁路建设主要是西南、京原线、北京地下铁，以西南为重点。而当前，支援越南应放在首要地位……

1965年4月10日，应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派出的军事代表团和铁道工作组离京，经凭祥换乘越南车辆入境。

国务院、总参谋部要求代表团和工作组：一、摸清越南铁路情况；二、抢修抢建铁路需多少兵力；三、我高炮部队怎样掩护重要桥梁目标及所需兵力。

当时，越南北方的铁路是以河内为中心的5条辐射状干线，即河内通往友谊关的北线，通往老街的西线，通往太原的中线，通往海防的东线和通往荣市的南线。各条都是轨距一米的米轨铁路，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小铁路。这几条米轨线，路基、桥梁涵洞标准低，质量差，主要桥梁又多是铁路公路两用桥，桥面低，受洪水威胁大，又由于大桥、大站集中，目标暴露，容易遭到轰炸，加之缺乏迂回线，铁路联不成网，所以很难保障战时运输的需要。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美机不断轰炸各铁路干线，企图阻断中国大量援越物资的南运，由于美机轰炸的升级，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基本处于瘫痪状。

1964年4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帮助越南修建铁路和提供运输设备器材的议定书，以后几年又陆续达成一些补充协议。

根据这些议定书补充协议，中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路项目有100个，其中主要项目：

一、改建北线和中线，将原有米轨铁路改建为米轨、准轨两用的混合轨铁路。这就是后来越南人称的“三条腿”铁路。增建、扩建数十个站、段和隧道等保障设施。改善和加强原有线路、桥梁涵洞及配套设施，对原来标准过低或改善受限制的路段，除适当改善外，重新开辟迂回线。

二、新建克夫至太原（克太线）的准轨铁路（部分混合轨），形成沟通北、中两线的大迂回。为克夫、安员等4个枢纽站各新建一条联络线，形成局部小迂回，使各条铁路联络成网。

三、修建铁路战备工程，包括为重点大、中桥梁和车站、隧道抢建便线、便桥、渡口及迂回线，为重点站、线、桥梁架设通信迂回线敷设水底通信电缆等。

四、为11座大小铁路桥梁进行防洪加固。

根据这些初步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同铁道部先行派团组入越勘察，同年7月和1972年7月，又2次派出铁路专家组到越南协助组织铁路保障工作。

从中国主要铁路建设工地上紧急抽调下来的战斗力极强的铁道兵部队，迅速组成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下辖6个团，于1965年6月23日，兵分两路，从友谊关。河口进入越南，兵力重点部署在北线、中线，执行对河内以北地区铁路的抢建、抢修任务。1968年8月，中国援越南部队筑路工程指挥部所属六支队的两个团编入一支队，届时，一支队将士达32700余人。

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被炸断

高炮 609 团团长沙程玉山率领二营于 9 月 20 日上午 1 时半在宋化首次迎击美机旗开得胜之时，一颗炸弹在宋化桥一号桥墩附近爆炸，桥墩被毁，其余墩台受损，另一颗落在桥北端 60 米处铁路张线侧，致使宋化桥面及两端铁路线破坏 130 米。

河友线顷刻中断。

正在附近改建路线的一支队 6 团闻讯赶来侦察，拟定抢修方案，报告支队指挥部。指挥部主任龙桂林立即批准了抢修方案并匆匆赶到宋化桥头。

这是一支队出国首次反轰炸抢救桥梁。河友线是条大动脉，能否畅通，关系重大。龙桂林要求 6 团 24 小时内拿下来，让列车顺利通过。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部队有的扛枕木，有的平路基，有的清墩台，有的顶桥梁，迅速展开作业。绞车、起道机、起重机隆隆作响，一派紧张、热烈的气氛。

程玉山所在的高炮部队严密注视着蔚蓝色的天空。

一支队 6 团的指战员昼夜奋战了 20 多个小时，提前修复了宋化桥。

一支队抢修了宋化桥后，在河友线又接连抢修了北江大桥、安员大桥、市求第一便桥、圪罗大桥，还抢修了西线外合桥，中线的多福大桥。在 1967 年 1 至 8 月间，美机大规模轰炸同模车站、克夫车站、安员车站，一支队指战员奋力抢修，克夫车站先后遭美机轰炸 48 次，41 次遭受严重破坏，指战员随时抢修，保障了正常运行。

1967 年 8 月 11 日下午 4 时，美机出动了 45 架，多批、多方向地攻击了越南首都河内的龙边大桥。

龙边大桥正桥长 1681 米，高约 20 米，共 19 孔，中间铁路，两侧公路，它横跨红河，南连河内市，是通往河内的交通咽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这次轰炸，龙边大桥遭受严重破坏。一支队立即命令 10 团开通修建不久的轮渡码头，保障铁路运输，同时积极准备抢修正桥。

时值洪水季节，红河急浪滔滔，浪头拍击河岸，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

大桥地处河内门户，事关重大，抢修方案需中越双方会谈商定。深水特大桥的抢修，对于入越一支队也是头一次。制定一个完善、正确的方案需要经过反复的认识过程。在轮渡保障运输的情况下，支队指挥部与越方有关单位先后商谈研究 4 次，9 月 7 日最后确定抢修方案，越方抢修第 8—13 孔，中方抢修破坏最严重的第 14、15 孔。

经过 18 昼夜的奋战，于 9 月 30 日提前开通铁路、公路。24 小时内顺利通过 27 列火车，5 小时通过 400 多辆汽车和 6 万余群众。

一支队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在抢修被美机炸断的铁路的同时，一支队将主要兵力、物力集中在抢建新铁路线和改建旧的铁路线上。他们克服了美机轰炸，酷热多雨、洪水泛滥以及不易就地取材等重重困难，于 1970 年 6 月 5 日提前完成了各项工程。

据有关方面统计，一支队共新建铁路正线 117 公里，改造铁路正线 362 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正线 98 公里，新建铁路桥梁 30 座，隧道 14 条，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 20 个，架设通信线路 1023 对公里，敷设水底通信缆近 8 公里。以上工程总共开挖土石方和采砂石 985 万立方米。所有工程经

双方检查验收，质量全部优良。

专家们认为，中国援越部队各项援建工程圆满完成，不但使越南河内以北地区的铁路干线的正线长度由 508 公里增加到 554 公里，而且由于整个线路系统得到改善，主要路段联络成网，因而运输能力成倍提高，仅河友一线的年运输能力即由原来的 146 万吨提高到 280 万吨，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运输需要。

构筑保卫河内的重大工程

平展展的河乐机场像块洁白的绢练，舒铺在翠绿的红河三角洲上。机场旁依几座小山，山势似一堵天然屏障，威武地守卫着机场。美机飞抵良山、柏格山上空时，编成战斗队形，对河内、红河大桥、对周围的重要据点狂轰滥炸。它们没放过河乐机场，将这块洁白的绢练炸得斑斑点点。

越方决定在河乐机场旁的山顶上修筑团观察所，将这工程与其它坑道工程、掘开式工事一并交给七支队。

七支队担负北至福平，南至宁平，西至永福、良山、东至海防以西的京门，上下纵横数千公里纵深的永久性防御工程。整个工程分为4个工区。金榜至宁平为第一工区，河西的侧边至良山为第二工区，安勇、嘉良，志灵至东潮、京门为第三工区，福平至永福为第四工区。312团完成二工区工程后转移到红河以北的四工区。

位于河西省的河乐机场的工程由312团承担。坑道打筑得很好，最后由一批军内专家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没找出什么毛病来，坑道完工后就构筑山顶的观察所。

团长许好修站在半山腰上。他连续跟班施工作业，身体显得稍瘦。这位来自华北平原，抗战时期就投入战场的老军人，此时年龄还不到40。他看着自己的部队嗷嗷叫的情绪，实在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他知道这支年轻的团对有敢打硬仗、敢打恶仗的老八路作风。

七支队位于援越部队最南端，敌机轰炸最凶。

许好修安排小分队白天修盘山小道，大部队集中在夜间突击作业。这次，他从祝山调15连，从良山调8连，和原在机场的1连，全部投入作业。这是全团战斗力突击能力最强的三个连队。

今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山脚下，四部拌合机同时旋转，“通通”的上料声和“哗哗”的搅拌声交相呼应。8连、15连负责运输，将一担担的混凝土挑上山。1连负责捣固作业。山上山下，一派竞赛的情景。

许好修想，修筑观察所最多只能展开三个连的兵力，两个连队要将近200立方米的混凝土肩挑上山，需要整整一个晚上，体力消耗很大。越是紧张的时刻，越要照顾好部队的生活。他要求各连要保证好今晚的伙食供应。

盘山道旁，摆着一盆盆喷香的肉包子，摆着一桶桶清凉解暑的绿豆汤，摆着一桶桶散发着浓郁芬芳的茉莉花茶水……

运输的两个连队像猛虎、像蛟龙，在盘山道上飞奔。

用兵之道也许在此。他们较着劲地赶，谁也不愿落后一步。机械的隆隆声、现场的宣传鼓动声、指战员们的号子声连成一片。辉煌繁忙的山梁外面，我高炮部队黑森森的炮口直指夜空。

从晚上6点直到第二天7点，整整苦战了13个小时。

七支队所属的施工部队、高炮部队和后勤支援部队，经过42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于1968年2月完成了红河三角洲的工程。当部队要回撤时，中越两国军队总参谋长又签署协议留下221团，奔赴内排机场修筑飞机洞库。

越南北方原有机场不能起降喷气式飞机，抗美援朝期间，越南空军曾到中国云南省的机场训练和隐蔽。为了提高越南空军的作战机动能力，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先后帮助修建内排、安沛两个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

内排机场位于河内西北约 20 公里处，是越南北方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河内的国际机场。这机场，由中国空军和民航局 1961 年至 1965 年间，派出专家组设计、指导并提供成套设备和材料建成的。但当时没修飞机洞库。

七支队接受任务后，朱惠泽副支队长率机关部分技术骨干和 221 团赶赴现场，组织设计和施工。1968 年 9 月 16 日开工，到 1969 年 11 月 5 日竣工。越方验收认为，工程完全符合战术、技术要求和设计标准。

秘密的海上运输线

自 1962 年后，越南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很快，美军和南越傀儡政权妄图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四处扫荡搜捕，围剿封锁，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给养供应十分困难。中国援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只好通过海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游击营地。大米用三层特制塑料包装充气，在大海上漂浮不沉，随着海潮漂向海岸，早已得到通报的游击武装力量就赶到海滨，将一批批大米运回根据地。大批的武器装备通过分散的渔船运到南方各海湾，转运到根据地。

中国在海南岛还提供两个港口作为从北越运送物资到南越的中转站。

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美国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就派船在海岸巡逻，有时派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通过 17 度线附近的边海河顺漂南方的米袋，许多被美国直升飞机上的机枪扫射，雪白的大米哗哗地倾入河中，米袋沉没。

这时，中国使用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港的秘密运输线。经南中国海驶向西哈努克港的援越物资的航轮上，高高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美军虽想扰乱阻止，但它毕竟不敢在中国海域大动干戈。中国援助越南南方的装备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当时的朗诺集团扣留。中国明知这点，为了援越之急需，只好默允。物资运到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再转运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的各个根据地和游击区。

侵越美军剧增，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越南南方的游击队扩充为正规军，部队扩充急需许多重型装备，加之整团整营的运动战得以发展，消耗很大。这一切，单靠西哈努克港的转运，已无法解决。

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英勇的越南军民在海上偷运、在西哈努克港转运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通过老挝狭长的地区的重

山峻岭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和柬埔寨鹦鹉嘴的羊肠小道——胡志明小道。在这条小道上，开始只能人背肩扛，逐步扩大到能推自行车、牛车、板车和大象运输。1965 年，10 多万中国援越部队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大批中国援助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大卡车，奔驰在胡志明小道上。

西贡伪政权和侵越美军头目威斯特摩兰对胡志明小道这条漫长幽深的补给走廊——后来也成为大部队运动的重要路线——焦虑不安。威斯特摩兰曾召集他的助手们多次研究对策。1964 年春组建的研究和观察大队，对胡志明小道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这支队伍，后来发展为拥有美军 2500 人，南越雇佣兵 7000 人。其中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自特种部队，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他们集中后参加空降训练，再参加特种专业训练，执行研究和观察大队特殊的作战任务。

机智勇敢的越南军民常常在胡志明小道上伏击美伪军研究和观察大队的巡逻队。虽然巡逻队出没无常，但终未构成严重的威胁，大批物资和人员南进时，这些巡逻队招呼直升飞机和战斗机来攻击，也往往遭到中越部队和掩护运输人员的还击。

美军在对付胡志明小道上确实花了一番心机。他们研究出了一种“星光镜”，通过放大从星星发射出来的光，使值勤巡逻人员能在夜间看清东西，发现目标。还有一种“嗅人器”——主要利用人尿的气味追踪人们的活动。

“标号 36 破坏器”是从飞机上向北越和老挝的胡志明小道投放地雷。它一落地，只要触动它或有什么东西靠近它活动就能引起爆炸。一些受音响和震动影响的地面传感器，也被安置在胡志明小道上，监听这里活动情况。改装过的 C—130 运输机，装备有照明器材、小口径速射枪、电子器材，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接收地面的传感器所发出的信号。

美国空军在泰国那空伯依（隔湄公河与老挝相望一个城镇）的基地配备了一个通信和计算站，以便从沿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的飞机上收集数据，以及从地面的电子传感器上接收信号。

为了把胡志明小道变成烂泥，阻止北越南运物资，美空军飞机还曾在老挝狭长地带上空制造云层，实施人工降雨。

1966 年夏，黎笋率代表团访华，主要成员有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

会谈自下午 3 点开始至 8 点，晚饭后又谈到深夜，重点是谈越南南方情况，谈斗争策略，谈斗争的困难和需中国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时间谈胡志明小道情况，阮文灵、武志公都谈到了胡志明小道上的困难，美军使用化学、电子武器，使用定时炸弹、钢珠子母弹等，不要说白天，就是夜间，车辆行驶的震动也常常引爆敌人撒下的地雷。

越南同志要坚决把反美帝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气概，和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决心，在周恩来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的印象在日后的几次接待中方援越人员时多次提及。他说：越南南方局的领导很清醒，很有希望！

周恩来在会谈中向越南同志重申了毛泽东的话：“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看作我国援外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事情。”他对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具体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材和体力，提出：弹药包装每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 25 公斤，大米包装各袋 50 公斤。

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携带的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提供的。毛泽东在夏日中，还想起蚊虫叮咬，特地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做的压缩干粮要份量轻，营养好……”

当时，中国为了满足越南救国战争急需，还专门研究生产了专打直升飞机的 20 毫米的高射炮、为汽车通过弹坑而铺设的轻便桥、排除磁性炸弹装置、燃烧钢珠手榴弹等。

在援越抗美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仅在 1970 年至 1972 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 300 多辆，为前 20 年援越坦克的 5 倍。坦克、大口径火炮，中国一时生产不出来，就从人民解放军部队装备中抽调。还向越南提供了 3000 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 万件避弹衣，这些都是在我国国内紧急动员下，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

这一批批援越物资，大都通过胡志明小道，通过穆嘉山口，运到了越南南方。

中国海军扫雷艇出动

美军妄图卡断中国援助越南的秘密海上运输线，一方面加强海上巡逻，派飞机轰炸我国运输船，另一方面实现全面海上封锁。

这个罪恶的行径主要通过水上布雷来实现。

1972年5月7日，美军以越南在南方发动春季攻势为借口，突然恢复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并在沿海重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设水雷，实现全面海上封锁，妄图切断越南所需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的主要进口渠道，逼迫越南在巴黎的谈判桌上让步。

熄灭才3年多的战火又在越南北方重新燃起。

越南政府向中国政府请求支援。

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新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除抽调汽车团在两国边境地区担负援越运输任务外，还担负协助越军扫除沿海的美军水雷和铺设野战输油管的任务。

随着阵阵汽笛长鸣，中国由12艘扫雷艇、4艘保障艇组成的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划破碧蓝的海域，向越南沿海前进。

人们没有忘却，周总理对海军扫雷队出动极为关怀、多次指示，要做好准备工作，要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好。中国19个省、市和军队的130多家工厂通力协作，很快把急需的新式小型扫雷艇具赶制出来，并送到扫雷工作队手中。

在这期间，中国海军扫雷队冒着美机的轰炸和水雷随时爆炸的危险，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破雷调查，摸清海区及美军布雷的基本情况。

8月4日，正式开始扫雷。

白天，天上有美机空袭。

那我军就白天准备，夜间扫雷。

在战术上采取我军崭新的招术。根据海区美军布雷范围广，我军集中兵力，首先扫通主航道咽喉区段，再逐段扩大范围，打通全线。遇到航道狭窄的地段，编队扫雷困难，就展开单点同时作业。遇到美军混合布雷阵，就将几种扫雷艇配合使用，梯次扫除。

第05号艇的官兵勇挑重担，共扫爆各种水雷15枚，被誉为“开路先锋”，荣立集体一等功。

中国缺乏先进的探雷器具。

有时不得不采取人工探雷手段。

有一次，潜水组在浅水区海底发现一枚水雷，在用拴住水雷的尼龙绳往橡皮艇连结准备起捞时，意外地听到“嗡嗡”的响声。潜水员周春启又一次潜下去，辨明是水雷引信动作时发出的信号，立即急速出水，刚刚上船，水雷就爆炸了。

有了这次经验教训，第二次摸到水雷时，就先作安全处理再打捞，结果获得成功。

水雷军士长朱重滨在扫雷行动中身负重伤，6处骨折，未喊一声疼，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嘱咐战友快些给艇加满油，继续参加战斗。

越南海军对有关海区的航道检查后认为，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任务完成得很好，达到了清扫的目的。

1973年8月27日，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胜利回国。

在越南的这一年零三个月中,他们共出海 586 艇次,航程 2.78 万余海里,其中扫雷 526 艇次,航程近 1.75 万海里,扫除各种水雷 46 枚。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道,清扫面积达 201 平方公里,并多次引导中越运输船只安全进出上述各港,为越南人民打破美军海上封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此同时,越南政府紧急请求中国帮助铺设输油管,经广西边境向越南输油。

中国刚刚实现石油自给,还未生产和铺设过野战输油管道,但为了支援越南兄弟,中国政府满口答应了。

根据越方提供的部分样品,中国迅速生产出铺管所需的全套设备和专用车辆,并以最快的速度向广西边境调拨了充足的援越油料。

1972 年 5 月 31 日至 1973 年 2 月 1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部队、民兵 8000 多人次,并配备大批机构、车辆,在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两地段,铺设了 5 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 159 公里,连同新建扩建的油库、泵站、通信设施和铁路专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 10 多万立方米。

防城输油管,全长 99 公里,途中要翻越 200 多座山头,横渡 20 多条河流,跨越 43 处峡谷,通过 81 座桥涵,是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条输油管。指战员们领受任务后,顶烈日,战酷暑,栉风沐雨,昼夜奋战,仅 43 天就全部建成。

何等的神速!

从 1972 年 6 月 15 日至 1976 年 6 月 30 日,中国通过输油管向越南输送的汽油、柴油总计近 130 万吨,占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石油总量的一半多。

鲜血和生命凝聚的史册

1975 年，越南人民在全世界各国朋友和人民的支援下，在南方发动了规模巨大而又凌厉的春季攻势，打垮了美国一手扶植的阮文绍——阮高其傀儡政权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南方，统一了祖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热烈祝贺越南政府和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

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

当越南军民欢庆胜利的喜悦时刻，中国援越军队已经班师回国，不声不响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壮烈牺牲在越南国土上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却安眠在异国他邦。

越南军民是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欢送中国军队凯旋的。中国 32 万军队援助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越南人民中广为流传，并深深地扎根在心底。这一宏伟的战斗业绩和谱写的友谊凯歌，将永远载入中越两国关系的史册。

它与山河共存。

它与日月争辉。

第十四章 抵制美国利爪，老挝求援友好邻邦。

周恩来、富马发表联合声明，

毛泽东二度签署出兵命令。

第一节 中国首次派兵援老

英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美国。白宫。

肯尼迪总统一个夜晚未进入往日的那般甜蜜梦乡，他昼夜难以入眠的头痛事，仍是印度支那的局势令人不安。这块越南、老挝、柬埔寨几乎连成一体 的丛林、水网地带，到处活跃着共产党派遣的游击队，袭击政府办公住所，杀死政府官员，连美国派遣的军事人员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威胁，有的在协助政府军反击时失踪。

肯尼迪这时风华正茂，他是美国历届总统中较为年轻者，盛气逼人。在国际事务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是恨之入骨，巴不得将其一拳打死。

此时，他稍许整理一下灰色的西装，梳理一下乌黑的头发，踩着那双黑亮的皮鞋走向办公室。

办公室宽敞、明亮。平时置身于此，他会觉得一种轻快，此时此刻，肯尼迪的心境倒把明亮当作刺眼，把宽敞当作自己无法回避的攻击目标，他觉得世界各地，都有一股仿佛不可阻挡的共产主义洪流向他身边涌来，好像要把他湮没似的。

他的心感到一阵阵的紧缩。

早在 1951 年，他就曾出访印度支那。1954 年，法国为了保持统治所进行的战役惨遭失败，奠边府这一仗奠定了日后印度支那与法国人的命运。在这全过程中，肯尼迪一直严密关注着这一地区。

这个正在青云直上的政治家——肯尼迪。此时得出的首要结论是：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殖民政府要想对抗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民族运动，总归要失败。因此，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犹豫之后于 1954 年决定不采取直接干预行动去援救奠边府的法国人时，肯尼迪是为之拍手叫好的。

1961 年 1 月，肯尼迪接任总统，他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局势，被摆到国际事务中相当重要的位置。

美国很快便向虚弱的吴庭艳政府提供了援助。

美国的罪恶爪牙锋利地插入了老挝、柬埔寨。

事物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美国的援助与插手，并没有改变印度支那的局势，它并没有按美国人的意愿转动起来。相反，人们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共产主义的火焰在丛林、水网地带到处熊熊燃烧。

美国人深感问题的严重。

肯尼迪，和他被刺后继任的约翰逊，都曾不知多少次地聚集海陆空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分析研究对策。他们都深深地感到，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的武装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先是苏联、东欧，后又中国、北朝鲜，现在又是越南，继而推向老挝、柬埔寨，不知哪一天又会推到马来西亚、泰国，那里仿佛已经听到赤色的呼喊。这种在美国叫嚷得比较时尚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在三军联席会议上，也不知不觉地共同感觉到了，肯尼迪把这看

得比常人更深刻、更透彻，他滔滔地对三军参谋长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派美国得力的军队去援助他们，不要多久，他们就会被共产党的力量所吞没，整个印度支那就会落在共产党的手里，很快，东亚、东南亚，甚至更多的地方就会一块又一块地落入敌手，那要我们这帮人干什么……

肯尼迪挥出了凶恶的指挥棒！

一批批美军所谓的顾问，向越南南方推进……

一批批武装的间谍人员向老挝、柬埔寨及其邻国派遣。

越南南方到处是人民被枪杀的惨景。人民反抗的力量从新组织和发展起来。

从西贡和泰国向老挝渗透的美军军事人员和间谍人员，在老挝境内开枪开炮，烧杀抢掠。

陈毅向美国人发出警告

老挝，位于东南亚南半岛的东北部，同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相邻。

老挝是一个长期遭受外强侵略的国家。

老挝人民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54年7月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国承认了老挝王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1960年，老挝成了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王国联合政府。

但是，天上又飘来几朵乌云，一阵紧似一阵的风把这几团乌云凝成一块，似乎覆盖了老挝美丽而富饶的国土上空。

正在老挝刚刚独立不久之时，美国却积极扶植老挝的极右势力发动内战，直接训练和指挥老挝的“特种部队”，进行“以游击战对游击战”、“用当地人打当地人”的特种战争，镇压老挝爱国力量，扼杀老挝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从1964年2月起，美国还直接出动飞机，对老挝解放区和“老挝走廊”——即胡志明小道，进行轰炸。1968年11月以后，入侵老挝的美国飞机大量增加。1971年2月8日，在美国策划下，南越军队悍然侵入老挝，为了配合这次入侵，美军出动作战飞机4万余架次。这时，美国在老挝推行的“特种战争”达到了最高阶段。

面对美国的侵略，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党和爱国战线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抗美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但困难还是很多。

武器装备差，军用物资缺乏，军事训练欠缺，交通运输很不便利……

为了长期坚持抗美救国斗争，为夺取最后胜利，建设美好的家园，老挝人民党和爱国军民，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并帮助修建公路。

中国政府有求必应！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作出决定：积极支持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

1961年4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答记者问。

记者提了一个又一个当今世界敏感的问题。

陈毅副总理以他刚毅的面容面向世界宣称中国政府对于国际风云的一个又一个看法。

当有位记者提出如果美国派兵老挝，中国政府有何见解？

陈毅以严正的口吻警告美国：

“如果美国继续派兵侵略老挝”，“我们将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政府声明：老挝是中国的近邻，美国对老挝的侵略，也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中国绝不会坐视日内瓦协议被撕毁，让战火烧到自己身边。

周恩来总理在审批外交部关于援老工作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提出了“在逐步促进老方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援助”的方针。

1964年7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又指示，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老挝的军事物资援助，把老挝爱国部队的后勤供应包下来，老挝人民需要多少，中国就帮助多少。

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承担了向老挝提供军事援助的任务，先后向老挝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后勤军需物资，帮助老挝爱国军队培训军事、技术人员。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大量工程部队，

无偿地为老挝修筑公路。还派出大批防空、警卫、后勤保障部队进入老挝，在筑路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担负援老筑路中的防空作战、地面警卫和后勤保障等任务。

第二节 中国二次派兵援老

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

1968 年的一个春日。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刚刚醒过来，丰泽园内“喳喳”的雀叫，令他心旷神怡，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整，他头脑清晰，从南海飘过来的缕缕春风，仿佛是双温柔的手抚摸着他的周身。

他伸了伸手，微微挺了挺胸，仿佛搅有甜味的春的气息，充蕴着心胸。

这几天，国事、外事都较忙。但在这繁忙中如不抽点余暇光顾一下南海、瀛台的春光，未免可惜了。

他抬脚向丰泽园外走去。

还没走出园子又停脚欣赏那两簇茂密的海棠。此时虽已不是繁花似锦的季节，但碧绿的枝叶预示着今秋又是一个红灿灿的果实累累的好光景。

正在这个时候，秘书送进一个批件，内容是关于派遣部队援老抗美事。

毛泽东的思绪不尽飞扬起来。

记得 1961 年 4 月 25 日，周恩来和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应老挝政府的请求，同意帮助老挝王国政府修建一条公路，即丰沙里至帕卡公路。6 月，云南省派出技术考察团实地踏勘、设计。9 月，总参谋部按周恩来关于援建丰帕公路“要动用工兵部队”、“包下来、修得快、修得好”的要求，决定由昆明军区和铁道兵各组织一个工程大队，成立了军工指挥部，在云南省援老筑路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与民工大队共同完成筑路任务。1962 年 1 月，两国政府代表在老挝临时首都康开，签订了关于中国帮助修筑丰帕公路的协定。2 月 10 日，由 4315 名中国军人和 60 辆运输汽车、610 匹骡马和部队工程机械组成的队伍向老挝境内开进。

老挝北部地区，群山连绵，森林密布，河溪纵横，气候炎热，蚊虫滋生，疾病流行。这一切给中国军队带来十分艰巨的困难。

军人对于时间，比谁都看得重要。

他们一边准备，一边测量设计，一边施工。为了缩短补给线，筑路指挥部决定由两个军工大队和民工大队逐段包干，同时进行路基、路面和桥涵的综合施工。施工初期，机械开不进工地，只能进行手工作业。部队虚心向民工大队学习，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制手推车、滑土车和打夯机，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经过精心施工，所修公路达到路基坚实、路面平整、边坡整齐、桥涵稳固、外型美观的设计要求。

在中老双方组织验收中，老方称赞中国修筑的公路“质量良好”，被命名为“老中友谊路”。

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军队援助老挝。

毛泽东知道此事。但他没精力过问这么细，他也不必过问这么多具体的事务，他是宏观把握，从战略上考虑。

现在是第二次要派中国军队援老了。

这实际上是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佬较劲。几十年来与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较量，毛泽东心中有数，他把握局势，运筹帷幄，让手下的兵马决战于千里之外。

援助老挝修筑公路，并非一般民用，而是具有战略意义，尤其是美国把

魔爪伸向这个中国的邻国，其用心路人皆知。

援助老挝修筑公路，美军必定要加倍地破坏，它定要派遣更多的轰炸机来袭击中国军队，袭击不断向南纵深延伸的交通网络。在这当中，与美国佬交手，是正常的。美国人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包围和进攻，中国人也决不放弃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支持他们扛起反帝反美的大旗。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中反复较量着。

要派工兵部队。要派高炮部队。要派警卫部队。要派后勤运输部队……
毛泽东在春风中思索掂量着。

这件事，总参谋部和国家交通部已经协商。中央和国务院也拟同意由总参和交通部共同领导。

毛泽东看着军队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觉得他们分析得在理，任务也很明确。只欠自己的手一挥，数万兵马就可浩浩荡荡开进了。

徐徐的春风夹着中南海的阵阵清香吹进了丰泽园，毛泽东双手扩了扩胸襟，提笔在文件上批示。

1968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爱国阵线
中央委员会、老挝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寮双方关于修建公路问题的会谈纪要》。

8月16日，毛泽东签发命令，由援越筑路的中国第五支队组成工程指挥部，率四个工程大队、云南省第一民工总队以及
防空、警卫和后勤部队共2万人，浩浩荡荡地越过边境，向老挝腹地开进。

军人的家在脚背上

1968年9月。老挝境内。

阴雨连绵，崇山峻岭披上了濛濛的云雾。正值雨季，入老不久的中国军队安家无干处，做饭无干柴，空中时有美机轰炸，地面又有特务袭扰，条件十分艰苦。

逶迤的山路，坎坷不平，在雨水中部队向茫茫的森林施工地段开进。虽官兵都有雨衣，但数天的行军夜宿，背包和草绿色的军装已是雨水、汗水交融，野草莽莽的途中时有蛇蟒盘绕，时而向行人攻击。中国军人有了在越南丛林中修路、作战的经验，这次到老挝就觉得生存环境上差不多，但毕竟是另一个国度，在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态环境上总有较大的差别。

筑路指挥部决定，集中4个大队的力量，首先抢修老西路，打通中老边境的道路，同时以一个大队的力量，进入老东线，作施工准备。

702大队的指战员在风雨中向森林挺进。从大队领导到每个战士，肩上都扛着沉重的施工器材和生活用品。没有像样的道路可走，只有在崎岖的小道上攀登和缓慢的行进。但他们每个指战员都十分明白，这也是在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抢时间，争速度。

先施工，后生活。一到达目的地，马上展开作业，仅留少数人组织安家。

军人家在何方？

军人的饭锅就垒在脚背上。

参天大树耸立在勘测好的道路上，立即砍伐！

荆棘、乱石横卧在预定的道路上，彻底清除！

美军投下的炸弹虎视着中国军队，威胁着过路行人，坚决排除！

陡削的山谷妄图挡住前进的步伐，马上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架设桥梁！

702大队的指战员硬是在3个月的时间内，修通了老西线102公里的汽车便道，为修筑正线创造了条件。

时节已进入旱季。

旱季，是修筑公路部队的黄金时期。

筑路指挥部及时抓住这一黄金季节，调整部署，全面展开正线施工。

各大队在负责的20—30公里地段上，科学分工，密切协作，集中人力和机械，首先突击路基石方。在指挥部统一组织下，各部队积极开展了比速度、比质量的竞赛活动，有效地加快了施工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

702大队一营与技术营配合，实行机械集中定点作业，劈山填谷，仅用1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2公里多的路基土石方，计4万多立方米。

担任备料任务的分队，采取就地取材和开辟场外料场相结合的办法，保证了每公里路段所需的2200立方米石料的及时供应。

在铺砌路面底层时，706大队一连从日进30米很快提高到68米，以后又提高到214米。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艰苦奋斗，老西线于1969年12月25日竣工，公路长100.397公里，有桥梁11座，涵洞315个。老西线建成通车后，筑路指挥部将3个大队的主要力量及时调往新西线。

1971年4月，新西线圆满竣工。次年3月，老东线也宣告竣工。至此，3条公路、共长293.009公里全部完成，从而老挝北部的交通状况大为改

善，有效地支援了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第一批筑路部队完成任务后陆续回国。为保障公路畅通，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72 年 3 月开始，又先后派出 2 个工程兵大队，担任老西线的维护保养任务，时间长达 6 年之久。

一名美军侵略者的自述

“1971年2月过后，我来到了老挝南部位于巴色东北面14公里的蒙西泰——老联合军事基地，担任反游击战略顾问。当时所有的训练工作几乎都是在战地进行的，所以，我经常跟随老挝特种部队与越共支持的‘老挝战线党’军队作战。”

这位自称是顾问的美军侵略者以及同伙，他们被派到越南时，已达几十万，仍叫顾问，其实是实际参与作战。如今他被派遣到老挝，像他这样侵入老挝的美军已渗透到反动军队的营连各部队。实际上美军已经控制了整个老挝的反动部队，像美军控制了南越傀儡军队一样。由美军控制的老挝右翼军队与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军队作战，这些由美军训练出来的所谓老挝特种部队同样没有逃脱失败的下场。

“在雨季到来之前，老挝特种部队为了配合美国空军切断胡志明小道的行动，决定对北部川圹地区进行空投渗透。因为那里有5个营的军队遭到了‘老挝战线党’部队的重重包围。

“到达指示降落地点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的时分，直升飞机发现了地面出现的降落标记，便开始降落。我们打算从这里降落，向北越过查尔平原，进入富科特山区，然后切断越共的供给线胡志明小道。但是，这个计划被泄露了，我们下了直升飞机之后并没见援助部队出现。

“突然，站在我面前的一名队员倒下了，随之四面响起了枪声，子弹飞蝗似地向我们打来。我们匍伏在草丛中，开始向四面面的树林扫射，同时向直升飞机撤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老挝战线’的B—40反坦克炮击中了三架我们的直升飞机，另一架急忙起飞，在飞机刚刚离开地面之际，一名身穿白色衣裤，围着方格头巾的女游击队员冲出芭蕉林，用一枝冲锋枪向直升飞机猛烈扫射。

“对于那个女游击队员突如其来的英勇行为，我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当她端着冲锋枪向我们冲过来时，我们都向她开了火，她重重地摔在地下……

“不久，我们发现这些游击队员除了一架B—40反坦克火箭炮和两、三支冲锋枪外，显然没有更多的武器，因为枪战的时候，从四面射来了很多梭镖。我们边打边退，刚刚进入树林的时候，从对面同时发现数百枝梭镖，我们许多队员被射穿了喉咙或胸膛后倒下了。

“我们后来抓到了4名俘虏都是年轻的老挝妇女，这才知道，刚刚我们是被老挝的一支女游击队所包围。女游击队队长是一位24岁的老挝妇女，她一言不发，当我们中的一位领队上前对她提问。她突然扑过来，企图夺他手中的自动枪，于是双方扭打起来，她咬住了他的耳朵。就在这位女游击队长举起抢过来的自动枪准备扫射时，我们两名队员的枪托砸了过来。”

多么勇敢的老挝女游击队长！

她是老挝英勇军民的化身！

这帮美国强盗和右翼军人把这位英勇的女游击队长拖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疯狂地折磨她，用脚踢她的面部和腹部，用罪恶的匕首挖出了她的奶头和眼睛，最后用梭镖发射器把她活活地射死了！

多么残酷的杀人凶手！惨无人道的敌人就是这样杀害了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老挝人民。

敌人的罪恶总是要清算的。正是这支敌人的突击队，被老挝的女游击队

员们用梭镖射死了 19 名。

这批像野兽一般的敌人在向丛林撤退过程中，对另外 3 名被俘的女游击队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侮辱和折磨，强令她们脱下裙裤为他们跳舞，女游击队员拒绝这种无耻的命令，他们就用枪托砸，用皮鞭抽，打得她们遍体鳞伤。最后，这帮凶恶的敌人一齐冲上去，硬是扒掉了女游击队员的衣裤……

在原始森林中，美军和右翼突击队员用无线电与他们的上司联系，等待救援。所带干粮已尽，这帮敌人就打猎，但猎物无几，森林中的动物早被他们的凶残和血腥所吓跑。

这位美国兵后来是这样回忆的。他的这种自述性的回忆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罪恶与残忍。

“比亚山区的野兽早已被连年的枪炮声吓得躲到更远的森林里去了。此时，极度的饥饿终于使人们失去了人性。我们准备吃掉唯一可以找到的食物：三个俘虏中的一个。

“将俘虏一丝不挂，将她手腕和脚腕上的银镯除掉，拖到几根用以屠宰的粗藤下倒悬起来。她那年轻光洁的胴体微微摇晃着，马上就要被肢解成血淋淋的几个部分，放在篝火上去烘烤成焦红的颜色，然后送入贪婪的嘴咀嚼和啮咬……”

这批敌人终于惨无人性地食用了老挝人民的优秀子女——英勇的女游击队员。

这位美军侵略者几十年后也许带有某些忏悔和懊丧，也许带有某种悔恨与自责，但人们清晰地看到，历史是难以磨灭的，一个民族留给另一个民族的带血的创伤，即使愈合后，也永远磨不平留下的疤痕和隐隐作痛的永久回忆。

何况这个带血的创伤至今还未愈合！

雷锋生前部队的英勇气概

美军在越南南方大举发动春季、旱季进攻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老挝的围剿和渗透。

老挝的右翼军队在美军的帮助、训练下不断向爱国战线解放军发动进攻。

爱国的军民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敌人发起一个又一个战役，打得美军、右翼部队不断退却，有的美军只好退至越南南方或泰国。

老挝爱国战线军民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

在他们困难的时期，中国政府和军队给予他们大力的支持和援助。到1966年底，中国援助老挝的主要装备物资，计有各种枪械2.4万余支（挺）、火炮600余门（具）、子弹3000多万发、炮弹49万多发、手榴弹20余万枚、无线电台和电话机1300多部、汽车60余辆、军服60余万套，金额约为人民币5000多万元。

1967年以后，根据老挝爱国武装力量的要求，中国提供援助的项目和数量不断增加。仅以枪支和子弹为例，1966年以前平均每年援助各种枪3800多支（挺），各种子弹450多万发；1967年至1972年，平均每年援助各种枪支17800多支（挺），枪弹2300多万发。1960年至1977年，中国向老挝无偿提供的武器装备物资援助主要有：各种枪弹1.7亿发，炮弹267万余发，手榴弹92万枚，地雷25.4万个，无线电机2530部，有线电机2654部，汽车773辆，炸药958吨，军服257万套（件），主副食品771吨等，为老挝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物资援助是一方面。军队的支援仍在不断地运作着。

1971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又命令调2个工程兵大队与云南省再次组建的1个民工总队，共同担任老挝北线施工任务。

这次是由老挝人民党请求中国帮助修建北线和孟北线的协议换文和会谈纪要所采取的又一次军事行动。

北线公路的越岭线和沿溪线占80%，工程量很大。担任北线施工的715大队，是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这支部队进入老挝后，筑路指挥部号召全体筑路人员，学习雷锋同志的实干精神和献身精神，搞好援老筑路。

天上有飞机轰炸。

地面雨水淋淋，道路泥泞。

广大指战员在雷声隆隆中作业，在急流险滩中施工。紧张的工作，繁忙的战斗，数月得不到一天的休息，到1971年底便完成了清场、粗通任务。

1972年初，为加快施工进度，各筑路部队普遍采取了路基、路面、桥涵和备料4项工程联合作业的施工方式，一个大队中以营为单位组成4个专业队，形成一条龙，各负其责，互相促进。

各大队经常组织施工会战，不断掀起竞赛高潮。

雷锋生前所在班担负运输任务，从1971年4月至1972年2月，安全行车13余万公里。雨季中，粗通的汽车便道往往难以行车，雷锋班的同志们就踏着稀泥，一天往返40多公里，将物资背到工地。1973年1月，雷锋班荣立集体二等功。

雷锋班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着筑路部队。

孟北公路常常要盘山过河，平均每公里的桥涵纵长达45米，施工任务非

常艰巨。718 大队负责修筑的路段有一公里多长的险要地段，悬崖峭壁高达 20 余米，人称“老虎口”。718 大队三连在 715 大队技术一连的密切配合下，实行三班制连续作业，登悬崖，攀绝壁。悬空打眼放炮。担任打炮眼的七班，在狭窄的导洞里跪着钻孔，爬着出渣，洞内又闷又热，加之放炮后硝烟呛人，有的战士一天昏倒多次，仍不肯离开战斗岗位。经过 17 个昼夜的奋战，三连终于打通了“老虎口”。

在桥涵施工中，714 大队的桥涵专业队采用墩、梁整体浇灌法，替代打筑预制梁吊装法，缩短养护期，提前两个月完成了桥涵工程任务。

雷锋精神在所有的援老部队中大发光彩。

1973 年 12 月，孟北线和北线公路同时竣工。第二批中国援老抗美部队在胜利完成任务后相继回国。

高炮部队英勇作战

现代化的美军，自认为占有空中优势，耀武扬威，在老挝的上空盘旋和轰炸，同时对中国援老部队更当作眼中钉、肉中刺，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袭击和轰炸。

中国每支援老筑路部队都配有防空高炮部队，他们与筑路部队本身的防空作战分队密切配合，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自 1969 年 3 月至 1973 年 11 月，中国先后派出 705 大队和 302、303、304 支队担任防空作战任务。

中国援老抗美的第一支部队出国时，美国和万象当局不断派飞机对中国部队进行监视性侦察，并伺机进行进攻，平均每月达 100 多批、400—500 架次。

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于 1969 年 2 月规定了中国援老部队防空作战的原则：对过往民航班机，一律禁止射击；对一时无法判明国籍与活动意图的飞机，只监视其行动，不得射击；对有敌对行动的运输机、直升机，只有当其向援老部队轰炸、扫射、空投或盘旋侦察时，才能进行射击；对进入筑路工地上空进行轰炸、扫射的作战飞机，则坚决予以打击。

705 大队在筑路部队的积极配合下，克服重重困难，构筑了 7 个临空指挥所和 47 个高炮连阵地，并采用手拉肩顶的办法，把高炮拉上山。他们根据热带山岳丛林地通视不良等特点，采取环视雷达分散配置、观察哨上山等方法，构成远近结合的空情报知系统，百倍警惕地注视着空情动向。

指战员顶烈日，战风雨，坚持坐炮值班，几乎天天处于一级战备状态。8 月 22 日，雨后初晴，4 架 T—28 型飞机飞临孟赛桥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筑路部队。705 大队指挥部立即命令担负守桥任务的分队进入战斗。指挥员迅速判明情况，指挥射击，当场击落一架，击伤一架。

1970 年 1 月，302 支队率 707、710 大队进入老挝，接替 705 大队的防空任务。

这两支部队与先期进入老挝的两个高炮营和筑路指挥部的高射机枪分队统一部署，将中、小高炮和高射机枪混合配置，组成严密的防空火力配系。

1 月 2 日，三架美国飞机对中国筑路部队 710 大队 6 连进行轰炸扫射，发射了上千发机关炮弹和 26 枚火箭弹，还投掷了气浪炸弹。战士倒在血泊之中。

眼看着自己的亲密战友一个个在敌机的攻击中倒下，高炮、高机分队的指战员心如火焚，满腔的仇恨在燃烧。

高射炮射出了仇恨的炮弹！

高射机枪喷出了复仇的火焰！

瞬间，整个天空响彻着轰轰的炮弹爆炸声和嗖嗖的飞射炮弹、枪弹的嘶鸣声。

高射机枪连二排长吴春祥等索性扛着机枪迅速跑到一片开阔地进行射击，吸引飞机。

敌机果真被他们吸引住了。一次又一次向他们俯冲、扫射。

其他高炮分队和高射机枪射手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战机，狠狠地向敌机开枪开炮。

敌机在空中开花！

可吴春祥同志却壮烈地牺牲了。

战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苏发努冯授予吴春祥一级英雄勋章。

302 支队越战越有经验，战果不断扩大。707 大队二营运用集火近战。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三战三捷的战果。

1971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命令 303 支队进入老挝，接替 302 支队的防空任务。5 月 24 日，军委又命令 304 支队入老，分

别担负各个方向的防空作战。在这期间，我军进入老挝的防空

高炮部队有两个支队 6 个大队及 3 个营。

根据筑路部队的工程任务，指战员只能是一线展开作业，同时多点施工，逐段向前延伸。高炮部队也只能据此特点设置多

一点防务，不断向前推进的办法；同时在其他地段的高山上设伏，进行机动作战。

高炮部队以灵活的战术，声东击西，隐真示假，迷惑和打击来犯的敌机。

5 月 5 日，美国 F—4 型飞机 3 架，窜入老挝老东线东端的孟夸地区上空，采取前双机佯动，后单机跟进攻击的战术，发

射导弹 6 枚。303 支队 712 大队二营和另一个高炮营密切配合，击落美机 2 架。

14 日，天空晴朗，能见度良好。美国空军出动 F—4 型飞机 3 批 7 架，再次进犯孟夸地区，在 2 营阵地上投下气浪弹、钢珠弹。刹时，阵地一片硝烟火海。指战员们毫无畏惧，坚守岗位，顽强战斗。五连副连长负了重伤，二排长挺身而出；二排长负伤后，指挥排长又站起来接替指挥。战士欧阳征生一口捂着伤口，一手紧握高低轮瞄准。指战员们打得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一举击落美机 2 架，击伤一架。

针对美国主要以快速战斗机袭击中国援老筑路部队的新情况，昆明军区于 7 月 17 日在云南思茅召开了援老高炮部队作战经验座谈会，分析快、慢速飞机的不同特点，总结交流了作战经验。会后，高炮部队加强临空指挥所的建设，训练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高超技能，以果断的指挥和快速的战斗行动，打击来犯的美国快速战斗机。

此后，各高炮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打得美国飞机不得不逐渐减少对中国军队的攻击。

在 4 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援老抗美高炮部队 21000 余人，对空作战 95 次，击落飞机 35 架，击伤 24 架，有效地保障了中国军队的筑路，有效地保卫了老挝的领空。

第三节 历史留有灿烂的记载

苏发努冯签署授奖决定

1973年7月7日。北京。

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查玉升正在主持召开中国援老筑路工作会议。

陈士榘上将是位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老同志。其他人的话他可以犹豫一下，可毛泽东的话他却一字一句不折不扣的执行。毛泽东签发命令调中国工程兵部队援老抗美，这是毛主席对咱工程兵的信赖，也是毛主席对陈士榘的信赖。任务完成得很好，该坐下来好好总结一番自1968年以来援老筑路的经验了。

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还有一层想法是，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因为老挝人民革命党又有请求，中央、毛主席已同意又派部队帮助老挝修建纳双至孟献的新东线公路。这条公路经过长达5年的战斗，终于完成交付使用，老挝政府将其命名为友谊一号公路，这是后话。

老将军深思熟虑，要好好总结经验，要把中央军委、毛主席交给的这件事办得更好。为中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

几位将军带领他们的将领们的确认认真地吸取了数年的丰富经验，并且具体研究了援新东线的部署和防空作战计划。

新东线勘测设计长度约为300公里、要反复跨越高山峡谷、急流险滩。

担负地面警卫任务的720大队指战员冲在最前面。前方无道路，每个指战员都手持一把锋利的柴刀，组成一支支利剑般的队伍，向密林深处进发，他们走一路砍一路，硬是在森林中开辟出人行通道290多公里。

地形复杂，路基开挖土石方平均每公里数比已经修筑的各条公路几乎多出一倍，可想任务之艰难。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正式施工之前，部队又指派负责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勘测设计人员一道爬山涉水，对线路进行全面复查，使线路的实际长度比原设计缩短13.7公里，减少桥涵100座，从而加快了工程进度，降低了工程造价。

在突出重点工程时，部队实行机群多班作业，做到人休机不休，使推土机平均每台班的作业量成倍增长。726大队在一个月內，完成土石方55万立方米，创造了援老筑路部队的最高纪录。

楠乌河大桥，是中国援老修建的桥梁中最长的一座，桥位处的水面宽160多米，水深2—4米，旱季和汛期水位差达18米。733大队二营指战员在云南省交通局技术组指导下，战胜了水质不良、水文资料缺乏等困难，攻克了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的生产难点，并成功地进行了深水桥墩围堰施工。经过艰苦奋战，他们终于于1978年1月，将这座256米的9孔大桥胜利建成。

1978年3月17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苏发努冯签署了《国家主席关于表彰中国工程队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授予中国筑路工程队指挥部一级自由勋章，725、726、727、732、733、734等大队及7个分队一级劳动勋章，17个单位和2名个人二级劳动勋章，黄小毛烈士等3人一级英雄勋章，另外207位烈士二级英雄勋章。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签发了给中国

筑路工程队 2498 位 立功人员的奖状。

4 月 8 日这一天，老挝孟外县彩旗缤纷，锣鼓喧天。中老两国签字移交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老挝政府交通部部长萨南在移交仪式上动情他说：“中国援建的老中友谊一号公路，是中国筑路干部和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历史标志， 它将永远树立在这块英雄的老挝土地上。”

一曲国际主义赞歌

为了支援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筑路所需物资，除砂、石和一般木材在老挝就地取用外，其它的钢材、水泥等都由中国供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老部队的一切费用部由中国负担。为了把援老物资及时运入老挝，中国不仅在国内组织了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而且长年使用汽车 2600 余辆，临时调用汽车 660 余辆、骡马 900 多匹担负运输任务。援老部队在艰苦的筑路施工和对空作战中，顽强奋战，有不少人光荣负伤致残，269 人英勇牺牲，其中 210 人长眠在老挝孟赛和班南舍的烈士陵园里。

在援老筑路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中央军委颁发的《援老人员纪律守则》和筑路指挥部的有关规定，虚心向老挝人民学习，爱护老挝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热情地为老挝人民做好事，他们利用施工和作战的间隙，为老挝盖小学 32 所，修便道 40 公里，修便桥 130 座，挖水井 100 多口，修水渠 5.1 万多米，助民劳动 3.1 万人次，修理车、船和机械 1.2 万多台（件），出动运输车辆 2500 多台次。708 大队三连副指导员杨金堂，在洪水淹没老挝村庄的紧急关头，带领战士奋力抢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幸被洪水吞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苏发努冯授予他一级英雄勋章。援老部队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老挝人民的爱戴和信赖。

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政府，对于中国人民为老挝人民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74 年 10 月 10 日，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部在写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信中说：“中国人民的援助，是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援助。这些援助，增强了老挝军队继续完成自己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在老挝的烈士陵园向中国烈士献花圈时表示，“对于中国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子孙后代将永远铭记在心。”

第十五章 混水摸鱼，南越进犯。十八勇士血染领海，五星红旗重飘西沙。

第一节 珊瑚礁盘上的可耻足迹

南越企图占有西沙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 200 多个，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岛群。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 330 公里，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组成，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这四个群岛星罗棋布，东邻菲律宾，西接越南，南临马来西亚，北靠

中国大陆，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航行要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丰富，蕴藏着石油和其他矿物，又是一个优良的渔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我国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到了宋朝，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渡大洋。到了明代，我国已比较重视对外关系的发展。从 1405 年（永乐三年）到 1433 年（宣德八年），郑和等数万人，曾七下西洋。那时船舶的航线常常通过南沙和西沙，对这两个群岛不但竖旗立石，而且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宣德”和“永乐”，就是明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的时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还早几十年；至于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更是在这以后的事了。所以，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国劳动人民曾世代在这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如古钱，就有西汉的“货泉”，东汉的“五株”，宋代的“圣宋元宝”和“永乐通宝”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沙曾一度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战后均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接收。南越当局一向企图占西沙群岛为己有，趁我国国内动乱之际，连续派遣军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

中国渔民守护岛屿

1974年1月15日，我南海荷叶岛捕捞队长方栅，率领四对渔船在西沙甘泉岛附近海面生产，南越两艘军舰派兵强行侵占了甘泉岛，公然取下中国国旗，并驱赶中国渔民离开。方栅和十几个渔民上岛，拔掉敌人插的国旗，并向敌人展开说理斗争。她责问一个中尉：“我们世代代在西沙抓鱼，在甘泉岛上加工鱼货，岛子姓中不姓越，你们跑来干什么，快快滚开！”渔民义正词严，敌人理屈词尽。当兵的都低下头不吱声，只有那个中尉很凶，用枪逼着渔民们下岛。方栅被迫带领船队转移到琛航岛附近生产，但仍留下5个渔民监视敌人的活动，同时还抽了部分人员登上琛航岛，以防御敌人前来侵占。

1月17日，南越的4号指挥舰，又开到了琛航岛附近。15个蛙人（戴潜水器水兵）从甲板上跃入海中，舞动起鸭掌般的脚蹼。偷偷向岛子游来。

当他们踏上中国的领土后，把头盔揭开背在身后，拔出手枪和匕首，蹑手蹑脚地朝岛内蠕动。他们眼睛睁圆，向四处观察动静，耳朵伸长，捕捉每一个细微的声音。

敌人估计岛上加强了力量，他们不再像侵占西部三岛那样，明目张胆地登陆，而是改变方式，乘夜间占岛。但今夜月光明亮，他们只能借着树荫的遮蔽，弯腰曲腿，匍匐而行。

珊瑚礁盘上，留下了入侵者可耻的足迹和罪证。

蛙人们尽管小心翼翼，脚步极轻，但由于地形不熟，精神紧张，加之倾着身子迈步，还是禁不住发出哼哧哼哧的气喘声。

其实，他们的行动早已暴露，等磨蹭到珊瑚坎上时，头顶上猛然响起一个沉雷：

“站住！不准动！”

这声吆喝使蛙人们吓了一跳，立即全部卧倒，他们来前就猜测会被发现，却没料到暴露得这样早，所以有些惊惶。其中有个头目，抬头朝前观望一下，给蛙人们打气：“不要怕，就几个民兵。给我起来向前冲！”

蛙人们站起身，又向前迈步。

方栅带领渔民们逼近入侵者。大家看着这伙奇形怪状的水鬼，充满憎恨和厌恶，恨不得一勾扳机，把他们全部消灭。但大家忍住气，等待方栅的命令。

方栅跟渔民们的心情一样。亲眼看见敌人践踏着祖国神圣的疆土，她血液不停地往上涌，眼睛里射出仇恨的火焰。只要她说声“射击”，就管叫这些水鬼暴尸礁盘。但为教育受欺骗的士兵，分化瓦解敌人，她还是展开了政治攻势：

“你们竖起耳朵听着：这是琛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谁也没下请帖，你们偷偷摸摸上岛来，干什么？这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承认侵犯了我国领土，马上离开岛子，我们不予追究；再一条路是赖帐，甘心为阮文绍送命，那样我们就要进行自卫，把你们消灭掉！何去何从，你们仔细想一想！”

蛙人们见民兵手里有武器，口气很硬，有几个气馁了，转身朝后移动。敌人的头目挥一下手枪，喊着：“混蛋，回来！不要听信中共民兵的宣传，我们总统说，帕拉赛尔群岛（西贡当局对我国西沙群岛的称呼）是我们的！”

有个蛙人在他威逼下，犹豫着转回身来，因为心虚，摔了一跤，爬起来跟着他的屁股后朝前蹭。

渔民们被激怒了，吼道：

“站住！再敢迈步，我们就把你们撂倒！”

“谁捣乱，我们就像对付海龟一样，把他打个四脚朝天！”

方姗姗想，蛙人的头目，是阮文绍集团的忠实爪牙，必须打掉他的反动气焰，才能瓦解敌军的大多数。她向前跨一步，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

“你休要贩卖阮文绍的破烂！全世界都知道，我国对西沙拥有主权。你们捏造谎言，混淆视听，妄图侵占中国的领土，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蛙人们默默地听着。

敌头目扯着嗓子争辩，强词夺理，硬说岛子是他们的，要渔民们撤走。方姗姗进行了驳斥，并郑重宣布：“如果你们执迷不悟，不认罪，不走开；我们就不客气了！”

蛙人们又有人开始向后移动。敌头目见势不妙，他带几个心腹，突然窜到方姗姗跟前，举起匕首刺来。

方姗姗眼疾手快，飞起一脚，正踢中他的手腕，匕首飞了。接着有两个渔民把他撂倒，摔了个狗吃屎。他一面挣扎，一面开了一枪。渔民们气炸了，用枪托狠狠在他脑袋上敲了几下，他伸伸腿，不动了。

与敌头目同时动手开打的几个骨干分子，也被揍倒，有的闹了个驴打滚，有的闹了个脚朝天，全部呜呼哀哉。其余的蛙人，纷纷转身逃走，跳海逃命。

方姗姗喊一声：“追上去，把他们抓回来！”

扑通！扑通！人们迅速地跃进了滔滔的大海。

浪中追捕“蛙人”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A扫雷舰军士长梁波和信号兵符阿海，驾驶202登陆艇来到琛航岛。他们是根据我海上指挥所的指示，联系调遣民兵驻岛工作来的。听清了岛上的情况后，他们也跳海参加了追击敌人的行列。

在西沙游过水、抓过鱼的符阿海，一到海里，像鱼儿似的自由而舒畅，月光朦朦胧胧，蛙人的影子模糊而虚幻。可他从击水的声音中发现了目标，全力追上去。

梁波对南越人的挑衅非常气愤。既然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就不能轻易放他们逃走，应该捉住，进行教育或惩罚。

梁波虽是全舰出色的游泳能手，但他此时却觉得自己游的速度太慢。他猛地扎下水去，憋住气，更快地潜游……前面水声哗哗响，他知道接近了蛙人，腾地钻出水面抹去脸上的海水，仔细一看，果然是个戴着头盔的水鬼，相距不到一米。

他四肢用力地运动，紧紧追逐入侵者。海水里跳动着碎银似的月光。海浪不时投下阴影。这个蛙人大概发现了他，把身子一缩，迅速不见了。梁波想：“你不论耍什么花招，休想从我手里逃掉。他纵身朝前一扑到了蛙人潜水的位置，却扑了个空。在他左前方两米处冒出了个人头，究竟是他追捕的那个还是另一个？他来不及细想，反正捉住再说。

他拼力向目标扑去，游水的速度极快，身上像安装了推进器，四肢是转动的桨叶，而保卫领土主权的责任感是推动他前进的动力。

蛙人背着氧气瓶，套着脚蹼，游起来省力，迅速，不花大力气是很难捕到的。

梁波双臂用力击水，他又加速了，比风还快。突然，他觉得头有点涨，透不过气，大概是游得过猛的缘故。但无论如何不能减速。他命令自己，即使血管爆裂，也不能让敌人跑掉。

他继续保持着原先的速度。为了减少海水阻力，他侧起身子游，像离弦的箭矢，出膛的炮弹……

近处传来击水声，呼喊声，是符阿海或别的渔民在追捕逃敌。梁波觉得血液直朝头上涌，脑袋仿佛要爆炸了。可他照旧全力向前。好！终于被他抓到了一个蛙人。这家伙喊了一声什么，但听不清，他已累得筋疲力尽了。

蛙人朝高处一跳，从他手上摆脱，然后潜水逃走。

梁波非常愤怒。孬种！你这家伙！该出力的时候，你竟然让抓到手的水鬼跑了，这就是失职，就是辜负了人民的期望。我必须重新振奋精神，游上去，抓到他！

眼前跳动着花花点点的月光。远处闪过敌舰漆黑的暗影。经过努力，终于重新追上了那个水鬼。他瞅准时机，双手扑向蛙人，就差那么一点没有抓到；他运运气，第二次伸出铁掌，好，扭住了蛙人一双胳膊。这小子没有反抗，也不再挣扎，只听他大声喘着粗气，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这个水鬼彻底垮了，游不动了。

梁波不放心，揭掉蛙人的头盔，按下他的脑袋，让他饱饱地灌了满肚子海水。同时，他自己也大口大口地呼吸，稍微休息一下。敌人被海水呛得直咳嗽，脑袋摇得像货郎鼓，海水从嘴巴、鼻子里朝外喷……

“告诉你，中国这块肥肉不是好啃的！你尝尝南海海水的味道，就不敢

再欺负中国人了！”梁波边喘边说，而后命令俘虏：“老实点，跟我走！”

有个黑影在梁波左边一闪。怎么，又是个水鬼？他正想采取措施，发现黑影是朝岛上游，而且是两个人。

“什么人？”他大声喝问。

“是我——方姗姗。”

哦！原来方姗姗揪住一个水鬼。梁波纳闷，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游到此处，而方姗姗竟比自己游得还远。不过也不奇怪，她自幼在海边长大，又是那么泼辣……

战果不错，15个蛙人，打死3个，捉住4个。俘虏们见有军人，吓得浑身筛糠，有的下跪磕头，哀求饶命。

梁波不顾衣服透湿，从小艇上取来一个塑料袋，拿出一张《南方日报》。

“不要害怕，”他对俘虏们说，“你们只要老实承认侵犯了我国领土的罪行，保证不杀你们。”

蛙人们乖乖地听着。

“1974年1月11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一个声明，现在我来读给你们听。”

符阿海拧亮手电筒为他照明，梁波大声宣读起来。

声明中指出，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些群岛附近海域的资源也属于中国所有。但近年来，西贡当局对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加紧侵占活动，最近又公然把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划入南越的版图，这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决不允许西贡当局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侵犯。……

“听明白没有？”梁波收起报纸，问俘虏们。“阮文绍集团妄想侵占我们南沙、西沙的一些岛子，这是个能允许的！声明发表以后，你们竟又到西沙来，我们更不能答应！”

蛙人们立即表示：

“官长，我们受骗了。这回知道了实情，以后再不敢侵占你们的岛子了。”

“我们侵犯了贵国的领土主权，是有罪的。希望官长高抬贵手，饶我们一条命。”

梁波说：“你们承认罪行，表示以后不再为阮文绍集团当枪使，我们可以释放你们。”

蛙人们听了，再次下跪、磕头。

梁波让他们起来，又问他们的舰只、人员等情况。俘虏们交待，他们一共来了4艘军舰，指挥官是何文锸大校。今夜就是他命令他们前来琛航岛侦察的。

“何文锸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

沉默了几分钟。梁波看出蛙人们有顾虑，不敢当众交待问题。他跟方姗姗商量，要逐个进行审问……

第二节 海战爆发

南海要冲刀枪对峙

军旗在战舰上兴起，新的一天开始了。

梁波一夜不曾合眼，稍觉疲劳。他站在甲板上，舒展一下四肢，望着永乐群岛海面，今天分外瑰丽。近处，有数不清的海鸥、鲚鸟、绣眼、秧鸡和不知名的小鸟，呱呱啼叫，在舰桅上空飞旋，似乎欢迎远来的客人。其中以鲚鸟最多，叫得最响，有的甚至擦着舰舷飞过，你都可以看清它们那雪花般的绒毛和黑褐色的翅膀。符阿海向他喊道：“军士长，西沙的鸟像鱼一样多，可以让你看个够！”远处，是琛航岛和广金岛，两个岛突起在一个礁盘上，像孪生姊妹；两岛之间的港湾广阔、平滑，岛上浓绿的植物愈加衬托出西沙特有的格调。如果有架照相机，拍摄下这壮观的景色该多好！

他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一转身，见一个军人朝他走来。

“啊呀，马骏？”梁波认出来，赶忙迎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使劲地摇，以表达内心的欣喜。

“你像断了线的风筝，失踪了。”马骏说，“我昨天运送民兵到琛航岛，才知道你在这里。”

望着当年一起插队的同学、朋友，梁波十分亲热。“走，到舱里好好聊聊。”

马骏是一艘猎潜艇的艇长，他们共有两艘艇，原先已在西沙海域巡逻。昨晚奉命到永兴岛载一个民兵排，于黎明时分送到了晋卿、琛航岛。

梁波说：“现在我们的力量加强了。”

“南越入侵的军舰已达四艘，我们的编队也是四艘，但吨位小，力量还是很悬殊。”马骏说，然后问及梁波的情况。

“暂时我没有固定的战斗岗位，”梁波说。原来他是扫雷舰的轮机军士长，到海校培训一年刚回，提升为机电长的任命尚未下达，所以他是舰上的机动力量。

“你暂时是个自由兵，”马骏笑道。

开过早饭，舰长丁玉辉召集编队的部门长以上干部，开了个会。他分析，南越阮文绍集团的本质虽然虚弱，企图偷偷摸摸侵占我们的岛屿，但当它发现自己的目的不能达到时，也有

冒险挑起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就是说，政治斗争可能发展为军事斗争。因此他要求全体指战员，务必充分做好准备工作。

1月19日清晨。

梁波站上驾驶台，举目四望。由于南越军舰的出现，洁净的天空被黑烟污染了。

此时，全国人民正在准备年货，以享受春节带来的温暖与喜悦，而阮文绍集团却策划阴谋，有意制造流血和死亡，这是

多么不和谐，多么令人难以理解啊！

丁玉辉发出启航口令。梁波望见航海兵启动起电罗经；炮手们登上炮位；帆缆兵把沉重的滴着水的铁锚从海底收上来；信号兵连续按动信号灯的把手，灯上的百叶窗打开、闭上、再打

开，无声的语言化作一道道闪电，飞向马骏他们的战艇。

梁波觉得军舰像一部精密的机器，各部门密切协同，使它运转起来。而指挥、操纵和调度者正是他所熟悉的几十个舰员。

军舰起初速度不快，非常平稳，但不久即开始颠簸起来，耳边响起了呼呼风声。

浪涛，擂响了战鼓。

劲风，吹奏起号角。

两艘扫雷舰编成严整的队形，沿着琛航岛和广金岛海面巡逻航行。两艘猎潜艇驶近晋卿岛附近，梁波望见艇桅上的八一军旗凛凛飘展。

南越军舰成楔形队形，由被其侵占的珊瑚岛驶出，向中国军舰逼近。它们都是庞然大物。梁波已从俘虏的口中知道，敌人共有三艘驱逐舰，一艘护航炮舰。其中4号为指挥舰，是由美国的一艘雷达哨卫舰改装而成。满载时排水量为2800吨。火力很强，前后甲板上各装有一门76炮，后指挥台上有两门迫击炮，后甲板上还有四门20炮和深水炸弹投放器；在中甲板左右两舷则按装着6具鱼雷发射管。但它却排在编队的中间，驶在前头的是10号护航炮舰。

10号舰体积稍小一点，但也有不下8门以上的火炮；在雷达天线后还竖着几根粗吊杆，像货轮上的起重机。2只小艇悬在两舷。甲板上站了十几个敌人。乍看来，它的舰首和舰尾差不多一样高，像一口棺材，而桅墙上乱七八糟的旗子，仿佛是招魂幡。不论吨位、火力，敌我是10比1，悬殊极大。

梁波还从俘虏口中了解到，南越的士气不高。为了维护对军队的法西斯统治，舰上订有“军人规定”，责令下层官兵无条件服从上司的指令；另设有“安宁署”，派“安宁人员”对部队进行秘密特务控制。当官的随意处罚、关押士兵，什么禁止上岸、跪甲板等，名目繁多。如果给谁加个“思想不良”的罪名，就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敌舰越来越近，梁波对丁舰长说：“敌人像是出殡。”

“为阮文绍集团送殡！”

当敌编队接近琛航岛时，丁玉辉怀着厌恶的感情下令：

“向南越军舰发出警告，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让他们走开！”
符阿海立即悬挂起信号旗，传达了舰长对敌人的警告。

但是，南越指挥官佯装不懂，编队继续向前。梁波听方姗姗说过，敌10号舰曾采取流氓手段，企图把她们的渔船撞翻，现在是否又来这一手？愚蠢的敌人打错了算盘，我编队对它的兽行没有丝毫怯懦，把定舰向，照直前进。结果，西贡海军编队不得不调头转向。

10号舰驶到距琛航岛约二链处停下，放下两条橡皮船，载着一批持枪的士兵划向琛航岛。显然，南越人因蛙人偷袭失败，现在又以武力强行登岛了。

敌人如此嚣张，早已激怒了全体舰员，有人喊道：“太猖狂了，应该教训他们一顿！”

丁舰长以极大的忍耐，压住满腔怒火，再次让信号兵向南越人发出警告，令其停止侵占我岛屿的行动。同时发报向海上的指挥所请示。

梁波对舰长的处理是理解的，对于南越当局的海盗行径，我们一直持克制态度，没有动用潜艇和航空兵。但如果对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举起望远镜，望见南越人的两只橡皮船已驶到琛航岛前，敌人纷纷登上礁盘。但没等他们站稳脚跟，岛上的渔民把他们阻拦在珊瑚坎的浅水滩前。

他认出那个穿红色上衣的方姗姗。她踞高临下地站在敌人对面，一手持枪，一手指点着敌人，展开激烈斗争。梁波心想，方姗姗意志坚强，口齿伶俐，一定会驳倒敌人。果然，经她揭露阮文绍集团的阴谋后，南越伪军们泄了气。有的蹲下吸烟，有的耷拉下脑袋装做捡贝壳，对她不敢仰视。

有三个敌人，像蛇似的钻进了羊角树丛，可能是企图窜入岛的腹地。但埋伏在树丛中的渔民猛地站起，用枪对准他们的胸膛，吓得他们连连后退，其中一个跟跄一下，斜着倒了下去。

梁波又发现一个南越人，拖着把铁锹，猫着腰，蹑到一丛树跟前，在珊瑚砂上挖几下，然后掏出一面旗子想插在岛上。方姗姗疾步上前，把旗子夺了过来，掷到脚下。那家伙滚到一边去了。

甲板上的指战员们，看着这场斗争，都为渔民们叫好。梁波想，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方姗姗和渔民们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她们守卫着琛航岛，南越人休想霸占它。

与此同时，南越人也派人登上晋卿岛，同样被渔民赶走。海上指挥员回电，指示编队，仍然坚持说理斗争，不开第一枪，如果南越军舰胆敢使用武力，我们则坚决进行自卫还击。丁玉辉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令猎潜艇迅速靠拢，监视着敌4号指挥舰的行动，严防敌舰的突然袭击。

琛航岛上。双方对峙了约半个小时，10号舰的敌人终于被赶下岛子。但敌指挥官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重下赌注，又从4号指挥舰上放下一只机器艇，载着30多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开向琛航岛。有个背报话机的军官，一踏上礁盘就用报话机同敌舰联系，但被渔民把机器打落到珊瑚礁上，摔碎了。梁波心想，我们的渔民筑成了铜墙铁壁，小耗子是搬不动、钻不入的。

一场海战开始了

从早晨到中午，南越人登岛的企图始终没能得逞。12 时刚过，隐约传来马达声，云层下出现了四个黑点，是从岷港派来的飞机。梁波并不感到意外。他估计，南越派飞机来的目的，不外乎轰炸岛上的渔民和设施，配合敌舰向我编队发动攻击。

不出所料，乌鸦似的敌机，飞临琛航岛上空，投下罪恶的炸弹！与此同时，四艘敌舰也丧心病狂地向我舰艇开了炮！舰长丁玉辉用激昂有力的声音，向舰艇发出命令：

“还击——开炮！”

全体指战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还击。

炮弹带着舰员们的愤怒和仇恨飞出去！

一场海战开始了！

战斗开始后，梁波立即跑到甲板上，为枪炮部门运送弹药。

他看得清楚，开始我方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因为敌我力量强弱悬殊，而且敌人又是有预谋、有准备地突然袭击；再者，近年来由于林彪的干扰和破坏，致使部队训练减少，战术、技术水平下降，所以开始时我们蒙受了不少损失，伤亡七八人。但是，舰员们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打得十分顽强。丁玉辉左臂负伤，仍像雕塑般巍然而立，镇定自若。他那种大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直接鼓舞影响着舰员们。还击不久，战局由被动转为主动。

敌机很快被轰跑。敌舰的射击也失去准确性。我编队四艘舰艇分别抓住敌 10 号和 4 号两舰，从距离 1000 多米打到几百米、几十米，充分发挥中小口径火炮射速快的特点，大量杀伤着敌人，减少了对方的命中率。爆炸的火光、震耳的喊声和翻腾的水柱，滚动在西沙海面。

梁波发现，敌人扩张领土的野心和惧怕被歼的忧虑交织在一起，战斗决心不强，战斗力也差。交手几个回合，敌 5 号、16 号两舰即后撤；10 号舰的士兵都穿起粉红色救生衣，准备逃生。

我们的舰员却越战越勇。梁波见舰政委组织炊事员、帆缆兵等能抽出的人手，全都参加运弹、清除弹壳，这样多人手，都感到有点紧张、吃力。

忽然，前主炮的炮门关闭。因为膛里有弹，按规定需等 30 秒钟，才允许开门退弹，检查底火。但在这紧要时刻，停止 30 秒，就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甚至遭到敌人的攻击，造成死亡！枪炮长冒着炮弹出膛爆炸的危险，毅然拉开炮门，迅速把臭弹取出，抛向大海！但他抛得过低，炮弹碰到舰栏上又被挡回。这非常危险，如果炮弹在甲板上炸开，许多人就会牺牲！梁波急得浑身冒汗，刻不容缓，他一个箭步跑上前，抱起炮弹，远远地掷到海里。由于用力过猛。神经高度紧张，炮弹掷出后，他踉跄一步，摔了一跤，好半天才挣扎起来。

当 10 号敌舰逃走后，梁波钻进了机舱。

主机轰鸣，说话不易听清，梁波提高嗓门，同时借助手势，告诉大家战斗的情况。

轮机兵们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拍拍胸脯，表示保证机械运转！

甲板上炮声仍在响。驾驶台不时摇下车钟。炮打得这样猛，速度变化这么频，一定是咬住敌舰反复冲杀。梁波用手势提醒大家，现在追击敌人不能

马虎，必须保证动力。

由于航行和战备，连续几个昼夜没有好好休息，梁波累得头晕目眩，非常疲劳。可他不肯稍憩，用心观察操纵台和各种仪表。

铃铃铃，一阵短促的铃声响起，梁波望见车钟指向“全速”。主机班长猛推加速杆，速度表的指针，陡地跳到了最大数字，战舰飞腾起来。棒！梁波想。此时他虽看不到战斗场面，但他猜测，必是咬住 10 号舰了，兴奋得眼睛发亮。

突然，一发炮弹穿过机舱，钢板破损，海水猛冲进来，流向每个角落。

海水淹没了底席。如果主机被淹，停止运转，军舰就失去机动能力，那样，不仅不能歼灭敌人，而且被动挨打。他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主机班长张林，已经在堵漏。海水的冲力太大，把他冲了个趔趄。梁波摸起一块大木塞，迈步向前。虽只几步距离，他却费了很大劲才迈到。漏洞里的水像是机枪在喷射，冲进舱里，四处泛滥。要堵住是不容易的。第一次没有成功，被海水把木塞打了回来。他第二次走上前去……

十八勇士血染领海

琛航岛附近，渔船整装待发。

方姗姗站在其中一只机帆船上。她戴顶钢盔似的竹笠，一绺短发被风吹向耳后，越发显得健美。她亲眼目睹南越人挑起了这场海战，但结果被揍熊了，四舰各自朝不同的方向逃窜。

“观战”并不轻松，或许比参战更紧张、焦急。她望见敌10号舰，在我方炮火的轰击下，舰首先钻进海里，舱尾翘起来，然后整个舰身像只铁匙掉进汤盆似的，沉入了大海。

10号舰这个乌龟壳，恶贯满盈，终于葬身于中国滔滔的南海之中。

这是入侵者可耻的下场！

方姗姗立即派两只渔船前去打捞俘虏。同时，她率船队驶向自己的军舰，准备抢救伤员。

中途遇上败北的敌4号舰。它被猎潜艇打得遍体鳞伤，被迫逃走，但尚有机动能力，边逃边向方姗姗的船队进行阻拦射击。

方姗姗善于利用风向和水流，引导船队曲折前进，敌人虽把成吨的钢铁倾倒在海里，却无法挡住渔船的去路。方姗姗的步枪连续射击，一个戴大檐帽的官儿被撂倒，引起渔民的喝采。猎潜艇远远追来，敌舰不敢恋战，夺路而走，方姗姗的船队得以顺利接近了扫雷舰。

渔船靠上军舰后，枪炮长迎接方姗姗上舰，引她朝会议舱里走。刚到中甲板，只见几个军人围着观看什么，方姗姗不觉一怔，原来梁波歪躺在甲板上，脸色苍白，双眼紧闭，仿佛睡着了。啊！他难道……？她的胸口像堵着什么东西，闷得难受！是的，她想，胜利不是白来的，是亲人们的鲜血换来的！但是海战已经结束，南海仍在奔腾，战舰仍然屹立，难道梁波不能与西沙军民共享战斗胜利的欢乐？泪水在眼眶里游动，没有流出。但悲痛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迈步走到梁波眼前。梁波脸上的表情非常恬静，嘴角上的线条微微带着笑意。方姗姗见状，更加抑制不住心里的悲恸，大声呼唤道：

“梁军士长！你睁眼看看，我是方姗姗！我是……”这位渔家姑娘竟当众哭了起来。

梁波的眉毛动了一下，接着微微睁开眼睛，四肢也开始活动。

“他累垮了，”枪炮长向方姗姗解释说，“机舱里太热，所以他昏迷过去，一呼吸新鲜空气就醒了。”

方姗姗擦去眼泪，发现周围的人都在望她，倒觉得有点难为情。

丁玉辉走来。他告诉方姗姗，上级来电，决定很快收复被南越人侵占的岛屿。他准备召开会议，进行部署，请她参加。至于伤员，由猎潜艇负责送往永兴岛。

方姗姗放心了，立即让船队返回琛航岛待命。等她转回甲板时，梁波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刚才我大出洋相，”方姗姗对他说，格格笑起来。

“你以为我‘革命成功’了？”梁波没笑，态度严肃。“这次战斗牺牲了18位同志，历史将永远记载着他们的功绩！”

“是的，”方姗姗收起笑容，说：“我们要在西沙为烈士们建立纪念碑，让子孙后代永远祭奠英灵！”

军民合力夺回西沙

19日晚，陆军四个步兵连来到舰艇上。20日9时即打响了收复珊瑚、甘泉和金银岛的战斗。

梁波所在的扫雷舰负责运部队到珊瑚岛。这个岛被侵占的早，敌人数目多，且修筑了碉堡，估计他们可能顽抗。因此先用舰炮轰击敌阵地，然后部队出击。

陆军的一个排，换乘渔民的舢板，由连长率领划向岛子。梁波通过望远镜，看见方姗姗背着步枪，在前头的舢板上奋力摇橹。这天，海上风疾浪高，舢板在波浪中颠簸前进。为了加快速度，她从战士手中接过一把备用锹，作划水的动作，战士们都用锹当桨划起来。

舢板在波涛中跳动不止，但方姗姗始终站得非常牢稳。海风吹起她的头发，浪花溅湿她的衣服，敌人的子弹在舢板周围掀起水花，她根本不予理睬。只见她时而侧过脸或举起手，向渔民下达各种口令。

在距离滩头约40米的地方，方姗姗把枪从肩上取下，紧握手中，遂即跳入水中。陆军战士们跟上她，边射击，边前进，很快冲上礁盘，占领了一座小庙附近的有利地形。

梁波不禁连连点头。方姗姗不但熟悉西沙，还能驾驭海洋，是位理想的向导。

因为风浪大，舢板一时返不回来。连指导员向丁舰长提出要武装泅渡。

时间在战斗中是重要的，丁玉辉同意。只是战士们携带着枪支、弹夹和手榴弹，每人负重数十斤，风浪又大，怕泅渡有困难。因此，他决定派出8个水性好的舰员，带上救生器材，和陆军战士一起泅渡。梁波和符阿海被选中。

梁波取了救生圈，跳入海中，在前开路。

渔谣说：“西沙浪高如山。”浪涛确实厉害，啸叫，翻腾，像是抖动鬃毛的狮子。海军战士个个犹如耍狮的拳师，他们在狮群中用力奋战，协助陆军战士们向前游去。

陆军战士们毕竟不熟悉海的脾气，游出不远就受到阻力。浪头扑头盖脸地打下，有的被苦涩的海水呛得哇哇直吐；有的被弹药坠得往下沉。水兵们纷纷把救生器材送给最需要的人，而且挽起臂膀帮助他们跨越浪峰。

指导员举起手枪，边划水边高喊：“同志们，为了收复祖国神圣的领土，冲啊！”

战士们勇敢地冒着弹雨和浪涛，射击着，呐喊着，武装泅渡了数百米，终于涉水登上了珊瑚岛的沙滩。当即以战斗队形匍匐前进，像把钢刀，直插岛子的纵深。

梁波脚踏珊瑚礁盘，心情激动如海水汹涌。啊，珊瑚岛！先辈用汗水把你培育，使你肥沃富饶！烈士用鲜血把你浇灌，使你美丽多娇！我们把南越海盗彻底赶走，定要把你建设得更好，让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由于第一梯队的打击，敌人已陷入一片混乱。梁波等长驱直入，一路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当梁波和两位陆军战士接近了一片草丛，发现草丛中藏着一个敌人，正托着掷弹筒朝陆军战士们瞄准。梁波举起手枪，绕到他的背后，大吼一声：“诺松空页（越语：缴枪不杀）！”敌人急转身，企图顽抗，梁波抢上前，

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掷弹筒。这家伙仍不肯就范，举起匕首向梁波咽喉刺来。梁波大怒。这家伙像猎犬般令人厌恶，同时他仿佛又重闻到了烈士们鲜血的味儿。他要复仇，他要亲手为死难的烈士们复仇！等敌人的匕首再次向他刺来时，他扣扳机，把敌人的脑瓜开了瓢，扑倒珊瑚砂上。

他们继续前进。

来吧，海盗们！他心里想。使出你们浑身的解数！只要不缴械，不投降，就别指望活着回老家！

经过一片灌木林，前边是一座碉堡。梁波对陆军战士们招呼：“注意隐蔽！”一言未了，冲锋枪子弹从他们头顶上飞过。

碉堡里的火力很猛，只能匍匐前进。但满地荆棘，爬行困难。梁波一面向碉堡射击，一面喊话，要敌人投降。碉堡里的敌人没有反应。

梁波突然望见方姗姗穿过灌木丛，出现在碉堡左侧。他大声提醒她注意。大概敌人见她孤身一人，又是女的，哒哒哒，向她一阵扫射！梁波的心收缩起来了，赶忙进行火力支援。同时，他发现方姗姗也用步枪还击，只打得碉堡附近灌木的枝叶簌簌乱飞。

打得好！梁波想，让南越人懂得，中国公民，不分男女，都不是好惹的！

梁波他们终于爬到碉堡附近，齐声大喊：

“诺松空页！”

“宗对宽洪堵命（越语：我们宽待俘虏）！”

碉堡里的南越人无可奈何，纷纷把卸了弹夹的 B4A、AB50 及冲锋枪丢出来，并用白毛巾当作白旗，表示投降。

方姗姗跑过来，对梁波说：“这一仗，打出了国威和军威，过瘾！”

话音刚落，从灌木丛中飞来一颗子弹，击中梁波的左肩，鲜血立即湿透了军服。

方姗姗骂了一句，朝灌木丛连发三弹，一个敌军官腿上中弹，哼一声，跪倒在地，他把一支 M16 举起，投降救饶。

方姗姗用枪口对着他，准备开枪！梁波眼睛里也燃烧起仇恨的怒火，但是，必须严格执行对敌军的政策，不能那样做，而且劝住方姗姗。

他向瞪着他的方姗姗解释：“敌人反抗，就坚决消灭！放下武器，就应宽待！”

方姗姗用牙齿咬着下唇，慢慢把枪口从敌人身上移开。

这是个少尉。刚才他见方姗姗用枪对准他，吓得面色如土，浑身筛糠；后来梁波收起他的枪，并令方姗姗把枪移开。南越俘虏连连磕头，并放声嚎叫起来：

“我有罪！罪该万死！……”

战斗胜利结束。珊瑚岛上共有敌军 36 人，除被击毙者外，全部被俘，其中还有一个美国领事馆的 KOSH（美驻西贡大使馆武官处派驻岷港领事的联络官，名叫杰拉尔德·埃米尔·科什）。

梁波望着珊瑚岛上空重新升起的五星红旗，心想，1974 年 1 月 20 日，是珊瑚岛回归祖国怀抱的日子，应该永远珍藏在记忆里。

三个岛屿全部收复，陆军在岛上构筑工事，架设电台，准备长期驻守，编队舰艇继续航行巡逻。渔民们重新开始捕捞生产。海面上，帆影点点，螺号声声。晴空万里，海波不大，飞鱼跃水，海燕腾空。金色的阳光，照耀着白玉般的西沙海岛和蓝宝石似的南海，到处呈现出一片热烈的气氛。梁波是

海战的参加者和目击者，至今肩头的伤口并未痊愈。他明白，正因为我们付出血的代价，西沙才会这样美好，这样安定！

第十六章 忍无可忍，攻其有备。邓小平语出惊人，千万吨炮弹植遍火红的森林。

第一节 友谊关的感叹

越军挑衅事件频发

友谊关，这座由陈毅同志亲自题名的巍峨雄关，矗立在祖国南部边陲的崇山峻岭之中。它曾经是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成群结队的越南边民从它的通道熙熙攘攘地进入中国境内，探亲访友，购买日用品。两国人民笑语盈盈，亲如一家。在它东侧的铁路线上，一列列满载着各种物资装备的列车，呼啸着向南飞奔；在它下面，几百辆装满粮食的卡车，满载着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深情厚意，源源不断地向南疾驰。

友谊关凭祥铁路段军援物资转运站值班日记记载：在越南抗美援朝的10个年头中，仅经凭祥运往越南的军援物资就有40万吨之多，约合80亿美元。当时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该转运站的同志每人每天平均搬运20吨重的货物，不少人常常累得昏倒在车厢里，但是他们还是相互鼓励着：“宁愿我们多流汗，也要让越南兄弟少流血！”

1978年9月，我边防部队某部7连的观察哨发现，同登附近山上的越军炮兵阵地，把一门大炮的炮口对准了北方。尽管当时越南当局已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争端，但连长听到报告时还是不敢相信“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当局竟会与中国为敌，直到他在前沿亲自看到了炮口所向。后来，越军就从这些地方向中国倾泻了罪恶的炮弹。镌刻着“友谊关”三个大字的关楼门口溅上了被越军炮弹炸伤的我守关战士的鲜血；当年胡志明主席经过友谊关时，休息的地方被越军的炮弹炸得弹痕累累，门窗上的彩色玻璃也被震得粉碎；中越双方边防人员在友谊关内会晤的建筑物和附近我边防连队的营房，也被炸塌了一角。

友谊关右前方的中国领土浦念岭，1978年8月被越军侵占，越军在岭上修筑的环形堑壕深达1.3米到1.4米，还有能容纳几十人的掩体。在友谊关左前方的馗朗岭上，越军修筑了两层环形工事，还有一条深沟同后面的山岭相接。浦念岭和馗朗岭上的越军工事就像一把钳子，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钳住了友谊关，使友谊关成了无险可守之地。而我守关战士为了自身安全，仅仅在站岗的地方挖了一个防身掩体，越南当局竟左一个照会，右一个抗议。我国政府委屈求全，下令连队把这个掩体填平。当时访问友谊关的一些外国记者目睹此情，曾提醒中国边防部队说：“你们这样要吃大亏！”

侵占浦念岭的越军曾得意忘形地挥着拳头向中国边防部队嚎叫：“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火红的木棉花开遍了中国的南疆，越南扩张主义者狂妄到了什么程度！

从友谊关以南越方一侧到我国水口关附近的越方一侧，越南当局修了数不清的暗堡、地道、炮阵地和各种暗火力点，连当年法国构筑早已残破不堪的碉堡、炮台也被“复活”了。一位在同登居住了30多年的越南边民说，这些工事有许多早在抗美援朝期间就悄悄地构筑起来了，黑洞洞的炮口早就对准了中国。

广西的东兴镇与越南的芒街一水相隔，北仑河的急流从这里注入北部

湾。“中越友谊大桥”横跨两岸。桥南头 1978 年底也架设了路障，筑起了地堡，南岸一棵大树上吊着 4 个大高音喇叭，整天嚷叫着越南要“全民动员”、“全民武装”、“随时准备同新的作战对象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高音喇叭还传出越军头目狂妄的声音：要“决一死战”，要“首战告捷”！树旁有一幅大宣传画，画上是全副武装的越南军人持枪面向北方。据桥北头的中国民兵和边防哨兵说，这幅画是越南侵占了金边以后挂上去的。一天，河南岸一个越南军官端着枪，面对着相距几十米宽的河北岸我方哨所，手舞足蹈地狂叫：“我们打下金边了，你们中国人怕不怕？”“等着吧，我们要打到东兴吃早饭！现在先给你一枪！”说着就开了枪。

中越边境村寨相连，哪块地是中国的，哪块地是越南的，越南边民了如指掌。在友谊关东侧有越南群众过境耕种的一块土地，河内当局企图霸占。一次，越南公安人员威逼群众来辩论，群众不来。越南公安人员就造谣煽动说：“你们种的庄稼全让中国人给拔掉了，地里还埋了地雷。”群众到现场一看，绿油油的禾苗一棵不少。他们心里明白，但谁都不说一句话。这时，越南公安人员找来一位老汉，硬逼他开口，老人看着土地，看着中国兄弟，诚恳他说：“这块土地是中国的。收了这季庄稼，明年就交还中国兄弟。”越南公安人员气急败坏地咒骂道：“你这个老糊涂，滚蛋！”事后，这位老汉竟被关了起来。

在广西北仑河北岸一个小山坡的松林里，有一座中国战士的墓，碑文上刻着这位工兵战士的名字邓永生。邓永生是广东省海康县纪家公社人，在 1972 年 8 月 15 日，为援助越南铺设输油管道而壮烈牺牲。1979 年初，在这个地方，两个逃跑过来的 20 来岁的越南同胞兄弟，他们的家乡就在北仑河南岸一个山村里，他们的亲人都被越南武装公安人员赶走了。越南当局逼着他们兄弟俩当兵，准备打中国。“这怎么行呢？”兄弟俩争着说。从小，他们就是和中国兄弟在同一条河里捕鱼，在同一座山上打柴、放牛，互相看着长大的。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他们家的生活很贫苦，常常缺米又缺盐，幸亏中国兄弟姊妹不断地接济，才渡过了艰难的岁月。1972 年，在美国对越南水陆交通进行封锁、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家乡去了中国的工兵，帮助越南火急地铺设输油管道，把中国援助的汽油、柴油源源输到越南。他们亲眼看到中国的军队对越南是多么好！哥哥激动他说：“我们家乡的人民有一句话，同中国兄弟姊妹的关系就像边界上的青竹一样，根节相连。现在政府要我们拿起枪来同中国打仗，我们死也不能干！”

1978 年一天，云南边境一个山区里，突然跑过来一个越南边民，我边防人员和民兵盘问他，他不会说话，可是他又很想向中国人员告诉些什么，急得要命。怎么办呢？他作出了各种手势，表示在靠近边界的中国境内，被越军埋上了地雷，有危险，要当心。中国人员感谢他，表示知道了，可他还是不放心，就领着中国人员走到有地雷的现场附近，先用手指一指，然后用脚向下一踏，两臂张开，作了一个被炸倒的姿势。中国人员向他点点头，表示完全明白，他才放心地走了。后来，中国边防人员和民兵就按照这位越南“哑吧”提供的情况，及时地排除了地雷，保障了我边民的安全。

1978 年 11 月的一个夜晚，在广西边境的一个渡口，担任中越边境人民来往摆渡的老船工夏老汉，习惯地睡在小船上，突然被一阵阵“哗啦—哗啦”的水声惊醒，赶忙起身到船头一看，只见江面上一个人影从对面撑着竹排过来。“是谁？”“是我。”多熟悉的声音啊，凭着 30 多年老相识的经验，夏

老汉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当年在越南北部山区和他一起打过3年游击的越南老战友，夏老汉要点灯。越南老战友摆摆手，递过烟，越南老战友不划火柴。压低声音急促地告诉夏老汉，“最近那边风声很紧，说要把你这条船烧掉，把你杀死，占领这个地方。”夏老汉半信半疑：“会是真的吗？”越南老战友说：“咱们兄弟俩说话还有错。你别再糊涂，现在我们那里全是从南边来的军队，他们把我们寨上的人都赶走了，我这回是从别处转来，把听到风声告诉你。你们可千万要有准备呀！”两位中越老战友紧紧地握着手，用沙哑的声音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分手了。夏老汉把这个情况赶忙告诉了他的儿子、民兵连指导员。民兵们加强了对渡口地区的巡逻保卫。果然在几天后的一个风雨夜里，一小股越南武装人员偷偷摸摸地来了。由于中国民兵严阵以待，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据不完全统计，越军在边境制造的挑衅事件：1974年121起，1975年439起，1976年986起，1977年752起，1978年1100多起。1978年9月至1979年2月的半年间，越南军警在边境地区侵占中国领土竟多达162处。

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态度

中越边境频频发生的越军挑衅事件，是越南当局反华政策的一个具体缩影。在从 1974 年起，越南当局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边界纠纷，蚕食中国领土。1978 年夏天，越共四届四中全会竟把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新的作战对象”，越南领导人一再叫嚣要打败中国。7 月 8 日，越军总政治局颁发的《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明确规定，要对中国采取“进攻战略”，“出其不意地、主动地”在边界线以内及以外“袭击敌人”，要把边境地区变成反华战争的“阵地”和“堡垒”。

在越南当局公开反华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一直以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希望通过和平协商的外交途径，解决中越之间的争端，中国外交部曾多次呼吁与越南谈判，寻求解决中越争端的途径。即使在中越关系急剧恶化和越军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开枪开炮、侵犯中国领土、绑架中国军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使矛盾激化，仍希望越南当局能够改弦易辙。中央军委还多次命令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严格执行政策，不主动惹事；对越军的挑衅行为，不对骂、不对打、不开枪动武，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说理斗争。

但中国政府的克制态度并没有使越南当局的反华气焰有所收敛，边境挑衅事件仍然不断升级。1979 年 2 月 8 日至 12 日，越军连续 5 天侵犯中国广西、云南 9 个县所辖的边境地区 30 次，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 34 人；并猛烈袭击中国云南河口开往开远的两列火车，使其严重损坏，铁路运输受阻；还不断向中国边境地区开枪开炮，使工厂停、学校停课、耕地停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都受到严重威胁。饱受越军入侵之苦的广西、云南边境各族人民，纷纷请求中国边防部队回击越南侵略者，保卫边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对越军侵犯中国领土、杀害中国边民、袭击中国列车的野蛮暴行义愤填膺，忍无可忍。

邓小平向越南当局发出了警告

1979年1月29日上午10时。

五星红旗和星条旗有史以来第一次并排飘扬在美国总统府上空。

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红地毯。礼炮。仪仗队。白宫的欢迎仪式。在简短的致词中，卡特热情地借这个机会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2月1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当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务卿万斯，要求对公报中的“霸权”一词作出解释，万斯让这位苏联外交官放心，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苏联。

1月27日，即邓小平访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

还在两个多月以前，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以及途经仰光的时候，他就毫不含糊地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犯柬，并且轻易得手。他们不仅侵略了一个主权国家，而且还在中越边境进行多次挑衅。岂有此理。欺人太甚。这回巨人真的动怒了。他说：

“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而霸权主义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靠乞求所能够得到的。想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和遏制霸权主义，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战略部署。”

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邓小平：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的局势紧张，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休斯敦同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他说：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之后在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并对大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

但此时美国人却不像日本人那样紧张。一位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说：“美国人很喜欢听到副总理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当邓小平同卡特谈起“教训越南”的话题时，卡特曾经婉转地谈到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但邓小平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一旦下了决心，很少有什么能够使之改变。毛泽东曾经评价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两员虎将统领东西线

邓小平没有吓唬人。早在他出访美国之前，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就有一系列重大的军事部署。

1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两辆军用吉普车悄悄地驶到了广西中越边境。离凭祥火车站20多公里外的金鸡山，是一处可以近敌观察的理想位置。这儿离友谊关不远，紧紧扼住同登至凭祥的交通要道。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选择这儿做为他的前线勘察点。

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许世友司令员等一行人悄悄地登上了金鸡山南侧的一个古炮台。这儿距离敌人前沿阵地最近处仅有300米远，也就是说完全在子弹的射程之内。

许世友司令员一下车，迈着有力的步伐，大步地率先向炮台观察点奔去。他来到炮台后，双手倒剪，腰杆挺立，双目久久地凝视着四周，眼神中闪烁着炯炯光亮。

“好！好！这个点选得不错，很开阔，看得很清楚。”将军十分满意地四下观察着，思考着突破口的选择方向。

南边越方的大小高地此刻都尽收眼底，这儿更清楚地看到了扣考山与扣马山就像谅山市的两扇大门一样，只要我军在战斗中能抢先占领，那谅山之敌就成了网中之鱼了。

许世友看到这儿，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他说：“我看从这个方向进攻对我们很有利，拿下同登就等于一枪穿了两个洞……”他又进一步向大家分析说，攻打同登很重要，只要拿下了同登，打高平时就可以用来牵制谅山方向的敌人，打谅山时也可以做为前进阵地。

73岁高龄的许世友看得兴致勃勃，坚持不休息又要去西炮台观察。在西炮台上他亲眼看到了我方领土被越军占领后用来袭击我们的地段，将军很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直到有关同志向他介绍完了情况后，他才转过身去，愤愤他说了一句极有份量的话。

“……他们现在叫徒弟打师父，恩将仇报呀！”

许世友司令员在金鸡山勘察归来后不久，又再到布局关堪察前线地形，他在这两次亲临前线部署反击作战的行动中，处处都显示了将军丰富的战争指挥经验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

前方的将士们看到司令员那胸有成竹的神态，人人心中都感到一种胜券在握的信心。

广西东线的我军自卫反击部队，经过许世友司令员的精心调遣和部署，迅速地拿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很快上报总参谋部和中央军委。经过批准后，立即开始实施准备。

这位传奇般的久经沙场的虎将，决心对越南侵略军来一个突然猛烈的打击，使用“牛刀杀鸡”的战术，把强大优势的打击力量对准敌人的弱点，来一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致命性打击，在短时间内就置敌人于无力还手之地。

将军信心十足，他完全有把握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操纵在自己的手上……

在东线广西战区的准备工作进行之时，我军西线云南战区也积极投入了反击越南侵略军的运转……

据 1979 年日本时事社东京 2 月 8 日的一条电讯披露：

“中国西南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换人，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为昆明军区司令员……据权威人士推测，这项重大的人事更换同中国对越的战略行动有直接关系……”

日本共同社 2 月中旬从北京发出的一条消息也说：

“……已经获悉，中国配备了朝鲜战争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担任对越前线部队的军事指挥官。杨得志之所以转任昆明部队司令员，是由于为适应南部边界军事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在西线云南方向的边境上，我军为了反击越南军队，已经部署了 10 万部队，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突然更换战区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呢？

各国的猜测与分析不能不说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这就是中国军队将在云南边境对越军实施大规模的惩罚性军事行动，需要一位更了解越南军队情况的指挥员。

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我军一员有名的战将，他无论是在抗战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以善打硬仗而闻名于全军内外。对于昆明军区的所属部队，他长期领导，自然十分了解和熟悉。当时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将军，曾对越军的军事情况与作战招数有过较为深入的了解。因为早在 12 年前的 1967 年，杨得志受中央军委之托，曾以友好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出访过越南，帮助越南的军事工作。

杨得志在越南期间，曾经详细地考察了越军的全部情况，同越南军方的高层有过接触与了解。应该说，杨得志将军在军事上曾是越军的一位老师。现在学生翻脸不认老师了，而且还对老师大动干戈，那当老师的不得不亲自动手再好好“教育”一下这些背信弃义的学生了。

杨得志将军曾以红军长征中抢渡大渡河的那场战斗而扬名中外。30 多年前他又从彭德怀手中接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指挥大权。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军队进行过较量，并且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此番他又被中央军委委以重任，调到即将惩罚越南的前线担任指挥员，这自然是中央经过了再三权衡后做出的重大决策。

临阵易帅，乃兵家大忌，但中央决定抽调杨得志接任云南我军西线战区的最高指挥员，却是为了保证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一个有力措施。中央认为，12 年前杨得志能够出色地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工作做得那么圆满，能够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尽心竭力地在军事上帮助尚在战争灾难中的兄弟邻邦，那他今天更能深刻地领会中央之所以不得不进行这场惩罚性自卫战争的重大意义……

历史有时就像一出戏。杨得志将军对此十万火急的调任命令，不由得从内心感慨万端，他痛恨那些忘恩负义的小人们，他更感到此次去南疆前线指挥这场全球瞩目的军事行动是中央对自己的最大信任，肩上的担子沉得很呀。

在飞往昆明的飞机上，杨得志一言不发，一头钻进了随身携带的那一大堆有关越军情况记载分析的材料中。他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深信不疑的……

此时西线我国云南边境一带，人民解放军的各个部队都已按中央军委的命令，进入了指令的作战位置。整个云南前线从河口地区到金平境内，我军

一线部队全部进入了进攻前的戒备状态。

杨得志司令员的专机一到昆明，他立即奔赴前线指挥部，来不及喘息一口气，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战前行动部署。将军再次上阵了……

越军求救：“中国的炮兵太猛烈了”

2月17日。拂晓，我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地动山摇。一发发炮弹，撕裂长空，一齐射向越军阵地……

谷珊，越军设置的指向中国的导弹阵地，顿时火光冲天，山石横飞。守阵者抱头鼠窜，连他们视为宝贝的苏制导弹也顾不上了，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在339高地，敌人的核心工事纵横交错。我英雄炮兵一阵急速射击，敌人工事土崩瓦解。我勇猛的步兵一跃冲上高地，很快歼灭了高地上的敌人。

在柑糖，越南当局头目直接给他们的部队打气，叫他们死守。但是，在我炮群集中火力猛烈轰击下，敌人的工事一个个飞上了天。越军惶惶如丧家之犬，争相逃命。我步兵一举拿下了这个要地。

攻击谷柳、保胜后山，训练有素的我某榴炮团一排排炮弹劈头盖脑砸向敌阵地。越军鬼哭狼嚎地在报话机里向上级求救：“中国的炮火太猛烈了，我们顶不住呀！”与此同时，在我阵地上，步兵战士高兴地跳出战壕，挥舞军帽，高喊：“打得好！炮兵打得好！”

越南军队在我强大炮火下伤亡惨重，为了逃脱覆灭的命运，指挥官命令部下在我打炮时，“马上钻洞，炮声停了再出来”。可是，敌人再狡猾也逃脱不掉我炮火的惩罚。某师炮团在支援步兵冲击时，大炮一响，敌人就溜进了地道。为了引蛇出洞，消灭敌人，我机智的炮兵来了个炮火假延伸。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延伸了的炮火又回到了他们头上，炸得他们哭爹叫娘。

我英雄的炮兵在战斗中巧施妙计，频出奇兵，敌变我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谷珊至沙巴只有一条公路相通，两旁是陡峭的高山，敌人沿公路两侧的山坡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吹嘘说：“中国炮兵的本事再大，也打不到我们。”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我炮兵某团出敌意料之外，打破常规，在山间公路弯曲处的凸部架起了大炮。经过精密计算，精心操作，出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从两山之间的峡谷顺着山边飞去，正中守敌工事。自以为得计的敌人猝不及逃，和他们苦心经营的工事一起化为灰烬。

俗话说得好：“棍子重不重，挨打的人最清楚。”一个在代乃战斗中被我活捉的越南士兵，在谈到他被俘的经过时说：“我们316师一个加强营刚下汽车，进攻队形还没展开，你们的炮弹就像雨点一样地落下来。炮火一停，我们的营长不见了，连长炸死了，我也被你们活捉了。”很多放下武器的越南士兵到我收容所后还谈炮色变，说：“真想不到你们的炮火那样猛烈，那样神！”有的在看电影时听到银幕上的炮声，就条件反射似地低下头，用手堵住耳朵，闭上眼睛，那心有余悸的情形，令人发笑。

第二节 踏破天险

直捣高平

高平，是越南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越南军队曾经以高平为基地，疯狂侵犯我广西靖西、龙州两县，使两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生活不得安宁。自卫还击战打响后，驻龙州某边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百里奔袭，直逼高平城下，配合驻靖西的我边防部队狠狠打击了越南侵略军。

从龙州奔袭高平，首先要攻占4号公路上的东溪。拿下东溪，才能沿公路北上高平，并堵住从谅山北援之敌。从龙州水口关到东溪有一条公路，越南侵略军在这条公路中间的复和县，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永备工事，摆下了重兵，屏障着东溪，自以为高平的后路万无一失。可是，敌军根本没有想到，2月17日拂晓，正当他们在复和拼命抵抗我从水口关出击的部队时，我驻龙州边防部队的主力，却从水口关以南的布局隘直扑东溪而

去。

布局隘，也叫布局关。从这里到东溪，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和悬崖陡壁，没有公路可走，只有一条牛车小路在断崖下各峡谷中穿行，山高路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2月17日拂晓，在一阵炮轰之后，我边防部队兵分两路，一路步兵，一路坦克，从布局关冲杀出来。越南军队犹如惊弓之鸟，连裤子都顾不得穿，抓起机枪乱打。某炮兵连在连长张桥生指挥下，把加农炮对准敌人，很快就把敌几个火力点全部摧毁。

敌人没有料到我边防部队会从布局关出击，更没有想到我坦克在这里出现。这里的地形是所谓溶岩地貌，笔直的山峰一个挨着一个，怪石林立，岩洞成群，很不适合坦克行动；在这种地形上开进，在各国坦克作战史上没有先例。越南军队正是只看到地势险恶，而恰恰忘记了我边防部队排除万难、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那冈山口悬崖从两边夹着牛车小路，坦克开不过去，行动受阻。这时，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猛烈扫射我搭乘坦克的步兵。在此紧要关头，我尖刀车——“101号”车驾驶员张东法急中生智，他毅然决然地倒过车来，开足马力，朝崖壁猛烈撞击。一连撞了四、五下，硬是劈开了岩石，打开了前进的通路。

在步兵和坦克兵紧密配合，两路夹攻下，我边防部队从布局关到东溪仅仅用了3小时。当坦克开近东溪时，一些越南人误以为是他们的坦克，还连连招手致意。

攻克了东溪，通向高平的后门打开了。我边防部队的一支摩托化部队以坦克为前导，从布局关经东溪沿四号公路北上，向高平急进。敌军百般惊恐，赶忙调集力量，想尽一切办法阻挡我边防部队的前进。17日下午，敌人在东溪以东班翁地区扒开水库，放水淹没了道路和田野，淤泥深达50至70厘米。我一部分步兵搭乘坦克开过去了，大批运载步兵的汽车难以前进。摩托化部队首长当机立断，决定甩开汽车步行。指战员们对步行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早就练成了铁脚板。敌人这一招完全挡不住我们。

在东溪以东的靠松山，4号公路上的嫩金山口、那外和博山等四个地段，敌人破坏了桥梁和路面，设置了伏击阵地，企图挡住我军前进的步伐。嫩金山口有一条弄梅隧道，地形十分险峻，敌人在这里构筑了三层暗堡，组成交叉火网，阻击我坦克部队。步兵某团1营接受了配合坦克兵夺取隧道的任务，

副营长陈殿标带领一个加强班，攀登悬崖绝壁，占领了隧道左侧的制高点。2连副连长甘永先带领2个班，也占领了左侧的一个山头。他们居高临下，用火火力压制敌人，掩护3辆坦克和2连3排向隧道进攻。拼死挣扎的敌人，从暗堡中疯狂射击。我火箭筒射手卓德喜和副射手董同，机智勇敢地沿着公路不断跃进，在离敌堡30米的地方瞄准开火，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摧毁了敌人2个暗堡，全连官兵一阵猛攻拿下了弄梅隧道。

部队离高平越来越近。这时候，一支兄弟部队从布局关进驻东溪，并南下进攻七溪，保障了北上猛攻高平的部队后侧的安全。原先攻占东溪的部队也沿着4号公路北上。高平的敌人不甘心覆灭，拼命挣扎，连忙把苏制反坦克火箭，还有在南越缴获的美制反坦克武器，都搬了出来，在高平以南的博山地区，构筑了八九十个火力点，设置了纵深达两公里的伏击阵地，妄图拦击我坦克部队。可是，我坦克兵和步兵紧密配合，打掉了敌人许多火力点，步兵在公路两侧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山头。那些苏制、美制反坦克武器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面对我军无坚不摧、锐不可挡的凌厉攻势，敌人一个个阵地被突破，高平这座军事重镇，终于暴露在我边防部队的铁拳之下。

正当我军沿4号公路北上的部队兵临高平城下的时候，我驻靖西县某边防部队也从高平西北方向压过来，高平敌人要摆脱我军的包围，只能向西南方向的纳隆地区逃走。他们派出一个营赶到纳隆，把守那里的一座桥，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敌人想到的事情，我军早就料到了。某团2营根据上级的指示，在高平以南离开4号公路，沿山间小路向西穿插。他们不顾山高路险和小股敌人的骚扰，一路猛跑，在守敌立足未稳之际就赶到了纳隆。敌人没有想到来的竟是我边防部队，举手打招呼问：“你们是哪个部队！”2营一阵猛冲，把一个营的敌人歼灭大半。然后，他们立即修筑工事，炸毁桥梁，既堵住了从西南方面增援高平之敌，又彻底粉碎了高平之敌向西南逃窜的幻想。

攻克东溪后又北上的某团3营，在4天4夜没有休息的情况下，沿4号公路东侧猛攻，直打到高平以东4公里处的平江南岸。平江宽60多米，激流滚滚。武装泅渡的命令一下，全营指战员便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跳下水，争先恐后地向对岸游去。副教导员王京玉和一战士捷足登上北岸，在滩头阵地占据有利地形，用机枪压制敌人，掩护全营泅渡。仅仅1个小时，全营渡过了平江，迅速拿下了敌人阵地，从东面威胁高平。

就这样，我军一举攻克了高平。残余的敌人纷纷向高平以北或以东的山区溃散。紧接着，我攻克高平的部队又从敌人这个后方基地向前打，从后路夺取了茶灵、广渊等地，把高平以北以东的地区分割成几块。这时，所有从高平溃逃的敌人，都落进了我军布下的天罗地网，逃不出覆灭的下场。

驻龙州某边防部队坚决贯彻上级的作战意图，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和路线上，勇猛出击，大胆穿插，走远路，走险路，排万难，从敌人背后奇袭高平，发扬了我军优良的战斗传统。自诩为“不可战胜”的越南侵略军，这次竟被我边防部队从背后揍得皮开肉绽。

越军“英雄团”覆灭

在友谊关附近界碑外的同登地区，驻扎着越军步兵第3师12团。这个决战不决胜的部队，据说是鼎鼎大名的“英雄团”，号称“善攻能守”，“擅长近夜战”，吹得开花乱坠。

就是这个“英雄团”，在我友谊关前耍刀弄枪，耀武扬威，炮击我村庄，枪杀我边民，侵占我领土，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去过春节”。

这个“英雄团”究竟英雄在哪里？同登一战，揭穿了老底。

2月17日清晨，我边防部队围歼同登守敌12团的战斗打响了。

6时25分，盘踞在549高地的敌炮兵观察所，被我火炮首发命中，2米厚的钢筋水泥墙飞上天空；刚从河内开来的满载军火的列车，起火爆炸，摊散在铁轨上；同登军营，腾起滚滚浓烟，成了一片火海；边境群众恨得咬牙切齿的公安屯，土崩瓦解，变为一片废墟；敌炮兵阵地上，炮管被炸弯，炮轮子连滚带跳地抛到了300米之外的山脚下，15分钟的炮击，迅雷不及掩耳，直打得敌人死伤累累，晕头转向。12团一个被俘的士兵后来说，同登附近有座三孔铁桥，为了阻止我边防部队前进，上级命令他们一个连负责炸桥。他们在桥下放了半吨炸药，炸药下面放了反坦克地雷，安了电发火装置，准备一遇到攻击，就把桥炸掉。没想到我边防部队一阵猛烈炮火，就把这个连炸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几个，耳也聋了，头也懵了，腿也软了，连按电钮的胆儿都没有了。

在炮火急袭的同时，我左右两支穿插部队，像两把锐利的尖刀，直向12团防区的侧后插去。担当左翼穿插尖刀连的某团7连，在前进中，突然遇到敌人布下的雷区，部队受阻。先头开路的尖刀7班利用各种器材排雷，仍不奏效。在这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别的办法都来不及了，只听班长朱泽威一声高喊：“同志们，踩过去！”随着这洪亮的呼声，战士罗光华一个箭步冲向雷区，“轰”的一声，地雷响了，罗光华负伤倒下。紧接着，副班长陈庭进又迎着浓烟冲了上去，几声巨响，连环雷引炸了，陈庭进也负了重伤。火光闪闪，弹片横飞，班长朱泽威冲上去了，战士吴石林冲上去了！我们的四位勇士就这样用鲜血和生命清除了雷区，为部队开辟了通路。

我先头部队继续猛插，敌人层层阻截。他们凭险据守，设置了重重障碍。连长刘超佳沉着机智，巧妙地运用尖刀排交替穿插的方法，不恋战，不停留，一次又一次地摆脱了敌人的纠缠，提前半个小时插到了指定地域。与此同时，我右翼穿插部队越丛山，踏荆棘，冲破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消灭敌人一个又一个火力点，也直插到了敌人后方。这一来，同登、谅山之间的423、409等高地，全部被我攻克，迅速完成合围。

同登守敌退路被我一刀切断，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关起门来好打狗。我正面突击部队在坦克的引导下，如滚滚铁流，直捣敌巢。我坦克部队大显神威，一路猛冲痛打，所向披靡。坦克2连连长李德贵，单车冲入敌炮兵阵地，见到敌人就辗，见到火炮就压，见到汽车就撞。敌人如火燎蜂房，一阵哇哇乱叫，连滚带爬，四散逃命。敌炮阵地被打得稀巴烂，6台汽车、2门火炮变成了废铁。我步坦密切协同，多路进剿，很快攻占了同登周围的所有高地，把敌人防御体系切成了数块。

不可一世的越军“英雄团”，插翅难逃！

敌人退路已断，阵地又失，狗急跳墙，妄图作困兽之斗，与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在探堑高地，敌人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向我 3 营猛扑过来。3 营指战员沉着应战，把目标瞄得准准的，50 米不打，30 米还不打，等敌人爬到离阵地 10、20 米时，各种火器一齐开火，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扔下了多具尸体，败阵而去。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拼凑兵力，对我进行轮番攻击。战士们高叫着：“狗强盗，尽管来吧！”一次次把退了敌人的冲锋。7 连 6 班班长张春才，在穿插时左手掌负伤，仍然坚守阵地，带领全班接连打退敌人 3 次反扑。在敌人第 4 次反扑时，7 个敌人在炮火掩护下，爬上了 6 班阵地。在这危急时刻，只见张春才抱起一挺机枪，一梭子弹撂倒两个敌人；子弹打完了，又用枪管击倒一个冲到面前的家伙。这时，4 个敌人又上来把他团团围住。张春才向班里的战士高喊一声：“向我扔手榴弹！”战士们瞄准敌人一齐开火，全歼敌人，守住了阵地。经过两天的激战，3 营指战员越战越勇，连续打退了敌人 31 次反扑，歼敌 720 人，在他们激战过的战壕里，填满了敌人的尸体。

不管是大的阵地，还是小的山头，只要有我们的战士坚守，敌人无论怎样疯狂反扑，也休想前进一步。同登火车站南侧的无名高地，坚守着某团 6 连 1 班。敌人为了夺取这个高地，以三面的交叉火力，向 1 班阵地猛烈射击，1 班岿然不动。黄昏时分，十几个敌人头戴钢盔，端着冲锋枪，拉成一线，嚎叫着涌上来。战士们泰然自若，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压缩干粮吃着。敌人爬到离阵地 5、6 米时，班长刘晓年一声喊“打”，全班一跃而起，猛扫一阵。敌人呀呀几声惨叫，全部毙命。

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戏英勇的边防战士倒是十分欢迎。战士们说得很明了：“不怕他多来，就怕他少来，最怕他不来。”事实正是如此，在我英雄战士面前，敌人来得越多，被消灭得就越多，反扑得越凶，失败得越惨。

在某高地，敌人刚刚爬上来，配属某团 1 连战斗的 82 无后座力炮连副连长曾卷章，跃出堑壕，从敌人手中夺过一挺轻机枪，一个长点射，一下子消灭了 20 多个敌人。

在 386 高地，敌人一个重机枪班正向我阵地扫射。某团 1 连 2 排排长何水木，从战士手里拿过步枪，说了声：“看我的！”然后举枪射击，挨个点名，8 发子弹，消灭了 8 个敌人。

连长倒下，一排长王文义站出来代替连长指挥。战士们高喊着“为连长报仇，冲啊！”的口号，像猛烈的旋风向山头卷去，很快夺下了高地。

和 230 高地攻坚战相呼应，某部 2 连也沿着右侧的山梁向 248 高地发起了攻击。在这个高地上，驻有敌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冲锋队，并构筑了 3 条坑道，6 个水泥工事，以及 25 个土木结构的暗堡，设置了 31 个明暗火力点。但这一切都没能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当战斗接近胜利的时刻，我攻击部队突然受到敌人火力的压制。一个战士冲上去爆破敌人的火力点，没有成功。在这紧急关头，跟随主攻连行动的副团长刘荣华，亲自抱起炸药包，巧妙地利用地形匍匐前进。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敌“乌龟壳”飞上了天。战士们欢呼而上，迅速拿下了高地。

担负围歼坝洒守敌的我边防某部，紧密配合，完成合围之后，兜住敌人

屁股向红河方向猛压下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晕头转向，一个个制高点相继丢失。幸存之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经过3小时激战，红河彼岸的要点全部被我攻克。通往敌人纵深的大门被我军挥起的铁拳狠狠地砸开了。

就在红河彼岸杀声震天的同一时刻，另一场紧张的战斗在红河河面上展开。我英雄的工兵部队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利用制式器材和简便器材，争分夺秒地为主力部队架设水上通道。水面上，汽艇、操舟机来往如飞；河岸上，车辆机械马达轰鸣。岸上作业组和水上作业组的战士们，沉着坚定，紧密配合。敌人的枪弹打在门桥钢板上，闪着耀眼的火花，炮弹落入河面，炸起丈把高的水柱。但工兵战士们镇静作业，谁也不去理会它。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刻，某部舟桥团的主要领导干部奋勇争先，跳入水中与战士们一同作业，使部队深受鼓舞，加快了架桥进度，门桥排藏族排长夺巴，右腿负了重伤，咬紧牙关，坚持在水中作业。连长杨志科发现他右腿流血不止，命令他立即上岸。他跛着腿找到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又不声不响地回到了战斗岗位。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临战前一天就提前交了党费。他决心为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直到舟桥架好，战友们才发现他已生命垂危。夺巴，这个藏族人民的好儿子，看到我主力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他亲手架起的浮桥上杀向红河对岸时，安详地闭上了他那虎生生的双眼。

与此同时，某部工兵连连长张兆云率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来到红河南岸的布雷区，开始了一场勇敢加技术的排雷战斗。战士们以他们熟练的技术，一气挖起了47枚地雷，随后又用挖起的地雷引爆了敌人大片的雷区，及时为大部队开进扫清了障碍。

天亮了，我边防部队的步兵、坦克、火炮，迎着晨曦，浩浩荡荡通过红河浮桥，向敌人纵深推进，直指谷柳、保胜……

据被俘的越军士兵称，战前，他们的上级命令至少要紧守半个月，可笑越南当局长期经营的所谓“红河防线”一个早上便土崩瓦解，成了历史的笑柄！

正义之师必胜，奔腾不息的红河啊，你是最好的见证！

在2号高地，一个家伙偷偷摸摸地钻上来，一把抓住了副班长杨来成的枪管。杨来成顺势用左手掐住敌人的脖子，使尽全身力气，将他按倒在地，右手带回枪来，一枪击毙了这个敌人。

敌人狗急跳墙，只落得腿断骨折。眼看反扑不成，继而变换了招数，像地老鼠一样，钻进了洞子。

“抗不住就散，跳不掉就钻”，这是“英雄团”的“绝招”。他们凭借着山高洞多、草深林密的自然屏障，依托着几年来苦心修筑的地堡暗道，妄图作垂死挣扎。见我人多就装死，见我人少就在背后打黑枪。敌变我变。我边防部队某部立即采取小群分散、交替掩护、多路攻击的战术手段。晚上派出部队封锁住大小道路和隘口，白天组织小部队分割围剿，以小群对分散，以潜伏对偷袭，以围困对钻洞，军事上打击，政治上瓦解。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一个洞子一个洞子，一片树林一片树林地实施逐点围歼。

我们的战士有勇有谋，他们充分发挥爆破筒、炸药包、火箭筒、喷火器和直瞄火炮的作用，创造了许多智勇胜敌的战绩。敌人钻进山洞里，战士们就用喷火器对着洞口喷射，直烧得藏敌哇哇怪叫。敌人匿于暗堡中，战士们

就在衣服上浇上汽油，扔进暗堡，尔后在炮弹上安上引信往里砸，炸毁了敌人一个又一个暗堡。某团2炮连3排长张署初，是摧毁敌隐蔽火力点的能手。他指挥全排将火炮悄悄推进，抵近射击，8发炮弹，摧毁敌人8个隐蔽火力点。某团2个连队，在打盘踞山洞的敌3个火力点时，量敌用兵，使用交叉火力，毙敌66人。某团一连派出小分队设伏，一次就歼灭敌人一个排。

经过反复清剿，“英雄团”的“英雄”们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炸死，有的乖乖地放下了武器，残余的一部分顽敌，利用夜幕偷偷溜进了同登城郊的中心地堡。

这个中心地堡，是越军的核心阵地。它左连火车站，右通某高地，长70米，宽40米，有2米厚的用铁轨作钢筋的水泥围墙，配置了30多个火力点。下面连着一个大溶洞，里面用钢筋水泥加筑被复，设备齐全，有密闭门、自来水、厕所、饭堂、仓库和舞厅，可容纳上千人，残存的敌人纷纷逃窜到这里，妄图负隅顽抗。但是洞深墙厚也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我边防战士采取严厉的措施，给洞里的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拔掉了这个钉子。

不可一世的越军“英雄团”覆灭了。至于我边防部队在这一仗中共歼灭了多少敌人，缴获了多少武器，最清楚不过的当然是越南当局。

第三节 铁流疾进

“王牌败北”

大炮轰鸣，铁流疾进。

我进行自卫还击的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以勇猛神速的动作，跨过红河，摧毁了敌人第一道防线之后，接着勇猛穿插，夺谷柳，取保胜，直指柑糖。正当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合击柑糖守敌之际，敌人急忙调遣 316A 师沿着 10 号公路东进驰援，企图侧击我主力部队，解柑糖之围。

316A 师是越军主力的“王牌”之一，号称“英雄师”，被授予过“决战决胜”的奖旗。该师是苏式装备，越军各部队的班排骨干的训练，均由这个师负责。每逢重大节日，越南当局都要把它抬出来炫耀一番。我自卫还击战开始后，敌人更是狂妄地扬言，它是一个“拳头”，随时要吃掉我“一个主力师”。

哪知这个牛皮吹了没几天，我代乃阻击战一仗，就把它彻底戳穿了！

代乃地区的 10 号公路，是敌人东援柑糖的唯一通道。公路边耸立着一座 500 米高的山头，是这儿的制高点。3 月 21 日，316A 师的先头部队控制了这山头。敌人占领了它，进可解柑糖之围，退可守老巢的门户。我边防某部前线首长果断地命令部队：立即夺占这个制高点，卡住敌人咽喉。

担任尖刀连的 6 连，于 2 月 22 日下午，向这个山头发起了攻击。敌人从山顶环形工事和两侧地堡以交叉火力阻止我军的进攻。6 连指战员连续奋战，越打越猛。2 班班长唐建林带领全班冲在最前头。唐建林这位英勇的战士，在战前控诉越南当局罪行时，就发誓要狠狠惩罚这个背信弃义的国际流氓。几天来，他打得很勇敢。此时他更是怒火满腔。只见他时而用冲锋枪扫射，时而扔出手榴弹，一气打死了 4 个敌人，炸塌了一个地堡。突然，唐建林中弹负伤，但他仍然奋不顾身，弯着身子往上冲。当发现敌人另一个火力点时，他先用越语喊话，喝令敌人缴械投降。一个敌人战战兢兢地爬出来，举起了双手。可是另外 3 个敌人还躲在地堡内负隅顽抗，唐建林甩出一颗手榴弹，3 个敌人顿时完蛋，接着，他带领全班继续进攻。6 班长谭光宋，在战斗中左手负伤，就用一只手扔手榴弹，狠揍敌人，后来，他身上又 3 处负伤，仍然坚持战斗，一个人就打死敌人 11 名。

6 连的勇士们奋战到黄昏，攻下了越军一个连防守的无名高地。被揍伤的敌副连长带着残兵，拖着死尸，慌忙逃命。山头上还横七竖八地摆着十几具敌尸，其中一具就是他们的连长。

敌人的咽喉被我卡住，要想驰援柑糖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不免使 316A 师的“英雄”们慌乱起来。23 日拂晓，敌人在炮火支援下，气急败坏地向我 6 连占领的无名高地拼命反扑。敌人向这块只有 600 平方米的阵地上，倾泻了几百发炮弹。6 连和赶来并肩战斗的某团 2 连的官兵，利用敌人的工事掩蔽自己，顽强抗击。敌人发起冲锋，他们沉着机警，把敌人放近到 20、30 米突然开火，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交织成一片火网。敌人被打得死伤狼藉，少数残敌抱头鼠窜。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垮了。

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几乎每隔 20 分钟就组织一次新的冲锋。兵力从开始的一个加强排逐渐增加到 1 个连、1 个营。潮水般的敌人一边打枪，一连狂吼乱叫，从左、右、正面三个方向涌来。敌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夺

回无名高地。可是，我边防战士却像一颗颗铆在岩石上的钢钉，岿然屹立。这时，在6连指战员的引导下，我远程火炮发言了！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一排排飞入敌阵，打得敌人前进不敢，后退不能。坚守在高地上的战士们见此情景，高兴得跳了起来，战斗情绪更加高涨。

在这前后，我另外两个连队也相继投入了战斗。他们攻下右侧的两个阵地，打退敌人十几次冲锋，歼灭了大量敌人，使2连和6连阵地右翼的安全得到保障。

2连和6连在炮兵战友和兄弟连队的密切配合下，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一天之内，打垮了越军18次冲锋，敌人遭受重大杀伤，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在各个阻击阵地上，我军英雄辈出。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事迹吧。

23日上午，2连3班机枪手、共青团员徐泽贵，主动要求一个人掩护全班转移阵地。当全班安全转移后，几十个敌人一边死命往3班阵地爬来，一边疯狂射击投弹，子弹打得徐泽贵身边的石头迸出火星，泥土冒起烟尘。面对步步进逼的敌群，徐泽贵毫无惧色。他有意把敌人放到近处，才突然端起机枪，猛烈开火。敌人应声倒下了一片，正当他打得起劲的时候，子弹打完了，20多个敌人包围上来。20米、10米、5米……就在敌人快要爬到跟前时，徐泽贵猛地跃出战壕，大吼一声，雄狮般地冲入敌群，趁敌人被惊呆的一刹那，奋力从一个敌兵手中夺过轻机枪，调转枪口，对准敌人就扫。十几个敌兵还没叫出声，就倒在了他的脚下。其余的连滚带爬逃下去了。徐泽贵的英雄气概，把自称“英雄师”的敌人从精神上完全压倒了！无名高地上，既有徐泽贵这样威震敌胆的英雄，又有武艺超群的勇士。彝族干部、2营机枪连排长阿尔子日，平时勤学苦练，是一个投弹能手，出手就是60米，投得很准，而且会使用多种武器。战斗激烈的时候，他一个人使用一挺轻机枪和5支冲锋枪，敌人冲上来时，他一会儿操起冲锋枪猛打，一会儿抱着轻机枪横扫。敌人吃了亏，改变战术，组织多路反扑。阿尔子日轻蔑地一笑，对战友们说：“这回该叫他们尝尝我的‘小炮弹’了！”负伤的2连副连长李玉明，立即组织几名轻伤员为他拧手榴弹盖。阿尔子日把袖子一卷，左右开弓，“嗖嗖嗖”，一气甩了3箱子手榴弹。60米开外的敌人，无论是成堆的，单个的，也不论是跑的还是趴下的，处处挨炸，哇哇叫，满坡滚。被他消灭的敌人不下一个排。

配属2连的特务连工兵排班长，共产党员李水波，是一个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战前他就向党支部立下誓言：“革命需要我流血，我毫不讲价钱；需要我献身，我脸不变色心不跳。”激战验证了他的话。23日凌晨，李水波带着一个爆破小组，正在无名高地后侧埋设定向地雷，一股敌人突然冲着他们扑来。他立即组织全组同志奋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这时，2名战士负伤，李水波腿上也中了弹。敌人得意忘形，嚎叫着窜了上来。李水波环顾四周，身边只有一根爆破筒了。他双眉一扬，命令2名负伤的战友迅速转移。然后抓起那根爆破筒，挺身跳出战壕，一把拉燃导火绳，怒目圆睁，逼视敌人。敌人惊恐万状，调头想跑，说时迟，那时快，李水波向密集的敌人猛扑过去，轰隆一声巨响，黑烟中传来敌人的惨叫声。英雄战士李水波为了战斗的胜利，毅然与6个敌人同归于尽。

敌人“英雄师”的士兵，被真正的英雄吓得目瞪口呆。一些被迫放下武器的家伙惊魂未定地说：“想不到中国军队这样勇敢！”是的，我们的战士的勇敢精神，是越南扩张主义者和被他们蒙蔽的人想象不到和难以理解的。

太阳落山了，晚霞把阵地映得火红。枪声稀疏起来。山风吹散了硝烟。尘土和汗水把战士们的脸膛涂抹成紫铜色。勇士们战斗了整整 30 多小时，干粮没吃一口，水没喝一滴，眼没合一会。但是个个精神抖擞，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突然，敌人的枪炮又响了起来。战士们紧握枪杆。准备再次迎敌。只见远处公路上敌人几辆卡车慢慢爬过来。几十个敌人从车上跳下，战战兢兢地把他们伙伴的尸体，从山坡上用绳索套住拽下去，甩上卡车。原来是敌人收尸来了。

“一辆、两辆、三辆……”战士们数着数着，敌人一共拉走 17 卡车的尸体，还有不少装不下的，被丢弃在我阵地前沿。

同越南侵略军作了几番较量，我英雄的指战员，对敌人的“特点”已经有了几分了解。战壕里，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英雄师’，真不赖，要谈本事有‘三快’：尸体抢得快，便衣换得快，向后溜得快。咳！溜——得——快！”这个顺口溜，引起大家阵阵爽朗的笑声。

在我战士的笑声中，越军“英雄师”丢盔弃甲，叫苦连天，仓惶逃入黄连山去了。

越军内部电台惊呼“禄平大败”

支马，是越南侵略军守卫禄平的前沿屏障。这里山高林密，重峦叠嶂，群山之间，只有一条公路通向禄平。越军在公路周围大小 20 多个山头上，修筑了许多明碉暗堡，居高临下，扼守着这条咽喉要道。

迅速歼灭支马之敌，是直捣禄平，策应友邻部队攻克谅山的第一仗。我边防部队某部经过周密侦察，发现敌人重点防御都设置在面向公路的一侧。他们自以为背后有海拔 1500 多米的公山，是我军无法逾越的障碍，防守比较薄弱。

“避实就虚，从敌人预想不到的公山插进去，打它个措手不及。”指挥机关拟定了战斗方案，把穿插任务交给了某团。公山，山高谷深，崖险坡陡，山上长满了带刺的灌木和茅草。整整一个团，要在一夜之间迅速荫蔽地翻山越岭，辟路前进，穿插 16 公里，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过去，真是谈何容易啊！天险阻挡不住我英雄的边防战士，在夜幕的掩护下，某团像一把利剑，悄无声息地直插敌后。荆棘撕破了战士们的衣服，划伤了手脸，尖石碰伤了腿脚，谁也没哼一声。遇到笔陡的悬崖，他们就一个一个拉着往上攀；有的地方不好走，战士们就爬过去。经过 12 小时的奋战，全团终于越过了敌人的“天然屏障”——公山。

担任尖刀的 7 连，首先插到敌人 612 高地。这里是敌人的主阵地，守敌是越军号称“决胜营”的 1 营营部和 1 个连。敌人曾经狂妄地吹嘘：“当年法国军队攻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攻下 612 高地；中国军队没有半个月，休想上来。”愚蠢的敌人是无法正确估量我军战斗力的。7 连如同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连长向万初带领主攻排，越过了两道战壕，逼近又一道战壕时，发现敌人正在睡觉，他们猛然向掩体内投去一排手榴弹。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只好赤膊光脚地负隅顽抗。战士猛烈开火，敌人死伤大半；剩余的敌人想夺路逃命，战士们哪里肯放！身负重伤的新战士吴建国，发现一个敌人要从他身边逃走，他猛地扑过去，扭住敌人滚下了悬崖。敌人当场摔死，英雄的战士吴建国壮烈牺牲。

在主攻排打响后，指导员郭友生带领助攻排的官兵，从山头的另一侧，迂回到敌暗堡前，摧毁了一个个火力点。全连官兵奋勇歼敌，仅 3 个小时就攻下了 612 高地，毙敌 61 名，俘敌 2 名。敌“决胜营”的旗子，被丢弃在敌军的尸堆旁。

在 7 连攻下主阵地的同时，其他连队也向 400、504 等高地上的敌人发起了猛攻，一举歼灭了盘踞在支马一带的敌人 123 团 1 营。

我军攻下支马，打开了禄平的锁钥。但是，禄平周围围裹着许多像蘑菇一样的大小山包，惊魂未定的敌人，还想凭借分布在我正面的 45 个支撑点，节节抵抗，与我周旋，以迟滞我军的攻击速度，等待增援。

敌人的算盘照旧是要由我们来拨动的。我指挥所在对越军动向作出准确判断之后，决定采取快刀切瓜，以快制慢的打法。兵分 6 路，快速推进，分片包围，逐点聚歼，迅速拿下 45 个敌支撑点，直逼禄平。

攻击开始后，一路路突击部队直插敌人各个支撑点。某团 1 营担负攻占 1、2、3、4、5 号高地的任务。这 5 个高地连绵相接，周围布满了地雷和明暗火力点，由敌一个加强连连环固守，我 1 营 2 连经过侦察，避开敌人精心布设的雷区，迅速穿插到 1 号与 5 号高地之间，首先向离禄平最近的 5 号高

地发起了猛攻。一排长肖开清带领一个战斗小组钻到敌人跟前，一跃而起，枪口几乎戳着敌人胸膛开火，一口气打死了8个敌人。全连仅用20分钟就拿下了5号高地。

与此同时，全营各连向其余4个高地一齐发起攻击。敌人防不胜防，无力互相支援。在我炮火的配合下，1营只用了1小时50分钟，就全部攻占了这5个山头，歼敌88名。1营连续作战，又乘胜攻占了6号、7号等6个高地，一天打掉敌人11个支撑点，向前推进了6公里，其他部队也迅猛穿插，分割包围，很快就攻占了敌人的45个支撑点。

打下了支撑点，禄平失去了依托，成了一座孤城，我军迅速挥师南进，提前3个小时攻占了禄平，全歼敌123团3营。

打下禄平之后，敌123团2营连滚带爬逃过奇穷河，躲进迷迈山，与那里的守敌一个加强营汇合一起，妄图凭险固守，逃避覆灭的命运。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指挥部决心乘胜追击，全歼迷迈山守敌，堵住谅山的后门，阻止敌人增援，保证友邻部队全歼谅山之敌。清晨，某团指战员向奇穷河奔袭。2连的战士跑在最前面，汗水湿透了衣服，一个个像从水里钻出来似的。战士们只有一个信念：咬住敌人，吃掉敌人！全连2小时10分钟奔袭了36里，在奇穷河边的扁福追上了部分逃敌。战士们迅速投入战斗，一阵猛打，歼敌178名，抢占了扁福渡口，为全团渡过奇穷河扫除了障碍。

奇穷河，宽150多米，水深流急，只有扁福渡口水缓滩平，河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沙丘，可以涉水过河。敌人在对岸组织严密火力封锁，重点把守。硬过不行，只能巧渡。指挥所命令2连攻占河中心的沙丘，摆开过河的架势。以吸引正面敌人的火力。然后，1连、9连分别从2连两侧300米远的深水处，同时抢渡。2连连长徐胜福带着两个班，在火力掩护下，涉水过河，冲上沙丘。果然，敌人轻重武器一齐向沙丘打来。趁此机会，1连从上游，9连从下游，有的泅渡，有的涉水，边打边进，像两游龙一样直取对岸。这样一来敌人的防御正面扩大成600多米，无法阻止我军的前进。2个连队登上对岸，迅速抢占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扫射，把一部分敌人消灭，另一部分敌人慌忙逃向迷迈山。全团顺利渡过奇穷河，向迷迈山发起了攻击。

敌人在迷迈山大小十多个山头上，配置了山顶、山腰和山脚三层火力。从下逐层向上打，费力费时。指挥员决心先抢占主峰，中心开花，从上向下，从里往外打。指挥所命令3连和9连向两个高峰猛插。9连摸到右峰山脚班茂村时，只见一个排的敌人扛着炮从面前通过，战士们真想狠狠地揍它一顿。连长俞历金决定避开敌人，直插敌军心脏——右峰峰顶。接近主峰时，遇敌阻击。俞连长命令2排正面冲击，3排从侧翼迂回，迅速攻占了主峰。左峰上的敌人听到右峰有枪炮声，急忙布置抵抗。未曾就绪，3连已经插到峰顶，剪断了电话线，直捣敌人的指挥所。占领主峰后，两个连队从山顶往下冲，包围迷迈山的连队从山下向上打，内外夹攻，打得敌人无处藏身。这一仗，歼敌480余名。至此，敌123团及155团第6营被我全歼。

敌人丢了禄平，损兵1个团，狗急跳墙，总想寻机向禄平反扑。为了扩大战果，彻底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军主动撤出禄平，诱敌入瓮。敌1个营和1个特工队，以为有机可乘，连夜北渡奇穷河，向禄平开来。

愚蠢的敌人果然被我牵住了牛鼻子，某团奉命埋伏在禄平东北一带，占领有利地形，布下口袋，待机歼敌。

第二天傍晚，越军特工队两个加强排，分成三路，偷偷地向我守卫在禄平附近的8连摸来。副连长孙新安带领2排埋伏在一堵围墙后面，仔细观察着敌人的动静。敌人毫无察觉，全部走进伏击圈。孙副连长首先开火，顷刻间，围墙的射孔里，喷吐出条条火舌，把敌人打得乱成了一窝蜂，有的应声而倒，有的四处逃窜。接着，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阵地前又留下了十几具敌尸。这时，敌人才开始清醒过来，拼命组织反扑，用40火箭筒，60炮、轻重机枪向8连疯狂射击。有我们的勇敢，就没有敌人的顽强。6连机枪手侯家玉，一阵扫射，把冲过来的6个敌人全撂倒了。这场战斗，8连2排歼敌28名，自己无一伤亡。与8连并肩作战的7连1排，也毙敌31名，俘敌1名，猖獗一时的敌特工队，终于没有逃脱出覆灭的下场。

禄平之战，一攻，一追，一撤，给了敌人三次狠狠打击。不可一世的敌人，也不得不在他们内部联络的电台惊呼：“禄平大败！”

禄平之战，我军全歼守敌123团及另外两个团各一部，外加一个特工队。我军打得勇猛神速，机智灵活。

一个在禄平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越军上尉，心惊胆战地说：“想不到你们穿插这样快”，“想不到你们攻击这样猛”，“想不到你们的打法这样怪”……

敌人正是在这一连串的“想不到”中被歼灭了。禄平之战，给敌人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远远超过了它在人和武器装备上所受到的直接损伤。

观凉山 黎笋良久不语

凉山是越军防御重点，敌部署了第3师另7个团（旅）的兵力（战斗打响后，又增调了第327师，加强纵深防御）。我广西方向以9个师的兵力，加强部分炮兵和坦克部队，于2月27日对凉山、禄平、广浪地区之敌发起攻击，3月2日攻占了凉山市北区，基本歼灭了敌第3师主力和公安第12团。

3月4日早晨7点钟，我边防战士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分多路强渡奇穷河。担任中路突击队的某部5连指战员们，紧跟着最后一批呼啸的炮弹，奋勇冲上铁桥。连长周端清带领战士快冲到桥南头的时候，敌人一辆装甲车掩护步兵扑了过来。5连火箭筒手连发命中，把敌装甲车打歪在桥边，冲在最前头的1排3班和敌人展开近战；消灭了守桥的敌人，夺取了桥头堡。

5连的战士们继续前进，沿着南市区东部的铁路线两侧，接连攻下凉山市委办公楼、汽车站和邮电局。打到火车南站时，遇到一个连的敌人反扑，连长周端清负了伤，但是他继续勇敢机智地指挥战士们包抄、围歼敌人，占领了火车南站。

紧随5连过桥的步兵4连，也攻占了凉山市行政银行、凉山省公安厅和越军一个近3000平方米的营房，军营里的越军丢下了一些尸体和枪枝弹药逃向南山。4连乘胜追击，又攻下了市南3公里的敌弄昆据点。

经过4日整天的激战，我攻入南市区的边防部队，痛歼守敌越军精锐第4师，先后拿下了奇穷河南的文庙山及其以东、西南和南面的10座高地。这些山头高地，都是凉山市南部的屏障。

3月5日新的捷报传来：417高地、627高地和413高地都夺下来了！

高地是凉山市西南面公路旁敌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某部3连的勇士们向高地攻击时，冲到半山腰，一道布雷阻住去路，每个地雷都有电线相连，一个敌人正躲在掩蔽部里拿着电发火装置，企图引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排长刘东胜和战士张庆利翻身卧倒，爬进布雷区，一个用牙齿咬断接雷电线，一个用剪刀把电线剪断，然后又机灵地用双手接连排除了30多枚地雷。2排长周道裕和机枪手苏军焕，一个箭步冲到掩蔽部前，把那个企图引爆地雷的敌人打死了。战士们一阵“杀”声冲上主峰。这时，两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宣告凉山之战胜利结束，时间是3月5日下午2时40分。至此，凉山以南制高点全部被我军控制，通向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当天晚上，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开始撤回中国境内。

3月31日，黎笋视察“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军事重镇凉山。这里的春天满目疮痍。他良久不语。

这次作战，我参战部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攻占了高平、凉山、黄连山、莱州4个省的21个县（市）和广宁、河宣两省的部分地区。歼灭和重创了越军第3、第316A、第345、第346四个师另7个团、25个营（队），部分歼灭和打击了越军第325B、第327、第338个师另12个团（旅），拔除了35个越军公安屯，共歼敌5万余人，其中俘敌2173人。缴获各种火炮916门，各种枪、火箭筒16062支（挺、具），汽车236台。击毁敌大批火炮、汽车和一部分坦克、装甲车。摧毁了高平、凉山、老街地区的大部分军事设施。

作战中，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空军只在我境上空巡逻警戒；海军只在北部湾中心线我侧海域活动，均未主动出击。

第四节 友谊关重放光彩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1993年8月24日，中国和越南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在钓鱼台开始进行。这次谈判是中越双方在新的形势下，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谅解，就边界问题举行的第一轮政府级会谈。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率领，越南政府谈判代表团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宽率领。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在争取各自民族的解放和建国后的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但在越南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后两国关系恶化，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发生了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1988年3月14日，双方在中国南沙群岛赤瓜礁海域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处于对抗的不正常的状态。

为了维护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越两国之间存在的争端问题。在中越发生边境武装冲突期间，中国政府多次建议中越政府在双方同意的地点尽快举行适当级别代表的谈判，讨论恢复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问题，进而解决有关边界和领土的争议。经过一再努力，中越副外长级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在河内举行，第二轮谈判于同年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谈判中表现了诚意，提出了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的八项原则建议，主张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有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争端问题，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谋求合理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它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等。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为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为排除柬埔寨问题这一中越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中国外交部于 1983 年 3 月 1 日发表声明，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建议，并且为推动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行了不懈努力，1989 年 1 月至 1991 年 8 月期间，中越先后在北京和河内举行了五轮副外长级磋商。双方主要就越南从柬撤军、停止外国军援、柬过渡时期临时政权和柬四方军队的处置以及联合国作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989 年 10 月 7 日，邓小平主席在会见老挝领导人凯山时请其向越南领导人传话，指出中国愿意改善同越南的关系，但越南必须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从柬埔寨撤军。只有做了这件事之后，才能说结束过去。

为打破僵局，中国在积极参加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磋商的同时，1990 年 6 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徐敦信以中国驻越大使客人的名义前往河内，同越南副外长陈光基非正式交换意见。中方对柬过渡时期政权提出了以下两种选择：

1. 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由四方组成的柬全国最高委员会是柬过渡时期唯一合法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对外代表柬埔寨，占据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内行使立法和行政职能，掌握影响未来大选的几个关键部门。

2. 该委员会授权联合国在过渡时期实施行政管理。中方并主张，柬各派武装力量在联合国监督机制指定的地点集结，全部解除武装或大量削减。由于越南主张原封不动地保留金边政权及其武装力量，此次交换意见没有取得进展。

1991 年 8 月 8 日至 10 日，中国副外长徐敦信同越南副外长阮怡年在北京钓鱼台举行第五轮磋商，双方主要就落实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框架文件，及有关联合国驻柬埔寨机构与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关系和柬埔寨四方军队的裁减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基本上达成共识。双方重申柬埔寨问题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框架文件的基础上早日获得全面、公正、合理的解决，希望柬埔寨各方尽快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还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尽快恢复两国经贸、交通、邮电等业务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这次磋商结果表示满意。

1991 年 9 月 9 日至 14 日，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的邀请，越南外长阮孟琴正式访华。这是中越关系恶化以来越南外长首次访华，标志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已提上日程。双方表示愿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柬埔寨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文件基础上，在巴黎会议范围内，为最终获得全面政治解决作出积极努力。双方认为，中越之间应当恢复睦邻友好关系。长期对抗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要回到 50 年代的水平也是不现实的。双方同意将采取切实步骤，恢复两国经贸、科技、交通、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逐步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双方就今后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及越南领导人年内访华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一致看法。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91年10月23日，巴黎国际会议正式签署《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标志着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1年11月5日至10日，应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越南高级代表团正式访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同杜梅总书记、武文杰部长会议主席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党关系、柬埔寨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相互通报了各自国内的情况。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谈中指出，中国方面珍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希望早日结束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经过联合国、国际社会和柬埔寨四方的努力，10月23日在巴黎签署了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定，现在，阻碍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已经解决，中越之间结束过去、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晤，它必须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杜梅总书记表示，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历史的必然。这次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阐明了指导今后中越关系的原则，指出中越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恢复正常关系；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鼓励两国边民恢复和发展传统友好往来，把中越边界建成和平与友好的边界；两国之间存在的领土等遗留问题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适当时候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族居对方国家的侨民问题。越南方面重申，越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方面对越南方面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中国方面重申，坚决反对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同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或进行任何具有官方性质的往来。中国方面对越南同台湾只进行非官方的经济贸易往来表示理解。双方声明，中越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影响各自同其它国家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中越两国都不在本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也反对任何谋求霸权的企图。

李鹏总理应邀访越

1991年11月中越高级会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并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中越间最大的公路口岸友谊关已正式开放，双边经贸、海运、航运、邮电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卫生、教育、出版、体育、气象、银行等其它领域的关系正在逐步恢复。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正在扩大。1992年两国贸易额达2亿美元。

1992年2月，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应邀正式访越。9月，中越副外长在河内举行磋商，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10月中旬，中越边界专家小组在北京举行第一轮谈判，就解决两国边界领土争议的原则交换意见，取得一些成果，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双方商定，专家小组第二轮谈判将在河内举行。1992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李鹏总理应邀访越。这是对越南领导人1991年11月访华的回访，也是中国总理21年来首次访越，是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双方充分肯定了中越关系正常化一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进展，一致同意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关系。双方确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领土争议问题，同意加快谈判进程，在继续进行专家级谈判的同时，尽早开始政府级的谈判，在争议解决之前，双方都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的行动。这为今后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访问期间，发表了中越联合公报。李鹏总理此次访越对进一步推动中越关系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12月7日至15日，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的邀请，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段奎大将率领越南军事代表团正式访华。此访标志着中越两军已恢复了正常关系。12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会见段奎部长时表示相信，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在两国关系的基础上也会得到进一步推进。

截至1992年12月，双方共签署了12项协定，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经济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邮电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交通运输邮电部国境铁路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投资保护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中越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1994年11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结束了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离开雅加达，前往胡志明市，开始此次东南亚之行的第四站——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从日程、成果与《中越联合公报》来看，江泽民可以说取得了圆满成功，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越南独立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国关系一直是比较友好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陷入低潮。随着越军从柬埔寨的撤出和越南推行革新开放路线，中越关系出现了转机。1990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访华，与江泽民在成都举行会谈，为中越关系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气氛。1991年越共七大之后，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代表团访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高级会晤，宣布中越关系正常化。

中越关系引人注目之处在于：

第一，两国之间存在边界领土问题，尤其是海上的领土问题。1991年双方都宣布，坚持以谈判和平解决陆地边界与北部湾划分问题。这次中越峰会再次强调：继续就海上的问题进行谈判，以便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的和长久的解决办法。在问题解决前，双方均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或扩大化的行动，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采取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予以妥善处理；不因分歧而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这就确立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务实的原则。有了这个原则，双方就不会受到分歧与意外事件的影响。这是中越两国与执政党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今后双方长期稳定的关系是可以预期的。

第二，双边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是中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界的硝烟尚未完全消失之际，中越的边民就已经开始了自发的边界贸易，此后随着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边界的贸易更加兴旺。然而由此也出现了一些亟待双方政府从高层次加以解决的问题，以提高双边贸易的水平，使之更加协调、有序地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这次中越双方签署了关于成立中越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汽车运输与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和相互谁等三个协定，有了这三个协定，中越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必将在更高的水平、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发展。

第三，双方重新确认了1991年11月《中越联合公报》的共识，即越南方面重申一个中国的立场，表示越南只同台湾进行非官方的经贸往来，绝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由于台湾最高当局推行所谓南进政策，而台湾对越南的投资较多，台越贸易额也较大，中越最高级会晤作出这种重申是完全必要的。

第四，江泽民在越南指出，中国与越南都在推行改革开放或革新开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国的共同语言也很多，许多经验和做法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这是中越关系的又一个特点，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现实的基础。

江泽民越南之行获得圆满成功。中越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经济发展。

第十七章 火龙撼宝岛，三军震台海。美国 航空母舰故伎重演，举世注目海峡局势

第一节 人民军队威显东南海域

硝烟重现海峡上空

这是一个略呈喇叭状的狭长水域。

人们称之为台湾海峡。

它的海面积约 6 万平方公里，南北长 380 公里，最宽处 370 公里，最狭处 185 公里。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在隆隆的炮声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及其家眷，以及其他一些追随国民党的人，共约 200 万人，先后离开大陆，匆匆跑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仍自称为“中华民国”。凭借其残余武力和海峡天险，在美国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人民力量对峙，使中国处于分裂局面。

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倾听两岸民众的强烈呼声，为早日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到解放军停止对金门的炮击、主动裁撤福州军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改善两岸关系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努力，两岸关系才得以逐渐从隔绝到交往，由对峙到缓和。

1991 年 6 月 7 日，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受权建议：国共两党派出代表进行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合情合理，言真意切，得到两岸人民的普遍拥护。人们希望台湾当局对江泽民主席的提议作出积极回应，并以此为契机，带动两岸关系迈向新的阶段。但是，李登辉在同年 4 月 8 日的谈话中表示，要谈判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中共必须首先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李登辉的“条件”实际上是设立了不切实际的障碍，完全是企图将此一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数月之后，李登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挟洋自重，跑到美国去大肆兜售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台独”私货，公然在国际上公开进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祖国的活动，引起中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不惜花费台湾人民的血汗钱，大量向外国购买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并在短短半个月连续 4 次进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军事演习、人为升高恶化两岸气氛。

为了反分裂，反“台独”，显示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数次进行了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训练。1996 年 3 月 5 日 6 时，新华社再次受权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 1996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15 日，向北纬 25 度 13 分、东经 122 度 20 分，北纬 25 度 13 分、东经 122 度 40 分，北纬 24 度 57 分、东经 122 度 40 分，北纬 24 度 57 分、东经 122 度 20 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以及北纬 22 度 38 分、东经 119 度 25 分，北纬 22 度 38 分、东经 119 度 45 分，北纬 22 度 22 分、东经 119 度 25 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四发地对地导弹成功试射

深夜，万籁寂静。

现代化的通信设备，神秘地传播着一道道作战命令。隐蔽在各集结地域的导弹发射部队，迅速地向目的地机动。指挥所里，宽大的屏幕上不断显示出各发射阵地的场景：身着迷彩服的指挥员，沉着、果断地下达命令，及时处置各种情况；参谋人员通过联网微机迅速准确地掌握发射准备的进程。

“一号手准备完毕！二号手准备完毕……”随着洪亮的报告声，一枚枚威武挺拔的乳白色导弹，耸立在群山环抱的各个发射阵地，官兵们严阵以待。

指挥所的微机屏幕显示：各发射阵地导弹技术状态良好，发射人员已全部进入号位；情报观测系统已启动，各观测点已做好观测准备；保障分队已做好各项保障。

导弹一触即发。

“点火！”

随着指挥员下达的发射命令，一发发导弹喷着长长的火龙，撕破长空，飞向预定目标……

“轰……轰……”

顿时，目标海域水柱冲天，地动山摇。

“第一发导弹命中目标！”“第二发导弹命中目标！”……

这一声声激动人心的报捷，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以提高整体作战能力为目的的丰硕训练成果；标志着第二炮兵部队和全军将士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3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

3月8日至15日，第二炮兵部队以4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的佳绩，圆满完成了地对地导弹向东海和南海海域的发射训练任务，充分展示了第二炮兵部队良好的军政素质、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近些年来，第二炮兵部队以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

队建设思想为指导，遵照军委主席江泽民关于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结合第二炮兵武器装备不断发展，导弹已形成多型号系列化的实际，加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广大官兵努力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深化训练改革，积极开展战法研究，快速机动作战能力、准确打击目标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在发射现场，记者采访前来看望参训部队的第二炮兵司令员杨国梁、政委隋永举。他们对记者说，这次导弹发射训练的成功，锻炼了部队，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检验了科研和训练改革成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们表示，第二炮兵部队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江泽民主席关于《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江泽民主席关于“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提高第二炮兵部队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

防卫作战能力，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应有的贡献。

海空实弹演习

3月15日，新华社在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和南海进行地对地导弹训练结束同时，受权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96年3月18日至3月25日，在北纬25度50分、东经119度50分，北纬25度32分、东经120度24分，北纬24度54分、东经119度56分和北纬25度12分、东经119度26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进行陆海空联合演习。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群鹰”角逐闽南上空

闽南某地。

风云变幻的某海湾上空，成为展示空军战斗力的大舞台。

尽管当时气象条件复杂，但没有阻碍由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电子干扰机、侦察机等组成的强大突击集团，展开精彩的空中打击演练。

共有十多个兵种参加了此次演习。参演兵种、机种之多，出动飞机的批次、架次之多，发射实弹之多，演练难度之大，协同之复杂，都是近年来少有的。演习中既有歼击机群对“敌机”实施猛烈攻击，夺取制空权；又有联合突击机群采用多种手段，低空超低空连续突击“敌”海上和陆地的重点目标；还有航空兵与地空导弹、高炮部队空地协同抗“敌”空中突击。既有空地火器的“硬摧毁”，又有电子战的“软杀伤”，展示了我人民空军的综合作战能力。空军航空兵以先进战机作拳头，组成联合机群，使空军的空战能力和对地、对海攻击能力大为提

高。

地空导弹兵也由过去单一型号装备向具有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多型号相配套的防空体系发展。尤其是一批新装备在这次演习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先进歼击机的空中截击如闪电霹雳，强击机的低空突击像惊雷蹈海，新型地空导弹的发射似利剑劈空，轰炸机云中投弹如泰山压顶。连续实施的攻击如骇浪惊涛，波波相连，排空而来，势不可挡。整个演习，贴近实战、组织周密、协同密切、连续实施，展示了空军部队各级指挥员的良好素质和指挥能力。

“长鲸”出没南海水域

在南海某海域，人们目睹的则是另一番场面。

空中机群破雾穿云，海面战舰铁阵森严，水下“长鲸”游弋出没。

由核潜艇、新型常规潜艇、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先进的电子侦察船等多个舰种数十艘战舰和海军航空兵多个机种组成的海空突击力量群，演出了这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海上诸兵种实兵实弹演习。

舰机协同夺取海上制空权，空空导弹如空中迅雷，舰空导弹像万丈长缨，打得“敌”机灰飞烟灭；联合反潜，舰载直升机编队搜索，准确定位，与水面舰艇联手攻击，鱼雷、火箭深弹齐发，让深藏水下的“幽灵”葬身鱼腹；贯穿全过程的电子战，动用部署在空中、海上和岸基的电子装备协同进行的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支援作战，显示了我军在这一“特殊战场”的制胜能力；多舰种、多方位的导弹攻击，阵容不凡的多艘驱逐舰、护卫舰的导弹齐射，诸兵种合同打击“敌”战斗舰艇编队，是这场演练最振奋人心的一幕。

尽管演习气象复杂，但海军官兵凭借精湛的技术、良好的指挥，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高难度的实弹演练：

三军联合渡海登岛

台湾海峡。

风雨交加，浪高涌大。

由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登陆舰艇和民用船只组成的登陆编队，在空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舰炮、导弹强大火力的支援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军”的拦阻行动。

空中硝烟弥漫，海上水柱冲天。扫雷舰、猎潜艇奋勇当先，破除水际滩头障碍；水陆两栖坦克突击群跃出登陆舰，多梯队编波冲上滩头；由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等组成的登陆艇波和搭乘民船的民兵、预备役部队编队，连续抵滩冲击。

海军陆战队乘坐气垫船和冲锋舟，像一支支利箭射向登陆点；神勇的空降兵和陆军特种兵，在“敌军”纵深阵地伞降、机降着陆，实现了指挥员多点登陆、立体突破、分割围歼、夺占和连接登陆场的战役意图。

岛上山地进攻作战演习地域山峦起伏。完成登陆后的我主攻部队在空军、陆军航空兵和地面炮兵火力掩护下，采取并肩突击、两翼卷击、乘隙穿插和越点攻击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手段，集中兵力火力向“敌军”发起猛攻。顿时，战机呼啸，战炮轰鸣，使“敌军”前沿笼罩在火海硝烟之中，为主攻部队向“敌”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担负主攻任务的部队是参加南昌起义的红军部队，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在诸军兵种以空中打击、火力拦阻、电子干扰、障碍迟滞、兵力抗击等多种手段联合抗“敌”反击的同时，由直升机、坦克、炮兵和步兵组成的我合成突击群，以风卷残云之势围歼了纵深核心阵地之“敌”。

3月18日至25日，我军又成功地举行了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演习。参加演习的三军技术、后勤保障部队官兵运用伴随保障、强行保障、立体保障等多种方法，为三军联合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后勤保障。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具有拥军支前光荣传统的福建省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急部队所急，送部队所需，成为三军将士坚强的后盾。

在这次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中，一系列高科技装备发挥了拳头作用，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强，新战法运用威力大，克服恶劣天气和复杂海情影响的办法多，进一步增强了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政治委员方祖岐表示，南京战区三军官兵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随时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在会见参演部队领导干部时作了讲话。他指出，我军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主席关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增强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多做贡献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张万年强调，我们主张并且一贯致力于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出现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独立”，我们将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节 宝岛震荡

台湾当局紧急磋商对策

在我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期间，台当局颇为紧张，多次召集高层开会研商对策。3月5日，台“行政院”召开临时决策小组紧张会议，由请假参选的“行政院长”连战销假亲自主持，听取相关部会对我导弹试射采取的因应措施的报告，并作了若干指示；同日“立法院”的两岸情势因应小组也就此事紧急开会，听取“国防部长”蒋仲苓的简报；8日“行政院”临时决策小组再次开会听取“国防部”、“国安局”汇报有关我已发射三枚导弹和在台南方海域发现我观测舰情况。11日连战再次召集临时决策小组会议，指示尽力维持国际航海、航空路线畅通，继续稳定股市与外汇市场。另外为因应两岸情势的演变，副组长徐立德与临时决策小组中有关“国际”、“外交”的成员已固定每周会面一次。

台湾“行政院”和“陆委会”都发表了色厉内荏的声明，要求“中共当局悬崖勒马，立即停止此种危险的行动，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中共当局负责”。“外交部”通电台驻外“使馆”及办事处，重申台“反台独政策”，呼吁“各国主持正义声援台湾”。“国防部”则声称“若中共犯台，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岛内民众情绪不稳

我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期间，台湾社会情绪不稳，金融、股市动荡，为此，台湾当局动用储备基金和银行介入等手段，稳定金融市场，但民众紧张不安的心理仍处处可以感受到。位于前线的金马驻军演习频频，白天都把炮衣卸下，基隆港连日来军舰调度频繁，沿岸山丘据点，更架上防空武器，桃园、台南、嘉义等空军基地军机起降频繁。许多居民开始逃离距导弹训练海域不远的地区，致使岛内许多地方飞机票难求，多个航班改道，每天影响逾300次航班。在南部的高雄市，当地政府举行一场模拟战时实行食物配给的演习。

由于台湾当局宣布不排除在台海情势进一步恶化的状况下，停止股市、汇市交易。敏感的投资者开始大量抛售股票，许多居民开始挤兑外汇，抢购粮食和黄金。几天内，黄金价格上涨了20%至30%，仅3月6日一天民众就挤兑5.1亿美元，尽管台“中央银行”介入动用储备金稳定汇市，但许多银行美元仍“告急”，黑市交易有增无减。3月5日台北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指数下跌62.49点，11日下降了169点。

台湾当局紧急抛出3000亿股市稳定基金，仅在11日就购买了70亿台币的股票进行干预，约相当于全部交易额的30%，并称还将扩大基金数目。“中央银行”也介入外汇市场，稳定1美元兑换27.5台币的水准，并称即使外汇储备从目前的近900亿美元，下降到500亿美元也在所不惜。台湾“经济部”也拿出备妥的重要“计划”，称一旦“国家”动员，便可将14类军需工业，总计500家的厂商纳入执行动员计划，统配生产军需及民用产品之中。

全岛反李声浪趋高

台湾两个主要在野党民进党和新党及各派政治势力对我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予以抨击，认为这是目的在于事实上封锁台湾南北两个主要国际航道。民进党扬言要到弹着区域抗议，并于10日分别在台北和高雄举行“反侵略、反统一”大游行，同日新党也在台北发动“黄旗反战爱和平”车队游行，呼吁朝野组特使团，与大陆协商停止军事行动。但作为造成紧张局势的责任者——李登辉，也受到各方激烈批评。

民进党发表声明，重申李登辉应停止无谓而遥远的“战斗呐喊”，应成立“危机政府”。新党指责台海危机“完全是李登辉一个人造成的”。台湾无党派“总统”候选人陈履安对记者说：“投票支持李登辉就是投票支持战争”。他说：“共产党中国的军事演习是针对李总统的独立倾向的，每个人都应当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我们生活不能依靠他的轻率和挑衅的个性。”他又说“李应退选才能救台湾”。而另一“总统”候选人林郁方则批评李登辉“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能把2100万同胞的福祸生命和他绑在一起作为赌本”。他并讥讽李登辉有“18套剧本对付中共，我看他如何处理这种局势”。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彭明敏也直接了当地说：“行动是李登辉引起的。”多位新党籍立委强烈批评李登辉是“台海危机的乱源”。林郁方指出，李登辉的18套剧本没有一本可因应飞弹演习。面对台湾当局欢迎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干预，陈履安再次批评道：“不要指望美国会以世界宪兵的身份对台湾问题深入干预。”他还指出：“美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活动的，台湾在美国与中共的游戏中只不过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一张牌而已。”

岛内媒体反应强烈

岛内媒体对我军事演习反应强烈，几乎所有报纸均在头版、焦点新闻栏目、要闻版大量报道我演习消息，并发表社评，显示对此事的关注程度。台《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等一些主要报纸从3月6日开始还专门辟有“两岸关系特别报道”或“大陆军事演习特别报道”栏目，每天用5至7个整幅版面报道我军事演习情况，远远超过仅占一个版面的“总统选举特别报道”而成为台选举前的热点问题，综合台报的反应有：

一、台报认为演习主要是政治目的：“企图影响我总统大选”，拉低李登辉的得票数，以“压制他们认为日渐高涨的台独意识”，彰显反台独的信心。

二、显示具有封锁台湾海峡能力。认为海空实弹演习覆盖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导弹试射选择台湾南北两端，足以威胁基隆、高雄港对外航运，表明具封锁台湾航道实力。

三、认为我两个演习海域都越过台海中线，表明我40多年来否认台海中线默契的意图已很明显。认为一旦我否认台海中线默契，将使台海情势改观，显示中共正逐步对台防务施压。

四、测试美、日等邻近国际反应。认为此次演习和1995年两次演习比较，客观环境已显著不同，即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警觉，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关注”。

第三节 香港各界反应强烈

港府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在我发射导弹训练和举行实弹演习期间，香港各界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并迅速作出了反应，主要报刊均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评论、消息和图片。

香港行政局 12 日听取港府就两岸局势发展对香港影响问题所作的评估报告，认为香港的经济相当稳健，港府的管理亦很稳健，因此对台海局势无须作出过敏反应，但港府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行政局召集人王■鸣说，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争取美国无条件地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香港要在这方面多做工

作。她希望两岸都能本着以和为贵的精神，使事态尽快得到解决。她说，以冷静及克制的态度来处理两岸关系问题，这样对香港及亚太地区都有利。如果两岸紧张关系升级，将无可避免地影响香港经济。

香港行政局议员陈坤耀说，“由于大陆进行军事演习，海峡

两岸军事情势确实较为紧张。但是这种紧张关系属暂时性情况，对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仍应持乐观态度。”他还说，“中共军方频频在台湾近海举行军事演习，主要是对台独势力发出强烈警告信息。但是，除非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否则两岸之间将不会真正开战。”他相信在台“总统”选举结束之后两岸关系会逐步缓和下来。他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人内部的问题，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任何问题都应该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行政局议员麦理觉说，“如果中方只是对台湾‘总统’大选进行军事恫吓，那么在选举尘埃落下之后，两岸会转为政治商谈。不过，这种良好愿望能否实现将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还说，“成功和稳定的经商环境，有赖和平的国际形势。如果中国动武，香港经济肯定受到严重干扰，损失重大。若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香港的过渡及 1997 年后的发展前景将会变得十分暗淡。”另一位行政局议员郑海泉表示，任何政治紧张局势必定会影响经济活动，他非常希望两岸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

经济学术界担心经济损失

香港经济顾问邓广尧 3 月 11 日预测，如果两岸局势进一步恶化乃至开战，香港经济将遭受一场严重打击。他指出，目前两岸局势会否继续发展及美国会否延续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已成为影响香港经济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根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字，1995 年两岸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总额已达 1100 亿港元（约合 141 亿美元），占香港整体贸易总额的 10%。因此，“两岸一旦开战，对香港的影响实在非同小可”。

据港报报道，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十分关心两岸局势演变。香港民间普遍相信，一旦两岸开战，不但台湾的经济将立即受到破坏，大陆近 20 年来推动经济改革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也将“付诸东流”，而香港也将丧失担任两岸经贸及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其所蒙受的损失将难以估计。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教授李南雄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港人正以“忧心而无奈”的心情密切注视着台海局势的发展，他认为，就目前而言，“两岸没有开启战争的动机，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只要给予时间，两岸和平仍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表示担心事态会因美国介入或“擦枪走火”而引致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他说，“近年来台商纷纷前往大陆投资，大陆早已取得战争所得不到的经济实利。”香港著名政治评论家余立人认为，“当前的台海风云是李登辉一再激怒中共而引起的。1995 年 6—8 月以来中共持续批李，说明对李登辉的认知出现了转机：中共断定李搞‘台独’，对他完全失望；认为李登辉这样搞下去，将把台湾带向绝境。”他说，李登辉等人的政治理念是美国式和日本式的，不是中华民族式的，根本不理睬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文化，也不知道台湾千万不可在民族统一原则问题上与 12 亿大陆人民决裂的道理，这样就将局面推向了难以收拾的境地。对中国民族心理的无知和对中共“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生存哲学缺乏足够的认识是李登辉的最大盲点。

媒体各抒己见

香港各大新闻媒体都对台海局势的发展进行了跟踪报道。各报对事态发展的见解不尽相同，但主调是希望两岸当局采取克制态度，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天天日报》说，继试射导弹和海空军实弹演习后，预计 21—23 日台大选期间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演习。还说这一举措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的。若李登辉不放弃台独立场，中共对他的压力就不会放松。

《成报》等几家报纸认为，在演习期间，台港之间每天 300 多次航班要改线飞行，基隆和高雄两大港口的货运陷于停顿，经济损失十分巨大。在台湾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倘若演习持续进行一两个月，台全年的经济增长恐会泡汤。对大陆经济亦有直接影响，目前台湾企业在大陆投资共约 250 亿美元。若两岸形势日趋紧张，台商将大举撤资，中国沿海省份首当其冲。如克林顿政府因台海风云而拒绝延续对华最惠国待遇，不仅中国今年预计的 8% 的经济增长率无望，香港经济增长也会由 5% 锐减至 2%。

受到外国股市及两岸关系紧张的影响，香港股市 11 日恒生指数暴跌 820 点以上，跌幅达 7%，是香港股市自 1987 年股灾以来的第二大跌幅。据报载，香港部分证券业人士指出，由于台海风云，他们手头控制的部分基金将不轻易投资于股市，以观事态发展。港府工商司俞宗怡估计，如美国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香港全年的贸易总额会降低 6—8%，损失 200—300 亿美元，并丧失约 9 万个工作岗位。

一些港报对我这一举措的效果表示怀疑。《信报》12 日发表评论说，中国以为导弹试射和海空实弹演习会令台湾人怕得要死，不投李登辉的票。哪知李的民望反而上升，赞成独立的台湾人亦明显增加。美在台海集结了自 1975 年越战结束后的最大兵力，不由人担心出一点意外会酿成大灾。《成报》6 日社评说，“北京的策略不但是一种违误，而且也具很大的危险性”。对于北京来说，静观其变是上上之策，以武力介入台湾选举“无补于事，徒失人心”。《星岛日报》社论称，“文攻武吓”应适可而止，过犹不及对李登辉反而有利。

要求美国勿插手两岸事务

《天天日报》3月13日社论《美国介入安知非祸》，担心美国两艘航空母舰率领其他舰只驶往台湾海峡会扩大事态。社论说，美国这一举动是对台湾当局的支援和对大陆的挑衅。社论指出，北京的一些警告也很有道理，那就是美国舰队驶向台湾海峡的讯息，极可能误导了搞“台独”的人，以为美国将倾力支持他们，从而进一步推动“台独”，则解放军的行动就很难不升级了。社论引用车臣的例子提醒李登辉注意“任何国家若出现分裂运动，必然会导致战争，造成流血”，“以为外力支持可以吓退北京，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东方日报》13日发表题为《提防美国存心不良》的评论说，“藉战争削弱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符合美国的利益。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台湾人对于美国的介入必须头脑清醒，提防外人居心叵测”。

右派团体示威请愿

一些反华乱港组织和支持台湾的死硬派团体近日对我军事演习反应激烈。据台湾“中央社”发自香港的报道称，上述团体“纷纷派代表”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大楼门前举行示威请愿，要求立即停止在台海举行的军事演习。此外，香港崇正总会，台湾大专院校、香港校友会总会及香港台湾工商协会等 230 个侨团 12 日联名在《明报》上刊登半版广告，要求我停止军事演习，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危机，“并要求两岸领导人秉持国父孙中山先生思想和中华民族大义，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举行协商，早日达成国家统一”。上述右派侨团也表示希望台湾当局恪守“一个中国”的立场，与大陆方面沟通协商两岸有关事务及中国统一前途。

第四节 美国舰队重现海峡

华盛顿的“严重关注”

在我国政府3月5日宣布在台湾附近水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召见了我国驻美大使，表示对此事的“严重关注”，并通过美驻华使馆向我提出了“正式抗议”。白宫发言人麦柯里称我导弹发射训练是“挑衅性的”，对促进该地区的稳定“肯定没有好处”。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则认为，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的目的“是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之前恫吓台湾人民”，但同时又认为“不存在中国出兵或进攻台湾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北京和台北应该通过直接的、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翌日，麦柯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克林顿总统对我导弹发射训练表示关注，他说：“总统强烈地感到，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制止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加剧。”他还称我导弹发射训练和海空军事演习是“一种不顾后果的行动”。美国政府还将对来访的中国副外长刘华秋表示“我们的不安”。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在一次讲话中还说什么，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是“一种潜在意义上的冒险行动”，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要是导弹试验出现了偏差，那就会产生真正的后果”。

在我3月8日发射导弹训练开始之后，白宫发言人麦柯里又出来说，这次导弹发射训练是“挑衅性的和轻率的”，并对这种性质的导弹发射训练“深表不安”。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导弹发射训练是“草率和冒险的”。他还警告中国不要采取进一步的“冒险行动”。如果中国人想通过武力解决他们同台湾之间的争端，那将产生“严重后果”，他还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作出“错误估计”。正在智利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中国在台湾附近水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表示“严重关注”。对演习给该地区的航行造成的威胁表示“不安”。

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必须向北京明确表明，“我们对这一地区和平和稳定有着非常重大的利害关系”。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将作出强烈反应”。

派军舰炫耀武力

美国在此同时又回避实质问题。在我 9 日刚宣布在台湾海峡进行海空实战演习之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10 日即宣布，以“独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支特混舰队将在今后几天内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以便在“必要时提供帮助”，但没有具体说将向台湾提供什么帮助。

国防部长佩里第二天又宣布说，目前驻守在海湾地区的一支以“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将驶往台湾海域，同“独立”号航空母舰汇合。

“独立”号航母是“福莱斯特”级的第 4 艘舰，为普通动力航母。该级舰是美国于 50 年代初首批专门设计用来起降喷气式

飞机的，并第一次采用英国研制的斜角飞行甲板和蒸汽弹射器。

“独立”号于 1955 年 7 月 1 日始建，1959 年 1 月 10 日服役。它的满载排水量为 79300 吨，舰长 326.4 米，舰宽 39.6 米，吃水 11.3 米；飞行甲板长 319.1 米，宽 82.3 米，装有 4 部蒸汽轮机，4 轴，8 个锅炉，205800 千瓦，航速 33 节。续航力：航速 20 节时为 8000 海里，航速 30 节时为 4000 海里。编制人数：舰员 2900 人（其中军官 154 人），航空联队人员 2279 人（其中军官 329 人）。舰上装有 3 座 MK29“海麻雀”导弹发射架，3 座 20 毫米 6 管“火神密集阵”发射炮。航母的主要武器是舰载飞机。“独立”号航母的舰载机数量是根据所执行的不同任务而定，通常包括：20 架 F—14“雄猫”战斗机、20 架 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16 架 A—16E“入侵者”攻击机（其中包括数架 KA—6D 加油机）、4 架 EA—6B“徘徊者”电子干扰机、4 架 E—2C“鹰眼”预警机、6 架 S—3A/B“海盗”反潜机。另外，还载有 8 架 SH—3H“海王”或 SH—60F“海鹰”直升机。

“独立”号隶属于美国第 7 舰队，母港是日本横须贺，它是于 1991 年 9 月 11 日接替“中途岛”号进驻横须贺的。目前，它是美国唯一的一艘以外国港口为基地的航母。

“尼米兹”号是“尼米兹”级航母的首制舰，是美国第二艘核动力航母（第一艘为“企业”号）。它不仅在尺度和吨位上，而且在现代化程度上都是名列前茅的。“尼米兹”号于 1968 年 6 月 22 日始建，1975 年 5 月 3 日服役，满载排水量为 91487 吨，舰长 332.1 米，舰宽 40.8 米，吃水 11.3 米；飞行甲板长 338.3 米，宽 76.8 米，装有两座冷却压水堆，4 台蒸汽轮机，4 轴，205800 千瓦，航速 33 节。核反应堆燃料可持续使用 13 年，续航力为 80—100 万海里，自持力可达 90 天。编制人数：舰员 2998 人（其中军官 147 人），航空联队人员 2625 人（其中军官 300 人）。“尼米兹”号装有 3 座“海麻雀”中程对空导弹发射架，3 座 20 毫米 6 管“火神—密集阵”发射炮。舰载机航空联队所辖飞机的数量通常与“独立”号的相同。

“尼米兹”号的母港是在美国西海岸的布雷默顿，它隶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它能在无需添加燃料的情况下以 30 节以上的航速环绕地球航行，舰载机航空联队的突击威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航母舰载机的 8 倍。“尼米兹”号在国际水域上经常耀武扬威，是美国“炮舰外交”的工具。自 1987 年调至太平洋舰队以后，“尼米兹”号曾数次窜来远东水域活动。

据《华盛顿邮报》透露，派航空母舰去台湾水域的建议是佩里首先提出来的，在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磋商之后正式提交给克林顿。克林顿于 9 日正式作出决定。

佩里在宣布这一决定时称，派遣航空母舰去台湾水域是“一种谨慎的防范措施，我们准备增加在该地区的海军力量”。他拒绝回答美国政府是否正在为中国可能进攻台湾作“最坏的准备”这一问题。克里斯托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回避有关一旦台湾遭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会出兵干预这一问题，他只是说：“我不想谈具体的军事行动问题。”

白宫发言人麦柯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有关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是否有义务保卫台湾这一问题也没有作出明确答复。他说，《与台湾关系法》没有明确说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一定的含糊。

美国国会的过激反应

与政府的言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国会议员所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动。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要求政府派遣更多的美国军舰去台湾海域。他说，美国必须明确地告诉中国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保持他们（台湾人）”。他还称，中国在台湾水域进行军事演习是对美国的“一次考验”。

参议员、参议院国际贸易小组委员会委员弗兰克·穆尔科斯基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必须懂得，中国的“导弹外交”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不会在一个和平和民主的盟友受到威胁时袖手旁观，在受到军事攻击时更不会袖手旁观”。他还建议政府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以帮助他们抗击中国大陆的军事进攻。

部分共和党议员上周在一项政策声明中说：“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也不会容忍它封锁台湾空中和海上的通道。”

以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为首的 82 名众议员提出了一项所谓的“保卫台湾”决议草案，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出兵台湾时协助“保卫台湾”，向台湾提供潜艇、飞机、防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加强美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力量，迫使中国作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该决议草案很快获得 100 多名众议员的签名支持。该决议草案将于 14 日提交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审议，定于下周在众议院进行表决。

据报道，参议院一部分反华议员也在积极活动，要求审议美国同台湾的关系，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的部分条款，并试图提出一项类似于众议院的议案。

美国国会针对我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而建议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防御性武器、让美国舰队“永久性地”在台湾附近水域游弋、取消我最惠国贸易待遇、支持台湾“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台湾大选之后向更多的台湾高级官员发出访美的邀请等。

美国航空母舰为何而来？

对美国当局调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海附近集结，港台舆论纷纷发表评论。

香港《东方日报》3月13日报道说，近日，以美国航空母舰“独立号”为首的战斗团，向台湾附近海域集结，接着美国总统又下令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驶赴台海，形成台湾海域一带近年罕有的最大规模的美军舰队集结格局。该报认为，美国的这些举措，明显地把台海紧张情势升级。因为，在美国摆出军事介入姿态之下，台湾一些人有所恃，大陆当局则进一步认定美国要霸占台湾，对台湾的举措只有更强硬。

台湾《工商时报》报道，美国学界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13日表示，美国对中共军事演习的强势反应，不意味着美国在考虑改变其“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是表示美国对“台湾问题不得使用武力”的坚定立场。

台湾《中国时报》特派记者冉亮3月12日自华盛顿报道说，美国政界“顶尖”中国问题专家傅立民表示，美国派航空母舰前往台海附近是极重要的表态，其意义在于美国坚持台湾问题须由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此外，傅立民也不认为目前中共进行的军事演习会走向战争之途，认为我“无意掀起战端”，而是警告台湾勿走向“分裂”。

台湾《工商时报》3月18日说，对当前的台海局势，美国至今还没有作出像处理波斯湾问题一样明快的表态。对美国而言，一个模糊的“中国政策”，可以让美国在两岸间扮演杠杆的平衡角色；当然这对美国而言，也是最有利的角色。美国派航舰驶往台海附近，“政治性的宣示意义，远大于军事性的吓阻效应”。香港《经济日报》说，美国展现武力，可以显示美国不受“威胁”，借以告诉美国盟邦，美国在该区域将会长期存在，而非暂时出现。

为因应台湾局势，台《工商时报》3月11日发表对专家学者访谈文章，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林中斌对美国“协防台湾”持保留态度，他认为美国虽不会派兵助台，但是军售范围的扩大及层次的提升，或是提前发货等，都是未来美国政府可能的回应。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及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倪俊凯也认为，由于二次大战后，美国从未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式交战过，而美国上下对越战的惨痛教训至今仍铭记在心。因此，一旦中共对台动武，台湾对于美国在军售以外的军事援助，不应抱过分乐观的态度。该报说：的确，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政治条件决定军事条件，在中共和美国两强争霸，问鼎21世纪的世界盟主霸权之际，“两大之间难为小”，台湾如不能谨言慎行，而成为任何一方的“战略前沿”，成为牵制另一方的“马前卒”，决非全民之福。该报强调：“扬汤止沸，何若去薪”，两岸关系仍以和为贵。

3月14日台湾《联合报》也说，美国对台海之策略完全取决于其国家利益，而美国对国家利益之认知，常因时、因地、因国内民意变化及决策者认知而改变，并非其他国家所能操控。美国对台湾问题可能毫不含糊地行动，也可能随时撒手不管。

香港《东方日报》认为，“峻拒美国介入，是台湾的最根本利益”。该报说，中国大陆17年改革开放，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益强大。美国对冒起的中国大陆，一直耿耿于怀，近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目的只为制造舆论，压抑中国的发展。在美国不愿见到中国大陆在亚洲强大的心态下，借台海战争使中国大陆元气大伤，经济倒退20年，符

合美国最大和最根本利益，况且，两岸若兵戎相见，首先美国可以卖防空导弹、战机、潜艇给台湾，立即便能大捞一把。

第五节 钱其琛外长答记者问

中国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1996 年 3 月 11 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就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新华社记者：台湾“选举”在即，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台湾“选举”后的形势？

答：台湾当局想利用领导人产生方法改变的机会，为分裂祖国的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这完全是徒劳的。对于中国进行军事演习，台湾同胞不必担心，真正值得提心的最大危险，是台湾确实有人妄图依靠外人的支持，搞台湾独立，分裂祖国。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答应的。“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今天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是我们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外国势力侵犯台湾或者出现台湾“独立”，那么我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警惕强权插手海峡

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最近美国政府决定要让美国的“独立号”航空母舰驶进台湾海域。请问对此中国政府有何看法？

答：美国军舰在公海上活动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如果有人公然叫嚷要让第七舰队介入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甚至提出要“保卫台湾”，那就是非常荒唐的。也许他们忘记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不是美国的保护地。

台湾联合报记者：如果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尽快举行汪辜会谈，就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及两岸高层会谈等举行预备性磋商，请问北京是否愿为缓和两岸气氛做出积极回应。

答：去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八项建议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欢迎。当时人们对海峡两岸的关系充满着希望，认为1995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非常积极的。但遗憾的是，后来所发生的事件完全破坏了这种希望，海峡两岸出现了紧张的局势。这个责任不在于我们，而是在台湾的某些领导人和支持他们的一些外国势力，他们想推动台湾“独立”。这是造成海峡两岸当前紧张局势的根源。如果台湾当局改弦更张，不仅口头上，而且行动上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海峡两岸的形势就会缓和。如果台湾当局在外国的支持下，在“台独”的危险道路上继续滑下去，那么我们反对“台独”、反对分裂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美国最近决定从它位于日本的海军基地派出“独立号”航空母舰驶往台湾海峡。面对台湾海峡当前的形势，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安全协定已经开始启动。您对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协定怎么看？您希望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答：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不应该说三道四，更不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企图加以干预。只要外国势力不支持，不纵容台湾岛内一些人搞独立、搞分裂，就不用担心海峡两岸的形势紧张，反之，就会使海峡局势紧张起来，发生这种情况对美国未必有什么好处。

分裂祖国者绝没有好下场

意大利安莎社记者：台湾有人觉得中国对台湾的“民主进程”感到不安。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安的是台湾有些人要搞独立，要分裂中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提出建议：台湾选举举行后，两岸高级领导人能进行接触。您对此有何评价？

答：李光耀资政是外国领导人中间对海峡两岸问题和中国问题了解较深的一个。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任何希望海峡两岸的问题能够和平解决，缓和紧张局势的外国领导人和政府，最重要的是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美国的舰队正在驶进台湾海峡，在必要的时候可能对台湾提供一些帮助。您是否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构成了对台湾“台独”势力的纵容？是否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挑衅行为？

答：我和克里斯托弗国务卿有着经常的接触，下个月也可能有机会再见面，我将会问他，他们作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草率的、鲁莽的？’应该说，1995年春天的时候，海峡两岸形势是平稳的，正是由于美国的错误决定，也是“草率的、鲁莽的”决定，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形势，他们应该想一想怎样来改变这种局面。

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记者：请问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军事演习是否会影响台湾的一些利益。

答：我们已宣布演习的时间，演习的地域，希望各方面注意，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举行演习的作用是增强我们军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表明我们国家有决心有能力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此任何外国不应该说三道四。

400 多名中外记者参加了这个历时一小时的招待会。中央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笔音了解到，许多人非常关注这次记者招待会，尽管是上午 10 时直播，还有不少人收看。《北京青年报》新闻热线的调查显示，关注者多是头天收看新闻预告，凭直觉判断钱外长将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看法。北京海淀区一位姓杨的教师说：“每一位中国人都希望祖国早日统一，痛恨外国势力插手，分裂祖国的卖国者绝没有好下场。”

第六节 甲午海战饮恨

中华民族的一支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直是与大陆密切联结在一起的。台湾省花莲县高山族的泰耶族同胞廖守臣经过多年研究，在他所著的《泰耶族文化》一书中证实：高山族的泰耶族的祖先，古称越獠族，原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大约在 4000 年前就辗转迁到了台湾，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台湾的先史文化，十之八九属于祖国大陆系统。自三国以后，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虽然曾与祖国大陆数次隔绝，但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总是又和祖国大陆统一起来。远的不说，仅近 300 余年间，台湾曾三次与祖国大陆隔绝，又三次和祖国大陆统一。第一次是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于 1624 年侵占了台南，将台湾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到 1662 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大军，赶走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维护了祖国的领土主权，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病逝后，其子郑经掌握了政权，在台湾实行割据。1683 年，清王朝收复了台湾，随后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至此，台湾重新统一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这种统一局面持续了 200 多年。1895 年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被日本强行割占了台湾，台湾才又一次与祖国大陆分离。1945 年，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李鸿章落入日本人陷阱

1894 年春天，中国邻邦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军高揭“逐灭洋倭”、“除暴救民”旗号。朝鲜政府镇压失败，请求清政府派兵赴朝。日本政府预谋利用这一事件挑起战争，一面引诱李鸿章出兵朝鲜，一面又出动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分据要地。李鸿章面对优势日军，进退失据，束手无策，落入日本预设的战争陷阱。7 月 25 日，日军不宣而战，在牙山口丰岛海面，偷袭中国军舰和运输船，揭开甲午中日战争序幕。日军先在牙山、平壤击溃清陆军，继又在黄海海战中破北洋舰队。

甲午战争爆发后，台湾处在日军严重威胁之下。清廷以台湾为海防重地，命台湾巡抚邵友濂筹办防务。邵是文官，不懂军事。清廷复以淡水巨富在籍太仆寺正卿林维源为会办，协助邵友濂筹防；旋又令广东南澳镇总兵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和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为帮办，各带兵渡台。邵友濂随即内调。清廷以布政使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又调刑部主事俞明震来台帮办防务。唐景崧派人回广东招募广勇为亲军，驻守台北。当时，清军驻台总兵力约 3.3 万多人，其中台北 1.3 万人，台中 1.2 万人，台南 0.8 万人。兵力不少，但十之八九都是新募的广勇，缺乏训练；武器又落后，难以御敌，更难以抵御如日军之强敌。

邵友濂、唐景崧都是文官，毫无远略，只知道加强防御部署，而不懂得高级指挥将领的重要性。杨岐珍为淮军宿将，唐景崧竟未任命他为北部防卫指挥官，致使杨岐珍一闻割台之讯，即行内渡。北部各地守将，上无统一指挥，各自为政，成乌合之众，一遇敌攻，即仓皇溃退。

日军攻占澎湖

澎湖位于福建、台湾之间，为台湾门户，闽台锁钥。群岛错立，易攻难守。日本欲侵占台湾，必先得澎湖。

澎湖岛原有的防御设施，在中法战争中，多遭到法军破坏。台湾建省后，刘铭传重新修筑了防御工程。甲午战争爆发前，澎湖岛已修建了拱北、天南、东南、西屿东和西屿西 5 座炮台，配置了火炮。岛上驻有果毅军、宏字练军 3 营。战争爆发后，驻军陆续增加到 13 个营，分别由澎湖镇总兵周镇邦和候补知府朱上泮统领。

日军于 1895 年 2 月陷威海卫，旋即移师南下，进攻澎湖。3 月 15 日，日军混合支队 5000 多人，在联队长比志岛义指挥下，从日本佐世堡军港出发，进犯澎湖。20 日，日军到达澎湖海域，拟从澎湖东端的里正角登陆。23 日 7 时，日舰队突然攻击里正角海湾西侧的拱北炮台，清军发岸炮还击，炮战持续数小时，击伤日舰一艘。11 时许，日步兵在里正角登陆。清军猛烈轰击登陆的日军步兵。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抢占了拱北炮台以北的太武山。

24 日黎明，日军猛攻拱北炮台，守军伤亡惨重，后继无援，炮台被日军攻占。日军另一队从太武山来攻，朱上泮率军在西溪遇敌。日军在海上舰艇发炮支援，清军只能依据民房，凭壁抵抗，伤亡无数，朱上泮负伤率部西退。周振邦见朱军已退，只身逃往白沙岛。朱上泮以寡敌众，又不知兵，退回妈宫城（今马公镇）后，乘船逃西屿，后又乘渔船逃台南。日军入龙门港，进据圆顶半岛清军退路，再以大队攻妈宫城。当时，妈宫城和火烧坪守军仍在拒守，听说统帅逃跑，遂溃弃阵地。当天中午，

日军陷妈宫城。坚守圆顶半岛的清军，被日军围攻，于 25 日投降。

25 日，日军炮击西屿，副将刘忠梁还击，伤其一船。敌炮击中弹药库，守军溃散。周振邦逃回台湾鹿港。守卫西屿东、西炮台的清军，见日军已进妈宫城，无心恋战，卸下炮栓，投进大海，退吉贝屿，转赴台湾、厦门。澎湖陷落，台湾危急。

日军攻打澎湖列岛，伤亡不大，但因水土不服，疫病蔓延，患霍乱者约 1700 人，死亡达千人。

26 日，日军在妈宫城设立“澎湖列岛行政厅”，以海军少将田中纲常为行政长官，对澎湖列岛实行殖民统治。

割让台澎

吞并台湾，是日本侵略者的夙愿，它事关日本在东洋的霸权。甲午战争爆发不到3个月，清朝海陆丧师，急于求和。日本连战连胜，气焰万丈，陆军提出要割取辽东半岛，海军则非割台湾不可。

1894年冬天，日本前文部大臣井上毅，曾经露骨地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表明占有台湾的重要性。他说，大家都知道“朝鲜主权之必不可争”，而不明白“台湾占领之最可争”。“占

有台湾，可以扼黄海、朝鲜海、日本海之航权，而开阖东洋之门户。况台湾与冲绳及八重山群岛相联，一臂所伸，可制他人之出入。若此一大岛落他人之手中，我冲绳诸岛变受鼾睡之妨，利害之相反，不啻霄壤。”“若失此机会，二三年之后，台湾必

为他国所有，不然亦必为中立不可争之地矣！”

1894年年底和1895年1月，清廷先后派代表赴日求和，都被拒绝。日本公开示意要李鸿章“当此大任”，还规定全权使臣必须具有割让土地的权力。时值威海卫清海军覆没，关外危急，京畿震撼，清廷只有屈从，改派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伯爵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李经方（李鸿章之子）为参赞，往日本议和。

日本敢于如此强硬，是同美国的支持和沙俄的教唆分不开的。当时，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驻华公使田贝，以“调人”资格在两头穿针引线，促成了《马关条约》签订。担任李鸿章法律与外交顾问的美国人科士达，竭力阻挠“借助英俄”之议，怂恿李鸿章接受日本的条款；提任日本议和大臣顾问的另一个美国人端迪臣，则替日本起草约稿，勒款索地，彼此串通，密切配合，帮助日本对中国肆行敲榨。沙俄驻日公使米哈伊尔·希特罗渥在一封密信中声明：俄国政府“并不反对日本占领台湾”。1895年2月14日，他在另一封信中重申“不反对日本占领台湾这一立场”。

清廷害怕日军进攻京津，一心求和。1895年2月22日，光绪帝召见李鸿章与军机大臣翁同和，商谈和议。李鸿章为自己预留退步，声言“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帝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反对割地，主张“宁以款偿，不可割地。”李鸿章故意刁难，请翁同和往日本议和。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则以为不割地和议难成。王公大臣们一再集商，难以定义。但是李鸿章同掌管外交的恭亲王奕訢，已倾向割地。慈禧太后起初也不愿意割地，李鸿章固请不已。当时，人们都料想到割台必难幸免。

3月2日，恭亲王等同光绪皇帝相商，决定给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同一天，李鸿章上折，引证中外历史上割地的先例，主张不妨暂屈以求伸，否则势难解纷纾急。翁同和则力言“台湾万勿议及”。3日，庆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王文韶等王公大臣会奏，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请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廷议始定。这里说的“边徼”，指的就是台湾。所以在李鸿章赴日谈判之前，清廷已经内定放弃台湾。

3月20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同日本全权使臣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开始谈判。李鸿章要求先议停战协定。伊藤故意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被迫同意先议和款。

24日第三次谈判，伊藤告以日本已派兵进攻台湾。李鸿章未提任何抗议，只指出日本之不愿停战，是因为有踞台之心。当李鸿章请伊藤出示和议条款时，希望不要牵涉他国权利，明确指出，“英国有不愿他人盘踞台湾之

意”，想运用国际关系来挽救台湾。伊藤早已明白英国的态度，自然无动于衷。伊藤问及台湾人民情况若何，李表示“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伊藤不理，允明日提出议和条件。当天会后，李鸿章返寓所途中，突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行刺，枪伤面部。日本政府深恐李鸿章藉口回国，因此招致沙俄等列强干涉。28日，陆奥与李鸿章在病榻前议定无条件停战条约6款，停战范围仅限于奉天、直隶、山东。李鸿章对停战范围未及台澎没有表示异议，反而欣然签字。

4月1日，日方提出比实际要求更为苛刻的议和条约10款，限4日内答复。其中第2款就是割地：第一项是整个的辽东半岛；第二项是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第三项是澎湖列岛。李

当天即电告北京。翁同龢仍坚持台不可弃，庆亲王则谓辽南重

于台湾，两派相持不下，廷议不决。翁力争不获，“不觉流涕”，

自责“不敏不明，真为愧死！”光绪帝亦同情翁的看法，他哀叹“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电训李鸿章，割地“应以一处为限”。

5日，李鸿章对日方送说帖，不提台湾，澎湖问题，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日方要求。但是，李鸿章在割地问题上也不愿完全照办，他在说帖中表示，“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

8日，李鸿章再致说帖，逐条请求减让。伊藤威胁李经方说，“割地决不允修改，应知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若“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一旦离去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不能保证”。在伊藤大肆恫吓、科士达暗施压力下，9日，李鸿章未经请示，就对日提出修正案，让地北限于奉天南部安东等四州县厅，南限于澎湖列岛。在10日的第四次谈判中，伊藤答复李鸿章修正案，除将赔款由3亿两减为2亿两外，其余各款基本照旧。李鸿章就台湾问题虽也极力争辩，甚至哀求。但是对方已看透他隐忍求和的用心，于台澎则坚持原案，声言中国只有“允或不允”而已，不能减少，不必分辩。伊藤扬言，如果重新开战，条件还不止于此。李鸿章责问道：“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伊藤则诸以“吉林、黑龙江一带，何以让与俄国？”（指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强割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李鸿章反驳说，吉、黑一带为瓯脱荒寒之地，台湾则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相比。伊藤表示，当派兵强取。李鸿章告以“台湾海浪涌大，人民强悍，实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即未得手”；并说“台湾瘴气甚大，所以台民大多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伊藤表示，“不论何苦，日军皆愿承当”，“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所谓禁鸦片，乃欺人之谈。11日，伊藤以最后通牒形式照会李鸿章：10日所提为尽头条款，中国或允或否，限于4日内案复，战争愈久，则赔款愈大。

清廷在4月11日曾电训李鸿章，迫不得已时，可许以台湾矿利，而土地人民仍归我有。李复电说，“彼垂涎台湾甚久，似非允以矿利所能了事”，日方此次所改约款，“实系末尾尽头办法”。再次请示如何应付。言外之意，是要朝廷说出割台的话。12日电谕，“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湖台南之地与之”，台北仍归中国。13日上午李鸿章接到此电，时日方已拒绝李再作一次会谈的请求。李接连发电总署，谓“割台之半与之，亦必不允，一岛两国分

治，口舌既多，后患亦大”，日方“词已决绝，无可再商”，还说日方已出动运兵船 20 多艘，准备开往大连，情势愈迫愈紧，促朝廷速下决心。清廷虽分别向英、法、德、意、俄列强求援，但均告失败，终于被迫屈服，14 日电训，令其遵旨定约。15 日，李与伊藤最后谈判，议定《中日马关新约》，所议已是台湾如何交割与人民内迁问题。李鸿章对伊藤声明：“台湾人民如不愿从，授受之际，恐生事变，当与中国无涉。”伊藤对曰：“此我国之责也”。李鸿章又说：“台民素称难治，聚众戕官，视为常事。今闻割台之信，经已鼓噪，誓不易主。”伊藤说：“贵国但将治权让出，则治台之事，我国任之。”李提出：“台湾官绅交涉事件纷繁，应于换约后六个月方可授受。”伊藤嫌太慢，乃定两月，割台之约遂成。

17 日签订《马关条约》，共 11 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偿日本军费 2 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依西例议定通商条约。条约还规定日军于条约批准后 3 个月内撤退，以占威海卫为质。《马关条约》第 2 款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第五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马关条约》签订后仅 7 天，又发生了一个“三国干涉还辽”的插曲。4 月 23 日，俄、德、法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俄国出于侵略中国、谋取太平洋霸权的目的，联合德法两国进行干涉。三国纷纷把军舰开到日本附近海面。停泊日本各港的俄国军舰昼夜升火，禁止船员登陆，俄国东部西伯利亚总督集合 5 万人，随时准备出动。沙俄为强迫日本退还辽东，不惜一战。日本经过 8 个月侵华战争，已十分疲劳，无力对付三国，于是决定对三国让步，对中国则一步不让。5 月 5 日，日皇宣告接受三国劝告，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有。日本想趁机大量勒索“偿金”，使中国永久不能还清，以变相占有辽东。俄、德、法三国议定退还辽东半岛的偿金为 3000 万两。10 月 19 日，三国和日本在东京签署协定，约定清政府支付偿金后 3 个月内，日军全部撤出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屈辱的卖国条约。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也决定了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命运。

5 月 2 日，清廷批准《马关条约》，8 日，派换约大臣伍廷芳、联芳与日方伊东美久治在烟台换约。10 日，日政府即派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海陆军司令官和接收台湾全权委员。清廷亦派李经方为交割台湾全权委员。

誓死反对割台

割地，实为国家民族奇耻大辱。割让台澎，举国悲愤。当中日代表正在马关媾和的时候，割让台湾的消息即已传出。在京师的各省代表纷纷函电谏阻，台湾士民相继上书台抚，请转奏清廷免割。在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邀集 18 省举人 1300 多人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在京的台籍官吏、举人，也联名上书都察院代奏：闻朝廷有割弃全台与倭之说，“数十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十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已。”“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悲愤壮烈，可惊天地而泣鬼神。

清廷官员亦纷纷上书，指出台湾为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力陈倭敌“意在吞噬中国，非仅割占数地而已”，启此一端，必使“法人窥粤，英人窥滇，俄则西窥新疆，东窥东三省，四夷交侵，各求所欲”。有人要求立毁和约，迁都再战。从 4 月中到 5 月初，各级官员反对割台奏章 140 件，签名达数千人。

《马关条约》无异是台湾人民的一纸卖身契。割台凶耗传到台湾，全省悲愤，聚哭市中，夜以继日，无可抑制。台北鸣锣罢市，民众拥围巡抚衙门，哭诉死不属倭，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局不准停工，全部厘金充战倭之用。地方士绅丘逢甲等联名血书，陈奏清廷：割台议和，全台震惊！臣等“桑梓之地，义共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台湾巡抚唐景崧急稟朝廷：“台湾属倭，万姓不服”，绅民“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易极！”

台湾同胞发布檄文，怒斥国贼李鸿章：“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文（刑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子侄，遇之车船于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歼除，以谢天地祖宗”，“以为天下万世无廉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警戒。”

“民主国”的败亡

在清廷决意让台、日军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台湾上层士绅于5月15日在台北筹防局集会，议留唐景崧暂摄台湾政事。台绅致电总署说：“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明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论断。”清廷为表示与台湾自立无关，于5月20日下诏令台抚唐景崧“着即开缺，调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官限期内渡”。清廷同时下令，“百姓愿内渡都听便，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说什么“交割时须极力保护（日人）”，并谕百姓“切勿滋生事端”。这时，又传来三国干涉还辽不包括台湾的消息，岛内人心惶惶，形势迅速

恶化。

台湾官绅在内求清廷拒绝、外请国际干涉都告无望之际，为救亡图存，于5月25日宣告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抗击日寇侵占台湾。唐景崧被推举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唐初则犹豫，经士绅一再恳求，始勉允。以台湾巡抚署为总统府，以丘逢甲为副总统兼团练使，任命刘永福为大将军，建号“永清”，示不忘清朝。同时，还在台北设议院，设军务、内务、外务三部，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为军务衙门督办，刑部主事俞明震为内务衙门督办，副将陈季同为外务衙门督办。致电清廷：“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

台湾民主国《自主宣言》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唐景崧任“总统”后电奏清廷：“今之自主，为拒倭计，免其向中国饶舌；如有机，自仍归中国。”26日，唐景崧复以“总统”名义发布告示表示：“今虽自立为国，感念旧恩，仍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

唐景崧命义武各官，有内渡大陆者听便。于是道、府、县各官相继纳印去，掀起一场内渡之风，造成地方行政无人负责的半瘫痪状态。对一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如淮军宿将杨岐珍的5个营，台南镇总兵万国本的4个营，也任其全部内渡，而将北海岸交给新募广勇防守。

是时全台兵力，土客新旧军号称300多个营，每营360人。据日方估计，官兵包括广勇、湘勇，约3.5万人，民兵义勇约10万人。多缺乏训练，武器杂乱，军械弹药不足，又无军舰在海上牵制敌人。沿海各省当局，虽曾设法接济，但为数有限，后来又怕人籍为口实，有碍和约，因而停止接济。

台湾尚未交接，日军即分两路进攻台湾。兵力达5万人，占日本陆军总和1/3强，海军则是联合舰队倾巢而来。5月28日，日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偕同东乡平八郎少将指挥的舰队，从琉球中城湾出发，进抵台北海口。29日，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率近卫师团自澳底（基隆之东）登陆。这一天，日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以军舰佯击金包里（基隆之西），而以主力掩护登陆部队驶进三貂角海面。日军先头部队60人，在虎仔山附近核仔庄登陆后，在盐寮架起便桥。大队从盐寮登陆。守军曾喜照部两营，士兵多新募入伍，刚组织成军，遇敌不战而溃。日军顺利登陆，当晚越过土岭，30日陷顶双溪、三貂大岭。

唐景崧闻警，临时急调新募广勇分赴三貂岭、基隆增防，派全台营务处内务督办大臣俞明震督战。三貂岭是台北第一高山，山岭险峻，易守难攻，竟不战而失。过岭，分大小两道，大道通瑞芳，达基隆；小道通吴程，达八堵。31日，日军逾三貂天险，以第二联队进攻瑞芳。6月1日，日军第一

中队进到瑞芳西面高地。刘燕部炮兵阻击，给敌以较大杀伤。日军第二、三中队绕过山地，向瑞芳进攻。守军凭围墙和民房作战，英勇抗击

日寇，日方死伤较多。2日，瑞芳不守。日军集中登陆部队，扑向基隆。守军分隶于统领六七人，无统一指挥，各不相下。是

日子夜，清割台全权委员李经方至基隆港外，登日舰同桦山资纪草草签署交接台湾文据清单。3日，日军陷基隆。

基隆失陷后，众议守狮球岭，不决。基隆同知方祖荫到台北请唐景崧率兵驻八堵，作死守计。唐景崧派黄义德率护卫营守八堵。黄部官兵正索饷大哗，不能战，谎报狮球岭失守。4日，俞明震等劝唐景崧退守新竹，合林朝栋、刘永福再举，亦不听。是日，狮球岭失守，电线已断，溃兵入城索饷，乘机抢劫，广勇、台勇互杀。总统府又发生兵变，唐景崧急化装携带台湾巡抚印逃沪尾（今淡水），在美国税务司马士帮助下，6日乘德轮逃回厦门。丘逢甲闻讯，哭曰：“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是日，溃兵听说藩库存银百万两，争先破门而入，抢夺斗杀；继又焚烧巡抚衙门，火药库又发生爆炸。散勇四出抢掠、烧杀，台北陷于混乱中。汉奸李春生、辜显荣和德商奥利、英商汤姆森、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达维森等乘机出迎

日军。7日，日军先头部队80人，由辜显荣向导开入台北。林朝栋在台中闻讯，即遣散部众，逃漳州。丘逢甲也仓猝挟饷银逃广东嘉应州。纷扰了十多天的“台湾民主国”，在台北官绅的逃跑声中烟消云散了。

6月14日，桦山资纪到台北，以善后局为台湾总督府。¹⁷

日，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巡抚衙门举行“始政曲礼”。日人定这一天为：“始政纪念日”，年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第七节 台湾人民保家抗寇

台北地区的反占领斗争

由于“台湾民主国”将帅无能、军纪败坏，日军所以顺利占领基隆、台北。台中空虚，台南势孤。富有反抗侵略和爱国精神的台湾人民，摆脱了无能政府的束缚，以誓死杀敌的坚强意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家园、抗日寇的武装斗争。他们公推爱国将领刘永福为首领。刘永福领导的台湾抗日武装，除黑旗军外，还有新楚军、乡勇和义军。此外，各地也纷纷群起响应。安平镇有胡嘉猷（阿锦），新竹有姜绍祖、徐骧，苗栗有吴汤兴，还有云林等处义军，各支义军少则三四百，多则七八百以至于余人。他们同刘永福等爱国将士共同抗敌，展开了可歌可泣的反占领斗争。广东、福建等地人民不仅为他们捐输饷银，有的还乘小艇赴台参加抗日。

三角涌歼敌 三角涌是台北的一个村庄，地形险要，当地民众具有反抗外国入侵的斗争传统。日军占领台北后，又逃来了大批难民，他们共同抗日。这里“有众万余人，火枪数千杆”，同仇敌忾，士气旺盛。

7月11日，一支由25人和6艘运输船组成的日军水路运粮队，由台北出发，12日到达三角涌。13日晨，日军运粮队遭到义军袭击。数百名义军夹河射击敌船，击毙运粮队日酋樱井曹长，除3人逃脱外，其余全被击毙。

15日，由山本小队长率领的一支骑兵团，来三角涌侦察，找村民引路，被引上盘杭头狭路。正疑惑间，忽然枪声四起，响彻山林，伪装成农民模样的义军，拿出预先藏好的步枪，从四面八方向日军射击，宁静的山地顿时草木皆兵。日军被迫后退，但无法摆脱义军的包围，只有3骑侥幸逃脱，其余全部被歼。

日寇恼羞成怒，22日，又纠集3个支队的兵力，由第2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指挥，包围三角涌，杀气腾腾，企图一举消灭那里的抗日力量。三角涌的义军和当地民众，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挖陷阱、设埋伏，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抗击日军。经过

两天激战，义军壮烈牺牲数百人，三角涌落入敌手。日军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烧毁了数以千计的民房。

大湖口之役 日军步兵第二联队，在坂井重季大佐率领下，从台北到达中坜。6月21日，进犯大湖口。吴汤兴从大湖口出击，在杨梅镇同日军遭遇，发生激战。徐骧、邱国霖、陈起亮

率民团和义军赶来助战，三路夹击日军。义军怀着国恨家仇，英勇作战，歼敌多人。日军仗着兵多械精，疯狂进攻，于中午11时逼近大湖口。义军藉大湖口兵营围墙掩护，与日军鏖战数小时。围墙被日军猛烈炮火摧毁，义军被迫后撤。是日，日军攻占大湖口。

新竹争夺战 新竹是台北进入台中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6月上旬，刘永福即令新楚军分统杨紫云会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义军驻守。中旬，日军主力近卫师团来犯，诸军路于大藟茨、大湖口、龙潭陂等地据险狙击，激战6天，打退日军。6月22日，日军从大湖口进犯新竹，9时，日军占领新竹县城东侧的高地。在炮火掩护下，日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攻新竹新营，一路攻打新竹车站。守军因粮械不济，被迫退到城外。日军工兵架木梯

越墙而上，新竹陷落。25日，吴汤兴率义军400多人反攻新竹，在城郊与日军展开激战，不分胜负，各自收兵。徐骧等义军继续阻击南犯日军，三次败敌，迫使其退回新竹。7月9日夜，抗日义军集结万余人，分4路再次反攻：由傅德星攻东门；管带陈澄波攻西门；吴汤兴率主力攻南门；姜绍祖、徐骧从侧后进攻。陈澄波部遇伏军败退。吴汤兴率义军占领城东十八兴山，炮轰城内日军。日军派出步兵炮兵各两个中队反扑。义军诱敌深入，分兵夹击，大败日军。姜绍祖率义军绕过十八兴山，正拟夺城，日军大队骤至，将义军包围。义军奋战不屈，同敌人肉搏，战死20多人。反攻新竹失败。7月18日，姜绍祖率义军200多人，再攻新竹东门。徐骧从背后以民团攻击日军。两支队伍，互相配合，同日军激战。因寡不敌众，又没有成功。

上海《申报》8月4日转载日本报纸关于台湾战况的报道说：台湾抗日军民“视死如归，有进无退。台兵每临阵时，虽势值危迫，而仍踊跃向前，誓死不退。有时日兵以大队至，台兵见势不敌，即佯力退去，一转瞬间已不知去向。俟日兵相近十余步或二十余步之近，彼等即放枪猛击，每发辄中，子弹皆在要害。”

8月19日，《申报》报道：“日兵由台北前进，各处攻战，每次被围受创。兼之路多险阻，行军不敢锐进时，每遇台民耕于田、樵于山及家居者，探问前途有伏兵否，若辈皆答以不知。及日本战败而退，则若辈不论男女，率皆奋勇腰（邀）击，亦有从墙壁间放枪者，致日兵大受伤夷。”

据日人追记：“人民就是士兵，其数不得而知，破坏铁路，割断电线，皆彼所为。见我兵寡则来袭，见我兵众则远遁林中”。“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在新竹争夺战中，大小20余战，牵制日军一个多月。是役，姜绍祖遇难。

姜绍祖（1874—1895），台湾新竹人，世居北埔，祖籍广东。家巨富，为一方豪。愤日本强割台湾，散家财募军，得健儿五百，率以抗日。6月中旬，在保卫新竹之战中，在大湖口等地重创日军。7月上旬，会各路义军反攻新竹，与敌激战于枕头山，力战不屈，所部多死伤，弹尽被俘。日军问谁是姜绍祖。其家人猝应曰：“余”。推出斩之。绍祖知不能免，服鸦片烟膏就义。

台中保卫战

从8月上旬到9月下旬，台湾义军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艰苦的台中保卫战。其中著名的战斗有尖笔山、大甲溪、八卦山、大莆林、彰化等地的争夺战。

尖笔山之战 尖笔山位于苗栗镇以北，是义军防线的前哨据点。集结在这一地区的义军有吴汤兴、徐骧、李惟义、杨再云、陈澄波等部7000多人。日军南犯台中，首先要夺取尖笔山。当时日军在前线的兵力约1万多人，还有海军配合作战。

8月7日，日军出动两个支队，扫荡新竹和尖笔山之间的义军，在水仙岭与陈澄波所部义军遭遇，激战后义军败退。次日黎明，日军分左右两翼。向尖笔山前的枕头山和鸡卵面义军阵地发动进攻。吴汤兴、徐骧所部义军，奋勇抗击，又败退。9日，日军在军舰支援下，用3个联队的兵力向尖笔山和头份庄发起攻击。凌晨5时，日军一个联队进攻头份庄，杨再云率新楚军将士抵御，大挫敌军。日军正面进攻未逞，转而抄袭杨部后路，切断其联系。杨再云部孤军作战，不稍退避，将士大部英勇战死，杨再云亦中炮牺牲。

杨再云（？—1895），亦作杨载云。1895年春，以副将分统新楚军，驻守台南。6月上旬，防守台湾中路。6月中旬到8月中旬，他率部会同义军，保卫和争夺新竹。8月中旬，同日军激战于头份庄，中炮阵亡。

向尖笔山进攻的另两个联队，在日舰支援下，用猛烈炮火轰击义军。徐骧部坚守尖笔山，巧妙利用地形，抄袭日军，杀伤进攻之敌。但终因力量悬殊，义军被迫转移。尖笔山陷入敌手。

8月13日，日军分三路攻苗栗。黑旗军青年将领吴彭年不畏强敌，率部同日军一个联队激战，因损失严重，被迫撤退。14日，苗栗陷落，居民大部随义军撤走。

吴彭年（？—1895），字季，浙江余姚人。年十八，为诸生。工诗文，赋气豪迈。流寓广州。1895年春，以县丞至台北，刘永福闻其才，聘为幕僚。7月，率黑旗军七星队100人守彰化八卦山炮台。8月上旬，率黑旗军一部往援苗栗，驻大甲溪。时部下兵薄，方召募未成，日军猝至，不能战，又不得不战。彭年骑马略阵，马悲鸣不行，易马再出，躬自陷阵，奋呼力战，弹如雨下。彭年收兵，归大甲。

大甲溪伏击战 大甲溪是台湾一条大河，由东向西奔泻于苗栗、台中之间。河西边竹林丛生，山谷险峻，是一道天然屏障。吴彭年、徐骧退守大甲溪后，计议在这里伏击日军。

8月22日，日军前卫部队千余人进犯大甲溪。渡溪时，埋伏在大甲溪南岸竹中的吴彭年部，突然出击。日军刚过溪岸，猝不及防，急忙回渡。待日军回渡到中流时，伏于北岸竹林中的涂骧，率众拦腰杀来，杀声震天。日军丧胆，纷纷落水。李邦华亦率数千乡勇赶来助战，激战一天，生擒日军多人，斩杀无算。义军、乡勇伤亡千余人。大甲溪积尸盈水面，溪水为之不流。次日，日军调大批援军反扑。时，吴彭年已率部回守彰化，大甲溪一带由黑旗军管带袁锦清和徐骧部民团共同防守。袁、徐谋划分兵包抄日军，由新楚军统领李惟义为后援。日军收买土匪，伪装义军，从后面袭击新楚军，李惟义部溃逃。在前线作战的义军闻讯，被迫后退。袁锦清率50人断后，扼守大甲溪阻击日军。日寇迫近时，袁锦清率队迎战，全部壮烈牺牲。徐骧率民团死

战，冲出重围，退往彰化。日军渡大甲溪，全力扑犯台中。

8月24日，日军进犯台中，台中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林大春等集子弟千人，拒战于头家厝庄。少年林传精火器，潜伏树上，以准确射击毙敌20多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杀。敌放火焚庄。吴彭年得悉，急派兵援救。敌大队至，援军退。26日，日军攻占台中。

血战八卦山 台中失陷，吴彭年与将士约，誓与台湾共存亡。敌占台中，又攻彰化。义军在彰化城东的八卦山同敌寇展开惊心动魄的血战。八卦山是彰化城的制高点和天然屏障，形势险要，距城江东1公里。防守彰化的部队有义军和地方武装共约3600人。李惟义守彰化城，徐骧、吴汤兴等守八卦山，王得林率七星旗兵守中寮。8月27日，日军近卫师团主力分三路进犯。右路两个大队由陆军少将川村率领；左路两个联队由陆军少将山根率领；中路三个大队由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守卫八卦山的义军奋勇抵抗，激战8小时，敌不得进。抗日军死千余人。入夜，日军左路从大竹庄附近山谷僻径，悄悄爬上八卦山，匍匐到山顶。28日晨，义军发现敌寇已布满山谷，并接近八卦山东侧高地。敌精锐部队日皇近卫师团千余人用快枪快炮环攻。抗日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拼死肉搏。八卦山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义军首领吴汤兴中炮阵亡，林鸿贵率黑旗军冲锋队七星队百余人冲入敌阵，夺吴汤兴遗体，相继遇难。是时，吴彭年大战于大肚溪，遥望八卦山已树日旗，急率全军回救，众奋勇夺山。吴彭年和七星队大部均英勇战死，死者500人。徐骧率20多人突出重围，退往台南。

义士陈凤昌，闻彭年战死，深感敬佩，洒酒为文以祭。数年后，负彭年遗骨归乡，发穴时，衣带犹存，血痕斑斑。至其故里，唯一老母，发已白，妻早逝，遗二孤，俱幼，家无余资，但依亲友以存。《台湾通史》作者连横在“吴彭年列传”中赞曰：“如彭年者岂非所谓义士也哉。见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云汉而光日月”。“吾望八卦山上，犹见短衣匹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呜呼，壮矣！”

八卦山陷落后，日军从八卦山居高临下，炮击彰化城。城里秩序大乱，日军乘势进攻。老幼妇孺出西门避难，迎面遇到日军，尽被杀戮。汉奸开彰化城门迎敌，日军入城。义军巷战半日，守将李仕高、沈仲安、杨春发与敌巷战，全部殉难。29日，彰化陷落。

彰化失守，嘉义吃紧，台南震动。8月30日，日军陷云林，进据大莆林，锐甚。刘永福亲赴嘉义前敌诸营，令王德标率七星队坚守嘉义，令副将杨泗洪率军五营奔赴前敌，发动当地民众，组织武装，抗日自卫。同时派人联络附近的简精华、黄荣邦、林义成等义军，共同抗敌。

激战大莆林 8月30日夜，杨泗洪率部进攻大莆林。简精华、林义成等率义军数千人助战。占领大莆林的日军，散居民户，警戒疏忽。杨泗洪率百余人乘黑夜摸到敌营附近，四处纵火，发起突然袭击。激战一场，日军大溃，仓皇逃窜，义军乘胜追击。杨泗洪在追击中被中炮死，管带朱乃昌夺尸归。日寇退路中的一座桥梁被义军拆毁，进退两难，走投无路，拼死作困兽斗。酣战至夜，荣邦、义成伏蕉林中从敌后抄袭，前后夹击，日军四散逃命。义军一举收复大莆林。是役，歼敌数百，朱乃昌亦血战死。

杨泗洪，早年参加抗法斗争，屡立战功，被台湾巡抚刘铭传聘任到台湾教练军队，以副将署台南镇总兵。日军入侵台湾，杨又任刘永福黑旗军的协统。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杀在前，被誉为“黑虎将军”。为保卫台湾，

他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收复云林、苗栗杨泗洪牺牲后，刘永福令肖三发统率其部黑旗军，指挥前敌各军；令简成功统义军。成功是简精华之父，骁勇能战。日军陆路战败，急派十多艘兵舰攻台南各海口，日夜炮击不停，汉奸土匪蠢动响应。刘永福推行联庄法，检举汉奸匪类，地方渐靖。

9月1日，王德标率七星营及黄荣邦义军2500人、林义成义军3000人、简精华义军数千人，合攻云林县城，日军弃城溃逃。王德标会合义军追击，将日冲成两股：一股窜进山林，被林义成部切断退路，予以全歼；另一股退据北斗。2日，苗栗附近义军乘胜收复苗栗，日军逃彰化。黑旗军和义军反攻获胜，大大鼓舞了台湾军民的抗战热情，踊跃参军。义军准备乘胜收复彰化。

反攻彰化 9月4日，肖三发督率各军包围彰化城。彰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抗日军阻于日炮，分驻树仔脚，连战俱捷，而饷绌，请济，刘永福无策，仅拨1500两与之。幸亏附近庄民蒸饭劳军，抗日军没有挨饿。日军龟缩城内，义军紧缩了包围圈。但台南饷械竭蹶，刘永福再三派人回内地筹饷，因清廷严禁援台，均空手归来，接济绝望。外国洋行指使商人到官银票局兑现银，市面大扰。台南商人持银票索现银更急，卧局中不走，市上拒用银票，交易停止。清廷封锁，加上洋行、奸商破坏，使台湾抗日难于支持。围彰化军数千人得不到接济，断粮难熬。肖三发与简精华等商议相持非久计，不如并力前进，夺回彰化。时徐骧从卑南募得高山族健儿700人，组成先锋营，从台南赶来助战。9月23日，全军猛攻彰化，守敌枪炮密集，难以攻克。24日，黄荣邦猛攻炮台，中炮死。25日，林义成再攻炮台，又重伤。10月1日，日军大队反攻，肖三发率各军力战，重伤不退，徐骧、简精华奋死击退日军。相持数日，弹尽援绝，求刘永福接济，刘永福无策，一文难筹。抗日军退他里雾。7日，日军又进攻，徐骧率数十人遇敌伏击，徐骧负伤倒地，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众人皆受伤。8日，复大战，各军战败，死2000多人。10日，云林、大莆林又陷。

台南抗战

早在9月中旬，日军在台北成立南进军司令部，筹划进攻台南。南侵兵力约4万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近卫师团主力约1.5万人，由陆路从彰化南下，经嘉义直扑台南。乃木中将率领第二师团主力约2.5万人，从海路进攻台南；其第四混成旅团主力约1.3万人，在旅团长伏见率领下，从嘉义西部袋嘴港登陆，沿海边直扑台南前侧；其第三旅团主力约1.3万人，由山口少将率领，在枋寮登陆，经凤山（今高雄县）向台南后背进击。海军配合陆军攻击安平、打狗（今高雄市）等要港。

嘉义地雷战 彰化沦陷后，刘永福令王德标率七星队守嘉义。10月上旬，日军海路攻台南，牵制刘永福部，陆路南逼嘉义。11日，日军陆路炮队攻嘉义，兵临嘉义城下。在日军到来之前，王德标同徐骧、林义成等商议，日军来势凶猛，无法硬拼，决计巧设地雷阵，杀伤敌寇。他们先在城外营中埋下地雷，加上伪装，安排停当，撤进城内。徐骧、林义成率部分义军埋伏营地两侧。日军到来时，义军打了一阵，假装败退。日军踞营房宿营。深夜，王德标派人潜入营地，点燃地雷药线，连续爆炸，炸死、炸伤日军700多人。日军仓皇撤退，王德标出击，沿途伏兵又给敌以重大杀伤。

12日，被激怒的日军用大炮轰塌嘉义城墙。徐骧登上城楼，持刀指挥作战。总兵柏正才、守备王德标、义军首领简精华父子均率部力战，伤亡惨重。刘步升、杨文豹等壮烈牺牲。午后，日军破西门，拥进城内。七星队、义军浴血巷战，冒着猛烈炮火冲出重围。王德标、徐骧等退入大山，转守曾文溪。是役，日军近卫师团师团长、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受重伤，旋毙命。

曾文溪大战 在嘉义保卫战正在进行时，日本南进军司令官高岛丙之助由基隆到达澎湖，部署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水陆合攻台南。10月10日，第四混成旅团在台南以北布袋嘴登陆。11日，第三旅团在枋寮登陆，配合近卫师团夹攻台南。12日，东港陷。14日，陷凤山，屠城。15日，2000多名日军在“吉野”、“秋津洲”等6艘军舰掩护下，攻占打狗港，进犯台南，沿途不断遭到狙击。16日，日军一个骑兵队行进到二层溪时，突遭义士郑清所部700多人袭击，被打死骑兵十多人。18日，义军4000多人在李翊安指挥下，在王爷头附近，同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的一个联队展开激战。义军以村落、民房和大堤为掩护，坚守阵地毫不退让，成批地英勇战死在阵地前沿。日军也不得不称赞这些爱国战士的英勇无畏精神，说他们是“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10月20日，从布袋嘴登陆的日军一个联队，渡曾文溪犯东势家庄，总兵柏正才、义军首领徐骧率抗日军及土著勇士700多人，在溪尾庄附近迎敌。这里距台南府城仅20公里，是府城外围要地。抗日军同敌人展开最后决战。日军依仗良好装备和优势兵力，步骑并进。义军凭借爱国热情和民族义愤，临危不惧，冒着猛烈的炮火，奋勇冲杀。徐骧亲临城头，提刀督战，虽身负重伤，仍大呼：“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激战中，不幸被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徐骧（约1858—1895），台湾苗栗人，祖籍广东。秀才出身，甲午战前执教于头份庄。日军入侵台北，徐骧在苗栗组织义军抗日，被推为军团团长。6月中旬，保卫新竹之战中，同日军大战荖荪、龙潭波一带，歼敌樱并在佐一队60人。在新竹地区坚持抗敌两月之久。他先后驰骋在台北、台中、台南

各战场。几乎每次重大战斗都有徐骧率领的义军参加，在抗日保台的战斗中，立下不朽功勋。

这场战斗，除徐骧中弹身亡外，柏正才力战牺牲。王德标、简精华下落不明。

台南沦陷 在曾文溪决战之前，另外两路日军已进逼台南。刘永福部柯王贵率部坚守，与日寇血战。刘永福驻安平炮台，策应守城军。各军因饿极不能战。18日，台南绝粮，守军溃散。19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守军顽强抗击，毙伤敌数十人，无援战败。刘永福带随从十人，从安平乘英轮逃回厦门。台南城抗日武装失去指挥，顿时大乱。21日，台南沦陷。11月，日军占领台湾全部重要城镇。11月下旬，日本宣告台湾“平定”。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继续坚持反抗。

此后，林少猫领导的义军活动于台南的凤山、屏东、东港一带。林少猫，出身台南大族，拥有很大势力。1898年底曾率3千之众围攻湖州公务署。后日军采用欺诈手段将林少猫诱杀于后壁林庄外，然后日军破庄大屠杀，杀死林氏家属及亲友，计男子107人，女子31人，幼童15人，又捕后虐杀者，计男子31人，女子22人，幼童25人。

1898年，日寇又采用“先抚后戮”的手段，诱降了柯铁的部分义军。1901年，日寇杀死了所有受降分子，“幸免者千分之一二”。据统计，自1897年至1902年，台湾抗日民众被捕者8030人，其中被杀的3473人，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个数目。

英雄的台湾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百战不屈，用劣势装备抗击日本侵略军近5个月，打死打伤敌军3.2万人。比日军在甲午战争中死伤人数多了近一倍。日本最精锐部队侵台主力军近卫师团被歼灭近半，师团长中将能久亲王、旅团长少将山根信成，先后在台湾伤重毙命。

第八节 宝岛回归

铁蹄下的革命火种

正当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时候，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世瞩目的伟人，此时也正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奔走呼号，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没有忘却把革命火种带到日寇铁蹄下的台湾岛。当他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后，就于1887年派遣被称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秘密到了台湾。陈少白到台后，找到杨鹤龄的堂弟、兴中会会员杨心如，并通过杨心如串联了吴文秀、赵海朝、容祺年等人，成立兴中会台湾分会，在杨心如的住宅设立会所。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次在台湾建立据点，也是台湾同胞直接参与祖国革命运动的开始。

1900年9月，孙中山为领导惠州起义，到台湾设立前进指挥所，共在台居留42天。

1910年春，同盟会会员王兆培到台湾，一方面在台北医学校学医，一方面秘密发展同盟会的组织。不久，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宣布成立，到了1911年，会员已发展到30余人。同年10月，同盟会老会员、曾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罗福星，奉孙中山之命到台湾发展组织。他在苗栗设立支部，在台北、桃园、彰化、台南、基隆及宜兰等地设立分部，招募志士，组织了华民会、三点会、革命会等抗日团体，并令吴觉民在台北大瀛旅馆设立联络总站，作为同盟会指挥中枢。

在一年时间内，罗福星先后4次密谋起义，均因事机提前泄露，当地领导人被捕而告失败。1912年12月18日，日本警察进行大搜捕，罗福星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此案受株连者达1200多人。

孙中山三赴台湾

1913年8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逃亡日本途中二到台湾。在台同盟会老会员杨心如、翁俊明、周赤中等前往晋见，孙中山勉以“讨袭革命”的大义。翁俊明听后，要求道：“吾要人京暗杀袁世凯。”孙中山说：“袁世凯者贼防护极严，很难近身。”翁俊明说：“吾不用接近袁老贼即可杀了他，只要将医学校培养的细菌放入达官贵人饮用的自来水中就成。”孙中山虽嘉其志却阻其行：“你这样做不仅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伤害，而且不一定真能杀了袁世凯。”但翁不听劝阻，依旧成行，结果细菌虽然放了，却未发生效力，只得又返回台湾。

1918年6月，孙中山第三次到台湾。他本想借此机会多接触台湾同胞，同他们宣传三民主义，但日本当局不允许他长时间停留，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与民众接触，结果孙中山仅住了一夜便离开台湾转赴日本，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到台湾。1925年3月12日，这位近代史上的巨人以59岁之龄与世长辞。台湾的台北、台中、彰化等地均组织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台湾文化协会在其开设的文化讲座上召开追悼会，5000多民众冒雨参加。会议本来准备了悼词和挽歌，但日本当局禁止致词唱歌，于是众人在如泣如诉的雨声中，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

1927年，蒋渭水等人脱离台湾文化协会，另组台湾民众党。1929年，该党派遣谢春木、王钟麟为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害怕刺激日本，予以拒绝。同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向台湾派出总领事，承认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当然，此时的蒋介石绝不会想到20年后，他会和台湾结下不解之缘。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雾社起义

为消灭台湾各种反抗力量，日本殖民当局于1929年2月12日，出动全部警察特务，进行全岛大搜捕，1000多人遭到突然搜查和逮捕。尽管如此，暴动仍时有发生。1930年10月27日，雾社国民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从10月22日起，就开始搭架看台，准备会场。日本人因高山族人耐劳且工资低廉，便雇了10多名高山族人运料做工。那日正值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工事迟缓。日本监工石川和吉村，手持皮鞭，驱赶工人。其中一个工人不服，反唇责骂，日本人大怒，就将他倒悬于树上，鞭挞示众，竟将其打死。高山族人的新仇旧恨一时并发，私下推举雾社领袖摩那·罗达奥和花冈一郎、花冈二郎兄弟俩为首，计划集众暴动。27日晨，运动会开始，观者云集。将近正午，呼啦一声，预先埋伏在会场四周的高山族人，舞刀怒吼而起：“杀啊！杀了日本人报仇啊！”一时秩序大乱，日本兵措手不及，四处奔窜。但见高山族人杀得性起，刀光闪处，人头落地，134名日本人很快成了刀下鬼，受伤者250人。又搜抄附近官舍，掳获大批武器弹药后胜利撤去。

日本警备队跟踪追击，但高山族人熟悉地形，动作迅速，早已逃入深山幽谷之中。日本人使用战车大炮，均不能伤及其皮毛。坚甲利兵，失去用武之地，且常被诱孤军深入，结果有去无还，尸骨难归。这样相持了半年之久，上至总督，下至当地警官，都束手无策，最后竟下灭绝人道的毒手。先筑长围防止高山族人突围，然后出动十余架飞机，在各山谷间投放毒瓦斯，企图使高山族人灭种。一时乌烟瘴气，弥漫山谷，半年之久，人不敢入。高山族人约有2千余人被毒死，一部分逃出的也在长围附近被机枪扫杀。穷山幽谷，横尸累累，望之令人心碎神寒。

雾社起义后，日寇继续对高山族人采取高压政策，将高山族人从高山驱逐到平原。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强迫高山族人入伍，为日军充当炮灰。

抗日战争期间的台湾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又转趋强硬。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以解救台湾的人民为职志，必须使台湾同胞恢复自由，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础。”这番话已隐约显示出蒋介石决心要以光复台湾作为对日抗战的重要目标。

“九·一八”事变后，台湾的抗日活动日趋活跃。1934年，日本海军元帅军令部长伏见宫亲王与海军元帅梨本宫亲王先后到达台湾，准备观摩海军大演习，并为台湾国防议会联合会总部举行成立典礼。典礼预定在10月1日举行，但在9月29日上午1时，“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基隆警察署门前爆炸，警署部分建筑物被毁，日本两个亲王极为惊恐。于是，日本总督府一面封锁新闻，一面大肆搜查，结果侦悉投弹者乃一个21岁青年，名叫郑清水。日本警察将其住所包围，结果郑清水化装成老者机智逃脱。一个月后，郑清水身上的钱全部用光，无奈只好向当地的保正廖某商借旅费。廖某见是通缉的要犯郑清水，就设计稳住郑清水说：“你先在我家藏着，我的钱被朋友借去，我这就去讨来。”郑清水轻信了廖某的话，哪知那廖某出了家门后，就直奔警察署，将日本兵引来，郑清水四面被围，知道走不脱，就拼力搏斗，杀伤日警数人后，剖腹自杀，虽已死但仍盘坐于地，四面包围的日警见状，不敢走近，后见久无动作，才知郑清水已死。郑清水之死，如此惨烈，今日寇胆寒。

郑清水的悲壮之举激励着台湾众多爱国青年，许多人冲破日本警宪的层层封锁，回到祖国大陆，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阵营，抗击日寇。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派人潜入台湾，散发抗日传单，秘密发展组织。

开罗会议后，国民党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为主任。蒋介石令陈仪草拟接收台湾的各类计划，先做好技术上的准备。并开始着手培养接收干部。

台湾上空飘起了青天白日旗

日月轮回，光阴荏苒。台湾人民与世界人民一同迎来了 1945 年胜利的曙光。到了 8 月份，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诺曼底海滩和莱茵河畔的枪声虽日渐稀疏，但东方的硝烟仍在空中弥漫。

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空军 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掷下的原子弹将两地变为废墟。曾在欧洲战场纵横驰骋的苏联红军铁骑兵，再踏征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同时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也发起了最后的攻势。8 月 10 日，日本天皇“圣断”停战，昔日的战争狂人低下失败的头颅。

当天下午 7 时 50 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了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次广播是日本外相茂德未经过日本军事当局的检查，代表日本政府播发的。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浴血厮杀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

日本投降后，重庆的蒋介石立即着手安排台湾接收事宜。中国政府以中字第 18 号备忘录及其附件通知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列为第十五受降区，任命陈仪为受降主管。日军投降部队为：10HA、8FD、9D、12D、50D、66D、71D、7SRs、76BS、100Bs、102Bs、103Bs、112Bs 及澎湖守备部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也在重庆成立，陈仪任长官兼警备司令。

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将向中国军队投降的命令电告台湾日军司令官安藤利吉。9 月初的一天，在台湾的日本第十方面军举行台籍官兵解队仪式。当晚，安藤利吉在台北东门町兵营设宴，以示惜别。日本将佐和台籍官佐应邀出席，分席列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时，一台籍准尉借助酒兴站起发问：“今日宴会，既是送行惜别，应当尽礼尽欢，一视同仁。为何席上日本人饮上等洋酒，台湾人饮劣酒，待遇要不同呢？日本人死到临头，还要贱视台人，台人就先退席。”言毕，欲离席。此时，一日本大佐怒起，喝令：“坐下！”那准尉闻言，二话没说，抓起一只酒瓶，掷向日席，“呯”的一声，玻璃碎片及菜汤溅得日军官佐满身满脸。日本官佐大怒，拔出腰间手枪，齐向台籍官佐射击。台籍军官见状也愤起反击，各拔枪剑，向日人攻击。一时间，子弹横飞，桌翻碟碎，秩序大乱，安藤利吉慌忙退避。一场厮杀，双方各不相让。结果，日人死伤 30 余，台人死伤 20 余。此当为台人抗击日寇的最后一幕。

国民党接收台湾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蒋介石令国民党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延孟携带中华民国国旗迅飞台北。张延孟到台后不敢怠慢，刚下飞机即与安藤利吉交涉：“我代表中国政府要求驻台日军放下武器，并降下总督府上的日本国旗。”天皇既已宣布投降，安藤利吉只得照办。随后，张延孟命人升起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台湾的天空，第一次飘起青天白日旗，在场的中国人无不为之动容。

蒋介石又电令：国民党陆军第 70 军先头部队 75 师在基隆登陆，第 70 军其余两个师和第 63 军所属的 3 个师迅速完成在台登陆计划，海军第 2 舰队进驻台湾各重要港口。

75 师在基隆登陆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当部队乘火车进入台北时，

30 万市民夹道欢呼，并高唱《欢迎国军歌》，其词曰：“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清，哈哈！到处欢迎，到处欢声。600 万民同欢乐，壶浆箪食表欢迎。”

国民党军队登陆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陈仪偕同行政公署交通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永、美国陆军上校顾德理、美国海军上校凯尔抵达台北。

10 月 25 日上午 9 时，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

出席受降仪式的除陈仪和其随行人员外，还有警备副司令陈孔达、第 70 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延孟、美军联络官柏德以及台湾地方著名人士和新闻记者李万居、叶明勋、李纯青等共 250 人。日方投降代表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一个小时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广播电台郑重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新归入中国版图，该区之一切土地、国民、政事皆归于中国主权之下。10 月 25 日遂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每年都要隆重纪念。

从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到陈仪宣布台湾收复，整整经过了半个世纪。血雨腥风 50 载，台湾人民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受降仪式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台湾各界在公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大会。许多人在会场上感激涕零，回忆 50 年往事，像一场恶梦。

翌日，台北学生和市民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庆回归祖国。台湾各地喜气洋洋，到处张灯结彩，爆竹喧天，通宵达旦。许多人家点烛焚香，祭祖拜天。

当时，由于日本统治者的封锁，绝大多数台湾同胞视国民党为孙中山的继承者、抗日的英雄、收复失地的功臣。然而，他们不知道此时的国民党已没有当年罗福星那样的义军和献身精神了。不久，台湾同胞的那一腔爱国热忱便熄灭了。两年后，便爆发了“二·二八”大起义。蒋介石把驻扎在宁沪线上的 21 师调往台湾镇压，抓获的起义者有的不加讯问立即枪决，有的割掉耳鼻后再用刺刀刺死，有的集体被机枪扫射，然后投入大海，被害者三四万人，使得为光复台湾而奋斗的一代精英凋零殆尽。

“二·二八”起义后，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并改公署为台湾省政府，撤换陈仪，改派魏道明为台湾省主席。

到了 1948 年底，国民党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桂系的白崇禧联络湖南的程潜、河南的张轸一起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后院起火，蒋介石感到根基动摇，失败将至，开始考虑自身的退路。他看中了四面环海，易守难攻的台湾，把台湾作为最后的据点，他的海空军优势可以发挥，且台湾地处东亚交通要道，可以很方便地从日本、南洋、美国得到外援。

此后，海峡两岸又开始了新的隔离。

第九节 邓小平的统一设想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

结束台湾与大陆分离的局面，长期以来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早在 50 年代，周恩来就曾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和平解放台湾的愿望未能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有了重大的突破。

1979 年 1 月 30 日，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时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是一国两制的最初构想。

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 年 1 月，邓小平在同一位海外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3 年 6 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话中，他从实际出发，进一步阐发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问题。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和平统一祖国决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邓小平强调，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在大陆和台湾的统一问题上，他要求国共两党都不应搞小动作。他批评台湾的“完全自治”的提法不妥，“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他提出，尽管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政治经济“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损害统一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在对内政策上，台湾地方政策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可以有其它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也特别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6、87 页）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现实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到，台湾当局所鼓吹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现实。

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也是国共两党都应担负的共同责任。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台湾的历史和现状，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台湾当局则根本无视海峡两岸变化的现实，鼓吹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改变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统一的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决不能接受的。邓小平认为。“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三民主义的使命已经结束。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在 19 世纪末走向革命后逐步形成的革命思想。它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内部已出现危机、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日益强烈的要求民族独立、民主、工业化和社会进步的愿望。在推翻封建帝制，创建共和国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三民主义”毕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产物，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它的历史局限性日渐显露出来。为了使国民党有一个适应于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主义，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赋之以新的内容，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样，新三民主义才成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1927 年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打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旗号，背离了三民主义。他们取得全国政权后，并没有按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对外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发展民族经济，而是投靠帝国主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独裁统治，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使中国仍然贫困落后。由于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最低纲领基本相同，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新三民主义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地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今天，中国人民在民族独立、民主、工业化和社会进步等许多方面取得的进步，已经大大超过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显然，三民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因此，以一个过时的理论为基础实现祖国的统一是不切实际的。从现实来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行不通。

建国 40 多年来，大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一個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是大陆 11 亿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就是从台湾方面来说，它既没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经济基础，也不具备这个力量。所以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不现实的。

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祖国统一的大局出发，在正确分析国共两党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共两党实行第三次合作的主张，以期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邓小平指出，平等会谈是指我们主张两党会谈，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为了消除对两党会谈的误解，邓小平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 1981 年 9 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内容和 1983 年 6 月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希望大陆和台湾双方“要多接触，增进了解”，可以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邓小平关于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的主张，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富有政治远见的重大决策，是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有效措施，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正确途径。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统一祖国，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政策，受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欢迎和称赞。

第十节 “台独”是危机的根源

李登辉强调加紧战备

邓小平所阐述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体现了尊重事实、尊重实际，特别是尊重台湾的历史实际，充分照顾

到台湾人民的愿望，对于尽快结束海峡两岸分离的局面，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台海局势，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对台使用武力的三个前提：一、台湾宣布独立；二、

台湾被外国武力入侵；三、台湾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

在台海海峡风云迭起之际，李登辉反复强调加紧战备。据

台湾报刊报道，目前的台湾的防卫策略，主要着眼于空中防卫、海上控制和反登陆作战。

空防重点是进一步发展“经国号”战机、地对空飞弹、空对空飞弹系统的研制和发展，统一台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

系统，加强地面防空设备全自动化以及电子干扰和反电子干扰的能力，逐步淘汰固定雷达并部署机动化三度雷达以改进低空侦测，在东部和西部兴建完全的空军地下基地；

制海方面，强调舰队空防、海面拦阻、反潜艇作战、水电战，武器改良以“光华”，一、二、三号计划为主，并且加强海上和陆上监视人力，阻止特工的渗透；

反登陆作战方面强调继续发展地面和空中火力支援优势，机动性、预置坦克座炮、在岛外部署地对地和地对空飞弹、逐步采取新式侦测/监视装置、强化巡逻、防止渗透和枪械走私，以及反破坏、反颠覆作战。

台湾军方虽拟有各种防卫作战计划，但原则只有一个：挡住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波攻击。这个原则从蒋经国任“总统”的年代即已确立。

至于挡住第一击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最新发表的郝柏村日记中并未说明，但综合推论不外乎国际声援、调停，甚至出兵协防，或是人民解放军知难而退等变化。台湾军方的一位高级将领表示，台湾尚未完成备战，也挡不住中共的第一波攻势。

台湾军队演习频繁

为了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也为了自我壮胆，更为“李连配”保驾护航，台湾军队曾举行了一系列演习。外岛部队将战备状况提升为“状况三”，外岛前线则实施代号为“祥和”的三军联合戒备演习；1996年3月，台湾还将“联合演习”与新加坡部队在台举行的“星光演习”结合，首次举行联合登陆演习，验证双方登陆与反登陆战力；为加强反渗透、反破坏与应变能力，在东部苏澳地区实施“天威”演习，验证海军部队、炮兵部队雷达站及陆军重要设施的反制能力，该演习包括陆战队两栖侦搜营、特勤队及攻战特遣队官兵对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渗透破坏，借以测试各单位防卫战斗及安全警觉能力；海军168舰队在花莲外海进行战斗巡弋实兵战备操演，意在展示海军反潜防空战力，安抚岛内民心，操演项目包括反潜作战、防空作战、直升机舰上起落、潜艇紧急上浮海上整补、舰炮平面射击及海空协同作战。

除却演习场上硝烟滚滚外，台湾还对其防卫体系具有战略预备能量的一环“佳山计划”进行后续增设工程。佳山基地1992年6月30日完工后，被认为是空军“保持战力，避免决战”战略中最有效率的硬体工程。只是由于飞机洞库抽油、抽水马力不足，无法迅速排除自岩缝骤增流出的山水，经常导致积水并抽水马达轴承卡死，造成水气渗入加油设备中，泡损油料，无法为战机进行加油作业。另外，掩体洞口外缺乏战机检修及装备停放空间，时常造成备用气源车、油车、液氧车甚至消防车，均停放在非规定位置，极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如此为台湾军方所看重的重要工程，在1993年的“汉光9号”演习中，佳山计划区竟有25项必须重新加以检讨，目前已优先编列了其中17项的工程预算。

海峡两岸军事现状对比

美国军方有一种声音大概能令台湾当政者略觉宽慰。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大陆近来在加强军事能力方面虽然取得很大的进步，但要跨过相当距离的水域发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则是一项复杂的军事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而台湾占有空中优势，美制 F—16 战机可占有台海制空权，中国大陆仅具备对台实行海上封锁或导弹攻击的能力。

真是如此吗？台湾《世界论坛报》于 1996 年 3 月 7 日刊登的《台湾海峡军事对峙分析》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分析：

资料显示，台湾的空军战机总数不足 800 架，空防主力为美制在台装备的 300 架 F—5E 战机和经国号战机（IDF）。台湾军方退役将领承认，F—5E 战机就算更换机身纵梁，在性能上也难与解放军的歼 7、歼 11 战机抗衡。

台湾自制的经国号战机，空中性能优于 F—5E，配备的雷达应用共相脉冲多普勒技术工作的 X 波段，共有 15 种操作模式；同时拥有高、中、低三种不同的脉冲重复率，分别在仰视、俯视和空战缠斗时使用；飞行控制则采用三重全数字化线传飞控系统。但是由于采用轻巧的外形设计，却安装了二台推力不足的大引擎，使机身超重，从而意外频频。军方原有意暂缓每月量产两架的进度，等改正所有缺失后再恢复，碍于空防战力不足，去年 12 月又恢复量产。

台湾扩充空军实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向美国购买 150 架 F—16 战机上，可是，据一位退役的上将指出，台湾的建军工作要到 1999 年才能完成，向美、法等国采购的先进战机、战舰装备，要到 1998 年初才全部运交台湾。虽然美国说，售台的 F—16 战机将修正组合任务电脑、数据地形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微波降落系统、座舱等多方面功能进行了改进，无论是航电、火力控制系统、续航能力与作战半径等性能甚为优异，适合台湾空中防卫作战，但是台湾中山科学院院长刘曙唏却认为，若在台湾海峡发生空战，F—16 战机可能不及 F—15 战机。

中共在东海两度试射飞弹以后，台湾急欲建立更先进反飞弹系统。原有的“天网”全自动综合性防空系统为美国休斯公司设计施工，完成于 1980 年。整个系统由 21 座雷达站构成，散布在台湾本岛、澎湖以至金马、东引。1988 年开始，台湾军方再推动强网计划，耗资 1.1 亿美元，将陆海空三军防空资源的指挥和管制统一起来，更新战管电脑。但根据台湾军方非正式推算，若中共从沿岸发射 M 族飞弹，台湾能预警的时间还不到三分钟。由于飞弹不易拦截，即使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弹道飞弹也难以对付中国的导弹，台湾空军总司令黄显荣将军称，空军已开支 205 亿元新台币向美国购买了 E—2T 空中预警机，首批两架已运抵台湾。它们加入空军侦测行列后，由于侦测范围涵盖大陆东南沿海第二线机场，亏使空中预警时间延长到 25 分钟。此外，该种预警机滞空时间长达 6 小时，可同时追踪 2000 个目标，管制 40 个拦截任务，协同 C—130 电子作战机，执行电子干扰、敌方雷达干扰及反制雷达操作等任务。在战术部署上，E—2T 空中预警机还可配合战机上的雷达，加强战斗空域的反应时间。问题是预警机不能永远停留天上，而如果战争爆发，中共不断干扰和轰炸台湾的几个机场，预警机也难发挥作用。

中国大陆的中、长程导弹技术水准已和美国接近，其攻击能力涵盖台湾全岛。大陆各种类型的导弹都能打到台湾去，以目前台湾相当脆弱的防空系统，是无法拦截大陆的导弹的。一旦双方开战，台湾军队只有被动挨打，机场、军港、码头、各军部门、电站，甚而至于总统府等等，都将成为袭击对象，而毫无还手之力。

台湾的军队，由士兵至三军司令，久无作战经验，而中共解放军，打过大规模的中

印边界战、中越边界战和较小规模的珍宝岛保卫战以及收复西沙海战，可以说有相当的作战经验。

大陆和台湾的军力，不可同日而语。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武器之外，军队的素质相当重要。台湾军队不但缺乏作战经验，目前更存在吸毒、逃亡、自杀等问题。加上派系林立，平均每天有 1.29 人死于非战斗原因，全年损失的兵力，在一个营以上。三军官校招生不足，优秀军官难求，已非一时一日，而是长久以来积弱不振的顽疾。

从总体而言，虽然台湾不断加强其军力，但论数量，和中共的军力相差太远；论先进程度，也未见比得上大陆的水准。加上地缘接近大陆，本岛幅员狭窄，原料、能源仰赖外界供应。因此，不论防卫如何做得严密，中共军方只需打消耗战，台湾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台湾不断增加军费，想方设法购买这样那样的先进武器，从根本上来讲，对改变双方军力对比意义不大。与其说是为了增强军备力量，倒不如说是李登辉为了竞选连任而造势。

从多家媒体或持之有据、或穿凿附会的猜测判断来看，大陆的军事准备是认真的，台湾却尚未完成备战。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就不难理解台湾方面何以会曝光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去年 12 月 19 日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

无疑，中共的军事压力使得台湾岛内民心振荡，对总统大选形成重大的牵制，岛内反李阵营的火力相应增强。抛出尼米兹舰过台海的消息，至少可以制造出美国支持李登辉的模糊效果。

有迹象显示，台北在促使参众两院对白宫施压的背后，有公开游说的轨迹可寻。美国的立场，显然是

台北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最大支柱。一场号称中国第一次民选总统的对战，极有可能成为外来势力左右胜负的强权游戏。日本媒体就重提美日安保条约中的“远

东条款”，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协防范围，把日本的安全维系在台湾的不会沉没。在如此扭曲的台海形势和

国际环境中，美、日、北京甚至东南亚诸国的动向，已经隐然成为台湾选举的风向球。

众所周知，冷战时期，台湾在美国阵营中有“不沉的航空母舰”之称。随着两岸过去 10 年的开放交流，彼此的敌对局面已有很大改观。去年两岸关系跌回近年来最为低迷的时期，台北当局放出尼米兹事件讯息，

强烈地暗示美台重新协防台海的可能性。这对北京，暗含极大的挑衅意味。可以肯定，一旦台北把美国重新拖入台海争端，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最后一扇大门也将永远关上。诚如一家媒体所言，如果第七舰队重新巡防台海，韩战的历史就可能重演，不过战场不在朝鲜半岛，而在台湾。

归根结底，台海情势虽然紧张，但尚未到达战争

一触即发的地步，尼米兹号在此一敏感时刻通过台海，必然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而要美国人为

中国人的事务流血，是不切实际的梦想。美国的出发

点在于维护其在亚太地区利益，防止中国大陆的海权在此区域过度扩张。且不论台湾当局力图拖美国下水的策略能否收效，仍在未定之中，即使美国真的如李登辉所愿，帮助台湾抵挡彼岸的攻击，也未必能改变台湾的命运。美国曾经以介入南中国海军事冲突为内容两度演习，结果令人沮丧：航空母舰在中共密集而准确度极高的导弹袭击下，无能为力，仓皇落败。而且，韩战的创伤，美国民众可以渐渐淡忘，在军界却是永远的烙印。

中共高层业已放出狠话。乔石说，中国在考虑对台湾使用武力时，美国是否干预，

已经不再是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言下之意，到了非动武不可的时候，即使美国强欲介入，中国只有不惜代价，采取军事行动，无可选择。以此观之，对台湾而言，加强军备也罢，寄望美国也罢，均非上全之策。放弃“台独”，与大陆沟通对话，化干戈为玉帛，才是生存之道。

尽管中国已经十分强大，但正像邓小平 1983 年 9 月回答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封锁台湾的可能性时所申明的：“中国不会采取轻率行动。”无论谁都不必去怀疑这是一种有诚意的说法。因为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对大陆有利，对台湾有利，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亦有利。

当然，中国人民对“台独”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这又如江泽民主席 1995 年春节《讲话》中第四条主张中所说：“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的图谋的。”

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 12 亿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国人民都将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宏伟大业。

祖国统一的期限不可能是无限的。任何拖延和破坏祖国统一的进程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附 录

以下五则附录，展现的是一幅幅精彩的想象图。它们分别出自不同的出版物，尽管其中部分篇幅不乏对我的诬蔑和诽谤，也不足以准确地预测未来。但由于它们分别出自名家和专家之手，抛开政治见解不同之因素，就其对战争的专业看法，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附录一：备战而避战开战玉石俱焚

——独家专访郝柏村谈台湾战略构想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作者谢忠良为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

原编者按：在两岸军事演习频仍之际，香港《明报月刊》独家专访台湾前“参谋总长”郝柏村，由他以专业及主导者的立场，分析台湾的军事战略。在访谈中郝首次承认台湾当初设立中山科学院，就是为了研发核子弹。在他“总长”任内，台湾曾经研发中程飞弹“天马计划”，目的就是发展中程核子弹头飞（导）弹，以改变台湾的战略劣势，并把作战纵深更向前延伸，以争取更有利的守势及吓阻作用。

不过郝也反复强调，台湾战略指导原则是“备战而避战”的上策，只要发生战事，就必须有玉石俱焚、苦撑一年的心理准备，台湾将付出毁灭性的代价，而大陆也会付出上百万兵力损失的牺牲。

在台湾，郝柏村是除前“副总统”陈诚之外，唯一由“参谋总长”到“行政院长”“出将入相”的人物。他后来虽没有出任“副总统”，不过也提任国民党副主席，横跨党、政、军的第二把手，但是他真正具有专业及影响力的领域仍是军方。目前郝因派系斗争，在国民党内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对于军方事务已无置喙之地，但他对于自己近十年的建军计划仍有一份专业的自信。他说：“我的战略构想是经历次渲习修改而成，即使他们想改也改不成！”

问：你在台湾建军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你的设计中，台湾的战略主轴是什么？

答：在纯军事战略上，台湾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为了防止大陆的侵占，台湾的武器装备加上国民的意志，必须要有打一年的打算，也就是必须有玉石俱焚的心理准备。否则很难面对大陆的军事压力。

必须作最坏的打算

在这个前提下，战略必须持久，以保存台湾的战力为目的。我们在大陆的奇袭封锁之下仍应保存大部分战力，做为在本岛决战之用。

把外岛当做屏障，空军全部转移到东部山洞实施佳山计划，因为空军是所有军种中最脆弱的军队。一般估算，台海发生战事三至五天内，台湾机场将被破坏殆尽，佳山计划就是为防止大陆飞弹及空军轰炸机场而设计的地下掩体工事。

空中奇袭共军于台湾滩头

以台湾的飞机数量而言，在一般战争中空军消耗量最大，台湾的飞机在几天内就会打完；所以，佳山计划是让飞机在台海战事爆发时躲起来，等到中共陆军大部队登陆台湾时再出现，奇袭轰炸共军于台湾滩头，达到奇袭的效果，并歼灭敌军于滩头。

在战术上我们争取速决的作为，因为军事上台湾是处于劣势，两岸不打最好。台湾战略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备战而避战”。只要两岸开战，台湾就必须要有最坏的打算，并以台湾本岛做为决战场的准备。

问：在战略设计上，海军角色如何？

答：必须要有制空权，才会有制海权，否则在战场上舰队是完全暴露在空军的攻击下，将成为空军的靶子。所以必须做到以空制海，以海制海，甚至以陆制海。海军的活动因为无法在掩体内，经常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保持空中优势是制海的先决条件。

基于对制海权的需要，台湾部署“雄蜂二型”岸置飞弹，瞄准大陆的海上舰队的活动。在外岛东引及本岛基隆部署为的是封锁台湾海峡北部，在澎湖马公及金门马祖部署则封锁台海南部，这样的设计就是着眼于以陆制海，封锁台海，克制大陆海军。

问：台湾海峡狭窄，本岛也是狭长地形，且又有中央山脉从中阻隔，作战的纵深有限，在战略与战术的设计上是否有困难？

答：战略的设计只能以既有的时空条件为基础做最佳的设计，不能说有中央山阻隔，就把中央山脉移走，或忽视它的存在。

“金马非军事化”是外行话

从台湾及台海的既有形势中，在战略上是尽量向前把作战纵深，把防空飞弹前移到金马前线，把空军往东部后移，尽量加大作战的纵深。

外岛的驻军及防卫力量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作战纵深。反对党有人提“金马非军事化”的说法，这是完全缺乏战略常识所讲的外行话，只会贻笑大方。

不过，最主要的战略思想还是应该以有限度军队的战略吓阻中共武力犯台，不要让大陆有正当的理由做为侵占的藉口，否则对两岸都将大伤元气。

问：你前面提到两岸开打，台湾必须要有苦撑一年的最坏打算，这是在什么状况下得出的结论？

台湾须准备苦撑一年

答：所谓的苦撑一年是我们在兵力及后勤贮存上的打算，当大陆对台海进行封锁，我们除了有相当的贮备之外，还必须有能力突破反封锁，争取外援。在大陆大部队登陆台湾西岸时，仍有战力做最后决战，让中共必须花费上百万人的兵力，才能拿下台湾，这就是最坏的打算。

问：也就是说，两岸爆发战争，最后的决战场将会在台湾本岛？

答：台湾不大可能用武力去侵犯大陆，或登陆大陆开辟战场，大陆在兵力上也明显占优势，这是既存的事实。

台湾的最上策是持续维持两岸稳定，如果最后为了保卫民主自由，不得不起而战时，台湾人民必须要有决心意志，众志成城，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这时决战场只能在台湾本岛，不会在大陆。

当中共用大部队登陆台湾时，对中共而言，已属下策，这样台湾就已经算赢了，台湾虽将毁灭殆尽，大陆也将面临百万兵力在台湾耗尽的重大损失。

问：在波湾战争爆发之后，世人对战争形态有了新的看法，高科技战争可以减少大量兵力的损失。如果两岸发生战事，大陆是否还必须损失上百万人，才能拿下台湾？

答：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战争，仍属于传统的战争，谈不上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不外乎电子战及飞弹，两岸都没有能力打高科技战争。在军事科技水准上，仍然会以传统战为主。

大陆不须动用核弹

问：目前大陆仍频频核子试爆，再加上北京又拥有中、长程飞弹，这对台湾是否构成很大的威胁？

答：大陆不至于敢冒世界之大不韪而动用核子弹；对付台湾也不需用中、长程飞弹，以近程飞弹的射程，就足以把台湾涵盖在范围内。

以传统炸药弹头的近程飞弹对付台湾，在两岸发生战事时，是北京最可能使用的方式，这样对台湾的攻击已经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就纯军事而言，台湾对大陆的攻击，仅限于东南沿海的地区，对大陆只算“抓破皮”而已。但是，大陆对台湾的军事施为则是直指心脏。

因此，台湾必须把政治与军事结合在一起，维持两岸的和平，备战而避战。否则，台湾将是较吃亏的一方。

问：你在总长任内，曾经有发展中程飞弹的计划，中程飞弹是否有利于台湾的战略提升？

答：中程飞弹只是捎带弹头的载具而已，必须看捎带什么样的弹头而定，如果是核子弹头，则有很大的战略及战术意义。否则，辛辛苦苦飞了几千公里，仍只是捎带传统炸药的弹头，只能造成很小的伤害，在战略与战术上的意义不大。

问：台湾是否曾经发展过核子武器？

答：初期中山科学院成立的目的就为了发展核子武器。后来，因为我们签署了禁止核武扩散条约，才停止发展核武。不过，我们是有能力做，而不愿意做而已。因此，中程飞弹在核子弹发展停止后，也就一并取消研发，当时中程飞弹则已达完成设计的阶段，绝对有能力生产。

问：台湾的防卫计划（固安计划），可以说是在你的主导下完成，你的设计是把台湾本岛做为决战场，以最繁荣的西部为战场，兵力则隐藏在东部吗？

答：建军是十年间每年不断透过各种演习修正，它是极度科学的计划，以台湾既有的时空条件做基础，设计出最好的防御条件，有些因素是不可能改变的。

台湾西部恐将毁于一旦

由于西海岸是暴露在大陆的直接武力威胁之下，东部则有中央山脉做为屏障，不管是大陆的飞弹或飞机在中央山脉的阻隔下，很难攻击台湾的东部，所以花莲台东地区是台湾战力保存的绝佳地点，空军佳山计划就是选择这里的优势地理条件而设计出来。

中共大部队如要登陆台湾，由于台湾的地形东部是悬崖地形，无法登陆，也只能从西部上岸，决战场自然就会在西部地区。虽然台湾的一切工、商、文、经设施都以西部为主，但势必会在战争中毁于一旦。这也是我说的只要两岸发生战争，台湾人民必须有玉石俱焚决心的原因。

两岸战争从初期到后期都是以台湾西部为重心，决战也将在西部发生，这是想改也改不了的地理条件。

问：大陆军事演习，从 49 年以来，就没有停过，何况北京是否要武力犯台，与演不演习并没有关连。为何近一、二年来北京武力威胁的说法特别严重？

答：两岸军事威胁的现象早已存在，“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需要军事防卫力量。戒严时期两岸是对抗的阶段，军事武力对峙的状态另当别论。现在两岸进入谈判协调沟通的时代，两岸应以协商代替对抗，不要给大陆任何犯台的藉口。

以目前状况而言，台湾方面只有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一个中国”的概念，并不与北京相同，我们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对“一个中国”的坚持，两岸仍能保持和平的状态，否则将很难避免兵戎相见。

问：你一直强调台海安全不能从纯军事的角度思考，其原因为何？

答：台湾防卫战是守势作为。在台海安全考虑上，军事只是扮演配角的地位，就整体形势而言，两岸军事力量悬殊，若只做纯军事思考是极不对称的。台湾的屏障应该把政治因素考虑进去。过去我在“国防部”时，台湾的建军基本思想就是从政治形势上设计。

设计战略要考虑对美关系

问：在建军构想中，如何把无形的政治因素加入？

答：举例来说，在北京与华盛顿建交之前，台北与华盛顿在有邦交时，签订有《中美协防条约》。所谓的《中美协防条约》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由美国的巨大政治力量支持台湾各方面的发展，让台湾有时间完成建军准备。所以，当时美国一方面与中华民国共同协防台湾，一方面却与北京在华沙举行会谈，保持着台北、华盛顿与北京的三角关系。

在当时的建军构想中，就必须以这种国际环境为前提，加以设计，在美援下建立台湾的防卫能力。美国人不会也不希望替台湾流血，台湾军方也只能从美方获取后勤支援，达到吓阻的作用。当时两岸处在不稳定的军事平衡状态下。

问：目前的两岸局势，与美国协防台湾时大不相同，政治形势如何加入建军构想中？

答：美国与大陆建交的基础是“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及“八一七公报”，在这三个公报中，双方就台湾问题都做出重大让步。美国的让步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及“一个中国”的政策，而大陆对美国的让步是同意美国关心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在这个基础上美方提供台湾防卫能力及武器。

这也就是北京方面对于李登辉“总统”访美反应这么强烈的原因。北京认定华盛顿违反三个公报的原则，因此也一再暗示北京也可以违背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承诺。这也就是近来台湾在面对大陆军事演习时民心不稳的原因。所以，在战略设计上，自然要把这些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问：你主持台湾的建军构想长达8年多近9年的历史，你曾主导整个台湾的战略思想。有人批评你在“参谋总长”及“国防部长”的任内有“大陆军主义”的倾向。

不是大陆军主义者

答：在我担任总长及部长任内，“国防”预算分配的比例，空军、海军及陆军为三、二、一之比。空军飞机的换装 IDF 成军，美国 F—16 与法国幻影 2000—5 的采购，都是我任内打下基础；海军二代舰拉法叶舰的采购等，预算几乎都是以空军与海军的花费为主。从预算分配来看，我不可能是“大陆军主义”。在我任内，三军中以陆军预算最少，而其中大部分经费是为了使陆军达到装甲化、机械化为目的。在兵员的裁减上也以陆军为主。这怎么可说是大陆军主义！

避免给中共攻台口实

问：以目前的局势，台湾防卫力量首重什么因素？

答：最重要的是要把国民意志结合在一起，不能把政治流派斗争拿到军队中去搞，不要造成民心与军心的不稳，避免让大陆有口实轻举妄动。

一般而言，大陆上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想毁掉台湾，不要让中共有藉口煽动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大旗发动对台的不利行动，而使得两岸陷入不可知的未来。

至于大陆的军事演习，一般都是例行性的，大陆军队演不演习与犯不犯台是两回事。大陆如果真要有所行动，可能就不会大张旗鼓演习。台湾民心因为大陆军事演习而浮动，是台湾一大警讯，应该有所警惕。

附录二：台湾海峡不再是天险

〔原载香港《广角镜》，作者袁林专研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问题〕

1996年3月18日至25日，南京战区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从争夺制海制空权到快速装载航渡，从装甲集群抢滩登岛到空降、机降部队垂直登陆，从多层次火力突击到多路强击突破，从立体穿插分割到纵深越点攻击，展示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和山地进攻作战的壮阔场景。

三波演习在军事上意味着什么？

台湾海峡不再是障碍

台湾被西方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在台湾军方一些人想象中，台湾海峡是不可逾越的天险。

一向以来，宽阔的台湾海峡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屏障，但以今天的条件看来，台湾海峡风平浪小易于航渡，台湾海岸平缓坚实，西海岸大多是沙滩、浅滩，便于抢滩登陆。台湾军港水浅又狭窄，便于布雷封锁。在当代军事技术下，海空军和导弹都可飞越台湾，台湾海峡再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了。

大陆导弹有力摧毁台湾全部机场

军事技术的进步使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几十年前解放军根本没有海空军，大陆破旧的木帆船面对辽阔的台湾海峡感到力不从心，望洋兴叹。但如今强大的空军超音速机群，只要短短 2 分钟就可从中线飞越海峡到达台北市上空。

几十年前，解放军射程最大的武器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火炮，它有限的射程还不能覆盖仅在几千米外的金门岛，对台湾本岛更是鞭长莫及。但如今大陆第二炮兵的巨型地—地导弹，可以准确地击中海峡对岸任何一个空军机场。中国拥有专门破坏机场的尖端武器和各种空投地雷，并于 90 年代初就向海外公开出售。如果有需要，摧毁台湾的全部空军机场，对大陆来讲毫无困难。大陆过去生产了大量“红—2”防空导弹，这种导弹现在已经过时。然而“红—2”仅仅改变一下控制软件，就是很好的近程地—地导弹。据说大陆已经用“红—2”改制了 M—7 战术地—地导弹，这样，光是“红—2”导弹即可有效地压制台湾的机场和防空阵地，又因其已经过时退役，故此成本极低。

台湾缺乏安全后方

台湾总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南北长 394 公里，东西宽 144 公里，地势狭长，不利防守，山地面积占全岛面积的 2/3，居民和军事基地几乎全部集中在余下的平原和丘陵上。由于人口密度过大，台湾陆军战时部署和调动难于灵活。152 条河流将台湾平原及台湾陆军分割，使它只能各自孤军作战，无法互相支援形成合力，防御能力大打折扣。台湾陆军容易被对方少量进攻军队轻易各个击破。台湾西部平原最宽处仅有 32 公里，整个处于海上炮火的射程内，缺乏防御纵深，没有一处安全的后方，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不容易组织起坚固有效的防御。台湾孤悬海中没有外援的通路，补给困难，使台湾不可能长期固守。

台湾空军拥有 8 个主要军用机场：桃园、新竹、嘉义、公馆、台南、屏东、台东和花莲，机场设施完善，并建有飞机掩体，但多数靠近海岸，近的不足 5 公里，毫无防御纵深，极易受到大陆攻击。

大陆战机两分钟可到台北上空

台湾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距福建最近处仅 130 公里，台湾各主要军事基地和城市距大陆均不超过 300 公里。

由于台湾非常靠近大陆，大陆海军 25 型快艇只须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跨过海峡到达台湾，大陆的 SU—27 战机、歼—8 战机只要 2 分钟时间就可以从海峡中线闯到台北上空。

台湾多风、多雨。其中以台风影响最大，每年多次台风过境，台湾三军必须收起兵器防风雨，一旦有事，台湾军队在台风过境季节更不利，台风前后更处于束手挨打状态。

如何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

过去长期以来，台湾当局有一种理论：大陆无法夺取台湾的制空权，而无法制空，就不能制海；一定要制海，才能抢滩登陆进台湾。台湾军方还说，中共也没有足够的渡海工具，最多只能强渡 3 万人。解放军的战船将在渡海途中被国民党军全部击溃。

台湾军方还说，台湾空域每次最多只能容纳 400 架战机，双方各来 200 架，结果大陆战机被台湾军机和防空导弹打得惨败，被迫停止“侵略”，败退回大陆。

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一旦爆发战事，中共中央军委必然会有精密部署，内外配合，多重准备，战斗模式哪会这么简单？试想想，中共现任军委负责人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等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谁能强迫中共指挥部必须按“台湾模式”开战？谁能要求解放军不首先出动导弹、同时海陆空三军配合进攻？谁能规定解放军空军每次只能出动 200 架战机？谁能估计解放军只有海空决战后才登陆宝岛？谁不知道奇兵突出，打起仗来有各种奇袭、包抄、分割、封锁的计谋？谁能断言大陆不会先炸毁台湾的机场、军港、雷达站、油库和各种战略目标然后才进行海空战？

台湾的“强网系统”

台湾最近也不断向外显示其“强网防空系统”。台湾一些人认为，“强网系统”可将台湾的战斗机、防空导弹、高射炮结合起来，组成铜墙铁壁，发挥强大战斗力。如果中共战机来袭，势必受到重大损失。

台湾的“强网防空系统”是新近花了 1 亿多美元改建的指挥、控制、情报、通信综合系统，完全由电脑控制台湾陆海空军的防空电子系统，这个系统的确加快了台湾防作战的反应速度。

“强网”系统所依据的空中情报，由分布在台湾和大陆沿海岛屿上的 21 个雷达站中的约 35 部雷达提供。台湾 1995 年从美国购进的 E—2T 空中预警机，进一步提高了台湾的空中预警能力。

台湾的防空武器有“奈基 II”、“霍克”、“天弓”、“爱国者”、“小木解树”、“标准”等数种防空导弹和一些 35 高炮，还有约 400 架战斗机。

台湾相信它的“强网防空系统”先进而严密，理由是“强网”比台湾过去的防空系统强得多。但如果将“强网”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防空系统横向对比，结果又如何呢？一些东亚安全事务专家指出：“强网”可阻止一两架间谍飞机或误入台湾上空的飞机，但对大规模进攻不起作用。

台湾防空网缺乏防御纵深

事实上，无论防御空袭还是防御导弹，都需要一定的防御纵深。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和伊拉克军的防空导弹纵深都在 300 公里到 1000 公里以上。但海岛的地理特点，使台湾的防御纵深几乎为零，这就引发了下面一系列问题：

1、台湾雷达站暴露海边。“强网”在运行中完全依赖雷达和预警机提供空中目标的情报。没有这些情报，“强网”就不能发挥力量，防空导弹也难以发挥作用，战斗机不能有效作战，高炮的命中率也会很低。

台湾的防空雷达站暴露在大冈山等高山上，体积很大，目标也大，易受攻击。台湾没有防御纵深，它的雷达站就在海边，而无法像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军队那样，将雷达站设在安全的后方，由众多其他部队提供掩护。这样，大陆只要派一艘安装了火箭炮的渔船冲过去，就可将台湾的雷达站打掉。防空雷达又不能藏起来，因为如果它藏起来，大陆军队固然炸不到它，但它也“看”不到大陆的飞机，那么它还有什么作用呢？而暴露在外的雷达站是大陆飞机导弹和海军火炮的良好目标，战斗一旦开始，台湾的雷达站将会很快被大量摧毁。

2、台湾预警机的缺陷。当然，台湾还有 E—2T 预警机。但台湾这种预警飞机只有 4 架，每架实际持续值班时间小于 4.5 小时，而这种飞机在海湾战争中的可靠性是 69%。因此台湾的预警机数量不足以组织连续 24 小时的空中警戒。同时台湾的预警机雷达作用距离小，一架飞机不足以覆盖整个台湾空域。美国航空母舰同台湾比起来是一个点，但它一般都需要配备 5 架 E—2T 预警机，显然，台湾 E—2T 的空中雷达监视系统有极大的漏洞。

台湾的 E—2T 是美国预警机中的次货，已经用了近 30 年，E—2 是舰载预警机，由于航空母舰上严格的体积重量限制，美国海军预警机本来功能就不强，比美国空军预警机性能相差一代。91 年的海湾战争证明，E—2C 的雷达在海陆交界处失效，在陆地上效果也很差。而台湾的 E—2T 又是 E—2 系列中最次的一种，美国、日本、埃及等国全都用 E—2C，只有台湾是 E—2T。从机上主要设备看，美军在 10 年前就有了 AN/APS—139 雷达，但问题还是不少。1990 年以后，美军的 E—2C 装备了更完善的 AN/APS—145 雷达，其性能接近于美国空军 15 年前的 E—3A 预警机水平。但台湾新买的 E—2T 却装上 1983 年的 AN/APS—138 雷达，性能差了一大截。据说为保密，美方还卸去了机上的一些重要的“模块”，使台湾的预警机在台湾海峡这样的地理环境下，难以发挥大效。3、台湾没有雷达对抗本钱。中国是个大国，拥有从米波到毫米波，从低空近程到高空远程的各种雷达。中国不仅获取空中情报的能力强，而且通过先进的抗干扰雷达的研制，了解了干扰各种雷达工作的技巧。而台湾雷达多数已经用了 20—30 年，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但全面更换又为台湾经济现实所不允许。因此台湾同大陆这样强大的对手在雷达上对抗当然必败无疑。

看完先天不足的“软件”——台湾防空指挥控制系统，再看台湾空防的“硬件”——战斗机等武器系统。战斗机一向是主要的空中武力，由于台湾地理上过于靠近大陆，因此台湾空军的全部机场易于被毁，这使台湾的战斗机无论怎么样先进，都将因这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而很快丧失战斗力。而台湾的战斗机事实上并不先进尖端，所以它将更快地从台湾空域消失。

台湾导弹品种不全

当然台湾还有美制防空导弹，但是台湾的导弹品种不全，它既缺乏真正的高空导弹，也没有真正的低空导弹，真正能打高速目标的导弹也欠缺。美军一贯并不很重视防空导弹，因为美国有空中优势。但台湾没有，而导弹的品种比美军还少，美军的“罗兰特”等低空导弹台湾就没有。当然，小小的台湾真像美军那样装备 7—8 种导弹也无法管理。另一方面，台湾防空导弹部队太少，只有 6 个营约 30 个作战单元，根本不足以掩护全岛。而海湾战斗中，联军虽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仍部署了约 50 个防空营。

防空导弹主要是为打击轰炸机设计的，因此像台湾的主力“霍克”导弹其机动性只有 15G，即使最新的“爱国者”也只有 25G，根本打不到远比轰炸机灵活的大陆战斗机和强击机。台湾的防空导弹杀伤概率低，如“霍克”导弹的理论值为 80%，“小木解树”导弹为 50%。而在实战中它们的杀伤概率比这界定要低得多。

台湾防空导弹构筑不起空中防线

台湾地形起伏大，使防空高炮和导弹的观察和射击死角大，结果台湾防空部队不可能构成相互重叠掩护的有效防空火力网。台湾山地的遮蔽，加上大陆飞机如“强—5M”等火控设备的进步，使大陆飞机在台湾防空火力下暴露的时间缩短，往往只有几秒！由于台湾地理上过于靠近大陆，因此大陆战机从海峡中线冲到台湾只要两分钟！而台湾的多数防空武器系统反应时间长，如在有准备的情况下，“霍克”导弹反应时间长达34秒，最短也要20秒。“爱国者”为12秒，也快不了多少。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台湾导弹反应时间长达10分钟甚至半小时，这使台湾防空导弹几乎不可能拦截大陆的战斗机，只能打轰炸机和运输机，但大陆肯定将先出动战斗机炸掉台湾防空导弹，而决不会先将轰炸机和运输机送上前来让它打的。

台湾的导弹除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爱国者”外，都极其陈旧易干扰。台湾的地形使其导弹阵地暴露在海边，如设在台北三芝乡的导弹阵地距海边仅几千米，极易被大陆海上炮火摧毁。总之，凭台湾的导弹力量，不可能构筑起一个完整的空中防线。要拦截大陆攻击机，台湾的防空导弹和高炮必然将全部离开地下掩体进入表面阵地。对此，大陆军方的无人侦察机传来的电视画面中可清楚看见。这样，一声尖锐的呼啸，大陆弹道导弹便会在台湾防空阵地撒下“云爆弹”，大面积沉闷的爆炸之后，足令台湾军方阵地上防空导弹高炮全毁。台湾地域窄小，其部队分布密集，这使大陆很容易地消灭台湾的防空兵力。

大陆弹道导弹同时可装备子母弹，子母弹杀伤范围大，对导弹命中精度的要求相对降低。无数子弹触地爆炸，崩出密集的钢珠雨，台湾防空部队官兵暴露在地表无处躲避。现代防空武器都是要组成一个系统才能工作的，如果许多导弹、高炮和雷达被摧毁，那整个阵地便丧失战斗力。这样，台湾空军和防空系统将被完全压制，为大陆在台湾下一步行动开创条件。

规模激烈空战中的对空敌我识别是全世界都未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美军在海湾战争中采取的是设空中走廊这种最笨也最有效的办法解决误伤问题。而台湾空军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台湾很小，不能设空中走廊。如果台湾上空发生空战，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大量的台湾防空导弹、高炮打死台湾飞行员的情况。台湾空军飞行员只有800名，很快便将消耗净尽。

利用台风季节进袭更难反击

如果大陆利用夜间和台风季节进袭，对台湾打击将更大。因台湾太小，每次台风来临，全岛都笼罩在强烈的风雨中。这时台湾都要收起武器，战机防空武器基本都失去战斗力。而大陆的机场在台风影响范围之外，大陆战机可从容起飞，在轰炸雷达和 GPS 卫星导航的帮助下，用对风不敏感的重型炸弹轰炸台湾的空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这类大面积目标，台湾更连还击之力都没有。

台湾高大陆最近处仅 130 公里，大陆射程最近的 M—7 导弹也可打到台湾的目标去，洲际导弹就更不必说了。如果听任大陆的导弹轻易地打掉台湾的机场、军港和防空阵地，那么台湾军队就只剩下投降的份儿了。台湾军队有能力拦截大陆的导弹吗？李登辉不懂军事，他说有能力对付中共的“飞弹”，希望以此稳定士气，然而军事现实决不是吹牛可以改变的。防御导弹是一种成本极其高昂的作战形式。拦截导弹需要卫星预警系统，建立这一系统需要数百亿美元，台湾当局绝对凑不出这笔巨资。即使有钱，台湾要借美国的卫星预警系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美国的绝密战略系统，绝对不会外借。而没有这个系统就不可能拦截导弹。

在台湾机场上布雷

如果需要，大陆的导弹可将台湾空军全部设备完善的常备机场和大多数临时公路机场彻底摧毁。大陆军队可以数枚弹头达十吨甚至于数十吨的特大威力弹道导弹摧毁跑道。大陆导弹能在跑道上炸出多个直径几十到百米以上的巨坑，其剧烈爆炸崩起的土、石、混凝土将打烂机场上全部建筑、飞机、高炮以及杀伤暴露在外的台湾空军人员。

台湾机场建筑有坚固的飞机掩体，可以经受住 250 公斤炸弹的破坏。台湾空军声称其战斗机躲在其中不怕大陆军队攻击破坏。但现在飞来的弹头又何止 250 公斤？台湾飞机掩体将在大陆导弹剧烈爆炸的烟云中破碎、飞散，令各大机场遍布碎石、尘土和被破坏的建筑物，也令台湾残存掩体和库房沉重的防弹门被卡死，就是内部飞机侥幸未被摧毁也根本开不出来。为保险起见，大陆军队的 M—7、M—9 式小型弹道导弹，每枚可携带数万颗小型地雷，封锁各个被破坏的机场。这些地雷引信可有绊发、压发数种，而多数是磁电感应引信，人和飞机一接近就发火爆炸，这等于给机场上的台湾空军关了禁闭——不许动。这样，一旦开战，在台湾这个“不沉航空母舰”上，即使部署最先进的战斗机，也会因机场被毁而丧失全部战斗力。

台湾机场无法躲

有人也许认为，台湾可以将战斗机分散部署在许多简易公路机场上，从而保存其战斗力。然而现代战斗机如 F—16，每出动一次仅航空油料就要 6 吨之多，而它复杂的机械及电子设备，则更离不开大量复杂专用的特种地面设备的维护，再加上导航和通讯问题，现代战斗机分散部署在简易机场上，虽然可能得以保存飞机本身，却根本不能保持其战斗力。假如飞机场被毁，台湾的 250 架 F—5E 战斗机分散部署而幸得保存下来，但在以后的空战中只能起到原来 15 架战斗机的作用，那么战斗机本身保存下来又有多大作战意义？

再则台湾岛大小，它全部处于大陆雷达的监视下。因此台湾任何机场只要使用一次，就再没有秘密可言。台湾平原极少，能做机场的更有限。因此台湾机场无论再分散、再保密，即使不使用，大陆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并可准确将其摧毁。

海军布雷扼杀抗拒

大陆海军也可以逼近台湾海岸，对台湾空军目标进行炮击。由于台湾地形限制，台湾空军的全部机场——包括临时机场全部靠近海边，尽在大陆海军炮艇的射程之内。如果在大陆海军的旧快艇上安装大舰用火箭炮，射程可达 15 公里、40 公里直到 80 公里。大陆海军日夜发动炮击，将严重破坏台湾空军的机场关键设施，杀伤台湾空军原本不足的飞行员和技术员。台湾高价购自西方的战斗机，将一再被大陆廉价的炮弹打得粉碎。大陆海军可以用大量布雷火箭弹，在台湾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上布下百万颗脾气暴躁的地雷，将少数敢于继续抗拒活动的台湾官兵炸得稀烂。大陆海空军布撒的地雷将扼住台湾空军的喉咙。即使台湾军方调来台湾全部扫雷专家和扫雷部队援救其空军，然而面对埋在土石中的百万颗地雷，台湾排雷专家也将一筹莫展，以台湾现有力量排除这些地雷需要一年！

台湾战机备受威胁

大陆海军改装后的反舰导弹，也可加入对台湾空军及其防空部队的惩罚性火力打击。无人侦察机和渗入台湾岛的侦察兵，将为大陆军队的远程攻击指示目标，修正弹着点，并报告目标摧毁情况。在许多地方，利用大陆军队远程火力攻击造成的极度混乱的机会，大陆侦察兵可以直接向台湾空军和防空部队展开广泛猛烈的突击。在大陆海空军的炮击和布雷之下，台湾昂贵的战机和地一空导弹将可能全部瘫痪。

中共快艇的作用

大陆海军是世界装备快艇最多的，数量多达几千艘，其目标信号弱，又配有完善的电子干扰设备，加上有海空掩护，而

台湾军队反艇导弹数量不够，若打炮艇则在最后决战关头将无导弹可用，因此台湾军队对大陆炮艇几乎无计可施。台湾军队武器弹药有限，而大陆正好相反装备过剩，杀鸡用牛刀，火力强盛将使对手损失极大。

如果有必要，大陆单用轰炸机就可将台湾防空体系最后毁

灭。当然这将付出代价，但大陆轰炸机将赢得最后胜利，这甚至是台湾的对手也毫不怀疑的。

大陆沿海机场众多，足够容纳所有的参战飞机。大陆机场纵深梯次配置，没有人能将他们这么多机场都摧毁。

总之，因为台湾过小和过于靠近大陆，这一不可改变的地理特点，使得台湾的全部空军基地处于大陆强大的重叠火力打击范围内，以此为基地的台湾空军部队随时有可能丧失地面后勤保障，从而丧失其战斗力。台湾的空军部队没有战略纵深可退，这样即使台湾的空军再强大、再先进，毕竟这些战机都不能永远呆在空中，它必须落地，而且必须落在大陆导弹火炮网之前，于是这落地的“猛禽”就变成了软弱的“肉鸡”，将任由大陆火力轰击随意处置。

整个海峡都在大陆库基反舰导弹射程内

过去台湾海峡对解放军陆军的小木船来讲，那是辽阔的外海。但今天大陆军方可以轻易地控制整个台湾海峡，将台湾海军从这里挤出去。台湾海峡只有 130 至 200 公里宽，完全在大陆海岸雷达的严密监视下，同时整个海峡都在大陆岸基反舰导弹的射程内，大陆的大批反舰飞弹可在海峡内编成稠密火网，密集攻击进入海峡的台湾军舰。台湾军舰当然可向来袭导弹发射舰一空导弹拦截，同时舰上的反导弹电子战设备也可全部开动，但台湾舰上导弹数量毕竟有限，每舰少的只有 10 枚，最多的也不过 40 枚。历次实战纪录证明，防空导弹在实战中平均每击落一个目标，需要 30 至 90 枚导弹，因此对付大规模攻击，台湾舰上导弹肯定不够用，而且台湾导弹全力进口，其中“标准”舰一空导弹总共只有 170 枚。最终台湾海军官兵将绝望地看着被导弹烧得焦黑的空荡荡的发射架，等待失败来临。军舰上配备的有源和无源电子干扰设备都有方向性，一部设备只能干扰 20 到 30 度夹角范围内的来袭导弹，而且舰上配备干扰设备数量也有限，不可能同时干扰从 360 度方向来袭的全部导弹。如今大陆的导弹从四面连续飞来，此时就是世界上电子战力最强的美军战舰亲自前来也难免灭顶之灾。

台湾军队阻挡不住大陆来攻

干扰当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对付“饱和”攻击。大陆的旧导弹舰是世界上最多的，大陆的旧反舰导弹据说过剩，大陆因此发射导弹毫不吝啬，而大批导弹齐射的打击是任何战舰也无法承受的。大陆海军还拥有最先进的超音速两倍的反舰导弹“上游2号”、“C-101”和“C-201”，即使美国海军舰只也无法对付这类导弹。大陆旧式导弹弹头重达500公斤以上，威力大得惊人，足够将台湾最大的军舰炸成两段。台湾军舰将同时遭到多枚导弹攻击。而台湾军舰上配备的美制“方阵”（反导弹）近程防御武器系统每次只能拦截其中一枚，还经常打不中。因为“方阵”理论上的有效性仅0.2，而在实用中的有效性更低，同时它在舰上有很大的死角。大陆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速度太快，世界上现有的近程防御系统根本不可抵御。即便大陆的反舰导弹被击中引爆，由于该美国方阵武器系统射程近，而大陆导弹的弹头威力过大，它引爆后炸出的无数大威力弹片仍将劈头打烂全部雷达电子设备，军舰仍然将完全失去战斗力。美制“方阵”，不能对台湾军舰提供足够的保护，只能战前壮壮胆。总之台湾水面军舰不可能在大陆密集的反舰导弹火力中生存，因此台湾海军只能退出大陆导弹的攻击范围，只得退出台海去。

台湾海军还有一个致命敌人，那就是台风。台湾岛每年都有多次台风过境。台湾岛面积小，一旦台风到来，全岛都笼罩在狂风暴雨中无处例外，而大陆多数地方处于风雨外，这时更有利于发动攻击，大陆战机可将不耐风浪必须回岛避风的台湾导弹快艇任意宰割。台湾的大型军舰如果回岛避风，也难免同样下场。如果它在海上也不能幸免，它的舰体在风浪中剧烈摇摆起伏，舰上武器即使再先进也难免失效，军舰失去自卫能力，而大陆的战机受风浪的影响相对小些，仍可坚持攻击，那时台湾军舰只能频频挨打而毫无还手之力。总之，不可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使台湾海军即使再买多少新式装备，也还是挨打被动，大陆如果来攻，它没有能力阻止大陆军队渡过海峡、登陆台湾。

如果台独趋势无法制止，一旦需要，中共的导弹和海陆空三军就会跨海出击。那时，事实将会证明：台湾海峡不再是天险。

附录三：中国对“局部战争”的构想

〔作者吴嘉宝为澳洲昆士兰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专研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问题〕

“局部战争”出其不意、变幻无定，是中共现今集中研究的攻台军事战略思想。自 80 年代中后期，中共军事领导层已经决定组建快速反应部队，担任突破、奇袭等任务。不过这部队在行动时必须取决海、空军的支援能力，而目前解放军在这方面的装备仍有待加强。

台湾记者郑浪平的《一九九五闰八月》在去年出版后引起的股市波动和移民潮，显示台湾民众潜藏心底一触即发的恐共情绪，但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等却缺乏了解。台湾的前途此时正值“中国威胁论”高唱入云的时刻，而中国又与菲律宾在南沙群岛美济礁发生纠纷；中国的近邻，以致西方都非常关心中国大陆对台用武的可能性及因此造成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战略学的角度，并以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为主线，探讨两岸目前的战略形势、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动因（dynamics）和制约因素，以及假如动武的话，可能出现的军事状态（scenario）。

演习试射“对准”台湾

随着邓小平于 1978 年正式复出主政，中共明显调整了对台政策，并采取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先后提出了以和平统一为主的《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和“一国两制”等方案。台湾方面亦以弹性处理“三通”问题、取消戒严令等作回应，两岸更早于 80 年代初停止持续了 20 多年的互相炮击。可是，即使大陆过去十多年来两岸关系的主线是缓和，但它一直拒绝排除对台用武的可能，台湾人的心头还是留有一根刺。

李登辉在台担任“总统”以来，中共越来越不满台湾政治的台独倾向，舆论机器的批评也日渐尖锐，所以从台方的角度来看，沿海地区所进行的军事演习，都是冲着自己而来。今年台湾以“外交”和金钱为手段，积极地争取加入联合国和扩展建立邦交的国家，李登辉的美国之行，更被视为“外交”上的一大突破；换来的是大陆对台湾的不信任和猛烈抨击，尤其针对李登辉及其政府。其实，台湾媒体误报的“东海五号”演习和最近大陆在基隆港附近的导弹试射，都不过提醒台湾人：两岸自 40 年代以来的对峙状态尚未结束，国家分裂之事，仍有待了断。而在政治、“外交”角力之余，双方的军事现代化亦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使两岸关系形成了外弛内张的格局。

局部战争已取代人民战争

中国大陆的军事现代化中最重要，而又常被忽略的一项，就是军事思想。中共给军事思想的定义与西方不同，它包括了战争观和方法论、军队建设理论以及作战指导思想等。在 70 年代后期，大将粟裕重提叶剑英元帅的“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

思想，将自内战时期就“代代相传”的“人民战争”思想加以修正。中央军委更于 1981 年的会议中，放弃“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 1985 年，邓小平提出裁军一百万的同时，确定了国际间将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并摒弃了自 60 年代中期开始奉行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取而代之的是“局部战争”。

“局部战争”(local/limited war)并非中国大陆所发明，在 50 年代，美国学者如 Robert E. Osgood 和 Herman Khan 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简单言之，“局部战争”相对于“全面战争”

(total war)，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使用有限的武力来达到有限的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的局部战争战例，包括了大规模及中、高烈度(intensity)的战争，如 50 年代的韩战、1962 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以至于小规模及低烈度如 1969 年中共和前苏联在珍宝岛的军事冲突和 1988 年中国对越南在南沙群岛的海战。虽然这些战例都是常规战争，但局部战争也可包括核武器的使用。

正因为局部战争强调“出其不意”和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修订其“积极防御”战略。以前战争被概分为初战时期、战争中期和末期，军队相应实行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击的部署。但在局部战争之下，整个战局“变幻无定”(fluid)；战场的时空不再有前、后方之分，也没有前期、末期的明显划分。

1991 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之后，解放军对未来局部战争的形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把国防政策定位为准备应付“高技术局部战争”。军、兵种合同及协同作战，将取代中国军队过去的单一兵种作战或简单的步炮合同作战；而且投入战争的力量不但是立体的，还加上太空、电磁场两方面，形成一个所谓“五维”(five-dimensional)的作战环境。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自然与解放军现有军力和体制差距甚大，这已进行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改革，尚要继续深入和贯彻。

南京军区增强对台战斗力

随着中央军委在 1985 年对国际战略形势的重新评估,解放军除了裁减兵员外,更进行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十大军区减为七个,陆军全面重组为合成集团军,边防部队则改编为武装警察;这些改革都使常备军更专业,军队的指挥与控制更灵便。尤其将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后,就明显增加了对台作战的战役纵深。到 80 年代中后期,一方面为了适应局部战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碍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以经济为主,造成国防开支削减;军事领导层决定组建“拳头部队”,即快速反应部队。

这些部队开始组建时以营为单位,现在则建制不一,并已设于数个集团军,例如 15 军(空降)、北京军区的 38 军、沈阳军区的 39 军、济南军区的 54 军和驻湛江的海军陆战部队等。快速反应部队在装备、训练、物资保障、战备程度以及战斗力,都比其他常备军为高。在局部战争,这些部队将担任突破、奇袭等任务。不过,由于组建历史尚浅,财力亦始终有限,他们都只进行过较小规模的演练,实战能力,特别是持续作战能力,实在有待考验。当然,快速反应部队在国土以外的局部战争中的运用或投放(force projection)还要取决于装备和海、空军的支援。在这里,笔者无意重复中国武器装备的型号和性能,只再次强调解放军目前在这方面仍很不足。

为解决武器装备落后的问题,中国除了增加国防科研的投入,亦借助前苏联解体及急需改善经济的时机,购入 Su-27 战机等新式装备,更进一步要求技术转移。但致命的问题是,中国还未建立起一个“知识化、专业化”的军官队伍,即使新武器已到手,还要长时间才能转化为战斗力。这或许是“人”的因素在现代战争的新诠释。

面对以上的各项变数,中国大陆仍坚持在统一台湾问题上,做好和平谈判及武力解决的两手准备。究竟有什么因素促使和制约大陆动武?若真要使用武力,局势又会如何?一旦武力进攻台湾所出现的就正如解放军目前所集中研究的“局部战争”。

自蒋介石时期数次“反攻大陆”的行动失败以后,海峡两岸的和、战主动权已明显在大陆手上。虽然台湾在过去数十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成就远超彼岸;但军事方面却刚好相反,日渐形成强弱悬殊的格局。

中共对主权立场绝不含糊

进入 80 年代，中共领导层亦深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求一个和平的安全环境（security landscape）。同时军队经过“文革”的破坏，战斗力成疑，1979 年的“惩越”战争，就是明证；故此，虽然邓小平明确表示希望见到统一大业完成，却也抛出一系列和平方案。一方面，中共估计国民党主政下的台湾，即使偏安一隅，也与大陆一样反对国家分裂；一方面中共也一直很成功封杀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岂料李登辉执政后，凭借台湾的经济力量，锐意提升其国际政治地位；在民主改革后，“台独”的呼声也清晰可闻。大陆看在眼里，自然觉得统一之日，越来越远。而李登辉访问美国，正犯中共大忌。大陆自内战时期，即怀疑美国刻意中国分裂，在国内一直宣传为美国附庸。如今李登辉企图靠拢美国，而美国的众院议长金里奇更鼓吹承认

台湾独立，这无异于火上加油，所以感到有必要煞一下日益嚣张的“台独”气焰。

其实回顾中共过去每次出兵，除韩战尚有争议外，其他都是因为涉及主权；在这问题上，绝不含糊。然而中共的主权观念与西方不同，不但强调领土完整，更要求对国内事务有绝对控制权。只要有一天，我们看到大陆的宣传机器，指名道姓的给李登辉及其政府扣上“台独”的帽子（编者按：《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已于 7 月 23 日以联合评论员名义，强烈抨击李登辉），而国际（特别是美国）又即将承认台湾的对等地位，帮台湾的倒忙；那么大陆一定不会坐视。江泽民作为新一代的领导核心，既要树立威信及坚强形象，又要倚靠军队支持，因而让军方在政治、外交方面势力坐大，使大陆更显“鹰派”的颜色。

不过，中共果真动武的话，可能出现的局势，有以下几点可以剖析。

诺曼底式登陆力有不及

一、登陆、空降作战：中共的空降和海军陆战部队是军中精英，但碍于装备，特别是军载工具，要在台湾本岛进行“诺曼底式”的登陆或空降作战，恐怕力有不及，加上缺乏海、空军支援，只能威胁金门等岛屿，而且容易引致重大伤亡。

二、导弹战：中共拥有的地对地导弹，是台湾所无，而且台湾也没有反弹道导弹（anti-ballistic missile）系统制衡。但即使大陆导弹袭击得手，还需进行地面占领；故此导弹战本身虽然能避免战败风险，但只可制造政治恫吓。

三、封锁台湾海峡：潜艇是第一个手段，但中共目前除数艘核潜艇外，其余都因用柴油发动故噪音大、续航能力差、补给差等问题，容易被发现攻击。潜艇的优点是隐蔽，但一旦在封锁时开火，就暴露了自己。同时中共必须取得制空及制海权，否则就会面对台湾的猎潜力量。

导弹试射是变相封锁

不过，导弹是另一个手段。最近的东海导弹试射不单在政治上警告“台独”势力、在军事上展露实力和试验导弹性能，也是一种变相的封锁。在试射期内，民航班机和船艇都要改道；倘若试射在台湾重要的领空或领海附近进行，效果更不问可知。当然，封锁会给区内经济活动造成影响，东亚诸国和美国的反应会如何？这是中共的重要考虑。

根据大陆军事单位的专文和出版物显示，解放军在后冷战时期不但未有松懈，反而更积极争取在相对和平的形势下加速现代化，拉近和军事强国，尤其是与美国的距离。中共领导层明白大陆仍涉及很多边界纠纷，而未来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强大武力作后盾及控制；南沙群岛的资源，各样的主权争执都可能引致局部战争。更重要的是，中国要跻身世界强国，它的主权一定不容挑战。因此，虽然大陆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必胜的把握，但历史似乎说明，基于主权问题牵连甚大，北京会不惜做出西方认为不理智的行动。

附录四：实用主义主导下的美军策略

——分析美军介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

〔作者王飞凌为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曾任教美国的西点军校，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正式教官〕

美国是否干预台海战事？这位西点军校前任教官说，美国军界倾向于认为台海战事“不太可能”、“不必要”或“不值得”；而美军直接干预的可能性更几乎为零。

台湾海峡两岸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不仅将是两岸人民的不幸，亦将是美国的一大外交灾难。无疑华盛顿决定干预与否、干预多少，美国都将所失甚多，因此美国政策一直是在于避免、阻止乃至“遏制”台海战事的发生。美国的基本考虑，简言之，最重要者为维护自身这一地区的利益和减少损失。其次大约是遏止中国大陆军政并促其“和平演变”。最后才考虑中国统一或台湾独立与否的问题。除了一个海峡两岸均予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或统一或台独）之外，目前的台海局势对美国最为有利。美国将密切关注任何改变现状，打破均势的发展。武力独立或武力统一都会祸及美国利益。

美国军政界人士眼下倾向于认为台海战事“不太可能”、“不必要”或“不值得”，将只会是一个“糟透了的”局面。他们觉得台湾军方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大陆的越海两栖进攻，只是大陆的海上封锁阻扰大概会对台产生致命的心理效应。可以推测，如果台海战云逼近，美国很可能会以积极的外交活动及其他手段来力求避免两岸兵戎相见，从而替自己省去一大难题。

间接干预可能性最大

天谴人误，万一战事兴起，大陆对台用武除了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外，美国军事选择依可能性大小列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美国可用间接的军事干预来扶助台湾。美国可向台紧急运送大批军事装备包括先进的防空、反潜及扫雷武器，美军可以向台军方提供卫星及电子情报，甚至派技术顾问人员赴台。美国还可以帮助台湾在台东地区（例如花莲港）扩建新港口，以减少大陆封锁的效力。间接军事干预风险较小，“效益”高，可能性因而最大。

第二，完全不作任何军事干预，主要使用政治经济手段来影响台海战事。除了声明谴责、外交斡旋、冻结大陆在美资产和切断经贸关系乃至断交等之外，美军将在西太平洋地区高度戒备，加强情报收集，静观变化再作决定。这种反应很可能只是一种过渡。

第三，美国可直接用海空军力量在“维护海洋通航自由”的名义下对台湾周围国际海域进行巡逻护航，实质上挑战大陆的封锁，屏护台湾诸岛。美军只要向台海地区增派二至三个航空母舰编队（Carrier Battle Groups），便有足够的力量来相当有效地实施直接军事干预。在具体的做法上可允许台湾向美国申请“换旗”（reflagging），即是让台湾船队全部挂上美国国旗，犹如当年科威特在两伊战争时一样。这样台湾船只进出台海时便可合法地享受美军保护，美国也可能会联合盟国如日本一起参加此类护航。

不过，美国的国内政治或许会使直接军事干预难以持久。另一个顾虑是，与加勒比海、波斯湾或亚德里亚海不同，在台海巡航的美舰将处于大陆陆基导弹（编按：指由地面基地发射的导弹）的威胁之下，相当危险。若有一艘航空母舰受创及至沉没，对美军的干预决心将有很大的撼动。如美舰不在海峡中巡弋，则护航将不能奏效。为确保美舰安全，美军可能会被迫攻击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从而引发一场战事。由于直接军事干预将冒与一个核国家直接交火的风险，从而置大半个美国于大陆核武器的威慑之下，华盛顿似难轻易实施。

第四，美国可派出地面部队进驻台澎金马，或借用联合国军名义来“维持和平”。不过据笔者观察，美国军界人士一般都认为用地面部队直接干预台海战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美国利益与国情不允许这种风险花费均极大的士兵孤悬台海的行为。另一方面，不同于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台湾不是美国所承认的主权国家，美国对台并无防务条约的义务。

战事爆发的时机具关键性

当然，目前整个台海战事尚属一种假设。美国的对策更属任何人都可做的猜测。究竟华盛顿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及采取哪种方式，看来要取决于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战事的起因。如大陆遽然动武，不顾调停，意在用武力摧毁台湾，则美国军事干预可能性较大，国内政治支持也会很强，美国人的“台湾情结”亦会大为爆发。如果台湾迳自独立，不顾大陆警告及美国劝告，或者台湾同胞引发战事，则大陆用武后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下降，民众也将较为分歧。国会和“总统”可能会互相制时，致使难有有效的军事反应。

二是战事的规模与方式。如大陆对台实施全面攻击，包括大规模空袭及登陆作战，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则美国军事上旁观的可能性较小。如大陆实施较“文明”的海空封杀或海上“检查”行为，甚至仅宣布台湾海域为战区，以阻滞海运施加压力为主，则美军干预的可能性不大。如台湾主动出击扩大战事，意在争取国际同情和卷入来支持其与大陆的抗衡，则美军干预的可能性更小。

三是美国国内局势及台湾在美游说集团的能力。台湾战事爆发的时机对美国军事干预与政治（如大选之年）或过多的国际牵制（如别处热点）势将影响美军干预的决心与能力。台湾战事源于台湾统独之争。在美华人中的统独之争大约会分化势力强大的台湾游说集团，从而削弱其对美国决策层的影响。只要美国不承认台湾独立权，加上大陆在美势力与影响的增长，假以时日，美国军事干预台海战事的可能性大概会趋向减少。

四是台湾岛内情况。美国有资深军事安全分析家认为，如果台湾政治民主化进一步发展，导致在统独问题上的剧烈公开争执对抗，乃至某一党派集团公开呼吁并支持大陆对台独用武，则美军干预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更麻烦的是，某些在台势力也许会用政变乃至叛乱的形式来要求或配合大陆用武力阻止台独。鉴于历史教训和自身训练，美军对卷入他人内争的泥沼是极不情愿的。岛内的政治分歧和动荡甚至会使间接的军事干预也难以实施。

留有充分进退余地

五是华府与北京关系的变化。大陆如果在人权与民主诸项上有受美国欢迎的重大变化，或者重大国际危机需要大陆合作，从而引致北京与华盛顿关系有明显改善，则美国舆论与民众对大陆对台用武的反感会大为减少。犹如美国对俄罗斯用兵车臣的反应一样。美国甚至可用“国内事务”为辞，仅要求双方克制，不得损害美国利益，根本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任由台海战事自行发展。

总之，美国对台海战事是否以及如何军事干预，一直是留有充分的进退余地。这一政策上的灵活性，依笔者之见，其用意在于“吓阻”台海战事，不在于用武力保护台湾独立或促进中国统一。台湾海峡两岸之争需要两岸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勇气与力量去解决。美国对台湾政策一直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加现实主义的政策，而美国是否军事干预台海战事亦将是如此。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比，中国的统一或台湾的独立乃至别的一些“国际法原则”如海洋通航权均属次要考虑。海峡两岸人士似也应如是，以民众国家的根本利益为行为宗旨，避免滑入用武力解决分歧的最糟局面。台湾战端一启，涂炭者两岸百姓而已。

附录五：解放军为何不怕美军干预？

〔作者徐泽荣系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主席〕

北京一旦武力攻台，“美国能否救台湾？”是一个关键问题。但近半世纪以来，中美两次军事较量，皆以美军失利告终，美国部队卷入今后的台海纠纷机会太小。解放军虽然在军事技术方面远不及美国，但它对美军弱点的经验总结，有助其弥补军事技术上的不足。

中共对台使用武力，无非两种目的：一是逼和，一是陷台。我相信，若无外力的介入，中共会倾向于采用武力逼和，且会于近期内开始前奏动作。因武力逼和可以造成台湾朝野清晰的分化，既可使国际社会对于援台一事发生意见分歧，也可有利于今后“以台制台”。中共也不大可能越过武力逼和直接武力陷台，因根据它的意识形态，它还要收拾台湾的人心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但这一阶段绝不会持续太久，太久会对大陆沿海发展不利，且易于被别国钻空子。估计此一阶段不会超过三个月。如三个月后台湾当局仍不软化，则武力陷台就会剑及履及。

假若台湾的应变设想是力争突破封锁，争取外援的话，就不难发现，讨论两岸战事的要害，就不可避免地要落在“美军能救台湾吗？”这一问题上。

美曾两次败阵于共军

最近郭岩华于其文章《亚洲均势：台湾、美国与中共的战略关系》（金千里、张涛编《江八点的迷惑》，台北：中国大陆杂志社，1995）中说，无论是南沙还是台湾，美国都不会让大陆跨出武力解决的第一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郭氏估计美国会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干涉：一是以军售方式预防两岸发生战争；二是贸易制裁中共；三是军备援助和武力干涉。郭氏满怀信心地展望：“今日更强于往日的美军再次出动，打破中共的封锁，就注定了中共的失败。”郭氏似乎没有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美两次军事较量都以美方失利告终这一基本事实。

1950年来，在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中，中共军队仅凭以往缴获的日式和美式装备，就将越过南北朝分界线北进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击败，收复了北朝鲜的全部失地，造成美军成军以来最长距离的一次溃败。这是超级大国苏联于其最强盛之时也不曾做到的。它所击败过的最强对手是德国，其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中国的四川省。以后在越南战争中，美国陆军就不敢越过南北越分界线，在援越抗美战争中，中共已不用亲征，只须向前线国家输出战法（人民战争）和提供后勤支援，就可迫使美国于1975年知难而退，造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战争失败。越南若无中共的指导和支援，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

1958年金门炮战时，为台舰护航的美舰于炮声一响时就置台舰于不顾，开出炮轰范围之外，此乃也是有案可查的。1968年香港反英事件时，中共南海舰队曾奉毛泽东、周恩来之令派炮艇进入香港水域，炮击英方军用船只。英方军用船只与驻港美舰亦未敢采取任何报复行动（此事为第一次透露，乃据我采访前南海舰队司令吴瑞林所得知。）

美国自1941年起，便连续不断地在亚洲陷入三场战争：对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前后共34年，至1975年方得以在亚洲脱离战争泥坑。越南战争给美国造成的危害创痕，至今仍令许多美国人记忆犹新，现任总统克林顿就曾以反越战著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还会与中共这个它两次交手均未讨到便宜的对手重启战端，很值得怀疑。

70年代末澳大利亚汉学家菲茨来拉德就曾建议过，经此失败，美国今后不宜再在亚洲图谋陆上霸权，这一霸权应让予中共。美国在亚洲上应图谋海上霸权，以此针对中共形成亚洲的军事均势。很可能这就是亚洲军事均势的定向。

解放军掌握美军弱点

中共军队其实颇熟悉美军。解放军总参谋部曾于朝鲜战争结束后编写过一本四卷本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对美军的弱点有如下论述：

——战役布势仅为一个梯队，预备队很小。缺乏强大的突击力量，不能做到战役速决。当经我第一防御地带不断阻击和反冲击，往往招致重大挫败；待重整再发起攻击，形成断断续续逐次被我击溃。前进中害怕暴露侧翼。当我割裂其布势，迂回其侧背或断其道路时，往往全线动摇，直至仓卒撤退。

——在进攻战斗中，须因采取轮番作战，易被我各个击破，过早丧失后备力量，进攻劲头逐渐衰退。步兵进攻队形密集，冲击力弱，过分依赖空、炮、坦火力支援，遭我阵地反冲击予重大杀伤后则狼狈后退。如一旦失去火力支援，步兵便无力进攻。害怕夜战、近战。

——在防御战斗中，同样是将全部兵力作一个梯队的布势，反构成战术地幅内的防御纵深；其战役纵深兵力很少，甚至无兵守备，异常空虚。当我大军进攻，突破其一部防御地段时尚能应付，如两个以上地段被同时突破，则缺乏机动力量而处于手忙脚乱，往往全线撤退。

——美军冲击时都持炮前进，大喊大叫，螺集一团，缺乏单兵作战精神。行动迟缓、畏缩不前，怕近战，不敢与我白刃格斗。

——对我坑道异常畏惧，不断研究与改进战斗手段和破坏方法，但始终只能从外部设法破坏，不敢向坑道内部冲击。

——敌步兵过分依赖空军和炮兵，一旦被我逼近，失去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就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

如今，事过 40 年，在兵力不足、战斗意志弱这些方面，美军是否如郭氏所说：“今日更强于往日”呢？

中共如何对付入侵美军？

北京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付美军的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在朝鲜和越南，中共军队都曾有效地使用高射炮来弥补其航空兵量与质的不足，其高射炮部队击落击伤的敌机，比其空军击落击伤的还要多。在武力陷台时，若遇上美国空军，中共军队大可以使用各种导弹来代替高射炮。它也可以在整个空域中使用战术原子弹，毁灭美军的整个机群。在海战方面中共军队也可以使用战术原子弹和中子弹来毁灭美国舰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器的研制先后经历过两次革命：一是大杀伤力武器的出现，一是高精度武器的出现。前者即所谓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后者即所谓高科技武器。大杀伤力武器的效力是“一枚炸死一片”，高精度武器的效力是“一炮打死一个”，显然前者要比后者厉害得多。那么，为什么又要研制后者呢？这是因为西方国家认为前者只能用以威慑，不能用于实战，得另外想办法。中共在高精度武器方面不能与美国匹敌，但在本国领域内以大杀伤力武器摧毁入侵美军，其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时，因是派兵远渡重洋到别国作战，美国是否能以相同的手段报复中共，又是很有疑问的。美国费得着为台湾和中共干一场本土核互射吗？如果伊拉克当年已拥有大杀伤力武器，试想联合国军还敢那样用兵么？

美军若不能救台湾，那么台湾当局寄希望于美军，就等于让美军害了台湾。其实，美“军”害了台湾还有另一种形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于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便拿了科学主义作它的精神支柱，以确立信心赶

超英、法。于是其学术研究也充满了科学主义色彩。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在战略学方面，科学主义的影响尤为显著。军队设参谋部的制度就是由德国首创；德国战略家曾认为，军队布署的几何图形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德军参谋长史来芬曾花费十五年来构思制订攻克西、东欧的计划，连哪一天哪一刻德军哪一营乘火车到达哪一敌国哪一站都要明确规划好。

二次大战期间，大批德国学者逃亡到美国。于是战后美国的学术研究兴起了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行为主义学派，在从事研究时，大量使用数学、统计学、模型等。美国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战略学也不能置身度外。其实这些东西有相当大一部分只是纸上谈兵（有一部分是精彩的），不若孙子之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来得正确。

行为主义战略可能已误导李登辉

英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战略学就很有意识地与之划清界线，称此种趋势为“朝着错误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统计学家出身的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曾将这一套贯彻到越战指导中去，如计算这个月往北越投放多少吨炸弹，河内就会在谈判桌上退让多少，给士兵发放选择法（multiple choice）的作战手册等，结果是鲜有应验之处。现经揭发，沦为笑柄，并被拍成了电视片到处播放。麦氏最近公开承认越战是个错误，也是与受到这方面的讥讽有关。相反，欧洲的战略学（也许还有澳洲）还保持实事求是的基调。后来，美国中情局和兰德公司的首长合写了一本书（Douglas S. Blaufarb and George K. Tanham, Who Will Win?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89），坦率承认在对付革命战争方面，美国要向英国学习。我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习过战略学，也深感美国战略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误人子弟。据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中任过教的王飞凌博士说，美国军校军官如今对美国战略学者的行为主义理论也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

我怀疑李登辉“总统”身边的外交、军事顾问多是留美出身，便以为行为主义这套东西误导了这位农业专家，使他的有关言行频频出现有悖常性的现象。他们扮演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王后身边那位星术家的角色，最后必将台湾领向生灵涂炭的深渊。这就是美“军”未救台湾先害台湾。我要是台湾人，就会大声疾呼“清君侧”。

